万卷方法 | 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主编 陈向明

建构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JIANGOU ZHAGEN LILUN
ZHIXING YANJIU SHIJIAN ZHINAN

凯西·卡麦兹 著
边国英 译
陈向明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贸渝核字(2007)第 1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英)卡麦兹(Charmaz,K.)著;边国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3
(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
书名原文: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ISBN 978-7-5624-4747-4

Ⅰ.建… Ⅱ.①卡…②边… 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Ⅳ.C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8132 号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凯西·卡麦兹 著
边国英 译
陈向明 校

责任编辑:雷少波 卢 燕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邹 忌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张鸽盛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内江市兼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940×1360 1/32 印张:9.25 字数:239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624-4747-4 定价:33.00 元

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 总序

质性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2000)*。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总体和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质性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的领域,被运用到与"精神科学"有关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护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它不是来自一种哲学、一个社会理论或一种研究传统,受到很多不同的社会思潮、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近年来,质性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梳理和探讨,但迄今为止很多问题仍在探索和争议之中。

质性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

质性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ethnography(民族志)"一词中的词根"ethno"就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画)"合并组成"ethnography"以后,便成了人类学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

*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在港台也被译为"质的研究"、"质化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界通常被称为"文化人类学方法",在社会学界通常被称为"定性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定性研究的一类,另外一类是"思辨研究"(王洪才,个人交流,2007)。

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

质性研究在西方

早期民族志研究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世界上其他地区残存“原始”文化的兴趣,认为“落后的”民族是人类进化链中的一个环节,希望通过对异文化的了解反观自己的文化发展历程,了解整个世界的“本相”,以此修正西方学界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框架。实地调查方法的开创者是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 Boas),从1886年始他便经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去做实地调查,并把自己的学生赶出图书馆,从学者的安乐椅中站起来,走入实地。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真正开创了长时期实地调查传统的当推波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B. Malinowski),他于1914—1915年和1917—1918年间在新几内亚和特罗比恩(Trobriand)岛上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实地工作。通过亲身经历“在这里”、“到过那里”和“回到这里”的三阶段过程,他发现,白人研究者只有离开自己的文化群体,参与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才能对他们的制度风俗、行为规范以及思维方式有所了解。

博厄斯和马林洛夫斯基的实地调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西方的人类学家,如本尼狄克特(R. Benedict)、M.米德(M. Mead)、莱德可里夫·布朗(Redcliff-Brown)、贝特森(G. Bateson)、罗威(R. Lowie)、克罗伯(A. Kroeber)、普利查德(Evans-Pritchard)、弗斯(R. Firth)、保德玫克(H. Powdermaker)、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等人。他们各自在非洲、太平洋岛国、美国本土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地研究,为实地调查方法的实施和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质性研究中实地调查的传统还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社会改革运动。如美国的杜·波依斯(Du Bois)对费城的黑人社区进行研究时,除了进行大规模的统计调查,还组织了5 000例访谈,其著作《费城的黑人》(1899/1967)被认为是早期城市民族志研究的一个典范。德国的恩格斯(F. Engels)长期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1969)被视为实地研究的佳作。布思(C. Booth)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1927)通过统计数据、访谈和观察等方法,将伦敦划分为50个区,按照不同的标准(如贫穷率、出生率、死亡率、早婚率等)将这些区域进行了排序比较。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 Park)等人对城市内不同少数民族群体、亚文化群体(特别是贫困人群)进行了研究,在其著名的“城市”(1916)

一文中明确地把人类学方法作为研究城市的社会学方法。托马斯(W. Thomas)和兹南尼斯基(F. Znaniecki)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27)则通过大量个人信件,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进行探究。林德(Lynd)夫妇将美国中部城镇居民的生活分成六个方面(谋职、成家、生儿育女、闲暇、宗教、社会活动),对居民的道德观念和精神状况进行了考察,发表了《中镇——美国现代文化研究》(1929/1956)和《过渡中的中镇——文化冲突研究》(1937)。此时的研究者对自己个人的作用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重点主要放在如何从资料中挖掘当事人的观点和态度,认为那里存在着"客观的现实"。即使研究的内容涉及被研究者的主观世界,这个主观世界也被认为是"客观存在"。

从1930年到1960年之间的30年间,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以及非洲和亚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人类学开始受到独立国家人民的排斥,人类学家也逐渐具有了自我反省的意识,意识到自己所持有的文化进化观过于褊狭,而且自己要保持"客观中立"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逐渐将注意力放到对历史文献、语言学以及自己国家本土文化的研究上面。在这里人类学与社会学开始了学科上的合流,两者均在民族志方法上找到了共同点,即长期地与被研究的城市居民群体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切关怀和日常困扰。此时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观性,将自己的"前见"公布于众,探讨自己对研究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如美国社会学家怀特(W. Whyte)在其《街角社会》(1943)中便直接与多克等知情人士互动,参与到对方的各种活动之中。

1960年代以后,质性研究受到现象学和阐释学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者的自我意识不仅可以包容被研究的对象世界,而且可以创造一个社会世界。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意义的创造。研究不再只是对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事实"的了解,而是一个研究双方彼此互动、相互构成、共同理解的过程。这种理解不仅仅涉及研究者在认知层面上"了解"对方,而且需要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去"理解"对方,并通过"语言"这一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中介,将研究结果"解释"出来。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对方所关切的问题域时,"意义"才可能向研究者展现。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上涨,世界政治和文化格局在逐渐地"去中心"、"边缘与中心互换"。在"文化多元"的旗帜鼓舞下,质性研究也被卷入了多种相互不可通约,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和理论范式的论战之中。在后现代的今天,质性研究

者意识到,研究永远不可能"客观"、"中立","研究"其实就是在"写文化"。此时的质性研究已经从以往对自我和他人关系的反思转到了对语言、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科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反省,不仅对不同文化的人观、自我和情感的界定和经验进行探究,了解传统小型地方性社区与世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而且将社会科学研究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在方法上,研究者不再像前人那样讲究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确定性",而是采取一种"视情况而定"的态度,在关系中对"效度"、"信度"、"推广度"等问题进行考量。

质性研究在中国

在我国,质性研究的最早萌芽在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起初由一批外籍传教士、学者和教授发起。如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 H. Smith)于1878—1905年对山东的农民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1989);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C. G. Ditlmer)指导清华学生对北京西郊居民的生活进行了调查;美籍教授古尔普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并著有《华南乡村生活》(1925);美籍传教士甘博(S. D. Gamble)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J. B. Burgess)发表的《北京——一个时代的调查》(1921)。这些调查主要使用西方的调查方法,用外文撰写报告,并在国外发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成立了两个社会调查机构:位于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严景耀深入监狱,通过参与式观察对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1927—1930);陈翰笙领导的对无锡、广东和保定三地区的大规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1929—1930);王同惠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调查"(1934)。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比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陈达的《上海工人》等。作为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是社会调查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乌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0)等都使用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方法。共产党人20世纪40年代在陕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扬家沟调查》等大批调查报告。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社会调查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有少数学者到实地进行追踪调查，如费孝通于1957年和1980年重访自己1935年调查过的"江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受到更多重视，组织更加健全，方法也更加规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质性研究方法被系统介绍和讨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学生在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如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1999)、陶庆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2007)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纷纷使用质性方法回到中国本土进行实地研究，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有的学者则用英文写作，然后用中文翻译进入国内出版界，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000)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2006)。也有海外学者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如丹麦的曹诗弟(S. Thoegersen)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2005)。20世纪末以来，很多港澳台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

此外，不少中国学者从方法论和方法的具体操作上对质性研究进行了探讨。如早在1934年，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就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发展和流派等进行了系统、通俗的介绍。此后，有朱红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1994)、黄淑娉和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6)、水延凯的《社会调查教程(修订本)》(1996)、李德洙主编的《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1996)、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1997)、袁方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1998)、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0)以及她与朱晓阳和赵旭东主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2006)、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台湾学者胡幼慧主编的《质性研究》(1996)等。在历史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对质性资料的鉴别、考据和分析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被认为是质性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知识来源。

目前，质性研究方法在大部分高等院校里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必修

课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质性研究大都与量化研究一起讲授,学生的实地操作机会比较少。20世纪90年代后,很多大学(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开始独立开设质性研究课程,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独立完成一项小型的实地调查。一些大学的研究生还自发编撰论文集,将学做质性研究的艰辛、喜悦和顿悟记录下来,如杨钋和林小英主编的《聆听与倾诉——质性研究方法应用论文集》(2001)。近年来,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方法高级研讨班上,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对质性研究方法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实际操作训练。

质性研究的理论取向

由于质性研究发源于很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和学科传统,目前在理论取向上,质性研究仍处于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做后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和分析,强调的是自然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强调的是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和"视域融合"。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任何研究都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注重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又同时具有一种后现代的批判意识。

因此,在质性研究内部,研究者通常也有不同的学术立场和理论倾向。研究者如果关注对现象进行描述,通常会采取后实证主义的取向,通过一些可操作的程序和手段(如证伪、相关验证)对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检验。如果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社会改进,则会采取批判理论的取向,考虑到研究的价值和权力层面,希望通过研究对社会现实进行干预。而如果研究者认为社会世界中不存在"客观真实",社会习俗和规则都是人为的建构,则会采取建构主义的立场,看到人和社会的相互性和交往性,注意到研究者在理解和解释中的能动作用,使研究成为一种生成的过程。

虽然研究者可以采取不同的理论取向,但这些取向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也各有其弱点。后实证主义假设人们的行为有其内在联系,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义十分清楚,如果采取严谨的方法,可以(虽然是局部地)了解和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意义解释。这种对当

事人观点绝对尊重的态度不仅反映了研究者天真幼稚的“现实主义”立场，隐藏了研究者在理解中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且很容易导致相对主义，使研究者群体失去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

批判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批判的向度，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有可能表现出一种“精英意识”，把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强加给被研究者。此外，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矛盾：即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和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如果我们一方面承认“真实”是客观存在，而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只能被历史地认识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存在于历史之中的人们又怎么可能“真实地”认识“客观真实”呢？这涉及一个无法解决的“自相关”问题，即批判理论自身如何知道自己的理论不也是带有偏见的、需要被批判的？

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十分迷人，为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和创造可能性，但是在实践层面却很难付诸实施。在建构主义者的眼中，一切都在流动之中，只有此时此刻才是“真实”的。这种理论很难提出一套可供后人遵循的方法原则，而且无法设立明确的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这也许是伽达默尔认为阐释学不是“方法”甚至不是“方法论”，而是“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质性研究的基本类型

为了更好地理解质性研究，需要对其进行恰当的概念化和归类处理。特别是在大学教授质性研究方法这门课程时，学生对此有强烈的需求。然而，不幸的是，目前质性研究的分类标准繁多，令人无所适从。有的按研究问题类型分类，如意义类问题、描述性问题、过程性问题、有关口语互动和对话的问题、行为的问题；然后据此将研究策略分成六种类型：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常人方法学/言语分析法、参与性观察、质的生态学。有的按研究者的兴趣分类，如探讨语言特点、发现规律、理解文本和行动的意义、反思。有的按研究者的立场分类，如批判民族志、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女权主义民族志、历史民族志。有的按“传统”分类，如生态心理学、整体民族志、交流民族志、认知人类学、象征互动主义。有的按“类型”分类，如象征互动主义、人类学的方法、社会语言学的方法、常人方法学、民主评估、新马克思主义民族志、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另有按“取径（approach）”分类，如历史研究、民族志研究、个案研究、现象学研究、传记研究、扎根理论研究、行动研

究。还有学者认为,质性研究是一个多元、综合、丰富多彩的领域,不能进行分类。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我认为,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更加辩证和务实的态度。一方面,为了了解质性研究这把"大伞",需要进行分类;但与此同时又不必穷尽所有的类别,不希冀将所有研究类型囊括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中。研究者只需根据自己的问题选择更"好"、更"合适"的方法,而不是根据一种事先设定的标准对这些分类方式进行评价和选择。

此外,我们也可以改变分类思路,将质性研究作为一个连续体来看待(如下)。平行分类的方式很容易将丰富的质性研究人为地分成一些类别,排除了那些无法被纳入分类标准的类型。连续体可以给研究者很大的思维和想象空间,不会排除那些目前还没有发现的以及今后有可能发明的新类别。

作为连续体的质性研究

完全自然主义的研究	半自然主义的研究
完全自然情境	半自然情境
完全开放型	半开放型
完全悬置假设	主动利用假设
描述为主	建构理论为主

质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从上述质性研究的历史可看出其发展趋势:从传统到现代、后现代,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到多元,从事实描述到意义解释,从论证理论到建构"现实",从追求"科学"到重视人文,从"客观性"到"主体间性",从写语言到"写文化",从宏大理论到地域性知识,从价值无涉到价值有涉,从学术研究到实践行动。后现代的多元文化观和世界性视野带来了学科边界的模糊,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定义、边界和作用。

重新理解"理解"和"解释"

随着质性研究进入21世纪,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立场和风格进入研究的行列,通过"对话"来检验自己的"知识宣称"。质性研究者对"理解"和"解释"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强调"客观"、"中

立”，到“体验”、“移情”，再到在“参与”和“对话”中“共同建构”意义。

研究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他者”，不可能进入别人的皮肤和大脑思考和感受。虽然很多人仍旧在使用1967年由格拉泽（B. Glaser）和施特劳斯（A. 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方法（1967），而且这个传统在斯特劳斯和考宾（J. Corbin，1990）以及迈尔斯（M. Miles）和休伯曼（M. Huberman，1993）等人的工作中仍可以看到，但与此同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如龙迪在《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探索性质性研究》（2007）中，为了揭示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和群际“关系”及其交往如何建构出有关性侵犯的“真实”，使用了沃克特（H. Wolcott）提出的“转化质性资料”的策略：先对原始资料进行“深描”，通过细节呈现本质和文化回声；继而对资料中隐含的、有据可依的主题、特征及主题之间的模式化规律进行分析，将它们系统、有序地呈现出来；最后对资料的意义进行解释，建立知识宣称，达致理解的目的。

思考方法与理论和问题的关系

随着质性研究的逐步推广，研究者对质性研究的质量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质性研究刚刚在我国系统介绍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似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研究人文社会现象的工具。特别是对那些畏惧或讨厌数字计算的人，质性研究方法似乎是一个从天而降的“救星”。但随着尘埃落定，泡沫散去，国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质性研究是一个“好”的研究？仅仅对现象进行描述是“好”的研究吗？理论在质性研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实践探索，大家意识到，虽然质性研究强调对现象进行“深描”，但一项高质量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上，而应提升出研究者自己本土化的理论线索，并与前人的理论展开对话。因此，研究者需要学会恰当地使用文献——“浸泡在文献中”，但不被它“溺死”，将前人的理论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但不被这些理论所淹没。

对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将质性研究者引向对它们与研究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研究者不应用方法来限定问题，而应具有“问题意识”，让“真实的问题”浮现出来，在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得到恰当的定位，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方法。方法总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而理论总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方法和理论的目的都是为了澄清观念，解决问题，

解放而非限制想象力。研究者不要盲目崇拜方法和技巧,而应该做自己的方法论者、自己的理论家,让自己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Mills,1959/2001)。

质性研究通常被定位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量化方法的集体主义相对应),似乎研究的总是小样本的经验和事件。如何将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如何在制度与个人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这也是近年来质性研究者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个人困扰总是坐落在一定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制度结构和历史背景中,研究者在关注个人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建构这些心理现象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过程,将个人作为历史和社会的参与者,理解人类社会选择以及形成有关"人"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和关系。研究者不再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独立于个人的系统,而是与个人的自我中最深沉的部分紧密相连的、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质性研究已经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走向了关系主义,在个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文化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分析问题。

研究规范不断提高

虽然质性研究不被认为存在一套普适的、固定的、所有研究者都应该遵守的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行"。为了尽可能意识到并控制样本选择以及资料收集和解释中过多的随意性,质性研究提倡遵循严格的程序,在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要求:问题的提出、研究设计、进入现场、建立研究关系、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形成结论和建构理论、成文的方式、衡量研究的质量、反思伦理道德问题等。为了提高研究的质量,质性研究还尝试引入量化研究中的"信度"、"效度"、"推广度"、"代表性"等概念,与质性研究者常用的标准(如解释力度、可信度、一致性、典型性)进行对比分析。

此外,在比较传统的、源自语言学的方法(如内容分析、话语分析、修辞分析、语意分析、符号学、论据分析)之外,质性研究者还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沈崇麟,夏传玲,2007),如扎根理论、海斯(Heise)的事件结构分析、拉津(Ragin)的定性对比分析、雅伯特(Abbott)和赫里凯克(Hrycak)采用最优匹配技术的序列分析、雅贝儿(Abell)的形式叙事分析、鲍尔(Bauer)等人的语库建设、雅特里德—斯图林(Attride-Stirling)等人的主题网络分析和神经网络技术应用的质性分析领域、哈奇(Hatch)的类型分析、归纳分析、解释性分析、政治分析、多话语分析、计算机辅助分析等。所有这些方法的一个共同特征是,

把质性研究向更加系统、精确、严格、形式化的方向推进。

信息时代的电子声象技术改变了质性研究者的工作方式，使他们的工作更加标准化，也更加有效率。手提电脑被带到研究实地，互联网使研究者可以向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进行快捷而又便宜的资料收集。资料不仅可以以文本格式存储，而且多媒体介质（如图像、声音和视频）也被利用起来。研究报告开始用声象形式呈现，克服了语言的平面性和概念化。电子邮件代替了印刷品，研究成果的传播正在不断地加速。传统的“剪刀 + 糨糊”的资料分析方法被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CAQDA）软件所替代，将研究者从处理大量文字材料的繁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改变了质性研究的流程和研究集体之间的合作方式。数据库结构使质性资料的管理更加方便，为组织大型研究项目（包括多个研究地点、多个研究对象、历时的质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网络的便利还促进了世界各地质性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目前大型的国际网站有 20 余个，如国际质性研究方法协会、质性研究资源库、信息系统中的质性研究、质性研究互联网资源、质性研究报告、质性研究兴趣协会等。

然而，虽然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不要希望仅仅依靠技术就能创造奇迹。研究毕竟不只是按照一定的方法、手段和步骤就可以完成的，还需要提出问题、捕捉灵感和运用直觉和想象的能力，资料归类和分析编码的工作还是需要人脑来完成。而计算机软件是建立在经典质性资料分析思路之上的，其基本假设是简约论，即任何有组织的实体都是由更小的单位组成的，只有被分解成不可再分的单元才能被理解。然而，社会现象是一个不可简约的生命系统，一旦被分解成更小的单位分别探究，就无法获得充分的理解和解释。使用“分而析之”的简约论处理原始资料，很容易陷入西方个人主义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定势，描述个人层面的“行为”和“认知”，却看不到“关系”和“生活世界”。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建构扎根理论”的观点和方法（Charmaz，2006）。

质性方法与量化方法结合

早在 1950 年代就有学者（M. Trow，1957）提出，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应该主宰社会现象的推论，占主导地位的量化方法应该吸收别的研究方法的长处。1979 年库克（T. Cook）和雷査德特（C. Reichardt）使用量和质的方法进行教育评估的文章被正式发表，1982 年《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使用多元方法所做的研究报

告。但是,两大阵营之间的“论战”由来以久,特别是在理论探讨方面至今方兴未艾。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在个案研究与统计分析之间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目前很多有关观点都可以在这场论战中找到源头。

对于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之间的结合问题,一般有三种观点。①纯正派:认为两种研究分别基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不能混杂在一起使用。②情境派:认为两种方法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可以结合以及如何结合。③实用派:认为两者可以结合,但更加注重研究的具体功用,讨论的焦点放在方法的具体操作,不讨论范式以及建立系统的结合方式和衡量标准问题。

目前,两者结合的方式主要有整体式结合和分解式结合,各自分别有三种不同的设计(J. Maxwell,1995)。整体式结合包括:①顺序设计,两种方法的使用存在一个前后顺序;②平行设计,两者针对研究内容的不同部分同时使用;③分叉设计,在研究开始时先使用一种方法,然后在继续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分解式结合下面也有三种类型。①混合式设计,包含四种整合形态:a. 量化实验设计,质性资料收集与分析;b. 量化实验设计,质性资料收集和量化统计分析;c. 质性自然研究设计,质性资料收集和量化统计分析;d. 质性自然研究设计,量化资料收集和量化统计分析。②整合式设计: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在不同的层面(如问题、抽样、资料收集和分析)同时进行,并且不断地互动。③内含型设计:一种方法“坐巢”于另外一种方法之中;一种方法形成研究的整体框架,另外一种在这个框架中发挥作用。另外一种对结合策略的分类为:顺序性解释、顺序性探究、顺序性转换、并行三角互证、并行嵌套、并行转换(克雷斯威尔,2007)。

近年来,两者的结合呈现如下三个新的趋势(沈崇麟,夏传玲,2007)。①将质性数据尽可能量化。如科罗尔(Currall)等人在研究组织环境重要的群体过程时,通过内容分析把五年的参与观察资料量化,然后用统计分析来检验理论假定。处理调查数据中开放题器的编码问题的工具软件(如 Words at,Smarttext)和处理质性资料的传统内容分析软件(如 Nvivo、MaxQDA、Kwalitan 等)也提供了将质性资料转换到常用统计软件的数据接口。②方法论多元,即在应用研究过程中,通过核心概念的测量模型,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在一起。如格雷(Gray)和登斯坦(Densten)在研究企业的控制能力时,利用潜变量模型结合两种方法。③量化研究者对过度形式化的量化方法不满,试图通过质性方法加以弥补。如雅各布斯(Jacobs)等人在研究比

利时的家庭形态对配偶的家庭劳动分工影响时，首先用量化方法对纵向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延伸出对核心概念的质性研究。对"模型设定"的关注，也可被视为量化方法重新试图返回质性研究的一种表现。

用质性方法做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与学术研究相对应的研究取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善"，而不只是求"真"。与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和边缘的解释主义研究相比，行动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它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础（与技术理性相对），认为行动中的"知"很难用概念和语言所表达，只在具体情境和问题解决中才能了解到行动者思维和情感的"真实"。行动研究以社会改进为目的，强调行动者做研究，在行动中研究，为行动而研究。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实践理性）"、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反省思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勒温（K. Lewin）的团体动力学、阿吉里斯（C. Argyris）的行动科学、舍恩（Schon）的实践研究范式等。

原则上，行动研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包括量化的方法），只要"好用"（对改进现状有用）就行。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大部分人都采纳质性方法，因为它更适合行动研究的要求。质性研究对不同人群（特别是弱势人群）的关注，有利于处于困难中的行动者提高自信和自尊。质性研究对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和"前理解"结构（"前见"、"前有"、"前把握"）的肯定，有利于行动者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质性研究设计灵活，可在研究过程中视情况而改变，符合行动的不确定性和结果无法预测的特点。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者自我反思，符合行动者在行动中反思并及时进行调整的要求。质性研究没有对大样本和严格实验的要求，对行动者更具有亲和力，更容易"上手"。

行动研究可以由行动者自己做，但也可以与外来研究者一起做。外来研究者扮演的只是一个触媒的角色，帮助行动者确认和定义研究的问题，对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参考，并协助将知识公开化。目前，用质性方法做行动研究的现象较多发生在实践领域，如中小学教育、社会工作、医务护理、法律维权、劳工解放等。在教育领域，随着"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要求以及 2000 年以来国家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施，我国的中小学教师越来越多地投入到行动研究中。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人员也参与到这个行列，形成了很多大中小学行动研究合作基地。

质性研究之所以越来越重视行动研究,还因为它能够比较有效地纠正传统质性研究中的一些弊端。如研究者单凭个人兴趣选择研究课题,研究内容脱离社会实际。结果,实际工作者一方面得不到研究者的帮助,不能从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中获益;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种种原因(工作太忙、缺乏科研经费、领导不重视、缺乏指导等)不可能对自己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外来研究者的直接介入不仅可以为实际工作者提供技术上的指导,而且有助于当地权力结构的松动和改革缝隙的发掘。

"译丛"的特点

虽然质性研究在国外发达国家发展迅速,但我国对质性研究的讨论和运用相对滞后。现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原有"万卷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了本"万卷方法—质性研究方法译丛","译丛"的出版对增进学界和实践者对质性研究的认识、提高研究规范、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将大有裨益。丛书第一批共有 20 余种,包括《文化研究的实践》《质性研究导论》《如何做质性研究》《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反身方法论》《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民族志:步步深入》《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解释》《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方式》《质性访谈:聆听的艺术》《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指南》《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焦点组访谈: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标准化访谈调查》《参与观察法》《质性资料分析:方法与实践》《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情境分析:后现代转向的扎根理论》《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质性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质性研究中的伦理》《混合方法:质性和量化方法的取向》《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个案方法的扩展》(书名的翻译也许还有变化)等。

上述书种几乎囊括了质性研究的方方面面:从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从研究设计到具体实施,从资料收集到资料分析,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从研究活动到研究反思,从关注现象及其效度和推广问题到关注关系及其伦理道德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本套丛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便于操作。虽然有一些理论方面的探讨,但作者通常结合了研究实例加以说明。我相信,通过一大批高素质中国学者的辛勤努力(在我看来,"翻译"不仅仅是"再现",而更重要的是"创

造”和“重构”），以及出版社的精品意识和谨慎工作，此“译丛”的出版必能为质性研究在我国的推广和本土化、为我们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提供更加丰饶的精神资源、思维深度和想象空间。

陈向明

2007 年 4 月 10 日

于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

1 Charmaz, k. ,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eve Analysis. London: Sage,2006.

2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3 克雷斯威尔.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 崔延强,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4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陈强,张永强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1.

5 潘慧玲. 教育研究的取径——概念与应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 沈崇麟,夏传玲.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万卷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经典译丛”总序.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7 水延凯. 社会调查教程. 修订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8 袁方.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万卷方法学术委员会

前言

本书将带你穿越扎根理论的基本过程,同你一起走上建构扎根理论的旅程。本书提供的指导,将扩大你的视野,加快你的步伐,并指出这条路上的障碍和机会。我们将分享旅程,但冒险是属于你的。我会不断厘清扎根理论的策略,提供框架、实例和建议。虽然一些作者提供了可以依照的方法论地图,我还是会提出问题,并概括出一些策略,指出可能选择的路径。在研究旅程的每个阶段对自己工作进行反思会引导你下一步的行动。你的出发点、你的研究过程、你所接触过的人、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以及你学习和思考的方式,都会影响你最终的理论形成。简而言之,这项完成的工作是一种建构——你自己的建构。

方法论的写作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结果。在最近一期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中,霍华德·贝克尔(Becker, 2003)讲述了为什么民族志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会避而不谈他所使用的方法。贝克尔告诉我们,戈夫曼认为任何方法论的建议都会被歪曲,研究者总会抱怨他给他们带来了混乱。方法论的建议会带来误解和建设性的批评。然而,我和戈夫曼不同,我欢迎进入方法论的争论,并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其中。方法论误解的可能性也许会增加,但是方法论的清晰和发展的开放性同时产生了。在公共讨论中,只要不是复述,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解释、重构和误解。读者和研究者的视角、目的及实践会影响他们对一种方法的理解。过去,研究者经常误解扎根理论方法。已有著作发表的质性研究者在引用扎根理论作为他们的方法论路径时也加剧了这种混乱,而其实他们的作品与扎根理论鲜有相同之处。很多研究者只是把扎根理论作为使其质性研究合法化的方法论原则,而不是用它来指导研究。

本书代表了我对扎根理论的解释,以及方法论准则、建议和视角。自从扎根理论的创始人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提出关于扎根理论的经典陈述以来,这种方法已经经历了许多发展与变化。每一个人都在某些问题上

改变自己的立场,并增加其他的立场。我的扎根理论回到20世纪的经典陈述,并用21世纪的方法论棱镜重新检验它们。研究者既可以用扎根理论方法来处理量化数据,也可以用它来处理质性数据;然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纳了扎根理论的方法。在本书中,我把所处理的资料作为"数据(data)"而不是资料或陈述,因为质性研究本身在科学探究中就有其一席之地。

在本书中,我要实现以下目的:①以过去40年方法论发展为基础,为建构扎根理论研究提供一套准则;②纠正关于扎根理论的一些共识性错误;③介绍这种方法的不同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中立场的变化;④对这些进行充分的解释,使初学者可以一步步追随那些有经验的研究者进行研究;以及⑤给初学者和经验老到的研究者开展扎根理论研究项目时带来灵感。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经典扎根理论一样,我也强调,数据必须具有稳固的基础,同时,还要重视数据的分析过程。我在本书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了已发表的数据和文献,如果你想了解这些摘录的数据是怎样契合于各自的叙述的,可以很容易找到原始资源。

希望我对扎根理论方法的建构有助于你建构新的扎根理论。这些方法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工具,能够对研究工作形成分析性把握,以及在更广阔的逻辑意义上形成一种关于研究的理论。那些已经进入理论建构过程的研究者会发现,第5章和第6章特别有趣。不过,我也意识到,有时我们的研究对象和读者并不总具有清晰的理论建构,但是提供有用的分析框架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扎根理论方法能够使你的分析更加锐利。大量证据表明,这些方法能够带来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描述和故事。不管你进行的是民族志的故事、传记式的描述,还是访谈的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的方法都会帮助你,使你的工作更加富有洞见和更加尖锐深刻。

在我涉足本书所涉及的领域之前,有一段很长的发展历程。我的观点来自两个不同的源头:20世纪60年代对方法论的早期浸染,以及激发了我想象力的创新性博士项目。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研究生一样,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不过,那些挑战传统科学的客观性、推理方式及真理观念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对我产生了同样持久的影响。

作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社会学第一批博士学位的获得者之一,我有幸在丰富的研究生研讨课中追随巴尼·格拉泽学习扎根理论。在课堂的自由讨论中,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分析自己的资料。这些研讨课总会被兴奋与热情所点燃。当巴尼引导我们离开对材料的描述,在

分析框架中对材料进行概念化时，他总是那么才华奕奕。我非常庆幸能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安塞尔姆·施特劳斯是我博士论文的主席，他从我们会面的第一天开始直到1996年去世，始终关注着我的工作。他和巴尼都有同一个使命，那就是培养新一代的学者，使其成为有创见的扎根理论家。当我早晨交给安塞尔姆一份手稿——通常只是一个片段，他总会在傍晚就给我打电话就手稿进行讨论。虽然安塞尔姆不会同意本书的一些观点，但我还是希望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能够引起他的兴趣，能够引发熟悉的咯咯的笑声，这是他的很多学生所珍视的。

一本书在写作前就会有很长时间的准备。我的扎根理论之旅开始于巴尼·格拉泽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他们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渗透在我的工作中，也渗透在我的意识中。因此，我关于扎根理论的陈述也会以未必明显的方式包含着我在追随弗来德·戴维斯(Fred Davis)、弗吉尼亚·奥利森(Virginia Olesen)以及里奥纳多·沙茨曼(Leonard Schatzman)进行关于数据搜集的质量的博士研究和访问学者时期所学到的课程。从那时起，我就形成了本书的理念。很多人要求我讲讲自己的扎根理论，这些要求各不相同，这扩大了我的视野。虽然下面的这些人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项目，但是对他们早些时候要求的回应有助于我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形成我对扎根理论的理解。我感谢 Paul Atkinson、Alan Bryman、Amarda Coffey、Tom Cooke、Robert Emerson、Sara Delamont、Norm Denzin、Uta Gerhardt、Jaber Gubrium、James Holstein、Yvonna Lincoln、John Lofland、Lyn Lofland、Jonathan A. Smith。

如果没有 Sage 出版社本书的编辑 Patrick Brindle、丛书编辑 David Silverman 的支持和鼓励，本书也不会不断成熟。感谢 David Silverman 邀请我加入该丛书，感谢他对此书可以付诸实现的信任。特别感谢 Patrick Brindle，是他努力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感谢 Patrick Brindle、Antony Bryant、Adele Clarke、Virginia Oleasen 和 David Silverman，他们对本书手稿进行了敏锐的阅读和精彩的点评。Jane Hood、Devon Lanin 和 Kristine Snyder 每人都对相关章节进行了阅读，并进行了有益的评论。我和索拿马州立大学的教师写作项目(Faculty Writing Program at Sonoma State University)的成员多次讨论过该书的章节，而且总是非常享受我们的讨论。Anita Catlin、Dolly Freidel、Jeanette Koshar、Melinda Milligan、Myrna Goodman 和 Craig Winston 为本书提出了合理审慎的问题。除了参与具有启发性的讨论之外，Julia Allen、Noel Bryne、Diana Grant、Mary Halavais、Kim Hester、Williams Matt、James Michelle、Jolly Scott、Miller Tom Rosen、Richard Senghas 和 Thaine Stearns 也在写作的不同阶段为本书写了富有洞见的评论。我

和 Kath Melia 在该任务早期关于扎根理论的讨论使我一直很受激励。

在更加技术的层面上，Leslie Hartman 富有技巧和热情地处理了一些烦琐的事务性问题，Sage 出版社的 Claire Reeve 和 Vanessa Harwood 向我传递了细节性的问题。如果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写作，没有哪本书能成功付印。2004 年春季索拿马大学的假期加速了我写作的进程。在本书中，我从自己过去扎根理论的作品中筛选和编辑摘引了一些内容，这些作品是由 Sage 出版社出版的，我很感谢 Patrick Brindle 同意将这些内容再次付印。



目录

第1章 扎根理论的邀请

An Invitation to Grounded Theory

1*

旅行者在出发之前会有很多准备工作。同样,在我们开始扎根理论的冒险之前,也需要了解扎根理论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以及沿着这一旅程可能会遇到什么。我们会谈到扎根理论所涵盖的领域,以及我们希望穿越的领域。在出发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扎根理论在20世纪的历史,展望一下21世纪还未实现的潜能。我们动身前的最后一步就是展示一下方法以及本书的地图。

* 此为英文版的页码,全书同。

在本书中,我邀请你加入一次穿越质性研究计划的旅程。你可能会问,这次旅程能带给我们什么收获呢?我从哪里开始?如何前进?前面会有什么困难?本书将从数据搜集开始一段短暂的行程,接下来通过质性数据分析进行漫长的征程。在这条道路上,会有很多向导,它们会使你穿越分析与写作的路途变得更为容易。在整个旅程中,我们会让你的数据紧密联系现实世界,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提升你的分析水平,使你的想法具有更高的理论意义。

搜集数据和分析数据之间会是一段什么样的道路呢?暂时假设,你已经开始进行一项新的研究项目了,调查一种严重的慢性病突然发作的情况。想象你遇到了高中高年级的玛吉·阿伦(Margie Arlen)。玛吉给你讲述了风湿性关节炎突然发作给她带来的麻烦。你把她故事中提到的下述事件按顺序排在了一起:

> 14岁时,玛吉是一个明星学生和明星运动员。这显然为她在大学及以后人生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她的老师看到的是一个未来的学者,她的教练对她的运动才能大为惊异,而她的同学则把她看作是鹤立鸡群的人。然而她的健康突然之间因为关节炎恶化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她从足球场上的疾风闪电变得几乎寸步难行。其他同学对她的敬而远之,也使她备感屈辱。她的才华和努力曾一度使她离开周围喧嚣的人群。当她的同伴悄悄地避开她的时候,她所带的支架及行动艰难也使她越来越远离人群。然而,玛吉却获得了更深的感悟,她说:它(她的疾病与行动不便)教给我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我过去非常内向,害怕和其他人说话,但是现在,我能够利用我的才能,不是运动或诸如此类的才能,而是我能利用我的才能走出去,和人们交谈,成为他们的朋友。比如,鼓励人们,以及类似的事情。我发现,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尊,能够为其他人做事情,承担使命及诸如此类的事,这要比能够走出去证明你是个好运动员更重要。因此,它改变了我,因为我现在更外向了,它改变了我,因为我认识到了更重要的东西。

2

然后,你可能会像她的访问者那样小心地问,"那么,什么是更重要的呢?"玛吉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 我考虑过很多，就是不是使自己好，而是使别人好。我过去一直是个完美主义者，我能够很快把事情做好。如果我说我要去做什么事，不管睡多晚我都会去做……这让我的身体付出了代价。然后我认识到，告诉别人，抱歉我不能按时完成，或其他什么，或者只是说我做不了，这是完全可以的——在第一时间说"不"，我觉得那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有慢性病，你会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你会使自己更糟。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领悟到。但是我觉得分清轻重缓急真的很重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并且首先做重要的事，然后把其他的丢一旁。(Charmaz,2002b,p.39s)

现在想一想，怎么去分析像玛吉这样的故事。你如何理解玛吉·阿伦所描述的这些事件？在她的陈述中你看到了什么，你会进一步探究她以及其他患有身体疾病的人吗？想象一下，你在质性研究中如何追问这些问题以形成对资料的概念分析？你会如何进行你的研究？如何建构你的分析？

扎根理论的方法会帮助你起步，深入探究过程，并完成你的研究。研究过程会带来惊喜，会激发思想的火花，会磨砺你的分析技巧。扎根理论方法会促使你以新的方式看待你的数据，通过早期的分析写作探究你对数据的想法。通过使用扎根理论方法，你会指引、管理和排列你的数据搜集，而且，给你的数据建构原创性的分析。

什么是扎根理论方法呢？简单说，扎根理论方法包括一些系统而又灵活的准则(guideline)，让你搜集和分析质性数据，并扎根在数据中建构理论。这些准则提供了一套基本原则和启发性工具，而不仅仅是公式性规则(也见 Atkinson, Coffey, & Delamont, 2003)。这样，数据形成了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产生了我们所建构的概念。扎根理论家从研究计划一开始，就在通过收集数据来形成理论分析。我们试图了解的就是，我们所参与的研究环境中发生了什么，以及研究对象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研究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言论及行为，探求我们可以怎样分析地理解他们。 3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对研究现场究竟发生什么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可能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在对玛吉·阿伦的访谈

中，我们会专注于我们的所看、所闻和所想。扎根理论家从数据开始。我们通过观察、互动以及搜集到的关于这个问题或环境的资料，来建构这些数据。我们研究经验事件和体验，追随我们对它们的直觉和潜在的分析理念。大部分质性方法允许研究者以他们自己所设计的任何方式来追踪有趣的数据。扎根理论方法有这样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它的准则会清晰地告诉我们怎样前进。

玛吉·阿伦知道了要照顾他人、完成任务要量力而为，她的这些观点可以作为分析和搜集进一步数据的起点。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我们会去聆听其他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人在最近也经受了身体的病痛，也在探寻如何面对生活的变故。如果可能，我们会参与研究对象在学校、理疗、支持群体或只是与朋友闲逛的生活，以此增加民族志的数据。年轻人对严重的疾病和残障会作何反应呢？是什么形成了他们不同的反应？通过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思考，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指引我们去获得进一步的数据。

作为扎根理论家，我们研究早期的数据，通过质性编码开始区分、归类和综合这些数据。编码意味着我们把标签贴在数据的不同部分，这些标签描述了每个部分的不同特征。编码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和分类，使我们能够去与其他部分的数据做比较。扎根理论家非常强调研究现场所发生的事情。

在玛吉的访谈中，一些初始编码呈现在我的面前："被改变了"、"关注什么是重要的"，以及"知道了能力的有限"。这些编码以及我们关于这些编码的想法都在后续数据搜集中指向所要探究的领域。我们会比较玛吉所谈到的事件、观点与我们所访谈的下一个人的编码，再下一个，下下一个。

通过进行大量的比较及对这些比较进行编码，我们对数据的分析性把握开始成形了。我们要做初步的分析笔记（即备忘录），记录我们的编码、比较，以及所产生的任何关于数据的想法。通过研究数据、比较数据、写备忘录，我们把最适合和最能解释这些数据的想法定义为尝试性的分析类属（category）。当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类属间的缝隙（gap）暴露出来时，我们要寻找那些能回答这些问题、填满这些缝隙的数据。我们可以回到玛吉和其他研究对象那里去获得更多信息，增强我们的分析类属。在研究

过程中,我们不仅要使类属在解释所搜集的数据时结合起来,而且还要使类属变得更加理论化,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完整的分析。

我们的分析类属及在这些类属间所建立的关系为分析被研究经验提供了概念工具。这样,我们直接提升了这些数据的抽象水平,接下来,要搜集更多的数据来检验和完善这些生成的分析类属。当我们形成一个"扎根理论",或在对研究经验形成抽象的理论性理解时,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了顶点。玛吉的言论开启了我们的研究旅程;进行比较分析和形成自己的类属,会推进我们的研究进程。简而言之,扎根理论方法使质性探究的操作过程不再神秘,能够加速你的研究进程,并提升你的研究热情。 4

扎根理论的出现

历史背景

扎根理论方法最初出现在社会学家巴尼·格拉泽和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的成功合作中,他们一起研究了医院中的死亡过程(见 Glaser & Strauss,1965,1965;Glaser & Strauss,1970)。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早期,医院工作人员很少谈到甚至很少想到那些重病患者的垂死状态及死亡。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研究团队对不同医院环境里的死亡过程进行了观察;他们观察专业人员及其已到生命尽头的病人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知道他们要死了的消息的,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对他们的数据进行了清晰的分析,产生了对社会组织及死亡过程的时间序列的理论分析。他们在长期的交谈中考察了分析性观念,交换了在该领域所做的分析性观察的初步笔记。当他们建构关于死亡过程的分析时,形成了系统的方法论策略,社会科学家可以使用这些策略来进行很多其他问题的研究。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著作《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1967)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这些策略,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一个有利的时机进入了方法论研究。

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正在失去其基础。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当复杂的量化方法在美国获得主导地位,量化方法论学者支配了系所、期刊编辑委员会及基金会时,社会学质性研究长期以来的传统已经衰落了。尽管人们也会敬畏一些质性研究明星、一些实力强大的质性研究博士项目以及来自批判理论家的对量化化的尖锐批评,但学科训练还是朝着量化方式所规定的研究方向发展着。

哪些类型的方法论假设支持这场走向量化化的运动呢?认知的任何方式都依赖于人们有关知识如何形成的理论。这些一元论方法的信念即系统的观察、可重复的试验、对概念的操作化定义、逻辑推导出的假设以及验证了的证据,常常被看作是科学的方法,形成了关于量化方法的假设。这些假设支持实证主义,这种在常规的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探究范式。

20 世纪中叶关于科学方法和知识的实证主义概念强调了研究的客观性、普遍性、可重复性以及不同假设和理论的可证伪性。接受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社会研究者,目标在于发现外部可知世界的因果解释,并做出预测。他们相信科学逻辑、单一方法、客观性及真理,这些信念使得把人类经验的性质转变为可以量化的变量获得了合法性。这样,实证主义方法假定了这些事实的存在:观察者收集事实但并不参与对事实的创造,是无偏见的和被动的,事实与价值是分离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与科学观察者及其方法相分离的,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普遍知识是不断积累的。实证主义让研究者去寻求有用的工具、技术程序、可复制的研究设计及可验证的量化知识。

5

只有狭隘的科学的——也就是,量化的——认知方式坚持着实证主义的正确性;他们拒绝其他可能的认知方式,比如通过意义解释或直觉所产生的认知。这样,分析和解释研究对象意义的质性研究就激发了关于质性研究科学价值的争论。20 世纪 60 年代量化研究者把质性研究看作是印象式的(impressionistic)、轶闻式的(anecdotal)、非系统的(unsystematic)和有偏见的(biased)。对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的优先考虑使人们忽视了那些并不符合实证主义研究设计的研究问题。就算量化的支持者认可质性研究,也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使得量化工具更为优化的初级练习。这样,一些量化研究者用访谈或观察来帮助他们设计更精确的调查

或更有效的实验。

20 世纪中叶，当实证主义获得了发展的动力时，理论与研究的分野也在同时加剧。越来越多的量化研究者开始关注对具体信息的获取。那些把理论和研究连接起来的量化研究者从逻辑上验证由现有理论演绎而来的假设。虽然，他们使得现有理论更为精致化了，但却很少产生新的理论建构。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挑战

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中。格拉泽和施特劳斯遇到了主导 20 世纪中叶的方法论假设。他们的著作给出的命题旗帜鲜明，因为它挑战了方法论共识，并为质性研究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策略。从本质上说，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把认识论批评和行动的实践准则结合在了一起。他们指出，系统的质性分析拥有自己的逻辑，能够产生理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特别关注对社会过程的抽象理论解释进行建构。

对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 Strauss, 1987)，扎根理论实践的规定成分包括：

- 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同时进行。
- 从数据中而不是从预想的逻辑演绎的假设中建构分析代码和类属。
- 使用不断比较的方法，包括在分析的每个阶段进行比较。
- 在每一个数据搜集和分析的步骤都推进理论发展。 6
- 通过记备忘录来完善类属，详细说明它们的属性，定义类属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的缝隙。
- 为了理论建构的目的进行抽样，而不是为了人口的代表性进行抽样。
- 在形成了独立的分析之后再进行文献评述。

这些实践有助于研究者控制研究过程，增强研究的分析力度(也见：Bigus, Hadden &Glaser , 1994; Charmaz, 1983, 1990, 1995b, 2003; Glaser, 1992, 1994; Glaser & Strauss, 1967; Stern, 1994b; 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00, 1994)。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目的在于，使质性探究方法超越描述性研究，进入解释性理论框架的领域，由此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性、概念性的理解。

他们激励新手扎根理论者形成新的理论,提倡延迟文献评述,避免用已有的观念视角看待世界。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理论化与书斋式逻辑演绎的理论化有很大差别,因为他们是从数据开始的,在保持数据坚实基础的同时,系统地提高了分析的概念水平。与他们的论证一致,一个已完成的扎根理论要满足以下标准:要与数据非常契合,有用,具有概念深度,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可调整并具有解释的力度(Glaser, 1978,1992;Glaser & Strauss, 1967)。

《扎根理论的发现》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使得质性研究本身作为一种可靠的方法论路径获得了合法性,而不再仅仅是使用量化工具前的一个步骤。在本书中,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 1967)挑战了这些观点:

- 质性方法是印象主义的和非系统化的。
- 研究的数据搜集阶段和分析阶段是分离的。
- 普遍流行的观点:质性研究只是作为更加“严格”的量化方法的先在步骤。
- 理论与研究之间的武断分离。
- 一种假设,即质性研究不能产生理论。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的质性研究建立在早期质性研究者含糊的分析程序和研究策略的基础上,并使其清晰化了。20世纪前半期,质性研究者通过在田野研究中的言传身教和长期实践培养了一代学生(Rock,1979)。之前为进行田野研究所进行的指导主要处理的是数据搜集和田野背景中研究者的身份问题。作者们很少告诉读者如何处理和分析堆积如山的数据资料。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为质性研究操作所写的书面准则改变了口述传统,使得分析性的指导方法更加容易掌握了。

融合不同的学科传统

扎根理论嫁接了社会学中两个互相矛盾而且彼此竞争的传统,每个传统都有其起源:哥伦比亚大学的实证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实用主义及田野研究。扎根理论方法的认识论假设、逻辑和系统方法反映了格拉泽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所接受的严格量化训练。当拉扎斯菲尔德为

7

量化研究进行编码时，格拉泽关注的是为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编码（Lazarsfeld & Rosenberg, 1955）。对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编码，能够使研究的清晰策略得到详细说明，从而使研究过程不再神秘。

格拉泽也提倡建立有用的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理论家罗伯特・默顿（Merton ,1957）所提出的那样。中层理论包括对具体社会现象的抽象表现，具体社会现象要扎根于数据。这样的中层理论与 20 世纪中叶社会学的“宏大”理论（‘grand’theory）很不相同，宏大理论曾横扫（swept across）社会，但并不是建立在系统分析数据的基础上。

格拉泽把扎根理论沉浸在冷静的经验主义、严格的编码方法之中，强调生成的（emergent）发现，以及模仿量化方法有些模糊的专门化语言。虽然《扎根理论的发现》传达了方法论的争论，启发了几代质性研究者，不过格拉泽的著作《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 1978）提供了这一方法最为清晰的早期陈述。

但是，施特劳斯的芝加哥学派遗产也渗透在了扎根理论方法中。施特劳斯把人看作是在其生活及世界中的积极行动者，而不仅仅是更大社会力量的消极接受者。他认为过程，而不是结构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事实上，人类通过参与过程产生了结构。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主体性和社会意义依赖于我们对语言的应用，并通过行动表现出来。行动的建构是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简言之，施特劳斯把这些概念如行动者、生成过程（emergent process）、社会的及主观的意义、问题解决过程及行动的开放研究引入了扎根理论。

所有这些观念都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这是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信奉的（Blumer, 1969; Mead, 1934）。实用主义形成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它是这样一种理论视角，假设社会、现实及自我是通过互动建构起来的，这样就依赖于语言和沟通。这一视角假设，互动本身是动态的和解释性的，解释人们如何创造、扮演和改变意义和行动。想一想玛吉・阿伦是怎样解释这些问题的，她认为什么变得重要了，以及她的行为相应地进行了怎样的改变。符号互动论假设，人们能够而且确实在思考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对刺激的做出的机械反应。受赫伯特・布卢姆（Herbert Blumer）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的影响，施特劳斯接受了符号互动论和民族志研究

这两项芝加哥遗产(Park & Burgess, 1921)。

格拉泽把他的分析技术用在了给质性分析编码上,这样就为8进行质性分析建构了具体的准则。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对在社会背景中研究基本的社会过程或社会心理过程,或者研究诸如患有慢性疾病的特殊经验有着共同的浓厚兴趣。这样,对于他们,一个已完成的扎根理论会以新的理论术语解释研究过程,说明理论类属的属性,展示这一过程得以出现和变化的原因和条件,并描绘出它的结果。

大部分扎根理论是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ies),因为它们所解决的是在具体的实质领域中被限定的问题。比如,刚刚残疾的年轻人如何重新建立他们的自我认同。扎根理论的逻辑能够达到这个实质领域,进入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的范围,这意味着产生抽象的概念,使它们的关系具体化,以理解多重实质领域中的问题(Kearney,1998)。比如,如果我们发展一个关于新近残疾的年轻人身份丧失及身份重建的理论,我们就能够在其他生活领域(人们经历了突如其来的重大损失,比如配偶的突然去世、失业、由于自然灾害失去居所)检验我们的理论类属。在一个新的实质领域进行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完善形式理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研究死亡过程的时候形成了关于身份变迁(status passage)的理论类属,并将其作为一个能够涵盖不同实质领域的普通过程。当格拉泽和施特劳斯选择这些理论类属时,他们的逻辑让自己走向了形式理论化(Glaser & Strauss, 1971)。

《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产生了接受该理论的读者,并成为激发"质性革命"的主要力量(Denzin & Lincoln, 1994, p. ix),这一革命获得了延续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势头。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清晰的策略以及关于从质性数据形成理论的号召扩展到了许多学科和专门职业。他们的著作激发了新一代的社会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特别是护士,去追求质性研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护理学的很多博士生都从格拉泽或施特劳斯那里学习扎根理论方法,后来都成了他们专业的领袖和质性研究的专家(Chenitz & Swanson, 1986; Schreiber & Stern, 2001)。

扎根理论的发展

自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 1967 年(Glaser & Strauss,1967)和格拉泽(Glaser,1978)1978 年的经典陈述出现以来,他们开始在不同的方向上应用扎根理论(Charmaz, 2000)。格拉泽仍然与他早期对该方法的解释保持一致,把扎根理论定义为一种发现的方法,把类属作为从数据中生成的,依赖于直接的、常常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分析基本的社会过程。施特劳斯(Strauss, 1987)把这种方法向证实(verification)方向发展了,他与朱丽叶·科尔宾(Juliea M. Corbin)合作的著作(Corbin & Strauss,1990;Strauss & Corbin,1990,1998)进一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施特劳斯和科尔宾的扎根理论版本也支持了他们新的技术程序,而不是强调区别于早期扎根理论策略的比较方法。格拉泽(Glaser, 1992)批评施特劳斯和科尔宾的程序使得数据和分析进入了预设的类属,这样,就和扎根理论的基本原则相矛盾了。虽然格拉泽对施特劳斯和科尔宾的扎根理论版本有许多异议,他们的著作还是成为了该方法的有力陈述,指导了遍及世界的研究生。

9

在 1960 年代,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开始反抗实证主义量化研究的主导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 1990 年,扎根理论不仅由于其精确和有用而闻名,而且由于其实证主义假设而为人所知。量化研究者接受了扎根理论,有时在需要复杂方法的项目中也用到这种方法。扎根理论方法的灵活性和合法性继续吸引着有着不同理论和实质兴趣的质性研究者。

与此同时,学者数量的增长使得扎根理论偏离了实证主义的格拉泽版以及施特劳斯和科尔宾版(Bryant, 2002, 2003; Charmaz, 2000, 2002a, 2006a; Clarke, 2003, 2005; Seale , 1999)。研究者使用扎根理论的准则,就像使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容纳的容器一样,比如编码、写备忘录和为发展理论而进行的抽样,而且比较方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中立的。

扎根理论方法描述了研究过程的步骤,并提供了进行这一过程的路径。研究者通过接受和改造它们来进行不同的研究。研究者如何使用这些准则就不是中立的了;他们带到研究中的假设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的操作也都不是中立的。安东尼·布赖恩特

(Bryant,2002)和阿黛尔·克拉克(Clarke, 2003, 2005)和我的意见相同,都认为,我们能够使用基本的扎根理论准则,并让它们坚持21世纪的方法论假设和方法。本书的目标就是探究如何进行这样的研究。

建构扎根理论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在对该方法的最初表述中,邀请读者以自己的方式灵活地使用扎根理论策略。我接受他们的邀请,回到了过去的扎根理论,那时的扎根理论强调对过程的考察,把行动研究放在中心位置,并对数据进行抽象的解释性理解。本书提供了操作扎根理论的一种方式,并对过去四十年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进行了反思。

我把扎根理论方法看作是一套原则和实践,而不是处方或包装好的程序(prescriptions or packages)。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强调灵活的准则,而不是方法论法则、诀窍和要求。在我们穿越研究过程的旅程中,我的目的在于讲清楚扎根理论家在做什么,并告诉你我们是如何做的。因此,在后面的所有章节中,我会以丰富的细节来讨论这些准则,这样你自己就能够使用它们,给它们一个合理的评价了。

扎根理论方法能够把其他方法补充到质性数据分析中来,而不是站在这些方法的对立面。有时我会从质性研究中选取一些优秀的例子,虽然它们的作者并没有声称是扎根理论的拥护者,他们的著作也只是体现了这一方法的某些具体方面。这些作者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具有想象力的洞见和富有启发的声音,并激发了优秀的研究。他们的作品超越了他们自己的圈子。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 1967)和格拉泽(Glaser, 1978)的经典扎根理论文本为分析过程提供了一种清晰的方法。我已经谈到了调查过程和研究过程,但是,什么是过程?[①] 一

10

①我对过程的定义主要偏重于生成性实用主义概念,部分同意 Russell Kelley、Dennis Waskul、Angus Vail 和 Philip Vannini2005 年 1 月 25 日在 SSSITalk 上进行谈话时所表达的某些不同观点。(www. soci. niu. edu/ ~ archives/SSSITalk)

个过程是展开的时间序列,这个序列可能有着清晰的开始标志和结束标志,有着两者之间的多个标志点。这个时间序列在一个过程中是连着的,而且是变化着的。这样,单一事件就连接成为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即使最系统化的过程也会包含意外,因为当下来自过去,但从来不会完全一样。当下是带着新的特征出现的(Mead,1932)。这样,一个具体过程的经验和结果就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不管这种不确定性多么小。

本书都建立在我早期对扎根理论的讨论(特别是 Charmaz, 1990, 2000, 2002a, 2003, 2005)以及符号互动理论视角的基础上。扎根理论是一种我们了解所研究世界的一种方式,是形成理解这个世界的理论的一种方法。在经典扎根理论著作中,格拉泽和施特劳斯谈到了发现理论,认为理论来自于独立于观察者的数据中。与他们的立场不同,我认为,数据和理论都不是被发现的。我们是所研究世界及所搜集数据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在过去和现在的参与,以及与人们、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我们*建构*了自己的扎根理论。

我的方法清晰地说明,任何理论形式提供的都是对被研究世界的一种*解释性*图像,而不是世界实际的面貌(Charmaz, 1995b, 2000;Guba & Lincoln, 1994; Schwandt, 1994)。研究对象并不清晰的意义、经验观点和研究者已经完成的扎根理论是对现实的建构。与芝加哥学派的前辈们一样,我认为扎根理论要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要形成解释性的分析,并且这种分析要认可这些建构。

建构扎根理论一览

本书的结构再现了线性形式的扎根理论逻辑。我们从搜集数据开始,以写作关于整个过程的分析和反思为结束。然而实际上,研究过程并不是线性的。无论什么时候有新的想法涌现,扎根理论家都会停下来把这些想法记下来。最好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在这个过程的最后出现,并吸引我们回到研究现场进行更进一步的观察。我们的工作经常会表明,要追随的往往不只是一个研究方向。这样,我们可能在最初关注某些特定的想法,并完成关

于这一想法的一篇论文或一个项目,但后来我们又返回到数据中,开始其他领域未完成的分析。我在本书中始终把扎根理论方法作为构成研究者实践的一门手艺(craft)。像任何手艺一样,实践者所重视的方面会很不相同,但却共享着一些共性,这正是我在本书中所要讲到的(见表1.1)。 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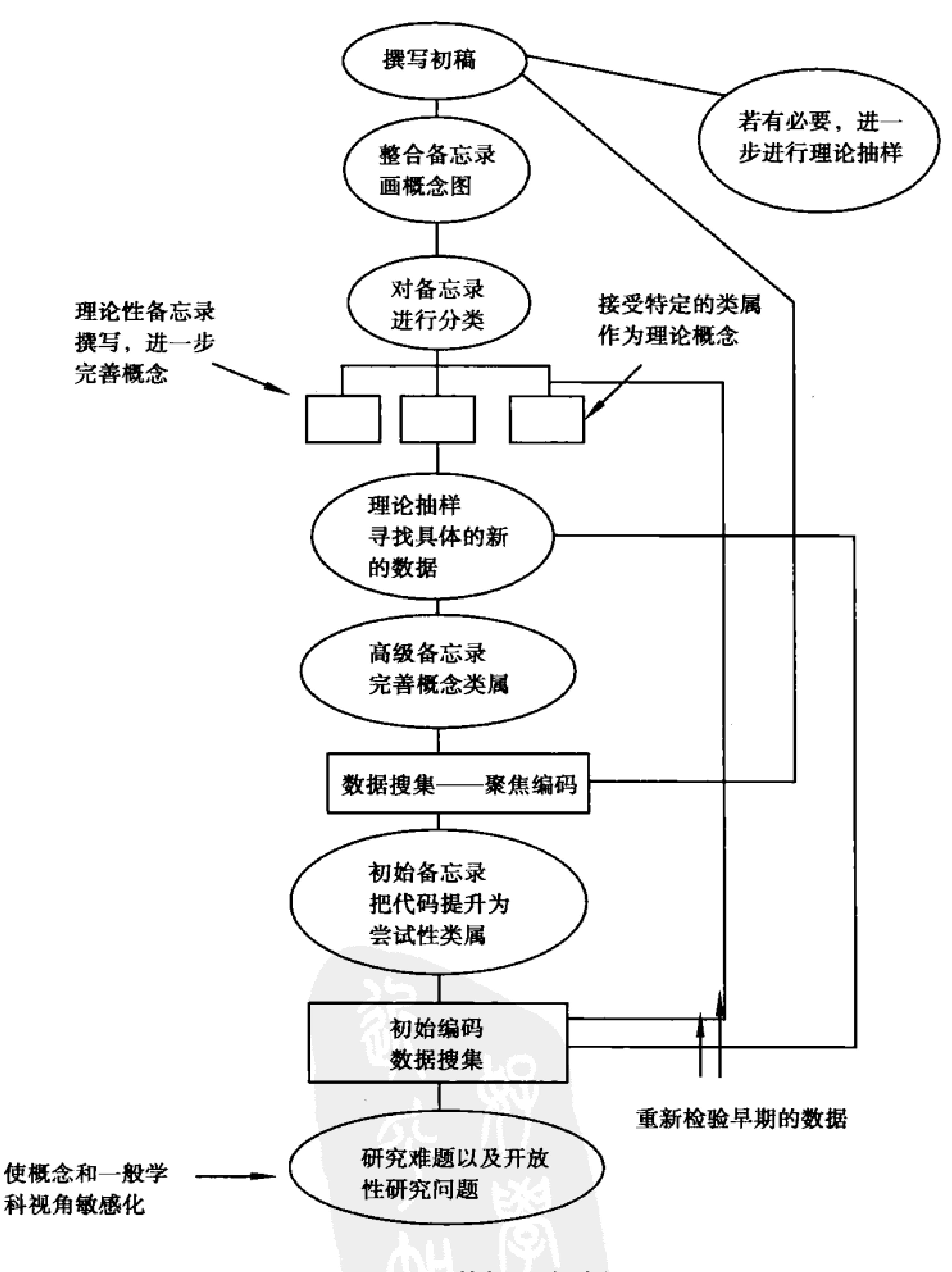


图1.1 扎根理论过程

在第 2 章“搜集丰富的数据”中谈到的是研究的开始及数据搜集方法的选择。研究者可以以不同的数据搜集方法来使用扎根理论策略。我把这些方法作为工具来使用,而不是作为必须遵守的教条。我主张搜集丰富的细节和充分的数据,并把它们放在相关的情境和社会背景中。本章介绍了一些主要的数据搜集方法,给出了一些准则,引导你通过数据来了解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情境并对其展开行动。

当我们了解了研究对象如何理解他们的经验时,我们开始以分析的方式理解他们的意义和行动。在第 3 章“在扎根理论实践中进行编码”,展示的是如何进行编码,及根据代码的指示给数据片段贴标签。本章关注两个主要的扎根理论编码类型:①初始的逐行编码,这一步骤会推动你仔细地研究你的数据——一行一行进行,而且开始对你的想法进行概念化;②聚焦编码,这会让你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区别、分类和综合。

特定代码会使数据中的意义和行动更为明确。记录关于编码内容的扩展型笔记即备忘录会有助于你发展自己的想法。在第 4 章“备忘录的撰写”中,我会告诉你,扎根理论家如何拆分这些代码,并在备忘录中分析它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你都要写备忘录。备忘录提供了一些方法,用来比较数据、探究有关代码的想法,并指导下一步的数据搜集。在你处理数据和代码的过程中,你的分析能力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直到你能够把某些代码提升为概念类属。

第 5 章“理论抽样、饱和与分类”解释了理论抽样,是扎根理论中获取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数据、完善和补充你的主要类属的策略。有人认为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就是表示,在数据搜集中不会再发现类属的新属性了,而在本章,我会质疑这一说法。接下来讨论的是,对备忘录进行分类,使其与理论类属相契合,并展示能够整合研究工作的概念关系。我引入了图表,因为越来越多的扎根理论家把它作为整合想法、建立逻辑顺序的方法之一。

第 6 章“在扎根理论研究中重构理论”,让你重新评价一下理论是什么。我探究了社会科学中理论的意义,探究了扎根理论中理论化概念的意义。我把实证主义的扎根理论和解释学的扎根理论放在一起,说明如何从不同的起点来比较分析的形式。本章最后讨论了扎根理论理论化的三个例子,以及它们各自理论逻辑

的重构。每个例子在理论重点、范围及深度上都不同,但它们一起展现了扎根理论方法的多样性和有用性。

第7章“撰写草稿”解释了为推进分析而进行的写作与为读者进行的写作之间的不同。扎根理论策略引导你关注自己的分析,而不是论点,推迟做文献评述,建构能够解释数据的原创性理论。这些策略和传统研究成果报告的要求是矛盾的。本章为组织论据、撰写文献评述以及发展理论框架提供了准则,从而调和了扎根理论方法和社会科学报告的传统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本章最后介绍了如何通过写作展示我们的想法。

最后第8章“反思研究过程”,讨论了评价扎根理论研究成果的标准,最后,我们讨论了知识追求的最终目的问题,并号召付诸行动。

那么,现在我们穿越研究过程的旅程就开始了……



第2章 搜集丰富的数据

Gathering Rich Data

进入了数据搜集的现场，扎根理论的冒险就开始了。从我们学科的视角出发，可以使用一些工具和临时概念。一次扎根理论旅程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路线，这取决于我们想去哪儿，以及所进行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在我们沿着这些路线前进时，民族志方法、深度访谈以及文本分析都会成为数据搜集的工具。通过本章的简短浏览，你会了解到每个工具的优点及其局限。



你想要研究的是什么？你能够研究的是哪个问题？哪些工具能够帮助你进行下去？如何利用这些方法搜集丰富的数据？丰富的数据要透过社会生活和主观生活的表面去寻找。探究的头脑、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创新的数据搜集方法能够把研究者带到一个新的世界，接触到丰富的数据。看看帕特里克·比尔纳基(Biernacki, 1996)在他的著作《戒毒之路:无治疗状态下的康复》(*Pathways from Heroin Addiction: Recovery without Treatment*)是怎样开始他的扎根理论研究的:

> 有关该研究的想法开始于几年前我对一群已戒除大麻的人的研究(Biernacki & Davis,1970)。尽管一些人给出的停止吸食大麻的原因在今天看来似乎已不再重要，但在那时是非常有趣的。即使不说该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它至少使我与那些曾经吸食鸦片和大麻上瘾的人以及已经不再使用毒品的人保持了联系。我偶然发现了一些自然康复的吸毒者，这启发我提出了有关鸦片吸食者最终命运的一系列问题。我发现的原因是不同寻常的吗？大部分的瘾君子注定要在他们的这个生命历程中保持毒瘾吗？一些治疗干预形式对于消灭毒瘾是否总是必需的呢？或者对于一些人是否也是有可能通过他们自己的决心和努力来康复呢？(Biernacki,p.200)

这些有趣的问题激起了比尔纳基的好奇心。但是他如何找到研究这个问题的数据呢？他这样说:

14

> 寻找并访谈一些经历过某种形式治疗的前吸毒者几乎没有什么困难……筛选出满足我们"自然康复"研究标准的人来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因为存在着"一朝上瘾，永世难改"这一普遍接受的观念，很多该领域的治疗师和研究者都认为自然康复的吸毒者，也就是本研究的关注对象，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不会占很大比例。(Biernacki,p.203)

就像比尔纳基要寻找合适的研究对象一样，你的研究冒险也要从寻找数据开始。[1] 你会发现，通过搜集丰富的数据，经验研究

---

[1]比尔纳基(Biernacki , 1986)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通过互相推荐来寻找自然康复的吸毒者样本。他的项目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他和他的助手对这些以前吸毒的人进行了101次漫长的访谈，并和那些通过接受治疗而康复的吸毒者的访谈结果进行了比较。

会变得多么令人兴奋。让世界通过你的数据呈现出新的样子。搜集丰富的数据会为你建立重要的分析提供可靠的材料。丰富的数据不仅是细节性的、焦点式的,而且也是全面的。它们揭示了研究对象的观点、感受、意图、行动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结构。获得丰富的数据意味着要寻求"厚描(thick description)"(Geertz, 1973),比如要记内容丰富的田野观察笔记,要收集研究对象书面的个人陈述,以及/或者汇编细致的叙述(比如来自访谈磁带)。

研究者有了丰富的数据,就能够产生论证有力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如田野笔记、访谈以及档案和报告中的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研究者所寻求的数据类型依赖于研究问题和进入途径。研究者常常在扎根理论研究中搜集不同类型的数据,并且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数据搜集策略。如果要为一个正在形成的扎根理论搜集丰富的数据,我们需要考虑些什么呢?我们该如何用方法论工具建构丰富的数据呢?

对方法的思考

通过方法进行观察

方法扩展和放大了我们观察被研究生活的视野,而且,拓展和加深了我们对它的了解和认知。通过方法,我们的首要目的在于像研究对象那样去看待世界——从内部去看。虽然不能断言我们再现了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地进入他们的环境和情境。从内部观察研究对象的生活常常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难得的观点。你可能知道,局外人对你所研究的世界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准确的、误解的,或者是极端错误的。

质性研究者相比我们的量化研究者同行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们可以给研究中的困惑增加新的内容,或者唤起全新的困惑,*在我们搜集数据的时候*,而且这些甚至可以在分析的后期发生。质性研究的灵活性允许你追随所出现的线索。扎根理论方法增加了这种灵活性,与此同时,给了你比其他方法更多的关注点。如果使用得好,扎根理论会让你在不牺牲特定场景细节的情况

下,对数据中所发生的事情更快地获得清晰的焦点。就像一个照相机有很多个镜头一样,你首先也要对风景进行全景扫描。接下来,你要多次调整焦距,越来越近地把景致放在视野中。

有了扎根理论方法,你就可以设计(并不断重新设计)数据搜集策略了,从而完善你所搜集到的数据。但是,方法不是变魔术。一种方法为改善观察提供了一个工具,但是并不会自动提供观点。我们必须*识穿*方法论技巧的武装以及对机械程序的依赖。方法本身,不管是什么方法,并不能产生好的研究和敏锐的分析。研究者如何使用方法是很关键的。锐利的眼睛、开放的头脑,灵敏的耳朵,以及果断的手腕都会使你接近研究对象,而且比形成方法论工具更为重要(Charmaz & Mithchell, 1996)。

15

方法只是工具而已。然而,一些工具比其他工具更为有用。当把洞察力和勤奋结合在一起时,扎根理论方法会提供一些锐利的工具来产生、探察和理解数据。扎根理论会给你灵活的准则,而不是一些严苛的命令。有了这些灵活的准则,你既会指引自己的研究,但也会让自己的想象力飞扬。

虽然方法只是工具,但是它们也会产生结果。要巧妙而睿智地选择那些能够帮助你回答研究问题的方法。怎样搜集数据会影响到你能看到什么现象,你如何、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看到它们,以及你如何理解它们。

就像我们选择的方法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带到研究中的东西也会影响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所有类型的质性研究都依赖于那些操作它们的人。我们并不是消极的灌输数据的容器(Charmaz, 1990, 1998;比较 Glaser &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我们并不是科学观察者,并不能够通过宣称科学中立或宣称权威而使我们免于价值的审查。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都不可能不受世界影响地进入视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彼此面前都有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假设,都拥有自己的知识积累,都占据着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都追求着影响他们视角观点及行动的目的。然而,是研究者而不是研究对象必须对把什么带入现场、看见什么以及如何看拥有灵活的态度。

让你的研究问题决定你所选择的方法。你的研究问题可能会指向一种数据搜集的方法。比如,你想了解人们怎样掩盖非法的吸毒史,你就需要考虑,如何接触到这些个体、赢得他们的信任

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可靠的数据。如果他们想对自己的过去保密，他们可能拒绝填写问卷，或者参加焦点团体。然而，那些自定义为戒除毒瘾者的人就可能会同意和你进行交谈。一旦建立了信任，那些吸毒者就可能邀请你在他们的圈子里游荡。

某些研究问题会使用一些复合的或序列的方法。如果你要研究癌症患者的生活，你可能有机会进入一个地方性的支持群体或志愿群体，进行访谈，参与互联网的讨论组，分发问卷。在所有研究中，研究所产生的问题都会引导你形成新的数据搜集方法，修正以前的方法。一旦开始搜集数据，研究对象就可能给你一些预料不到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会有助于推进你的想法。一些研究对象可能会邀请你阅读他们的个人日记；其他人可能会向你谈起一些组织的历史，给你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 16

扎根理论逻辑会教给你*数据搜集的方法*以及发展理论的方法。目的在于产生或接受一些方法，来发展你的想法。这些创新可以发生在研究过程的任何一点。在研究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你本该在早些时候就应进行探究的东西。想一想哪种方法能够使你获得所需的数据，你能够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找到它。对于一个项目，可能意味着设计一些问题让研究对象去回答，比如，“有人提到有过什么什么经验，你有过类似的经验吗?”民族志学者和访谈者可能会回到研究对象，可能已经和研究对象谈过并问过这种类型的问题了。然而，大部分访谈者都要面对时间、资金或制度瓶颈（只允许对每个研究对象进行一次访谈）的限制。这些访谈者可能会在访谈最后拿这些问题来问后来的研究对象。对于其他项目和目标，研究者可能发现，建构一份开放性问卷是有帮助的。

格拉泽（Glaser，2002）说到，“一切都是数据。”不错，你在研究背景中获得的，或者与你的研究题目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数据。然而，从数据的性质、与你研究兴趣的关联度以及对于解释的有用性来说，数据是不同的。研究者在识别有用数据的能力及技巧和记录数据的充分程度上也都是不同的。然而，*人们*建构了数据——不论研究者是通过访谈或田野笔记来建构第一手数据，还是从诸如为私人讨论或公共传播目的而留存的历史文献、政府记录或组织信息之类的其他来源得来的文本和信息。我们会把诸如文献、记录及人口普查数据的信息作为数据，然而，是

个人建构了它们。不论是什么样的数据,它们都是从某种目的出发,实现了一个特殊的目标。目的和目标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和情境化条件下产生的。

扎根理论家的背景假设和学科视角提醒他们,要在数据中寻找特定的可能性和过程。这些假设和视角在不同学科中往往是不同的,但是都形成了各自的研究问题和重要概念。布卢姆(Blumer, 1969)关于使概念敏感化(sensitize)的观点在这个时候是很有用的。这些概念会给你一些初步的想法,会激发你提出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一些特殊类型的问题。扎根理论家常常这样开始他们的研究,一些经验兴趣会引导你,以及和布卢姆一样,一般概念会给这些兴趣一个松散的框架。举例来说,我是这样开始对慢性病病人的研究的,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感受时间,他们的疾病经验是怎样影响他们的。17 对我起引导作用的兴趣(guiding interests)使我把诸如自我概念、身份和忍受等概念引入了研究。但这只是个开始。我把这些概念作为*出发点*来设计访谈问题,来观察数据,来聆听被访者,分析性地思考这些数据。研究兴趣、敏感性概念以及学科视角常常会发展而非限制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在连续分析中通过研究数据和检验我们的想法来发展特定的概念。

> 与布卢姆(Blumer,1969)关于敏感性概念的描述一致,扎根理论家通常以一定的研究兴趣和一套一般概念来开始他们的研究。这些概念给你一些所要探究的想法,让你更敏感地提一些与你的问题有关的特殊问题。

专业研究者和很多研究生在开始一个研究项目之前已经在他们的学科中拥有了可靠的基础,已经对研究问题及有关文献有了相当的熟悉。所有这些会带来一个好处,即能够深入地看待经验世界的某些方面,但是也可能会忽视其他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些好处开始研究,但要对研究早期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尽可能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简言之,敏感性概念和学科视角提供了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果*。扎根理论家把敏感性概念作为尝试性工具来形成他们有关过程的想法,并在数据中对这些想法进行定义。如果一些敏感性概念被证明是无关的,那么我们就要放弃。相反,传统量化研究的逻辑演绎模型认为,这些都是必需的,即理论中所形成的概念要操作

化，而且必须尽可能精确，关于这些概念的关系要演绎出可以验证的假设。在这一模型中，研究被锁定在最初的概念中。

如果你的质性数据并没有说明你最初的研究兴趣又会怎么样呢？佩蒂·阿拉苏塔瑞（Alasuutari，1995）展示了他的研究团队对这一问题的处理：

> 我们认真地思考了项目的主要问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开始，于是又重新整体进行了考虑。这对于一个研究项目来说，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意外。只是研究者很少在报告中提到这些而已。然而，早期的失败对于选择正确的道路来说并不必然意味着你最终会走入死胡同。在原来结果的基础上修正你的策略，你可能就会走向另一个结果。
>
> 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所做的错误的开始，以及考虑到现有资源不得不放弃的不现实的研究想法，都会产生一个更好的计划，并且更加清楚地明白了项目应该怎样进行。（Alasuutari，p. 161）

扎根理论家要评价他们最初的研究兴趣与已出现的数据之间的契合度（fit）。我们并不把预先形成的想法和理论直接强加给数据。相反，我们要追随数据所*规定*的路线（leads），或者设计另一种搜集数据的方式来追求我们最初的兴趣。这样，我以当时的研究兴趣以及自我概念开始，同时也追求研究对象所提到的关键问题。比如，我觉得有必要去探究他们对说出病情（disclosing illness）的关注，而这是我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他们说出病情和说出病情后的感受之间的矛盾心理是个不断重复的主题。① 后来，我研究了病人怎样、何时、为什么及和谁会谈论他们的病情。我更多地研究了慢性病患者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对他们的病情保持沉默（Charmaz，2002b）。

18

在扎根理论中，数据搜集策略和构成"强制性（forcing）"的因素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扎根理论家看来是一种可行的搜集数据方法，但却可能被其他人认为是把数据

---

①马修·詹姆斯（Mathew J. James）提醒我，所有的研究都有生成的主题（私人交流，2004 年 9 月 17 日）。确实如此，但是持有不同方法论的方法策略鼓励或限制这种情况的程度是有差异的。扎根理论方法是建立在有利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基础上的。

强行放入到预先设定的框架之中。格拉泽(Glaser, 1998)反对预先设定"访谈提纲、数据搜集单位、样本、已定代码、指示性图表、正规备忘录规则等等"(p. 94)。然而,探究一个问题的开放式访谈提纲和把已有代码强加给所搜集的数据并不完全相同。仅仅思考用什么词语提出开发性问题,就能帮助新手避免把满载自己偏见的问题一股脑地倒出来,也能避免把对方的回答归入狭小的类属之中。研究者如果不关注搜集数据的方法,会导致数据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被强制归类,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一再重演。

追求质量(reaching for quality)

研究的质量和可信性是从数据开始的。数据的深度和范围非常重要。一个基于丰富、充实而且彼此相关数据的研究是出类拔萃的。这样,数据除了要具有发展核心类属(core categories)的有用性之外,另外的两个标准是,描述经验事件的恰切性(suitability)和充分性(sufficiency)。

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要充分搜集符合你任务的数据,要尽可能给出关于该问题的完整图景。读者和评论家会把你的研究看作一次严肃的努力,你会拥有一个强有力的说话基础。新手可能会把好的但却有限的数据误以为一个充分的研究。要把研究设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比如,一个民族志学者能够致力于长期细致的观察,并以与关键信息提供人的十次深度访谈为结束,他们会比那些只进行了十次丰富访谈的人得到更多的东西。符合一个本科生项目要求的研究很少能满足一篇博士论文的要求。有限的数据会给你一个不错的开始,但并不会累积成一项细节丰富的研究或一个精细的理论。一个研究者很少能够从有限的数据得出具有说服力和确定性的结论来。

一些扎根理论家(Glaser, 1998; Stern, 1994a)反对关注数据的数量。别的很多研究者也持有同样立场,认为进行只有有限数据的小型研究也是合理的。对于格拉泽和斯特恩来说,小样本和有限数据并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因为扎根理论方法的目的就在于形成概念类属,这样,就把数据搜集指向了解释类属的属性及类属间的关系。它们的推论有助于你安排自己的数据搜集。这也会导致戴伊(Dey, 1999:119)所说的"砸碎了再掠取(smash and grab)"的数据搜集策略,和肤浅的分析。

什么类型的数据代表着丰富和充分呢？拿下面这些问题问问自己，可能会有助于你评价自己的数据：

- 对于有关的人、过程及环境，我是否搜集了足够的背景数据，以致可以回忆、理解并描绘出该研究的全面图景？ 19
- 我是否已经得到了关于研究对象观点及行为的详细描述？
- 数据是否揭示了存在于表面之下的东西？
- 数据是否足以揭示随着时间流逝所发生的变化？
- 我是否获得了有关研究对象行动的多重观点？
- 我所搜集的数据是否能使我形成研究性类属？
- 我可以在数据间进行什么类型的比较？这些比较是怎样产生并佐证我的想法的？

解释学质性方法意味着要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布卢姆(Blumer,1969)的名言“尊重你的对象”提醒我们，即使我们质疑研究对象的视角或行为，也要维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尊重研究对象的一个方式就是，尝试和他们一起形成报告。戴伊(Dey,1999)指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砸碎并掠取(smash and grab)的数据搜集策略破坏了和谐的关系(rapport)，而和谐的关系对于很多项目来说，是获得可靠数据的前提条件。如果研究者没有建立和谐关系，他们就有失去进行后续访谈或观察机会的危险。

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尊重要贯穿在搜集数据及形成数据内容的整个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去了解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努力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以此来表现我们的尊重。这一方法意味着必须检验我们关于被研究世界的假设，并清晰地再现这些假设。这意味着要发现研究对象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没有说出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他们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当我们试图通过研究对象的眼睛去看他们的世界时，我们要尊重他们，尽最大能力去理解，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赞同他们。我们努力去理解，但并不必然接受或把他们的观点复制为我们的；而是解释它们。我们试图去了解，但并不能知道，人们的头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Murphy & Dingwall, 2003)。但是，一个认真的解释性理解常常标志着经典的质性研究，代表了一项惊人的成就(比如，Clark,1997；Fine,1986,1998；Mitchell, 2002)。克里斯廷·卢

克(Luker,1984)的著作《堕胎和母亲的政治》(*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展现了解释性理解的类型。她研究了强调生命权的女性和支持堕胎选择的女性(pro-life and pro-choice women)的观点,对这两个对象群体都表现了尊重和兴趣。她描述了她们相互对立的观点,对两个群体的立场都进行了公平的分析。看看卢克是怎样展现强调生命权的积极分子的逻辑的:

> 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他们基本上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观念,即与已出生的人相比,胚胎属于一个不同的道德类属,所以,在"尊重未出生的生命"的世纪里,堕胎改革运动作为一种草率的而且是反复无常的排斥行为强烈地冲击着他们。……对于那些真正相信胚胎应一直得到尊重的人来说(而且我们的数据表明,大部分强调生命权的人都相信这一点),美国社会对堕胎的广泛接受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因为这似乎代表了社会的一种意愿,即剥夺人作为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人们一直在享受的。如果可以这么轻易地剥夺婴儿(胚胎)作为人的权利,我们中的谁会成为下一个被剥夺者呢?(p. 156)

20

搜集扎根理论数据

经典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强调对行动和过程的分析。当通过数据搜集来形成我们的生成性(emerging)分析时,我们要同时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这一扎根理论的方法有助于我们始终重视对行动和过程的分析。这样,第一个扎根理论问题就要问:

- 这里发生了什么?(Glaser, 1978)

这一问题进一步扩展,就要在两个水平上提出:

- 基本的社会过程是什么?
- 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是什么?

这些问题会让你开始自己的研究。答案可能不会像问题所表达的那么直接。你对"基本"的定义始终是自己的一种解释,即使主要的研究对象与你持同样的观点也是如此。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强调研究者在田野中

发现的基本社会过程。虽然经典文本提供了基本社会过程的分析，以此作为扎根理论方法的基础，格拉泽（Glaser, 2002）后来却反对对基本社会过程的追求，他认为这样做会强制数据。

你可能发现环境中发生着很多事情。任何事情都可能看起来很重要或不重要。反思你所看到和听到的。要对这些事情做出评估，如下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 从谁的观点看，某一特定过程是基本的？从谁的观点看，它是边缘的？
- 观察到的社会过程是怎样出现的？研究对象的行动怎样建构了这些社会过程？
- 谁在这些过程中施加控制？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控制？
- 不同的研究对象对这一过程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他们如何谈论它？他们强调了什么？遗漏了什么？
- 他们关于这个过程的意义和行动是怎样以及何时发生变化的？

这些问题可能会靠不住。一个简单的回答可能并不切中肯綮，而且并不能深入基本的社会过程。这些过程可能是不可见的，说不出来的，但却形成了环境中研究对象的行动和理解。根据研究对象的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立场（vantage points）的不同，环境中对“这一”基本社会过程的定义也会不同。研究对象对他们所参与过程的定义依据的是哪些信息和经验？他们提供的是公关辞令式的理想画面，还是反映了人们所争斗的现实？一个基本社会过程是在什么时候变得清晰起来的，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比如，一个社区部门可能会声称，他们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但是，经过仔细考察可能会发现，他们只是保持了机构的基本运转。建构数据时可以考虑下面的方法：

- 不仅关注语言，也要关注行动和过程。　21
- 仔细描述行动的背景、场景和情境。
- 记录谁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你能够分辨出原因的话），以及是怎样发生的。
- 分辨具体的行动、意图和过程所出现的条件或被削弱的条件。
- 寻找解释这些数据的方法。

- 关注研究对象具有特定意义的具体字眼或词语。
- 发现不同的研究对象持有的理所当然的、隐含的假设;展示一下它们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如何影响行动的。

民族志中的扎根理论

民族志意味着记录特殊群体的生活,这样就必须长期在他们的环境、社区或社会世界中参与和观察。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因为民族志的研究涵盖了特定环境中所发生的一切,而且常常包括来自文献、图表、地图、照片以及有时也有正式的访谈和问卷的补充性数据。

研究对象可能会把他们观察的关注点局限在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相反,民族志学者要发现被研究的环境中多维度的丰富细致的社会内容,目的在于理解对象理所当然的假设和规则(Ashworth, 1995; Charmaz & Olesen, 1997)。

一个民族志学者在田野中应该研究什么呢?那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如果对那里的环境、行动和人们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民族志学者就有机会从基础开始,寻求他们认为最有兴趣的任何东西。

研究对象会让民族志学者看到他们的世界和他们的行动。民族志的目的就在于获得被研究世界内部人的描述。但是,像其他研究者一样,民族志学者把他们的理论训练和方法论工具带到了他们的工作中。从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看,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可能是产生一种局外人的报告(Pollner & Emerson, 2001)。

虽然标准的教科书都要求有开放的头脑,接受田野中人们的行为方式,但是民族志学者还是给他们的研究带来了多种不同的风格。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所遇到的对象以及所遇到的限制都影响他们的行动。一个民族志学者可能会发现,在某一个环境中,研究对象热情地讲述自己个人的故事和集体的故事。而在另一个环境中,这个研究者会发现,只有当他或她提供一些对于这个环境比较新奇的玩意儿时,自己才受到欢迎。从被动观察到完全参与,民族志学者的参与程度要依赖于具体的研究,包括它的

目的、对进入方式的认可度、参与度、互惠情况以及和对象形成的关系。同样，他或她会发现这种参与与预想的状态不一样。作为一个缺乏经验的民族志学者，当我在一家制度性医疗机构进行研究时，我认为自己应该溜回房间，在白天随时记录笔记。接待我的一位管理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机构的生活要比被研究的角色更重要。他认为，我应该把白天的时间以及大部分晚上的时间，用在参与病人的活动中。他告诉我，“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治疗师。”

22

一个环境中什么最基本，要依赖于研究对象的立场、行动和意图。行动可能会与所宣称的意图相反。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立场——有时还会有冲突的目标。当他们目标冲突时，是否能够意识到？他们如何据此行事？如果有冲突出现的话，又是何时出现的？

如果你读到一个扎根理论项目的田野观察笔记，你可能会发现这些笔记：

- 记录了个人及集体的行动。
- 对轶闻奇事和观察结果做了全面细致的笔记。
- 重视在环境中所发生的重要过程。
- 注意研究对象认为有趣和/或有问题的事情。
- 关注研究对象对语言的应用。
- 把行动者和行动放到背景中。
- 逐渐加深对关键性分析观念的关注。

> 扎根理论民族志优先研究的是*现象或过程*——而不是对环境本身。

扎根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和民族志其他类型不同的形式。扎根理论民族志优先研究的是*现象或过程*——而不是对环境的描述。这样，从田野工作开始，扎根理论民族志学者研究的就是在环境中发生了什么，并对这些行动进行概念化呈现。

一个扎根理论民族志学者可能会在这个环境中逡巡，以获得被研究过程更多的知识。其他的民族志方法常常关注诸如亲属网络、宗教实践以及一个具体社区的工作组织情况。接下来，这些民族志学者会提供被研究环境中与问题相关的所有描述，通常会采用比过程方法更为结构化的方法。

民族志学者把他们的问题看作是被研究世界相互独立的几部分,或者作为结构而不是作为过程来处理,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一个扎根理论分析会有很多困难。他们的田野笔记可能把问题作为一个事情、一个对象来描述,而并不展现构成它的行动和过程。不仅研究对象,也包括民族志学者自身,都可能把构成研究问题或结构的过程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在另一个水平上,要考虑你总体的研究目标和你所搜集、记录的数据之间的契合度。要对你所拥有的和数据所带给你的想法保持开放态度(Atkinson, 1990)。激动人心的新视野可能会出现。然而有时可能需要扩展你在一个环境中的进入途径。如果你想研究一个组织如何安排人们的活动,你就需要展现人们是如何通过组织进行活动(move)的——或者是如何被组织所驱动(moved)的。组织的空间安排和设置可能会提供一些有用的数据。比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为什么一个退休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分派和多次分派居民到一些公共空间并给以不同水平的看护,你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发现居民如何使用诸如电视休闲室等社会空间。居民对休闲室的使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一些有关医疗环境局限的观察,但不会提供有关工作人员关于看护水平决策的信息。

民族志研究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要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地搜集数据。所研究的世界似乎如此有趣(而且,也许的确是有趣的),以至于民族志学者要努力完全把握所有。堆积如山的支离破碎的数据在不断增长(见 Coffey & Atkinson, 1996),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接下来是什么?低水平的描述,以及,如果更复杂点的话,不相关的类属的排列。没有对数据进行融会贯通的民族志学者很少能产生新鲜的见识,有时甚至不能完成他们的项目,虽然经过了数年的辛苦。

进入扎根理论。有趣的是,比起早期民族志工作所使用的一些普遍的方法,关注一个基本的社会过程会更有助于你获得一幅更加全面的关于整体环境的画面。民族志学者通过使用扎根理论建立事件之间的关联,从而来研究过程。强调比较方法的扎根理论会使得民族志学者,①从研究一开始就比较不同的数据,而不是在搜集完所有数据之后,②比较数据和已有类属,③展示概念和类属之间的关系。扎根理论策略能够让民族志学

者更多地进入*调查研究过程*，尽管他们可能面对的压力是研究环境中完整的研究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扎根理论排除了那些只关注周围环境的消极观察者的实证主义观念。扎根理论家会选择自己所观察的场景，并引导着自己观察这些场景的视线。如果认真而充分地使用扎根理论方法，会获得透过表面、深入挖掘场景的系统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控制研究过程很有帮助，因为它们有利于民族志学者聚焦、结构化和组织研究过程。

扎根理论方法要求把描述提升为抽象类属和理论解释，从而把民族志研究推动到了理论形成的阶段。过去，民族志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为分离，并深受其限。扎根理论方法保持了民族志方法研究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不过又通过系统检查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使民族志研究变得更为精确了。扎根理论的逻辑要求必须回到数据，进入分析。接下来你要返回田野，搜集进一步的数据，完善生成的理论框架。这一逻辑能够帮助你克服几个民族志的问题：①不加批判地接受研究对象的观点，②在没有聚焦的情况下贸然地长期进入一个田野环境，③进行肤浅的、随机的数据搜集，④使用成套的学科范畴。

单薄的未聚焦的数据可能会使得民族志学者退回去依赖他们学科术语库中成套的概念。扎根理论会激发新鲜的观点，产生新颖的范畴和概念。这就是这一方法的力量和核心所在。在数据和分析之间进行往复循环也有助于你克服无所适从和拖拖拉拉的毛病（也可见 Coffey & Atkinson, 1996）。当研究者搜集数据没有方向时，这两个问题都可能发生。 24

使用有限数据的流行趋势和即时理论化（'instant' theorizing）[①]长期以来一直和扎根理论有关，而现在也渗透到了其他

---

①扎根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样的指责，即把分析建立在偶然事件和有限数据上（Lofland & Lofland, 1984）。克雷斯韦尔（Creswell, 1998）把扎根理论看作是主要基于有限数量的访谈基础上的（20～30 个），但是他并没有挑战使用小样本进行的研究。依据研究目的及数据和分析的质量情况，有限样本也可能已经足够了。当访谈是数据的唯一来源时，博士论文或重要研究就要求有更多的访谈。

现在缩短数据搜集时间的趋势已渗透到所有的方法，包括民族志。正如施耐德尔（Schneider, 1997）所说，急于进行理论化的冲动反映了超越具体研究问题的政治和职业决策，这既损害了理论，也损害了研究。

方法中,包括民族志。一项合格的民族志研究需要付出时间和热情。扎根理论能帮助你削减多余的工作,但核心的工作仍然需要去做。搜集丰富的民族志数据意味着要从深入研究现象开始——沉浸于其中!

你会充分利用你随身带到研究环境中的东西。新手带来的常常是精力和开放性。一些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可能会惯于沉浸在学科观点和程序中,以至于很难超越它们。另外一些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可能会在没有把它们表达清楚,甚至没有和它们建立联系的情况下就开始理解所研究的领域了。新手可能会步履艰难。一些准则能够把步履艰难变成硕果累累。米切尔(见 Charmaz & Mitchell ,2001)已经发现,民族志学生只要得到一点帮助就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他要求学生去研究行动和行动者,并提供一些能够激发他们思想的问题。你可能会发现,有些问题会帮助你观察研究环境中的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接受这些问题,但是首先要依靠你在环境中所观察到的。你可以使用米切尔的问题来引发探究,但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公式。

- 行动的背景是什么?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发生的?
- 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被研究的总体行动(研究对象用总体行动来组织自己较为长期的行为)是什么?构成这个行动的具体行为是什么?
- 在这些场景中,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如何分布的?
- 行动者(研究对象)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组织对这些行动有什么样的影响、检查、规范或促进?
- 成员如何分层?表面上是谁来负责的?被管理的状态是否随行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成员身份是怎样获得和保持的?
- 行动者关注的是什么?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先入之见的,什么是关键的?
- 有哪些主要的东西是他们会忽视,而其他人却会重视的?
- 行动者用什么样的符号去理解他们的世界、其中的参与者和过程,以及他们所遇到的对象和事件?他们是如何称呼这些对象、事件、人、角色、环境及设施的?

- 行动者应用了什么样的实践、技巧、战略及操作方法?
- 行动者在解释他们的参与时,使用了哪些理论、动机、借口、辩护理由以及其他的解释? 他们如何在相互之间(而不是对外部调查者)进行解释,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 行动者追求什么目标? 从他们的视角看,一个行为在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做就很糟糕? 他们如何判断行动——通过什么标准,由谁形成以及被谁应用?
- 不同的行动者从他们各自的参与中分别获得什么样的回报?① (Charmaz & Mitchell , 2001 ,p. 161)

在了解背景与内容、意义与行动、结构与行动时,民族志学者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扎根理论能够促进民族志学者深入钻研一些田野中出现的含糊问题。一个扎根理论的策略:寻找资料,描述所观察到的事件,回答关于发生了什么的基本问题,然后形成理解它的理论类属。这一方法也可以补救扎根理论研究的弱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单纯依赖田野调查者所给出的报告的研究。人们相互解释自己行动的方式可能和他们对访谈者的陈述不一样。而且,研究对象的大部分重要解释可能包括着默认的理解(tacit understanding)。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研究对象很少会在他们的成员之中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更不用说对非成员身份的人了。 25

社会行动者生活在一个意义共享的世界,其中的研究对象对世界的理解大部分直接来自他们的直观感受(Prus, 1996)。在实践意义上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和被研究对象分享一些相关的经验,但不必要分享所有观点。柏格森说,"哲学家一致认为,在认识一个事物的两种方式之间要进行深入区分。第一种指围绕事物去认识,第二种指进入事物之中去认识。"(Bergson, 1903:1)民族志学者的工作就是探索第二种方式。扎根理论研究常常围绕一个对象;这些方法产生了一幅从外部看研究对象的地图,但是可能并没有进入其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从不同的场所和立足点来看一个现象(比如,可见于 Glaser & strauss,

---

①这些民族志问题改编自 Mitchell(1991)一个更长的清单。

1965,1968)。但是扎根理论民族志学者可以深入经验进行解释性呈现(比如,可见于 Baszanger, 1998; Casper, 1998; Timmermans, 1999)。

深度访谈

访谈对话

深度访谈一直是各种不同类型的质性研究所采用的一种有用的数据搜集方法。访谈是非常基本的具有指向性的谈话(Lofland & lofland, 1984, 1995);深度访谈会产生对一个具体问题或经验的深入探究,这样,对于解释性探究它就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其他的访谈形式,比如信息采访,可能指向的是特定的扎根理论项目,特别是那些有着客观指向的项目(Hermes, 1995)。

> 访谈是非常基本的具有指向性的谈话(Lofland & lofland, 1984, 1995);和一个已经有相关经验的人进行深度访谈会对一个具体问题产生深入的探究。

深度访谈的深刻本质会引发每个研究对象对他或她的经验进行解释。访谈者要努力去理解这个问题,而且访谈对象可能有解释这个问题的相关经验(见 Fontana & Frey, 1994; Seidman, 1997)。这样,访谈者的问题让研究对象以一种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方式描述和反思他或她的经验。访谈者在那里聆听、敏感地观察,并鼓励对象做出回应。因此,在交谈中,主要是研究对象在说。

26

对于扎根理论研究,要设计一些宽广的开放性问题。然后你要把访谈问题进行聚焦,使其能够引发对问题的细致讨论。你要通过设计开放的、非判决式的问题,鼓励对象说出意料之外的故事。设计问题的方式和操作访谈的方式之间结合的程度如何,会影响访谈开放与聚焦关键命题之间的平衡。

深度访谈在结构上可以对问题进行松散的引导性的探究,也可以设计成半结构性的聚焦问题。虽然深度访谈可以是对话性的,但也要遵守一定的礼节。研究者应该表现出他或她的兴趣,并且告诉对方自己希望知道更多信息。在日常谈话中可能是粗

鲁的问题或者以友好的方式掩盖的内容(即使是和熟人也如此),对于研究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研究对象常常期待他们的访谈者问一些能够引发对主题进行反思的问题。不要只是"嗯嗯",或者只是点点头,好像意义是不证自明、人所共知的,一个访谈者应该说,"非常有趣,能再讲一些吗?"在作为访谈者的角色中,你的评论和提问有助于研究对象理清楚他或她的意图和意义。在访谈进行中,你可以要求搞清楚更多的细节,以此来获得正确的信息,来了解研究对象的经验和反思。和日常的谈话不同,访谈要推动谈话,要跟随直觉。访谈要深入到日常谈话的表面之下,要检验早期的事件、观点以及新鲜的感受。

深度访谈允许访谈者:

- 深入到所描述经验的表面之下。
- 停下来探究一个命题或问题。
- 要求更多的细节或解释。
- 询问研究对象的思想、感情及行动。
- 让研究对象针对主题。
- 回到早期的观点。
- 复述研究对象的观点,检验是否准确。
- 放慢或加快速度。
- 转换当前的话题。
- 承认研究对象的品性、视角或行动。
- 使用观察技巧和社会技巧来推动讨论。
- 尊重研究对象并且对他们接受访谈表示感谢。

现在我们拿访谈和日常生活中的谈话类比一下。访谈的规则要求你去聆听,而不是刨根问底;同意被访者——至少是默认,不去质疑;让被访者来引导谈话进程,而不是停下来追究以前的观点;听故事,但并不为了把握别人的话而用自己的话来重复这个故事。想想一个朋友和你分享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不可能对她说,"看看我能否正确把握这些事儿。"然后你就把她故事中的每个情节都再描述一遍。

研究对象在访谈中也有谈话特权(conversational prerogatives)。深度访谈允许研究对象: 27

- 打破沉默,表达自己的观点。

- 讲他们的故事,并给它们一个连贯的框架。
- 反思早期的事件。
- 成为专家。
- 选择说什么以及如何去说。
- 分享重要经验,并教给访谈者如何解释这些经验。
- 表达在其他关系和环境中不被接受的想法和感情。
- 获得认可和理解。

访谈过程中的协商

访谈是场景性的和协商性的。无论是研究对象要求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讲述他们所关注的东西,还是研究者要求对象讲出一些特别的信息,结果都是一种对现实的建构——或者说重构。访谈故事并不会完全再现已经存在的现实(Murphy & Dingwall, 2003; Silverman, 2000)。这些故事只是从特殊的观点提供了一些叙述,这些叙述服务于特定的目的,包括这样的假设,即一个人在访谈中应该遵循默认的谈话规则。

中立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中立的访谈。相反,一个访谈反映了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带进访谈的东西、访谈中的印象以及通过访谈所建构起来的关系。访谈者必须协调研究对象看待他们的方式,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过去和当下的身份可能会影响互动的特征和内容。当下的身份以及过去的经历会让研究对象对访谈过程以及所谈论的问题产生自己的认识,并形成相应的关系。访谈对象在评价访谈者,评价环境,并按照他们当下的判断和以前的知识来行事,并且常常是以一种习以为常的形式行事。经历坎坷的人可能会从他们的访谈者那里找到说什么以及如何把话题深入下去的线索。当访谈者对他们对象的关注点及脆弱处很敏感时,他们会知道如何深入话题,以及何时进一步探究某一个关注点。

权力和地位的相对差异可能会在访谈中表现出来。强势的人可能会主导谈话过程,使访谈问题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呈现,控制访谈的时间、节奏以及长度。强势的个人和弱势的个人都可能不仅不相信研究结果被使用的方式,也不信任他们的访谈者、发起机构以及研究者的目的。在访谈中,专业人员可能只是背一些公关套话,而不是讲出个人的观点,完整谈到他们自己的经验就更少了。访谈对象会或暗示或公开地问到这样的问题,访

谈者是否代表官方或官方支持者(advocates),并检验他或她的忠诚度。

除了权力和专业地位的动态影响之外,性别、种族以及年龄都可能影响访谈的方向和内容。男性可能会把深度访谈作为一种威胁,因为他们出现在一种一对一的关系中,不能对互动进行充分的控制,被鼓励对自我进行揭示,而且,还存在由此失去公共人格的危险(Schwalbe & Wolkomir, 2002)。如果诸如残疾或离婚等访谈话题挑战了他们男人的尊严,这种潜在的不舒适感可能还会加强。特里·阿伦德尔(Arendell, 1997)在研究离婚父亲时发现,在一些访谈中一谈到离婚,他们就会微妙地转移谈话重心。当这些父亲在谈到作为男人所主要关注的东西时,他们的谈话所体现出来的是关于男子汉的形而上的措辞。把自己的情绪掩藏在印象管理的厚厚面具之后的男人可能并不同意接受采访;其他人可能顾左右而言他,而不是开诚布公。正如阿伦德尔所发现的,一些男人在访谈中戏剧性地扮演着他们的性别角色。

28

访谈中的女性表现出另一种两难。当访谈者是一个男性时,访谈中就会出现性别的互动。当访谈者和对象都是女性时,阶级、年龄以及/或者种族和民族差异可能会影响访谈的进行。但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常常会自愿接受各种敏感话题的访谈。当其他人对于一些话题三缄其口时,女性能够接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她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可以从说明性的、沟通性的(cathartic)或启示性的,到不舒服、痛苦的或无所适从的。话题、话题的意义以及访谈对象的生活环境,以及访谈者的技巧都影响着女性对她们各自访谈的体验(也可见 Reinharz & Chase, 2001)。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访谈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种族、阶级、性别、年龄以及意识形态可能会影响访谈中所发生的事情。在谈到访谈话题时,这些地位特征也应该在考虑之列。男性对象常常喜欢和一位女性谈到个人经验,但可能喜欢在职业生涯上教导一个更年轻的男性访谈者。同样,老年访谈对象可能非常愿意和中年人或更老一些的访谈者讨论晚年的性事,但不愿意和年轻人讨论这个问题。

想想怎样才能最好地发挥访谈的灵活性。扎根理论方法鼓励使用民族志方法和访谈方法。你可以从观察开始一个问题的研究,在你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带着更聚焦的问题回访研究对象。

使深度访谈适合扎根理论

深度质性访谈特别适合扎根理论方法。扎根理论方法和深度访谈都是既开放又有方向性,既被形成又自然生成,既有步骤又很灵活的方法。尽管研究者常常选择深度访谈作为单一的方法,它还是弥补了其他方法比如观察,调查以及研究对象的书面陈述。

扎根理论方法和深度访谈都是既开放又有方向性,既被形成又自然生成,既有步骤又很灵活的方法。

相比大部分其他方法如民族志或文本分析,访谈者对数据建构的控制要更为直接。扎根理论方法要求研究者要控制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反过来,这些方法让研究者对材料有了更多的分析性控制。质性访谈提供了对生活某些方面开放的、深入的探究,访谈者在这种生活中有着真切的经验,并包含着有价值的见解。访谈可以引出研究对象的主观看法。访谈者通过描述话题和设计问题勾勒出这些观点的大概内容。访谈是灵活的、生成的技术;想法和论点在访谈中生成,访谈者可以及时追踪这些线索。

29

和深度访谈一样,扎根理论方法也依赖着同样的灵活性。作为扎根理论家,我们的目的是从研究一开始就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了解正在发生之事的努力有助于克服追随主观先入之见的倾向。除了要选择和追随访谈中的主题外,我们还要通过研究数据来寻找观点,然后返回田野,收集聚焦数据来回答分析性问题,来填充概念缝隙。这样,深度访谈技巧中灵活性和内在的控制性之间的结合,是非常适合于扎根理论策略的,因为它增加了最终分析结果的分析深度。扎根理论访谈和大部分深度访谈不同,因为在进行访谈时,我们把访谈话题的范围限制了,让它集中在为了发展理论框架而进行的特定数据的搜集上。

进行访谈

怎样进行一次扎根理论研究的访谈呢?如果故事源源不断,那么你的第一个问题可能足以激活整个访谈。当被访者能够而且愿意讲故事的时候,接受性的"嗯嗯啊啊"、一些澄清性的问题或评论会使故事不断进行下去。我会认真地选择问题,慢慢地问他们,以激发他们的反思。访谈者使用深度访谈来研究,而不是

来判决(Charmaz, 1991b)。设计问题需要技巧和实践。问题必须探究访谈者的主题,要符合被访者的经验。正如下面要谈到的,这些问题的类型要足够普遍,以涵盖经验的广泛范围,又要足够狭窄,以引出和阐明被访者的特殊经验。

下面我会举一些问题范例,让你了解一下如何设计问题来研究过程。这些问题也反映了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符号互动论非常重视对被访者观点、所经验事件以及行动的了解。这些问题范例目的在于研究个人经验。对于关注组织或社会过程的一个项目来说,我首先把问题指向集体实践,然后关注集体中的个人对这些实践的参与以及他们的观点。

这些问题范例只是一些启发思考的例子。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并试着写出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来。把你的问题清单削减得尽可能简短。我从来没有问到过下面所有的问题,而且通常在某一个阶段,提问并不会超出最初的那套问题。我很少带着访谈提纲进入访谈。我喜欢使访谈呈现为非正式的自然谈话状态;不过新手需要更结构化的问题。拥有一份设计精良、问题开放的访谈提纲和有准备的探究,会增加你的自信心,能让你集中于这个人所说的话。不过,你可能会忽视一些明显的探究要点,因为你的注意力被接下来问什么以及怎么问所牵引了。接下来,你可能会问一系列"你是不是——"之类的问题,打断了对这个话题的探究。最糟糕的是,你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一种审判。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一次深度访谈的失败。访谈需要技巧,但是你能学会怎么去做。 30

就像你可能需要对某些访谈对象给予特别考虑一样,很多话题也需要特别的关注。研究人生突变(life disruptions)或被社会认为不良的行为(stigmatized behaviors),可能会让人觉得突兀。被访者有时会在访谈中讲述一些伤痛的往事,这些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他们会提起的,这些内容可能和你的研究有关,也可能没关。在这种情况下,我所遵循的一些原则可能对你有所帮助。第一,我认为被访者的舒适感要大大优先于获得丰富的数据。第二,我会特别关注进行探究的时机。我常常只是聆听,特别是当被访者似乎沉浸在所描述的事件中时。第三,我努力从被访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些经验,来评价这些经验对这个人的意义。第四,我倾向于以一种积极的状态结束访谈,把结束性问题放在

一些积极的反应上。访谈不应该在访谈者问了一些最具有研究性的问题,或者被访者在很悲伤的情况下突然结束。访谈的节奏和速度应该在结束前把被访者带回到一种正常谈话状态。下面所列举的一些问题示例会解释上面的这几点。

机构审查委员会(IRBs)和人体被试委员会(human subjects committees)越来越多地要求研究者提交研究计划的详细介绍和全部研究工具以供审查。这些细节与质性方法(特别是扎根理论)的生成性本质不相一致。在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和人体被试委员会同意的过程中,访谈问题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难题。所设计的访谈问题必须要足够细致,才能说服评审者,研究不会对研究对象产生伤害;但问题又要足够开放,这样才能在访谈中允许意外资料的出现。一个深思熟虑的开放性问题清单会很有帮助。

表2.1中的问题是重叠的——我是有意为之。它们让你可以31-32回到早期的线索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或者去掉不必要或可能让人不舒服的问题。使用录音设备会让你全神贯注地和研究对象进行视觉交流,并且可以带给你更多的细节。在访谈过程中记下要点会对你有所帮助,只要记笔记不分散你或访谈对象的注意力。你的笔记会提醒你回到早期的要点,告诉你如何组织接下来的问题。

表2.1 一个例子:关于生活变迁的扎根理论访谈的问题

最初的开放性问题

1.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或你是怎样经历________的)。
2.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经历________(或注意到________)?
3.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刚好________?如果有人影响了你的行为,是谁?告诉我他/她是怎样影响你的。
4. 能给我描述一下使你________的事件吗?
5. 造成________的是哪些原因?
6. 然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继续的?在________发生前,你是怎样描述你的观点的?你的观点又是怎样变化的?
7. 你怎么描述那时你是怎样一个人?

中间阶段的问题

1. 你对________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当你知道________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想法和感受?
3.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4. 谁卷入了其中?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怎么进入其中的?
5. 告诉我,你是怎么学着去处理________的。

续表

6. 从________起，你对于________的想法和感受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7. 从________起，你的生命中发生了哪些积极的变化？

8. 从________起，你的生命中发生了哪些消极的变化，如果有的话？

9. 你是如何进行________的？你在做什么？

10.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在你________时，最具代表性的一天吗？（选择另一个时间）那么请告诉我，在你________时最具代表性的一天。

11. 你怎样描述你现在是怎样一个人。对这种变化，哪些因素起了作用？

12. 当再回头看________时，你的脑海中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事件浮现出来吗？你能分别描述一下吗？这些事件是怎样影响所发生的事情的？你对________（事件；导致的结果）是怎样的反应？

13. 你能描述一下通过经历________，你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吗？

14. 在两年（五年，十年，如果合适的话）之后，你如何看自己？讲讲那时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比较你希望成为的人和现在的你自己？

15. 什么帮助你去控制________？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告诉我这些问题的原因。

16. 在那段时间谁对你帮助最大？他/她是怎样帮助你的？

17. 有什么组织发挥过作用吗？它们怎么帮助你的？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结束性问题

1. 你认为对于________，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你是怎样分析（或产生）它们的？在________之前，你的经验怎样影响了你对________的控制？

2. 从你________之后，你的观点（以及/或者行动，依话题及接下来的反应而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3. 从________之后，作为一个人，你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告诉我你所发现和形成的度过________的力量。（如果合适）你现在最满意自己的是什么？别人最满意你的是什么？

4. 在经历了这些经验之后，你会给那些刚刚发现他们________的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5. 什么之前你没有想到，而在访谈中突然出现的事情吗？

6. 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更好地理解？________

7. 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我们必须反对把访谈数据强行纳入预先形成的类属之中（Glaser, 1978）。访谈要求我们要在问重要问题和激发对象的反应之间保持平衡——这要比质性数据分析的其他形式要求更高。访谈者的问题和访谈风格形成了研究的文本、框架和内容。接下来，一个天真的研究者可能会在无意中把访谈数据强行塞入到预先设定的类属之中。不仅提出错误的问题会导致对数据的强制，研究者如何提出、强调和安排问题都会导致对数据的强制。错误

的问题不能成功地探究关键性问题,不能引导访谈者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经验。这些问题还可能把研究者的概念、关注点以及话语强加给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这样。访谈录音能够使你很容易地看到,你的提问什么时候并不起作用,或者什么时候强制了数据。当无关的、肤浅的或强制的问题构成了你的数据,那么最终的分析就会遭殃。这样研究者就需要始终保持对问题本质的反思,思考它们对于特定的访谈对象和刚刚形成的扎根理论是否起作用。

访谈者接受的是建构主义的方法还是客观主义的方法,会影响访谈的焦点以及可能问到的具体问题。一个建构主义者可能重视引导研究对象讲出自己对术语、情境以及事件的定义,试图发现他或她的假设、本来的意义以及默认的规则。而一个客观主义者可能会重视获得有关年表、事件、环境以及行为的信息。格拉泽(1978)的扎根理论就会产生与施特劳斯和科尔宾(1990,1998)方法不一样的问题。

在更一般的水平上,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在设计访谈问题时的假设和视角。想想下面的问题:

- "给我说说你在那种形势下的应激源(stressor)。"
- "你用了什么样的应对技巧(coping techniques)来处理这些应激源?"

这些问题可能对于诸如护士之类的研究对象比较有效,因为只有对于他们,像"应激源"和"应对技巧"这些术语才是常用的说法,只要访谈者要求被访者在某些时候对这些术语进行定义就行。不过"应激源"这个术语可能对另外一些被访者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年老的疗养院病人,他们就很少会想到去发现压力的来源,很少想到去拥有自己清楚的处理压力的技巧。关注被访者的语言、意义和生活在这里是非常关键的。

像其他技巧娴熟的访谈者一样,扎根理论访谈者在访谈中必须保持活跃,对有趣的线索保持警惕(见:Gorden, 1987; Gubrium & Holstein, 2001; Holstein & Gubrium, 1995; Rubin & Rubin, 1995; Seidman, 1998 for suggestions)。可靠的访谈策略有助于研究者超越常识叙述,以及随后关于明显的低水平的不能增加新东西的类属。任何胜任的访谈者都会让自己提出的问题能够获得

33

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避免把先入为主的概念强加给这些资料。使问题保持开放会有很多好处。当被访者使用他们自己经验词典里的词语时，诸如“好日子”和“坏日子”之类的词，访谈者都能问出更多的细节来。比较这些问题的不同：

- “请告诉我，对于你来说，好日子是指什么？”
- “在一个好日子里，你对自己的感觉会更好一些吗？”

第一个问题对于访谈对象的经验和概念留下了开放的反应空间。这个问题让访谈对象能够形成和思考自己有关好日子的看法。第二个问题使讨论封闭起来了，并把回答转向了“是”或者“不是”上。这个问题也假设了这两种答案都是清晰的，是被访者和访谈者所共同认可的。

允许被访者对现象重新反思的访谈问题会引出丰富的数据。“告诉我关于……”“如何，”“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这些问题都会产生丰富的数据，特别是当你用诸如“你能进一步描述一下——”这样的问题来要求详细描述或具体说明以支持这些问题时（见：Charmaz, 2002a）。找到“嗯”以及“你知道（you know）”之类的话，然后研究它们意味着什么。长时间的停顿意味着什么？它们反映了怎样一个努力搜索合适词语的过程？“你知道”这样的说法在什么时候意味着一种理所当然的意义？“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是在寻求访谈者的合作，或者表明回答者只是努力在说清楚一个经验？不过，在我的研究中，被访者关于疾病的故事常常是毫不停顿地一口气讲出来的。比如，一个患有多发性硬化的被访者这样说，

> 总是患有尿路感染。你知道，就好像那里——在疗养院没有（一次尿路感染）似的。有两年或三年时间（没有这个病）。当我（从疗养院）出去的时候，就好像那是我要解决的所有问题似的——尿路感染……因此我只是清除了尿路感染。很有压力，那次尿路感染有一年时间，我可能还得过一次，这次只有一周半时间。因此我总是在谈我后背痛，谈我睡觉的姿势，——在每次得尿路感染的时候，药物也杀死了好的细菌。因此，你得了一次酵母菌感染，你就好像要一天24 小时（与疾病和治疗相伴）。如果我所做的只是解决这一个问题（也好一些），但实际上我还有我的……我的家庭压

力。那要付出真正的代价。接下来我的肠子也不好使唤了。治膀胱的药产生了腹泻。(Charmaz, 1991a,p.73)

一个研究者总要试图探究一些主题。研究对象有要解决的问题,要追求的目标,以及要执行的行动,对这些问题他们有自己的假设、想法和感受。你的研究问题和提问模式形成了之后的数据和分析。这样,你自己对你为什么以及怎样搜集数据的认识,会使你能够评价自己的效能。你学着去判断什么时候你就搜集到了丰富有用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没有破坏或贬低你的研究对象。那么毫不奇怪,当扎根理论家致力于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时,扎根理论方法就发挥了最好的作用。这样,你就可以探究意义和过程的微妙之处了,而这些是雇用的帮手很容易忽视的。

34

> 研究者可能已经进入一个意义的含蓄世界,但并没有用语言清晰表达出来。

被访者的故事可能会是源源不断(tumble out),或者可能人们进行的主要过程只是偶然才对你呈现出来。但是,可能被访者既不是这样直接,主要过程也不是那么清晰。即使他们的确是这样,通常也要花费很多功夫才能发现被访者的意图和行动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可能已经进入一个意义的含蓄世界,但并没有用语言清晰表达出来。比如,我的一些被访者提到了他们告诉别人自己病情的事。他们认为这些人最初是同情他们的,但后来却感觉到自己不再能得到诚恳的对待了,觉得他们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受到了破坏。这些事件的意义常常是他们带着情绪表现出来的,他们重新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对一些主题来说,深入探究和直接提问可能就足够了。而对于另外一些主题,你可能就需要间接的探究。比如,我们的语言几乎没有包含多少谈论时间的词语。这样,很多研究对象对与时间有关的态度和行动就保持了沉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们关于疾病的故事常常要依赖于时间的概念,提到所经验时间的内在质量。比如,上面提到的女性对尿路感染的陈述就是指那些日子的速度和不均衡。当你计划探究这些领域时,你要努力设计一些方式进行相关的观察,或者去建构能够产生相关回答的问题。比如,我问被访者这样的问题,"当你回头看你的病时,哪些事件在你的记忆里比较突出?""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周是什么

样的?"格拉泽(Glaser,1992)可能会认为我通过提问预先设计的一些问题强制了数据。实际上,我是通过调查生活中一些理所当然的方面产生了数据。无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关注你的研究对象的意义、目的和行动,你都能够通过扎根理论方法产生连贯的分析。因此,无论是对于发展概念性的理论命题,还是对于发现事实的描述性研究,这一方法都是有用的。

研究你的数据会推动你了解研究对象语言和意义的微妙之处。

研究数据会推动你了解研究对象语言和意义的微妙之处。接下来,你要了解你的数据可能会把你带到哪里。比如,通过研究访谈录音,你会更密切地关注研究对象的感受和想法。当你一遍一遍地听他们所说的话时,他们会活跃在你的脑海中。比如,我班里的一个学生说:

> 当我一个人坐在家里转录录音带时,语言给我带来很多冲击。我更加能够听到和感受到这些女人对我说的话。我意识到,当时我自己的脑子被这么一些想法占据了,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进行目光接触,或者希望我们声音更大一些等等。(Charmaz, 1991b, p. 393)

35

如果你关注被访者的语言,你会在他们的经验和你自己的研究问题之间架起桥梁。这样你就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假设它们意味着什么。比如,当我那些患有慢性病的被访者谈到拥有"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时候,我进一步围绕他们关于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意义问了更多问题。我问道,"一个好日子是什么样的?""你能描述一下一个坏日子是什么样的吗?""在一个好日子里你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些行为和坏日子里的行为有什么不同?"我发现,好日子意味着"疾病感染最小,能够最大程度地控制头脑、身体以及行动,对行动有更多选择"(Charmaz, 1991a, p. 50)。好日子的意义也扩展到了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增加,一天的质量,以及实现了一个人所希望的自我。但是如果我继续追问下去,问被访者这些词的意义,他们特定的属性就仍然可能是不清晰的。这样,我就对时间和自我是怎样关联起来的有了更为结构化的深入理解。

文本分析

所有的质性研究都要分析文本。然而,一些研究者只是研究他们片面形成的文本或他们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文本。新产生的文本(elicited text)包括研究对象在对研究者的提问做出回应时所产生的书面数据,以及相应的产生数据的方式。已有文本(extant texts)包括研究者没有参与形成的各种文献。研究者把已有文本看作数据来解决他们的研究问题,尽管这些文本是为其他目的——常常是非常不同的目的而产生的。诸如来自历史人物或历史时期的信件之类的档案数据是已有文本的主要来源。我们可能会使用新产生的文本和已有文本作为主要的或补充性的数据来源。

文本并不代表客观事实,尽管它们代表其作者所认为的客观事实(Prior, 2003)。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建构文本,并且他们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和形势的语境中产生这样的行为的。不管具体的文本是新产生的还是已有的,都依赖于特殊的话语,提供了对行动的记录、探究、解释、辩护或预测。比如,警官会对某些违规进行记录和给出交通罚单,但并不包括那些他们认为小事一桩的。他们进行记录目的在于完成他们警察的职责,但并不会将其作为研究的数据。作为一种话语,一个文本遵循一定的传统,并假设了嵌入其中的意义。研究者可以拿资料的风格、内容、方向和表达与文本所在的更大话语(a larger discourse)进行比较。作为叙述,文本会揭示某些意图,会有目标读者及非目标读者。

36 新产生的文本

新产生的文本要把提供书面数据的研究对象包括进来。一份邮寄问卷,或者采用越来越多的包含开放性问题的网络调查,都是这些文本的共同来源。此外,民族志学者和访谈者可能会要求研究对象去写一些文本。请研究对象记录家庭史或工作史,记个人日记,写每天的日志,或者回答已列出的问题,所有这些都会产生新文本。所有这些文本,都会像已发表的自传作品一样,让

人们产生新的思想、感情以及关注,并让研究者明白,是什么样的结构和文化价值影响了这个人。研究者处理新文本的策略,包括了从详细的指导到微小的建议。

在社会心理学的水平上,新产生的档案和直接的观察可能会讲出一个心酸的故事。比如,当进行一项关于病人生活环境的民族志研究时,我请研究对象记录下他们在星期三和星期日所做的事情,以获得更多他们在这种机构中对平常一天的看法。在我搜集了病人们关于他们典型的一天的日志后,我发现,一个女病人给出了一份由读写活动组成的满满的日程表。但是我发现实际上在大部分的这些时间里她都在睡觉。通过和一个护理工作人员的交谈,我发现这位女病人记录的是三年前她典型一天的情况(Calkins, 1970)。作为一个曾经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她希望通过过去来认同自己,而不是通过现在。很多老人和病人会从过去的实际身份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从而形成当前自己想象中的身份,如果我不搜集这些日志,我可能就会错过了解这些事实的机会。同样,访谈对象可能希望显得亲切、智慧或者政治正确,这样就形成了他们相应的反应。然而,访谈能够对故事进行检验,这是文本所做不到的。

在上面的例子中,因为我长期置身于研究环境中,所以我能够寻找观察事实和书面回答之间不匹配的原因。当新产生的文本是匿名形成的时候,研究者就没有办法拿这些文本和同样这些人的其他数据进行比较了。

新产生的文本,比如日志、私人纪事、日记或对某些问题的回答,有着一些和传统调查及访谈一样的优点和缺点。像调查问卷一样,匿名形成的文本能够产生更为坦白的表露,而他们可能不愿意对访谈者这样坦白。在自我披露中,说出秘密可能会产生羞愧、耻辱和失败感。研究对象可能不愿意讨论他们出身的故事、性生活、财政状况、工作中的麻烦、个人的失败、感情或者没有实现的希望和梦想,但是可能愿意以匿名的方式写出来。研究对象希望自己讲多少,就会讲多少。这种方法仍然依赖于研究对象以前的写作技能和实践。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有这样的技巧自如、自信地写所有的事情。墨菲和丁沃尔(Murphy and Dingwall, 2003)认为,新产生的文本产生了类似访谈数据的数据。不错,当这些问题产生类似的访谈问题,研究对象也对此做出了这

样的回应，而不只是像对待作为机关表格、快速调查、管理策略或小型调查的态度时，新产生的文本就的确产生了像访谈数据那样的数据。这样，当研究对象与要解决的问题及相关领域的经验利益攸关，并认为这些问题非常重要时，新产生的文本就能发挥最好的作用。

37

使用新产生文本就像使用调查问卷一样，研究者一旦提问了，就不能再修改或调整这个问题了。即使他们后来有机会再访谈研究对象，也没有可能直接去追踪某个说法，鼓励对象做出回应，或者提出问题。虽然拥有获取多种数据形式的渠道会强化一个研究，但是质性研究者在没有获得数据的其他方式，也没有获得这些数据的可能时，会越来越多地使用个人陈述、信件、对开放性问题的回答以及媒体资源。

已有文本

已有文本和新产生文本是不同的，因为研究者不能影响已有文本的建构。在那些我们可能使用的文本中有公共记录、政府报告、机构文献、大众传媒、文学作品、自传、个人信件、网络讨论以及来自数据库的以往的质性资料。过去，研究者非常重视已有文本，因为它们相对容易获取，数据搜集方式不那么唐突，而且似乎是客观的。①

当研究者使用已有文本时，他们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文本反映了现实。企业年度报告、自己家乡无家可归者分布情况的数据、美国的民意调查数据都可能看上去像是"事实"的报告。但是，它们反映了与每个主题有关的共享定义(Shared definition)，反映了加强这些定义的权力。很可能报告撰写者接受的这些定义①，改变或者违背了读者对这些具体类属(比如利益和损失)的理解。

诸如医疗档案，警察记录，或者学校政策之类的已有文本表明，所有这些都提供有用的信息，也都有严重的局限。比如，预见到可能出现司法纠纷的医务人员可能会限制他们医疗报表的记

①并非所有重要文本都是这么直接的。大部分重要的已有文本可能相对不易获得，需要寻找非常的方法。获得这样的文本可能会和共同的规则以及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政策相矛盾，而这些都是用来保护有权者的。道尔顿(Dalton)的《管理者》(*Men Who Manage*, 1959)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道尔顿从信任他项目价值的一个秘书那里获得了秘密文件，证实了管理者的地位特征。

录。蒂莫西·戴蒙德(Diamond, 1992)在进行疗养院的民族志研究时,作为一个护理助理,他检查了病人的医疗报表。他发现,工作人员的记录不仅抹去了以前不明确的事件,而且,护理助理的护理工作也并没有在记录中反映出来。通过他的田野调查,戴蒙德了解到工作人员制作的是什么样的图表,怎样使用图表,以及他们会忽略什么内容。

了解记录的用途和目的,有助于把这些记录放在一定的视角中,也有助于从其他来源寻找更多数据。已有文本可以作为民族志和访谈方法的补充。回答与这些文本中的信息相关的一些问题,能够产生有价值的数据:

- 哪些因素会影响信息?
- 这个信息所依赖的是什么事实,以及谁的事实?
- 对于该场景中不同的研究对象或行动者,这个信息意味着什么?
- 这一信息遗漏了什么?
- 谁能够接触到这一信息的事实、记录或来源?
- 对于这一信息而言,谁是目标受众?
- 通过用某种特殊方式形成和/或解释这一信息,谁能够从中获益?
- 这一信息是如何影响行动的?

38

假设你已经在你所研究的一个组织中搜集到了所有报告。你会发现组织报告和你所做的田野观察有极大差异。比如,你可能发现,经理会重新定义他们失败的项目,并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将其美化为成功。这些重要的数据能够以非常重要的形式引导你的分析。

对于某些项目来说,那些来自研究者搜集的一手资料所形成的已有文本,提供了一种独立的信息来源(Reinharz, 1992)。很多质性研究者使用人口统计学数据作为他们的研究背景。一些人通过探究这些数据的缺陷来形成他们的论题。我依靠的资料是个人叙述、主要是已发表的自传中各个作者患有慢性病的经验。不要认为这些文本是数据的客观来源,未被研究者所扭曲,而是要通过分析把它们看作是数据的另一种来源。这些文本可能激发了你的想法,为你的直觉提供了证据。有时,你可能会遇到这

样的文本，它在你草拟了研究方案很长时间之后，为你的分析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我形成类属"重新体验过去(recapturing the past)"之后，刚好读到凯瑟琳·刘易斯(Lewis, 1985)关于身染红斑狼疮的痛苦描述。她的陈述支持了我的类属：

> 我的家庭和我努力把"过去的我"留在心里，希望有一天她能够回来，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的生活。我们悲伤叹气，把她抛在脑后，但是她总在我们的记忆和希望中徘徊，阻止任何接受现实、活在现在的努力。总是"明天，我们就会……"或者，"记住昨天，什么时候……？"(p.45)

质性研究者常常使用文本作为数据的补充来源。民族志学者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他们的田野笔记，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新闻稿件、记录和报告，他们也会使用这些资料。田野笔记和书面文献的比较能够激发有关语言与事件之间的相对一致——或缺乏一致的见解。民族志学者能够看到在一个环境中所发生的事，能够了解当地文化。组织的公关套话和报告在面对被观察的世界时可能是苍白的。这些文本可能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目标，但是研究者不能认为它们反映了组织的过程。这样，这些文本提供了这样的有用陈述，即组织所认可的印象和所宣称的目标——台前印象目的就在于形成它的公共形象。当重要听众接受了这些陈述，组织就掩盖了台后的现实，而且常常是更为基本的目的，比如雇用新成员，或者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39 研究文本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把文本放在它们的语境(context)中。现在，因特网研究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方法论问题。没有语境的文本是其中的主要部分。数据来自哪里？谁参与了这些数据的形成？作者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对象是否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让我们进行合理的解释？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相关世界的知识来读懂他们的语言？在因特网中，研究对象可能改变了我们对一些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种族、民族以及社会阶级出身的定义，以及他们所回应的具体内容。

很多文本分析没有提到语境，甚至更糟，是脱离语境进行的。

怎样把文本放在语境中？如果有了时间、行动者以及事件的描述，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了。很多方法都会有所帮助，比如访谈关键的研究对象，使用几种文本类型，都会很有用。能够讲出其他文本背后的故事的文本至少展示了分析的社会语境。文本的细节本身以及充分的分析在这里都很重要。辛西娅·博加德（Bogard，2001）主要依靠《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关于当地无家可归者的故事以及档案数据、电视报导以及学术出版物，就重新建构了纽约和华盛顿有关无家可归者的宣称类型（kind of claim-making），重构了发生在每个城市的关于无家可归者的定义。她没有把报纸的报道作为客观的历史记录，而是把它们作为"关于社会问题的公共对话中权威和精英的声音……（以及就此形成的）建构现实的重要场所"（Bogard,2001,p.431）。博加德不仅强调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也对形成这些声音的自然语境进行了分析。博加德对这些文本详细审查的深度和全面性推动了我们对无家可归者的理解，也使我们对人们如何描述现实有了更多的理解。

使用文本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将其作为需要分析和仔细审查的对象，而不是证实证据的可靠资料。档案记录和书面陈述，录音与照片，网络公告和图表可能会提供给你关于视角、实践以及事件的见解，而这些是通过其他质性方法不易获得的。但是，所有这些文本都是产品。形成它们的过程可能是含糊的、不直观的，而且可能是无法知晓的。对文本的深入调查能帮助你研究它。在获得文本的可能方法中，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

- 文本是怎样产生的？由谁产生的？
- 文本的表面目的是什么？文本服务于其他未说出的或假设的目的吗？是什么样的目的？
- 文本怎样表现作者认为存在的东西？嵌入其中的有些什么样的意义？那些意义怎样反映一定的社会、历史以及可能的组织语境的？
- 文本的结构是什么？
- 它的结构是怎样形成所要说的内容的？你在它的结构中能识别出哪些类属？你可以从这些类属中收集到什么？这些类属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序列文本中是否有所变化？

是怎样变化的?

- 文本暗示了怎样的语境意义?
- 它的文本怎样建构了现实的想象?

40-41

- 文本声称所要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现实?它是怎样代表它们的?
- 你在文本中是否能发现什么无目的的信息和意义?
- 语言是怎样使用的?
- 什么样的规则主导了文本的建构?你怎样在叙述中识别它们?这些规则是怎样反映默认的假设和清晰的意义的?它们是怎样和同一主题的其他数据发生关联的?
- 有说服力的部分(telling points)是在何时以及怎样出现在文本中的?
- 你可以在文本之间进行什么样的比较?在关于同一主题的不同文本之间可以怎样进行比较?同一文本在不同的时间,比如在组织年度报告中,怎样比较?讲述同一问题的不同作者之间,怎样比较?
- 谁从文本中获益?为什么?

大部分扎根理论家会从文本的内容开始。我还关注结构以及结构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文本资料的扎根理论可以分析内容和形式、作者和读者、文本的表达以及文本的产生。

小　结

任何一种数据搜集的方法,都要考虑研究对象是怎样从更广阔的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中产生想法、实践和表达的。要记住,他们不仅只是从这些文化中借鉴或再生产这些文化,他们在使文化适应他们的直接目的时还在不断创新。同样,作为研究者,我们在记录数据时,也会更改语言和意义;数据从来不是完全处在自然状态的。只是记录数据本身就传达了对它们的解释,因为我们通过对语言的使用以及关于世界的理解把概念框架施加在了它们身上。

仔细审查你是怎样搜集数据的,以及哪些数据能够帮助你定

位这些数据。这些审查也会在编码和概念化的时候帮助你，因为你能够把生成的分析放在它的社会背景中。然后你就能在编码时做更准确的比较。研究自己的方法会提高你的方法论技巧和数据质量。最后，仔细审查能够让你认识到，用不同的方法搜集别的类型的资料，能够回答生成分析中的某些问题。对于大的项目或论文，你可能会使用两种或更多的数据搜集方法。对于一个主要的已建立的研究项目，多重方法和多个地点的方法常常被证明是更为有用的。如果你建构了一个研究计划，有可能在几个环境中寻找数据，那么接下来你就能够更灵活地使用或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接下来，通过对早期数据进行编码，开始进入我们扎根理论旅程的分析阶段。



第3章　在扎根理论实践中进行编码

Coding in Grounded Theory Practice

扎根理论旅程的第一次转向把我们带向了编码。扎根理论编码要求我们停下来，对已经搜集的数据提出分析性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推动我们对所研究的生活进行理解，也有助于用我们所定义的分析性问题来指引接下来的数据搜集。扎根理论编码至少包括两个阶段：初始编码和聚焦编码。在初始编码过程中，为了精确地进行数据的分析登录，我们要仔细研究数据的片段——词、句子、段落以及事件。逐渐地，我们可能会接受研究对象诸如现场录音这样的讲述方式。在进行聚焦编码的过程中，我们选择那些看起来最有用的初始编码，并用它们和广泛的数据进行比较检验。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比较不同的数据，然后比较数据和编码。我们可以沿着特定的程序来进行编码，或者应用现有的理论代码，但是只能在我们已有分析的指导下进行。路标和向导使我们的逗留能够获得适当的代码，并使我们荆棘丛生的旅途变得轻松一些。



看一看接下来邦妮·普雷斯利(Bonnie Presley)的访谈摘录,她很早就知道自己患红斑狼疮了,最近得知她还得了盘形红斑狼疮。在进行访谈的时候,邦妮已经48岁了,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离异。在离开这个和她生活了几年的伴侣之后,她独自和三只猫生活在一起。在过去的一年里,她经历了几次因病而产生的瘫痪,第一次还有生命危险。现在,在病了大约3个月后,她在努力重新获得力量。邦妮的好朋友及邻居琳达一直在照看她。自从邦妮虚弱到不能照顾自己开始,琳达就开始给邦妮送食物和水。

虽然邦妮有个已成年的女儿叫艾米,现在也住在这个地区,但她们很少通电话,艾米也很少来探望她。几年前,艾米不能理解,她所认识的母亲怎么会从一个欢蹦乱跳的人变得举步维艰了。邦妮年轻的外表掩盖了她的健康状况,因为她的症状对于没有经过训练的眼睛来说是很难看出来的。在她患病早期,邦妮很难告诉艾米她的病情以及病情的严重性。[①] 邦妮第一次生病,觉得要么告诉她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要么就避免和她说起这回事,在这之前,艾米就搬走了。邦妮回忆起她怎样告诉艾米关于她近期病情恶化的情况: 43

> 她从琳达那儿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很多天了。她给我打电话,"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还是从琳达那里知道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然而,我不知道那之后有多久,在一个星期六,疼痛开始发作,整整一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而她——我总在想,是的,我可以搞定,因此我吃了某种止痛药,但是毫无作用。那大约发生在下午。但是,情况却越来越糟糕了,以至于每次呼吸,我都疼痛难忍,因此到那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害怕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我就不能呼吸了。因此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发生的情况,希望她能开车把我送到医生那里,因为他们如果给我打一针局部麻醉剂或别的什么东西,找到疼痛的地方,就能缓解疼痛,我就可以呼吸了。于是我就打电话和她说这些情况。但是我打通的是汽车电话。她说,"哦,妈妈,过会儿我

①关于邦妮·普雷斯利告诉她女儿病情时两难心理的故事,见Charmaz(1991a:132-133)。

打给你或者你再打给我。"于是,我没有再打给她;她也没有打过来。那是在星期六晚上。她一直没有打给我,直到——她是星期天中午打过来的,我最后说,"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因为当我星期六晚上告诉你的时候,你没有打来电话,你并不在乎我,这真让我伤心。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出了这种状况。"然后她告诉我,"是吗,妈妈,你当时听起来状态很好啊。"于是我说,"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伤心欲绝,或者还是什么别的?"我说,"为了控制疼痛,我不得不让一切保持正常和平静,因为如果我情绪失控,我就不能呼吸了。"你知道的。就这样,她开始真的试图去明白,只是因为我怕死,我痛得很厉害,但是当我告诉她的时候,我猜想,我是一个正常的妈妈。

我们怎么理解像邦妮这样的故事呢?我们怎么综合数百页的访谈、田野笔记、文献以及其他文本,来发展扎根理论呢?不论我们搜集的是故事、场景,还是书面陈述,我们都要研究和定义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

44-45

质性编码,是对数据内容进行定义的过程,是我们分析的第一步。编码意味着把数据片段贴上标签,同时对每一部分数据进行分类、概括和说明。[①] 编码是超越数据的具体陈述、进行分析性解释的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进行解释性呈现,这就需要从对被研究的生活进行编码和说明开始。

> 编码意味着对数据片段用一个简短的名称进行归类,同时也对每部分数据进行概括和说明。你的代码展现了你是怎样对数据进行选择、区别和分类,并由此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性说明的。

我们的代码表明我们是怎样对数据进行选择、区别和分类,并由此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性说明的。质性代码把数据分解为片段,用简明的术语对其进行命名,并为解释每一部分数据提供分析性工具,以此来发展抽象概念。在我们进行编码的时候,要问,这些陈述可能需要哪些理论类属?

你可能想知道,质性代码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者如何建构

---

①关于对分类的创新性讨论见 Bowker & Star, 1999。

它们。请快速浏览一下我对邦妮·普雷斯利故事的编码,这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想法(见表 3.1)。

表 3.1　扎根理论编码举例

获得二手消息 被遗漏;指责母亲没有告诉她;(怀疑伦理地位?)遭遇了面对自我及身份的问题;要求说出病情和获得生病的消息 经受越来越剧烈的疼痛 希望能够控制疼痛 不能控制疼痛 疼痛的迅速恶化 忍受极为痛苦的疼痛 开始害怕;预料到可能出现的呼吸困难 说出她的病痛;告诉女儿她的计划 解释所设想的治疗 有办法和女儿取得了联系 让以后再联系 不确定 无下文 确定两次联系的时间 解释为什么没有告诉实情 指责女儿并不关心她 表达内心的难过;认为缺乏关心;做出消极推论(关于道德衰落?) 解释没有说的原因 听起来身体不错 质疑女儿的期待 解释情绪控制的必要 看到失去控制所可能产生的生命危险 说明,讲述的方式并不反映真实的状况 听起来像个"正常"的妈妈	她从琳达那里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很多天了。她给我打电话,"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还是从琳达那里知道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然而,我不知道那之后有多久,一个星期六,疼痛开始发作,整整一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而她——我总在想,是的,我可以搞定,因此我吃了某种止痛药,但是毫无作用。那大约发生在下午。但是,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以至于每次呼吸,我就疼痛难忍,因此到那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我害怕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我就不能呼吸了。因此我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发生的情况,希望她能开车把我送到医生那里,因为他们如果给我打一针局部麻醉剂或别的什么东西,找到疼痛的地方,就能缓解疼痛,我就可以呼吸了。于是我就打电话和她说这些情况。但是我打通的是汽车电话。她说,"哦,妈妈,过会儿我打给你或者你再打给我。"于是,我没有再打给她;她也没有打过来。那是在星期六晚上。她一直没有打给我直到——她是星期天中午打过来的,我最后说,"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因为当我星期六晚上告诉你的时候,你没有打来电话,你并不在乎我,这真让我伤心。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我什么时候出了这种状况。"然后她告诉我,"是吗,妈妈,你当时听起来状态很好啊。"于是我说,"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伤心欲绝,或者还是什么别的?"我说,"为了控制疼痛,我不得不使一切保持正常和平静,因为如果我情绪失控,我就不能呼吸了。"你知道的。就这样,她开始真的试图去明白,只是因为我怕死,我痛得很厉害,但是当我告诉她的时候,我猜想,我是一个正常的妈妈。

表3.1中的代码试图描绘出邦妮故事中的意义和行动。在邦妮讲故事时,我们获得了对邦妮和艾米所关注内容的理解。她的故事表明说出病情存在怎样的问题。误解和两难出现了,犹豫产生了,指责发生了,解释伴随而来。说出生病的消息会使自我面对审视,冒着付出感情代价的风险,产生亲情的问题。不说或者晚说也会失去或破坏亲情纽带。从有些人的角度看,就会产生家庭失败、伦理纽带脆弱、道德诉求(moral claims)等问题。客套话可能意味着,或被误解为传达了基本的判断。对邦妮和艾米来说,说出病情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领域,所引发的是相互对对方的感情的问题。一些事件可能会让人不得不说出病情,就像邦妮的故事那样。人们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如何说出来都很有关系。邦妮告诉她女儿的方式影响到她女儿理解这个消息以及对这个消息做出反应的方式。邦妮关注的是情绪不要失去控制,但后来意识到,她通知艾米的这种直接的方式可能降低了病情的严重性,并产生了误解。通知女儿时有效的情绪控制,使邦妮的女儿认为她的妈妈"听起来状态很好",像一个"正常的妈妈"一样。

要注意,代码要和数据非常接近,要展现出行动,并且要指出有关说出病情的两难是如何发生的。一定的编码,比如"被遗漏"、"面对自我和身份问题"、"要求自己说出病情和获得生病的信息"是分析邦妮故事的中心,因为那是说明、解释和提供原因的部分。其他的代码是指示事件、指出背景以及描述观点的,比如"获得二手信息"、"希望控制疼痛"以及"听起来像个正常的妈妈"。很多代码是很短的,但也暗示了说出病情和自我之间的重要关系。因此,代码意味着建立与说出病情、揭示病情、自我和身份有关的类属。我在圆括号里放了两个代码(因为它们并不比其他代码更显著),表示这些想法需要进一步寻找数据。扎根理论重视生成性(emergence),与此相应,关于这些代码的问题来自我对数据的阅读,而不是来自以前对此框架的应用。

扎根理论编码

扎根理论编码产生了分析的骨头。理论整合会把这些骨头组合成一套可用的骨架。这样,编码就不只是一个开始了;它形

成了一个分析框架,你可以用这个框架进行分析。为形成这个框架,我列出了编码的策略。试试看,它们能否为你所用。扎根理论编码会推动对行动和过程的研究,正如你在邦妮·普雷斯利的故事代码中所看到的那样。 46

编码是搜集数据和形成解释这些数据的生成理论之间的关键环节。通过编码,你可以*定义*数据中所发生的情况,开始反复思考它们的意义。这些代码一起形成了初始理论的要素,可以解释这些数据,并指引接下来的数据搜集。通过对编码的认真关注,你开始往复摇摆于扎根理论结构的两个主要维度上:使理论命题超越具体时间和地点,产生一般化,以及对行动和事件进行情境分析。

> 编码是搜集数据和形成解释这些数据的生成理论之间的关键环节。通过编码,你可以定义数据中所发生的情况,开始反复思考它们的意义。

扎根理论编码至少包括两个主要阶段:①一个初始阶段,包括为数据的每个词、句子或片段命名;②聚焦和选择的阶段,使用最重要的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代码来对大部分数据进行分类、综合、整合和组织。在进行初始编码的时候,你要通过挖掘早期的数据来寻找能够进一步指引数据搜集和分析的分析性观念。正如我对邦妮·普雷斯利的故事编码所表明的那样,初始编码能使你进一步深入阅读数据。在初始编码中,目的是对所有可能的、由数据阅读所指出的理论方向都保持一种开放的状态。接下来,你要通过聚焦编码在一大堆数据中发现和形成最突出的类属。理论整合从聚焦编码开始,通过接下来的所有分析步骤继续发展。

通过分析数据所进行的实际研究,很可能和你最初在研究设想或课题申请中所计划的非常不同——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通过研究数据,我们会不断学习。质性编码引导着我们的学习。通过它,我们开始理解我们的数据。我们对数据的理解形成了接下来的分析。对编码的认真关注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理解行动和表述、场景和感受、故事和沉默。我们想知道,在这个环境中、在人们的生活中以及在我们数据记录的字里行间发生了什么。因此,我们努力去理解研究对象的立场和处境,以及他们在环境中的行动。

扎根理论编码的逻辑和量化研究的逻辑不同,量化研究是把预先设定的类属或代码应用到数据之中,而扎根理论正如上面的例子所说明的,是通过定义我们在数据中所看到的东西来*生成*代码。在你仔细审查数据,并定义数据中的意义时,代码就出现了。通过积极地编码,你可以和你的数据一次一次地进行互动,并提出许多有关它们的不同问题。最后,编码可能会把你带入意想不到的领域和新的研究问题。

对于如何编码以及编什么样的码,语言发挥了关键作用。非常基本的一点是,经验世界并不会脱离人的经验以某种自然的状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通过语言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来认识经验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我们和同事分享着一种语言,而和朋友可能分享着另一种语言;我们把意义赋予特定的词语,拥有自己的视角。我们的代码来自语言、意义和视角,通过它们,我们理解自己的经验世界和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编码推动我们对研究对象用来分析世界的语言提出疑问。编码不仅应该激发我们检验研究对象暗含的假设,也应该激发我们检验语言使用中所隐藏的假设。

47

我们*建构*了代码,因为我们在积极地对数据进行命名——即使当我们相信,代码和被研究世界的行动与事件形成了最完美的契合的时候。我们可能认为代码把握了经验现实。但是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选择了构成代码的词语。这样我们把自己所看到的当作数据中的重要内容,描述我们认为发生的事情。编码包括了初始的、简单的定义和标签;它来自扎根理论家的行动和理解。但是,过程是互动的。我们和研究对象互动,接下来,通过研究他们的陈述、观察到的行动以及对我们认识它们的场景的回忆,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多次和他们互动。当我们定义代码,并不断完善它们时,我们试图从他们的视角来理解他们的观点和行动。这些视角通常所假设的远远不只是看上去的那么明显。我们必须挖掘数据,来解释研究对象默认的意义。对编码的密切关注会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第一个扎根理论的要求——*研究生成的数据*之后是对编码的密切关注(Glaser,1978)。

从一开始，你就会意识到，编码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张力——在分析性见解和描述性事实之间（不论是口头叙述，还是观察记录），在静态话题和动态过程之间，在研究对象的世界和专业人员的意义之间。

初始编码

初始编码的逻辑

当扎根理论家进行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时，要对能够在数据中识别的任何理论可能性保持开放。编码的初始步骤会进一步引导我们后来对于核心概念类属的定义。通过比较不同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研究对象认为有问题的内容，开始分析地对待它。在初始编码中，我们问：

- "这些数据是关于什么的研究？"（Glaser, 1978, p. 57; Glaser & Strauss, 1967）
- 这些数据表明了什么？宣称着什么？
- 从谁的观点？
- 这一具体数据指向的是哪个理论类属？（Glaser, 1978）

初始编码应该紧紧贴着数据。努力在每个数据片段中看到行动，而不是把已有的类属应用到数据上。尽量用能够反映行动的词语来编码。首先，要产生的是行动的语言而不是关于主题的语言，这似乎有点奇怪。仔细观察行动，尽可能把数据编码为行动。这一编码方法可以防止我们在进行必要的分析工作之*前*，发生概念跳跃，并接受已有理论。

48

学生们常常相信，在开始编码、使得他们的质性研究具有合法性之前，他们必须依赖以前的概念。他们会这样说，"我要用马克斯·韦伯的'常规化'概念。"或者，"我的指导老师想让我用安塞尔姆·施特劳斯的'协商'概念。"这种方法会在你对事件进行编码时排除掉自然生成的新想法。初始编码的开放性应该激发你的思考，并允许新的观念出现。以前的扎根理论规则规定，在进行初始编码的时候，头脑中不能有任何预先形成的概念（Glaser, 1978, 1992）。我同意格拉泽要使初始编码开放的要求，但是也认识到，研究者总是持有一些先在的观念和技巧的。正如戴伊

(Dey, 1999, p. 251)所说,“在开放的头脑和空洞的头脑之间是有差异的。”对于你在编码中了解到的东西,以及它要带你去的地方,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在团队研究中,几个人可能要分别对数据进行编码,然后把他们不同的编码进行比较并组合起来。

初始编码是临时的、比较性的和扎根于数据的。它们是临时的,因为你要给其他分析可能留下空间,并形成最适合你数据的代码。你要不断发展这些代码,使它们与这些数据相契合。然后,你要收集数据,去探究和填充这些代码。

初始扎根理论编码能够使你看到,你缺乏哪些必需的数据领域。要认识到你的数据所存在的缝隙或漏洞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当你接受一个新生成的研究理论时,这是不可避免的。[1] 毕竟,对你所研究的世界有所“发现”,并用这些发现构建分析,是扎根理论任务之所在。这些发现反映了你所了解到的内容,和你的概念化方法。扎根理论策略的优点是,你可以从最早的研究阶段就发现数据中的缝隙和漏洞。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所需数据的来源,并去搜集它们了。因此,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同时可以帮助你致力于形成类属,并让你进一步深入到研究问题中。

代码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临时的,你可以通过修改来提高它们的契合度(fit)。所谓契合度是指,代码所能抓住和浓缩意义和行动的程度。要让代码去把握现象,吸引读者。

初始编码的实践

速度和自发性在初始编码中非常有用。快速工作能够激发你的思考,并产生有关数据的新鲜观念。一些代码契合于数据,能够立刻吸引读者。你可以修改其他代码提高它们的契合度。我对邦妮·普雷斯利故事第一行的初始编码是“间接获得消息”。它浓缩了那些叙述,但是中立的措辞消耗了它的强度和重要性。把代码变为“获得二手消息”,就还原了消息的原有价值,暗示了消息接受者被贬低的地位,暗示出她愤怒的反应。

49

比较数据中同类型的事件,会激发你对它们的分析性思考。邦妮·普雷斯利说,她不愿意告诉她女儿,并推迟了告诉她的时间,并且是以一种平常的口吻来传递一个很艰难的消息。但是,

---

[1] 发现数据有漏洞并不只限于质性研究。进行标准化访谈的调查研究者有时会发现,在他们和对象完成访谈之后,他们的问题并没有触及核心内容。量化研究者必须坚持使用同样的工具,而质性研究者却能够在搜集资料时修改这些问题。

后来,邦妮和艾米谈到了获得和传达她病情的问题。因为邦妮不再和她自己的妈妈保持过多联系了,说出病情的两难情况并没有发生在她身上。也没有说出病情的事情发生过。邦妮的外祖母把她带大,她很喜欢自己的外祖母。邦妮不想让她的外祖母担心,所以就把她自己的情况轻描淡写,尽量把她的病症说得不那么严重。我的数据包括几个关于代际紧张关系的案例。我所研究的其他几个单身女性都没有孩子,几乎都没有紧密的家庭纽带,她们和年迈的母亲在关系上有冲突。随着地理上和情感上的疏远,这些妇女相应地也减少了共同分享的信息。从上面的数据和信念的描述中,避免说出病情、延迟传达病情,以及控制消息,都是作为明显的代码出现的。

格拉泽(Glaser, 1978)表明,用动名词编码对探究过程和贴近数据非常有帮助。考虑一下下面的动名词和它们的名词形式在意象上的差异:描写(describing)和描述(description),陈述(stating)和命题(statement),以及引导(leading)和领导(leader)。在动名词中我们获得了很强的关于行动和序列的意义。而名词却把这些行动变成了主题(topic)。与数据密切接触,在可能的情况下,从研究对象的词语和行动开始,保存他们经验的流动性,并以新的方式看待它。这些步骤有助于激发你从他们的视角开始进行分析。你的扎根理论可能反映的是局外人(outsider)的而非局内人(insider)的观点。局外人常常用一种陌生的专业语言来描述现象。如果你的数据是单薄的,如果你在编码中不下工夫,你会把日常的原则误以为是分析性的观点。这样,如果接受了研究对象基于表面价值的协调的印象,就会走向局外人的分析。

从访谈中选择诸如“经验”或“事件”之类的一般术语,并称之为代码,这不会告诉你多少关于研究对象意义或行动的内容。如果一般术语显得比较重要,就对它们做出限定。要让你的代码去契合你的数据,而不是强制数据去契合代码。

用来编码的代码要:

- 保持开放。
- 贴近数据。
- 使你的代码简单而精确。
- 建构简短的代码。
- 保留行动。
- 比较不同的数据。
- 迅速浏览数据。

一句话,要对资料所表明的内容保持开放,贴近数据。使你的代码简短、生动和具有分析性。上面的前两条指导方法反映了你对于编码的立场。剩下的告诉你怎么去编码。

50

逐词编码

用来编码的数据单位的大小很关键。一些扎根理论家进行非常细微的编码,逐字逐句地浏览他们的数据。这种方法,在处理档案文献或转瞬即逝的信息类型比如网络数据时,可能特别有效。逐词分析迫使你关注意象和意义。你可能不仅关注它们的具体内容,还关注词的结构和行文,以及这两者怎样影响你对它们的理解。

逐行编码

对很多扎根理论家来说,逐行编码是编码的第一步(见表3.2)。逐行编码意味着对你所记录的每行数据进行命名(Glaser,1978)。逐行编码似乎是一种专断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每一行都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并不是每一个句子都很重要。[①] 但是,它还是相当有用的工具。在你为寻找一个一般的主题分析而阅读数据时,你会遗漏某些想法,但是,在你逐行编码时,这些想法就会出现。[②]

对于有着丰富细节、与基本经验问题或过程有关的数据来说,逐行编码会发挥特别好的作用,不管这些数据包含的是访谈、观察、文献,还是民族志和自传。比如,如果你计划研究那些曾经是全职家庭主妇的老年女性是如何处理离婚问题的,你就需要选择一个地区去探究,在那里,你能在访谈、支持群体和职业训练项目中听到相关故事,这些可以在我们逐行研究时呈现出生动的意义。

对人们、行动以及环境的细致观察,能够明显地揭示生动的、因果相继的场景和行动,这有助于进行逐行编码。诸如"会议在

①到1992年,格拉泽在反对把单一事件拆开来时,似乎不承认逐行编码。他认为,逐行编码产生了对事件进行过度概念化的狼狈,产生了太多的类属和属性(Glaser,1992,p.40),而没有产生一个分析。但是,通过对一个事件进行逐行编码,研究者能够选择最生动的代码,并在事件之间进行比较。

②选择一套数据,并通过比较主题分析(大部分质性研究者都在用扎根理论编码进行这样的主题分析)的一般类型,来检验逐行编码的价值。首先,阅读数据,然后识别和记录其中的主题。接下来,进行逐行编码。列出最重要的代码,用主题清单来比较它们。

絮絮叨叨中进行下去”之类的一般化观察对于你编码给不了多少实质性的信息。

新鲜的数据和逐行编码会促使你对数据保持开放态度，看到数据中的微妙之处。当你对早期的深度访谈数据进行编码时，你能够密切关注研究对象说了什么，以及同样的，他们所斗争的是什么。这种编码类型有助于你识别清晰的和不清晰的关注点。逐行编码有助于你重新定位后来的访谈。下面这些灵活的策略对你进行编码会很有帮助：

- 把数据拆分成不同的部分或属性。
- 对他们所进行的行动进行定义。
- 寻找默认的假设。
- 把含糊的行动和意义讲清楚。
- 把要点组织起来。
- 比较不同的数据。
- 发现数据中的漏洞。

通过灵活使用这些策略以及数据中出现的线索，编码会有助于理论类属的形成，其中一些类属你可能已经在初始编码中进行了定义。坚持你在数据中所做的定义。把你的分析一步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不要随意地进行天马行空的理论想象。要有大量可信的数据来证明你的研究问题，这样才能增强你的研究基础。

51-53

研究对象的行动和陈述能够传达给你他们的世界的许多情况，虽然有时是以他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方式。逐行编码会让你研究自己的数据，这会激发你产生新的、需要继续探究下去的想法。因此，扎根理论方法自身就包含了修正，可以减少研究者只是把他们已有的概念施加在数据上的可能性。逐行编码能够让你在早期就对此进行修正。

在表 3.2 逐行编码的例子中，我对时间和自我概念的兴趣产生于摘录 1 中的前两个编码。注意我是怎样保持代码的积极作用，以及怎样接近数据的。初始编码常常广泛分布在不同的主题间。因为即使一个简短的陈述或摘录也可能涉及几个要点，它可以解释几个不同的类属。我可以使用表 3.2 的摘录来说明，通过避免说出病情怎样达到控制身份的目的。我也可以用它来说明，一个病人是怎样知道其他人并不理解他或她的病情的，或者用它来说明，每一天为什么都是那么地不可预料。对同一个人进行多次访谈使我能够

看到,社会孤立和情绪孤立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表 3.2　初始编码:逐行编码

	摘录 1　*克里斯蒂娜·丹福斯(Christine Danforth)37 岁,患有红斑狼疮、修格连氏症候群,后背有伤*
	红斑狼疮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不仅会影响关节、肌肉和神经,也会影响所有的器官。修格连氏症候群是一种关联性的自身免疫性炎症疾病,症状是眼睛和口腔黏液膜干涸。
转移性症状 不协调的生活 解释其他人所给她的自我印象 避免说出病情 预计别人会排斥她 让其他人无法知道 把症状看作是相关性的 不让其他人知道 预料到别人不会相信 控制其他人的观点 避免耻辱 评价可能的损失以及说出病情后的风险	如果你患有狼疮,我指的是今天肝脏出毛病,明天关节出毛病,后天头出毛病。如果你不停地抱怨各种不同的小毛病,人们会认为你是个臆想症病人……于是你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否则人们就要说,“上帝呀,别靠近她,她总爱不停地抱怨。”这就是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因为我所有的各种症状都这样或那样地和狼疮有关,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患有狼疮,即使那些知道的人也不会相信 10 种不同的毛病其实是同一种病。我并不希望人们因为我总在抱怨而疏远我。
	摘录 2　*乔伊丝·马歇尔(Joyce Marshall),60 岁,轻微心脏病,最近又发现有轻度的CVA(中风)*
中风的意义	在她的案例中,中风使她变得虚弱、疲倦,并且在疲倦时反应迟缓。
觉得不得不活一天是一天(living one day at a time)	我不得不把它(中风)看作是一个警告。我不能让自己太焦虑。我不得不活一天是一天。
过去的担心焦虑 早些时候的损失 活一天是一天的困难;关注今天 放弃对未来的设想 通过活一天是一天管理自己的情绪 降低生命威胁	我非常担心约翰(她的丈夫,患有威胁生命的心脏病,还没退休就在三年前失去了工作)……由于这些压力,很难……再去专心做我今天能做的事情。我过去常常展望未来,现在不行了;它让我非常不安。现在我不得不过一天是一天,否则我就活不下去。

在你开始对数据进行编码时，“发现”的逻辑变得很明显。逐行编码迫使你要重新看待数据。当你把一组田野笔记或访谈看作一个整体的叙述，并把你在逐字逐句、逐个事件对同一文献进行编码时所获得的信息融入其中时，你要比较你所看到的内容。整个叙述可能包括几个主要的主题。逐字、逐行、逐个片段、逐个事件编码会产生一系列想法和信息。因此，你“发现”一些重要的想法，你可以由此进一步发展成理论。

初始编码能够帮助你把数据分成不同的类属，帮助你观察这些过程。你往往容易过于沉浸到研究对象的世界观中，以至于会毫不质疑地接受它们，而逐行编码会把你从这种沉溺中解放出来。如果毫不怀疑地接受研究对象的观点，你就不能批判地、分析性地看待你的数据。对你的数据持批判态度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你的研究对象持批判态度。持批判态度指的是要迫使自己质疑自己的数据。这些问题有助于你观察行动，识别重要的过程。这些问题包括：

- 在这里处于争论中的是什么过程？我如何定义它？
- 这个过程是怎样发展的？
- 在进入这个过程时，研究对象是怎样行动的？
- 在进入这个过程时，研究对象怎样陈述他们的所思、所感？实际观察到的他或她的行为又说明了什么？
- 这个过程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变化的？
-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

通过对每行数据进行编码，你就知道接下来需要搜集什么类型的数据了。这样，你提取数据，并让早期搜集的数据指引你进一步的探究。比如，如果你在第 15 次访谈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过程，你会返回以前的研究对象那里，看是否那个过程解释了他们生活中的事件和经验。如果没有，你可以寻找新的能够说明这个过程的研究对象。因此，你的数据搜集就变成了聚焦性的，正如你的编码变为聚焦编码一样。

逐个事件编码

是否进行逐行编码，要看你所搜集的数据的类型、它们的抽象水平、研究过程的阶段以及你搜集这些数据的目的。扎根理论

家常常通过对事件进行比较研究来进行逐行编码。你要比较不同的事件,然后当你的想法形成时,要比较这些事件和经过编码的概念化的事件。那样你就能够发现新生成的概念的属性了。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通过观察得来的数据。对事件进行比较,可能会发挥比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更好的作用,部分原因是,田野笔记已经包含了你自己的语言(比如,可参见 Charmaz & Mitchell, 2001)。对事件逐个进行比较。对人们世俗行为进行具体的行为主义的描述,可能不方便直接用来进行逐行编码,特别是当你观察到一个情境,而并不理解它的背景、参与者,以及没有和他们进行交往时。学生们常常认为,在公共场合对行为进行观察是最容易进行的一种质性研究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会有很大不同。在记录行为与互动的微小差异时,很少会产生新鲜的见闻。他们往往记录下的是一般的具体行为,慢慢地他们才学会进行更加敏锐的观察。

不过,仅仅是细致的观察并不足以产生敏锐的理论分析,尽管他们可能做了很出色的描述。分析的模式至关重要。比较的方法有助于你以新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理解观察结果。对公共场所中人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观察,然后进行逐行编码,可能不会激发出新鲜的想法。而对这些观察进行比较,即使不能立即产生想法,也会给你一些线索,告诉你接下来怎么做。比如,如果你的研究对象把你带到他们的世界,你就会在田野笔记中记录下所有的奇闻轶事、对话及观察,它们都包含了其中大量的意义。你会直接了解到,研究对象是怎样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告诉你,你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

所观察到的事件对于你不是问题——也就是,越是常规的、熟悉的和普通的,要对它们产生一个原创性的概念分析就越困难。打破常规事件的平常性,需要下很多功夫。在普通的环境中从常规行为的观察中获得分析性见解,首先需要对同样的事件进行比较和编码。然后你可以定义一些微妙的模式和重要的过程。之后,比较*不同*的事件会给你带来更进一步的见解。

54 使用比较的方法

在扎根理论中不管你在哪个数据单位上进行编码,你都可以使用“*不断比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we methods)(Glaser & Strauss, 1967)来进行比较分析,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分析层次上进

行比较。首先,通过比较数据,发现相同与差异。比如,在同一个访谈中比较访谈记录与事件,在不同的访谈中比较记录与事件。进行连续的比较(sequential comparisons)会非常有用。对同一个人早期和晚期的访谈进行比较,或者比较不同时间地点对同一事件的观察。当你对一个常规行为进行观察时,比较某一天发生的和随后一些天里这些行为的情况。

如果你对一个过程、行动或信念的定义与你的研究对象所持有的观点不同,那么做出标记。你的观察和想法都很重要。如果你的想法并没有真实反映数据,也不要忽视它们。你的观念可能依赖于隐蔽的意义和行动,它们并不完全是表面化的。这些直觉形成了另外一套有待检验的想法。我们的任务就是分析地理解资料的意义,让这些意义挑战那些习以为常的理解。

你在数据中看到的内容部分要依赖于你以前的观点。不要把你的观点看成是真理,要把它们看作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那样的话,你就能够对你所使用并影响了你数据的概念有更多的认识。为了进行解释,你可能已经拥有了整套的心理学概念,用它们来进行日常行为的理解。在代码中应用这些概念使你能够预先判断会发生什么事情。要努力避免这样一些假定,比如,研究对象压抑或否认关于他们生活的一些重要"事实"。相反,在你通过自己的假定来判断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之前,要寻找他们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待世界,对他们经验逻辑的理解会给你带来新鲜的看法。之后,如果你仍然使用学科术语作为代码,你就会更为有意识地而不是不知不觉地使用它们了。这样,你就能够选择那些适合你数据的术语了。

初始编码的优点

从一开始,认真地逐字逐句、逐个事件编码会使你逐步实现扎根理论分析的两个标准:契合(fit)和相关(relevance)。当你建构代码,并使代码成为能够使研究对象的经验具体化的类属时,你的研究就契合了经验世界。当你提出了一种清晰的分析框架,能够解释发生了什么,能够在固有的过程和可见的结构之间建立联系时,它就是相关的。

认真编码也会有助于防止你把自己的动机、恐惧或未解决的个人问题放到你的研究对象身上,放到你搜集的数据中。几年前,我讨论班上的一个年轻人做了一项关于对残障现实适应情况

的研究,他自己是一个截瘫患者,他骑车时被一辆汽车撞了。勇气、希望和重新振作的故事充满了10个深度访谈。悲痛、愤怒和失落的叙述渗透在他对他们的分析中。我指出,他的分析并没有反映他所搜集的材料,于是他意识到,他的感情确实影响了他对其他人残障情况的理解。他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然而,他本应该在提交他的论文前,就进行更加艰辛的编码,来达到这个目标。逐行编码本应该改变他早期分析时的观念。

编码迫使你以新的不同于研究对象的解释方式来思考材料。你分析的视角以及学科背景会使你以他们从未想到的方式来看待他们的陈述和行动。通过研究数据,你会使基本的过程更加清晰,使隐藏的假设变得直观,给研究对象以新的洞见。托马斯(Thomas, 1993)说,研究者必须选择熟悉的、常规的和世俗的事物,并使它们变得陌生和新鲜。想象一下,在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以一种新鲜的眼光来看曾经熟悉的景色。你会以敏锐的眼光来看风景,风景在你眼里不再像过去那样模糊不清了。逐字逐句地编码有助于你以新的方式来看待熟悉的事物。对事件的编码有助于发现模式和差异。对于人们的行动如何相互契合或者如何发生冲突,你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你也能够对你的先入之见以及研究对象对材料想当然的假设保持距离,这样你就能够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了。

原生代码

扎根理论家通常会把研究对象自己的一些独特的词语作为一种原生代码(*in vivo codes*,或译为本土代码)。他们这些具体的词语会提供一种有用的分析出发点。原生代码有助于我们在编码时保留研究对象自己观点和行动的意义。*在你进行编码时要注意语言*。原生代码会成为研究对象谈话和意义的符号标志。它们是否会在后来更加整合性的分析中提供有用的代码,要看你怎样分析性地对待它们。像其他代码一样,它们需要服从于比较和分析。原生代码尽管容易让人记住,但是在坚实的扎根理论中它们并不能自己独立存在,而必需被整合进理论中。当你认真审视它们时,三种原生代码非常有用:

- 那些人人知道,标记了密集而重要的意义的一般术语。
- 研究对象自己创造的表达了某种意义或经验的术语。

● 缩写词语中反映了某一特殊群体观点的特别术语。

浓缩了意义的原生代码包含了研究对象认为人人都共享的广泛使用的术语。而相反,研究者要把研究对象对原生代码的使用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不只是再现它们。因此,我们要发现它们固有的意义,发现它们是怎样建构这些意义,并实现这些意义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要问,这些代码表示的是什么样的分析性类属?揭示这些术语不仅给你一个理解固有意义和行动的良好机会,也给你在数据之间,以及数据和生成的类属之间进行比较提供了机会。

56

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受虐妇女(battered woman)"这一一般术语的意义,但是,当某些群体使用这一术语时会认为它有特殊的意义。多尼林·洛赛克(Loseke, 1992)发现,那些公开使用这一术语的人所描述的一组特征并不符合这一意义,即遭受身体虐待的妇女。对于那些人,受虐妇女指的是经济上和情感上不独立的母亲,遭受着不断加剧的身体伤害,自尊心很差,处事技巧不足,不能够有效依赖外界的帮助或获得正式的帮助,而且无处可去。这些概念的使用者在决定谁该接受服务以及这些服务应该包括什么内容的问题上,会依据他们对概念的定义。一个年老的、富有的、没有子女的女性就不符合他们的定义,尽管她也遭受着虐待。

一些原生代码同时也反映了一般概念的丰富意义,揭示了个人的新鲜视角。一个人在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慢性病的侵扰之后,说,他要努力"东山再起(making a comeback)"(Charmaz,1973)。通过从一个曾经成功的名人那里借用词语,他把他的处境定义为抗拒病魔。其他研究对象的行为和谈话表明他们也持同样的立场,虽然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生动的词语。

原生代码是社会世界和组织环境的特征。比如,卡尔文·莫里尔(Morrill, 1995: 263-268)关于一家公司的行政词汇表中就既包括了一般术语,也包括了具体标签,这无疑有助于他理解他们处理冲突的方式。主管人员让诸如"莽夫(bozo)"、"拦路石(road-block)"或"跳槽(jumping ship)"等术语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丰富意义,虽然许多术语在组织内设定了具体的意义,并使用了斗争、暴力、侵害等行为的比喻。莫里尔包含了下面的术语:

黑骑士(black knight)	那些常常暗中攻击对手、在纠纷中从不支持部门内部同事的管理者……;(在惯用的意象中,从被接管的公司来看,黑骑士是一个不友好的接管者)。(p. 263)
低飞(flying low)	尽管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却不敢面对侵犯者。(p. 265)
冒犯(rape)	管理者让其他人公开批评自己,而并不与挑战者叫板。(p. 266)
小型火力攻击(small bursts of fire)	在快速的任务交接中对一个同事所做的公开简短的批评。(p. 267)
蒸发(vaporizing)	一个管理人员在公司里任期结束,或者产生一种让管理者从公司辞职的环境。(p. 267)

在分析的组织水平或集体水平上,原生代码反映了假设、行动和决定行动的驱动力。研究这些代码,探究代码中的线索,会让你对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它的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些代码会调整你对研究对象的世界的分析。它们会提供一些线索,让你判断你对研究对象意义和行动的解释与他们公开的表述和行动之间是否一致。原生代码还能对你是否抓住了重要内容进行检验。以利亚·安德森(Anderson, 2003)在他的一本民族志论文集中提到了这一点,在文集中他做了一项关于在芝加哥街头流浪的非裔美国人的研究。安德森发现三个群体:"值得尊敬的"、"不受尊敬的"和"有些受尊敬的"。在他的老师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问他这些人怎么称呼他们自己时,他提到了这些类属。安德森重新阅读了他的数据,发现那些街头男人自己的词语"正经人"、"恶棍"和"酒鬼"浮现出来了。在引用了这些词语,弄清楚了它们的意思之后,安德森说,他在理解他们的世界上得到了一次巨大的提升。比如,从扎根理论的立场,说明这些人怎样把自己归入这一类属或那一类属,谁来指定和强加这些类属,这些类属怎样使行动具有预见性,都是非常有趣的。

57

在你进行的每个研究中,研究对象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呈现和浓缩意义的方式,并以此来命名或书写事物。听到和看到这些新的词语,使你能够通过编码以及之后的数据搜集来探究它们的意义,理解它们的行动。要寻找能够讲出意义的词语。一个患有严

重糖尿病的年轻医生认为,他自己是“超级正常的”(Charmaz,1973,1987)。随着我们谈话的展开,他对于超级正常的意义也变得清晰了。他不仅试图不受他的病情妨碍,成功地做一名外科医生,而且能够超过和他患有同样疾病的人。他的希望和计划象征了社会生活中的身份目标,它超过了心理上的偏好。一旦我抓住了追求超级正常身份目标的这个想法,我就在其他研究对象的行动和目标中看到了这一过程。同样,当我提到很多人主张“过一天是一天”,提到他们关于“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故事时,原生代码中的其他内容就会浮现出来。随后,我要寻求这些代码所涵盖的浓缩的意义和行动,并对它们进行编码。

聚焦编码

> 聚焦编码意味着使用最重要的和/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代码,用大量的数据来筛选代码。聚焦编码要求判断哪些初始编码最能敏锐地充分地分析你的数据。

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是编码的第二个主要阶段。这些代码要比逐字逐句、逐个事件的编码更加具有指向性、更有选择性和概念性(Glaser,1978)。在你通过开始的逐行编码确定了一些重要的分析方向后,你就能够开始聚焦编码,综合和解释更大范围的数据了。聚焦编码意味着使用最重要的和/或出现最频繁的初始代码,用大量的数据来筛选代码。一个目的就是确定那些代码是否充分反映了数据。聚焦编码要求判断哪些初始编码最能敏锐地充分地分析你的数据。

但是从初始编码到聚焦编码不完全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些回答者或事件会使早期陈述或事件不清晰的地方变得清晰。一种豁然开朗的经验会提高你对早期数据的研究。然后,你可能会返回早期研究对象那里,探究那些可能被你草草带过的问题,或者探究那些可能太不清晰以至于早期不能识别或无法表述的问题。 58

扎根理论编码的力量来自于对过程集中的、积极的处理。你要按照数据的指示进行行动,而不是消极地阅读它们。通过你的

行动,新的分析线索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你以前从未想到的事件、互动和视角都会成为你所分析的范围。聚焦编码会检验你对问题的先入之见。

在表3.3的第一段摘录中,我选择了"避免说出病情"和"估计说出病情之后所潜在损失和危险"这些代码来把握、综合、理解命题中的主题。在第二段摘录中,下面的代码是非常有用的,"觉得不得不过一天是一天"、"关注今天"、"放弃未来的规划"、"管理好情绪"、"减少生命危险"。我再一次试图使代码变得更有解释力,更贴近数据。通过聚焦编码,你可以浏览访谈和观察而来的数据,比较人们的经验、行动和解释。注意这些代码是怎样浓缩数据,并提供对数据的把握的。

表3.3 聚焦编码

	摘录1 *克里斯蒂娜·丹福斯,37岁,红斑狼疮患者,修格连氏症候群,有背伤*
避免说出病情 估计说出病情之后所潜在的损失和危险	如果你患有狼疮,我指的是今天肝脏出毛病,明天关节出毛病,后天头出毛病。如果你不停地抱怨各种不同的小毛病,人们会认为你是个臆想症病人……于是你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否则人们就要说,"上帝呀,别靠近她,她总爱不停地抱怨。"这就是我为什么什么都不说,因为我所有的各种症状都这样或那样的和狼疮有关,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患有狼疮,即使那些知道的人也不会相信10种不同的毛病其实是同一种病。我并不希望人们因为我总在抱怨而疏远我。
	摘录2 *乔伊丝·马歇尔,60岁,轻微心脏病,近期得了轻度中风*
觉得不得不过一天是一天	我不得不把它(中风)看作是一个警告。我不能让我自己太焦虑。我不得不活一天是一天。
关注今天,放弃未来的规划 管理好情绪,减少生命危险	我非常担心约翰(她的丈夫,他患有威胁生命的心脏病,还没退休就在三年前失去了工作)……由于这些压力,很难……再去专心于我今天能做的事情。我过去常常展望未来,现在不行了;它让我非常不安。现在我不得不过一天是一天,否则我就活不下去。

59

和扎根理论的逻辑一致，编码是一个生成的过程。意料之外的想法会生成，而且会不断地生成。在对一组数据进行编码之后，要对照一下你的代码和数据。你所建构的契合事件或表述的一个信息丰富的代码可能会解释另一个代码。前一个事件可能会提醒你看到具有深刻意义的下一个事件。我看到过这样一些紧张时刻，当配偶说他们的伴侣由于疾病剥夺了他们以前的能力时，夫妻间出现了一种紧张的状态。

看看下面来自安德莱（一名退休大学教授）和他的妻子娜塔莎的田野笔记，他们两个都患有慢性疾病：

> 我问（安德莱）："你在退休后会继续从事专业工作吗？"他说："我过去教的是扩展课程，但是因为预算问题，政府没钱再开这些课程了。"她（娜塔莎）插话说，"安德莱曾经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演讲家，这部分是因为他的激情，部分是因为他的清晰晓畅，但是说话能力出现问题之后，他就做不到了……"（他缓慢的、痛苦地说）"学校没有钱了……我也讲不好了。"
>
> 这时我觉得极为难过。在他们不再请他讲授扩展课程的问题上，不管是不是这两个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在她那么说的时候，对于他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时刻。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时刻，知道了她对他丧失能力是什么样的想法，对他是最重要的。对这种短暂过程的参与，就好像看到这样一个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份被粉碎了——这对于他和我都是痛苦的，虽然我得到这样的印象，她沉浸在自己看法的准确性中，并没有真正看到这让他多么没面子……承认他不能很好地讲话，就好像承认了以前隐藏起来的罪恶或自卑一样。（Charmaz，1983，pp. 119-120）

从这些早期的观察中，我形成了"身份认同时刻"这一代码。在每个案例中，每个判断都会给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告诉我们这个病人成了一个怎样的人。这些让人不安的意见宣布了一些消极的变化，破坏了他们身份的永恒性。"身份认同时刻"

60

这一代码提醒我注意，当有人把一种重要的身份放在一个患有慢

性疾病的人身上时，会发生怎样的短暂互动。若干年之后，当我进入一家主要服务于贫困老人的疗养院时，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值班的助理人员说，她的主管并没有通知她我要和病人谈话这件事（像事先安排的那样）。轮椅中的六个老人靠墙排成一排，一个中年妇女走向助理人员的办公桌。轮椅中的人活跃起来，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在一些机构这是很常见的，因为很少有人拜访他们。助理人员头也不抬，冲中年妇女点点头，说，“你可以和玛丽聊聊；她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这儿这样的人可不多。”听到这样的宣告，轮椅中的六个脑袋齐刷刷地垂了下去。玛丽看上去很骄傲成为被选中的对象。我意识到我目睹了另一个身份认同的时刻——对于玛丽是一个积极的时刻，而对于其他病人却是一个消极的时刻。

通过数据间的比较，我们形成了聚焦代码。然后我们比较一下数据和代码，这有助于我们完善这些代码。在第一个例子中，我比较了这样两种情境，一种是研究对象已经能够很自由地谈论他们的病情，而在以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是他们还不能自由谈论这个问题。在安德莱认识到他说话困难这件事之前，他的医生告诉我，安德莱受损的说话能力从未被公开谈论过。我也比较了这些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和冲击。一开始，代码只是表现了消极的身份认同时刻。在我获得了更多数据之后，我发现和定义了积极的身份认同时刻。“身份认同时刻”开始作为一个代码，我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类属（Charmaz，1991a）。身份认同时刻这一意义和很多经验产生了共鸣，霍纳德（Van den Hoonaard，1997）把它作为一个敏感性（sensitizing）概念，其他研究者可以用来作为研究的起点。

轴心编码

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Strauss，1987）提出了第三种编码类型，轴心编码（axial coding），把类属指向亚类属。轴心编码使得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了。

> 轴心编码使得类属和亚类属联系起来，使得类属的属性和维度具体化，重新排列了你在初始编码中分裂了的数据，给生成的分析一种连贯性。

施特劳斯(Strauss,1987,p.64)认为轴心编码建立了"围绕类属之'轴'的密集关系网络"。这样，在主要的类属形成之后，轴心编码就出现了，虽然它可能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轴心编码的目的是分类、综合和组织大量的数据，在开放编码之后以新的方式重新排列它们(Creswell,1998)。

初始编码使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轴心编码是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8)把数据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的策略。施特劳斯和科尔宾认为(p.125)，轴心编码回答关于"哪里、为什么、谁、怎样以及结果如何"这些问题。有了这些问题，研究者就能够更加充分地描述被研究的经验了，虽然科尔宾和施特劳斯认为，在类属之间建立联系要在概念的水平上，而不是在描述的水平上。对于他们来说，分析数据意味着把文本转化为概念，这是施特劳斯和科尔宾使用轴心编码的目的所在。这些概念使得更大类属的维度具体化了。轴心编码的目的就是把类属和亚类属联系起来，并探究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克拉克(Clarke)把轴心编码看作是类属的精细化，并用表格把相关类属整合起来。[①] 对于她来说，一个整合的表格的目的在于把类属和类属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意义的行动理论。

61

在进行轴心编码时，施特劳斯和科尔宾使用了一套科学术语来建立可见类属之间的联系。他们把研究对象的表述聚合起来，使其成为结构框架的组成部分，以此来回答他们上面的问题。在一个这样的结构框架中，施特劳斯和科尔宾包括了这些内容：①*条件*，形成被研究现象结构的环境或情境；②*行动/互动*，研究对象对主题、事件或问题的常规性或策略性反应；③*结果*，行动/互动的后果。施特劳斯和科尔宾用"条件"去回答为什么、哪儿、怎样发生以及何时等问题(Strauss and Corbin,1998,p.128)。"行动/互动"用谁和怎样的问题来回答。"结果"回答诸如由于这些行动/互动"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问题。

---

①个人交流,2004 年 9 月 20 日。

轴心编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应用的框架。这个框架是扩展还是限制你的视野,取决于你的主题和你忍受模糊状态的能力。那些喜欢在一个预置的结构中工作的学生,会欢迎这样的框架。那些喜欢简单、灵活原则的人能够忍受模糊状态,并不需要轴心编码,他们会追随他们在经验材料中定义的线索进行行动。

虽然我没有根据施特劳斯和科尔宾的正式程序使用轴心编码,但我还是在了解了类属所代表的经验时,发展了类属的亚类属,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接下来的类属、亚类属和它们的联系反映了我对数据的理解。

对邦妮·普雷斯利和克里斯蒂娜·丹福斯的访谈所做的早期编码的例子指出,告诉其他人患有慢性病这样的事实会产生情绪和互动的两难,很多访谈中都出现这样的两难,但我没有打算去研究这些。毫不奇怪,我在早期访谈中看到的最初两个类属是"说出病情"和"避免说出病情"。我通过比较同种类型经验或事件的数据,概括出它们各自的属性。研究对象故事中明显的痛苦使我把"说出病情"作为一种暴露和冒险。邦妮·普雷斯利的冒险包括使病情更加恶化。很多其他人所冒的风险是使自己情绪更加脆弱,情绪变得不可控制。"说出病情"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说话方式。

接下来,我重新考察了初始编码中我所编码的数据。研究对象既通过避免说出病情,也通过告诉人们病情,来处理有关自己的信息;但是当研究对象觉得很受打击时,某些说出病情的方式就会失去控制,有时就可能导致病人三缄其口。如果研究对象在说出病情时缺乏控制,他们就会通过滔滔不绝地说出他们的顾虑担忧,而不是通过管理和控制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展现他们自己。

接下来,我就在自然的陈述和有准备的宣告这个范围内进行编码。我把研究对象在宣告病情时情绪控制得当或情绪失控的程度,和他们策略清晰的程度联系起来。在发现人们说出病情的不同方式之后,我仔细地研究了以下内容:

- 在说出病情时,他们是怎样陈述自己的情况的,以及互动的情况又是怎样的。
- 到底要把病情告诉谁,影响这个选择的社会条件和经验条

件是什么。

- 研究对象认为自己说出病情的目的是什么。
- 研究对象告诉这些人什么样的内容。
- 研究对象是怎样告诉他们的。

我对研究对象是否、何时、怎样以及为什么改变他们的讲话方式进行了编码。这些策略会引出被观察现象的原因和条件。我对说出病情的形式进行了分析(见图 3.1),通过研究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研究对象在说出病情时对主观得失的衡量远远超过了研究者在简单的连续系谱上所设计的情况。当研究对象张扬病情(flaunt illness)时,主观性和客观性就会遇到一起。显然,当说出病情使得研究对象无法解决自我接受和被他人接受的问题时,有些人会选择张扬自己的病情。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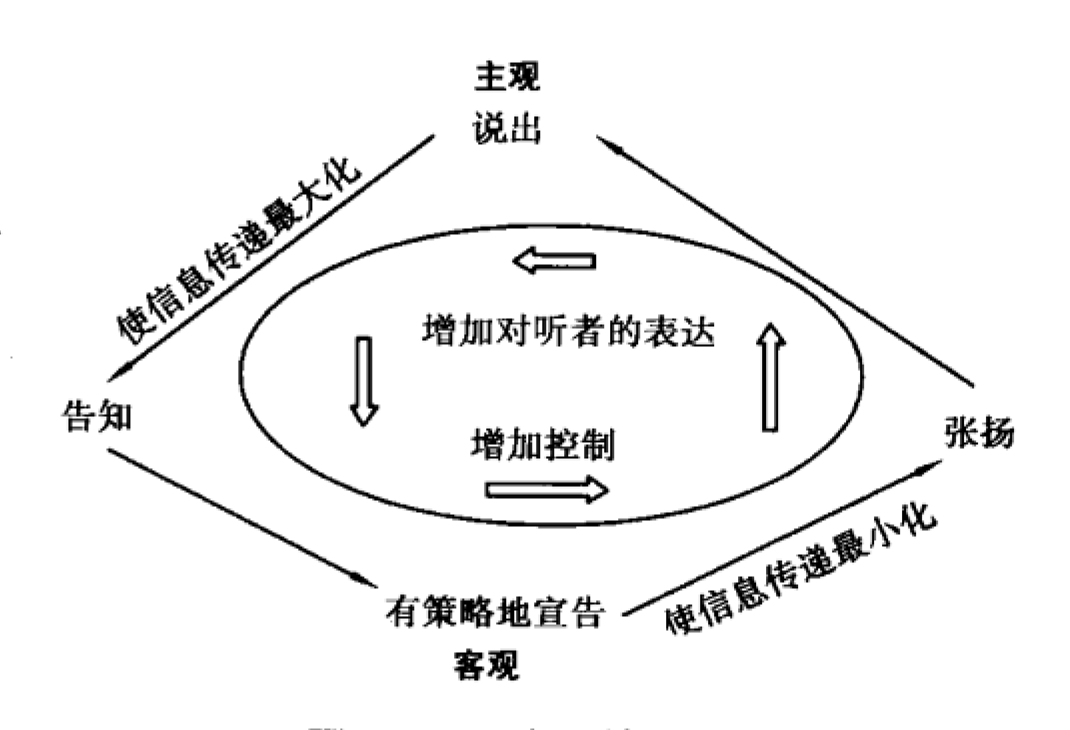


图 3.1 说出病情的形式

没有清晰的框架引导我对研究对象的陈述及经验进行分析性建构,也没有框架引出重点。虽然轴心编码可能有助于研究者探究数据,但也鼓励他们*应用*分析框架来处理这些数据。在那个意义上,依赖轴心编码可能会限制研究者对他们所研究世界的了解及认识的方式,从而会限制他们所建构的代码。

轴心编码究竟是会带来帮助,还是会带来阻碍,仍然是个问题(Kelle,2005)。它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比认真比较更加有效的技术,仍然存在争议。往最好处说,轴心编码有助于搞清楚并扩展生成想法的分析力量。往最糟说,它用技术覆盖在数据上——而且可能覆盖在你最后的分析上。虽然要努力对研究

63

现象进行更加完全的把握,但是轴心编码使得扎根理论更加难以处理了(Robrecht,1995)。

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theory Coding)是你在聚焦编码过程中选择了代码之后所进行的复杂水平上的编码。格拉泽(Glaser,1978:72)用理论编码这一术语使这一过程变得概念化了,即"实质代码(substantive codes)作为整合在理论中的假设,彼此之间是怎样发生联系的"。简而言之,你在聚焦编码中形成了类属,而理论代码就是让这些类属之间可能的关系变得具体化。格拉泽(Glaser,1992)认为,这些代码排除了轴心编码的必要性,因为它们"把支离破碎的故事重新聚拢在一起了"(Glaser,1978:72)。理论代码是整合性的,它们给你所收集的聚焦代码赋予了形式。这些代码可以使你的分析性的故事具有连贯性。因此,这些代码不仅会使实质代码之间的关联形式概念化,也会使分析性的故事开始变得理论化。

格拉泽(Glaser,1978)提出了拥有 18 个理论代码的家族系列,包括分析性类属比如"6 个 C: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量(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Glaser,1978,p. 74)"程度"、"维度"、"交互性"、"理论性"和"类型"编码家族,以及来自主要概念如"身份—自我"、"方式-目标"、"文化"以及"共识"家族的代码。格拉泽的一部分编码家族是具体的分析类属,但是融合了概念的区分。比如,"单元"家族包括以下结构单元:群体单元、家庭组织单元、总体单元、区域单元、社会单元、地位单元和角色单元。格拉泽还包括了形势、社会世界和社会情境,这些一定程度上是分析的单元,但是也意味着生成性,而不是结构性属性。在《扎根理论过程》(*Doing Grounded Theory*, 1998)一书中,格拉泽扩大了早期的一些编码家族,增加了更多的编码家族,比如:"成对的反义词"家族、"表征(representatioon)"家族、"规模 (scale)"家族、"随机游走(random walk)"家族、"结构—功能"家族和"单元身份"家族。

如果你巧妙地使用理论代码,它们就会成为锋利的分析利

刃，使你的研究更为犀利。它们可以增加精确性和清晰度——只要它们适合你的数据和实质性分析。它们有助于使你的分析变得连贯和易于理解。根据你所拥有数据的情况以及你对它们的了解程度，你会发现，你的分析要考虑好几个编码家族。比如，你可以阐明一个特殊现象出现的一般情境和具体条件。你能够详细说明使现象发生和变化的条件，能够概括出它的结果。你可能会了解到它的时间和结构排序，发现研究对象处理它们的策略。如果你了解这些时间序列，你就有可能把对过程的分析包括进来。这样，虽然没有深入研究实质，仅这个小例子就能带进下面的分析性编码家族："6 个 C"、"时间序列"、"排序"（格拉泽还包括了结构性序列，Glaser，1978，p. 78），"策略"以及"过程"。由代码所指出的联系也可以指出你需要加强的领域。 64

施特劳斯（Strauss，1978a，1993）关于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和社会竞技场（social arenas）的研究受到了阿黛尔·克拉克（Clarke，1998）的影响，克拉克后来又发展了这些概念。在下面的过程中，克拉克为理论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原则，理论概念作为整合性编码家族出现在她早期的研究中：

> 在有关纪律形成的研究中，社会世界和社会竞技场的概念为分析提供了很多帮助。社会世界的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通过把所有进行了参与并做出贡献的比较明显的社会世界包括进来，在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之间建起了桥梁。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都可能是相关的。社会世界本身就是分析的社会单元，非常具有弹性和可塑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使用。通过考察世界中的多样性，可以避免把集体社会行动者当成一成不变的事物，与此同时，仍然能够追踪和探索它们所有的集体视角、意识形态、信念和目标。可以在不局限于仅仅对个人行为进行分析的情况下，自如地把特殊个人的行动作为竞技场的重要因素进行分析。可能最重要的是，在竞技场的形成中，考察和分析社会世界内部以及社会世界之间的交涉（negotiation），这些交涉对于竞技场的不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p. 265）

早期的实质分析应该预示出后来你所使用的理论代码的类型。简单说，像任何其他已有概念一样，理论代码必须以自己的

方式进入你的扎根理论(Glaser,1978)。当我们观察分析风格和概念工具如何在一个学科中扎根时,发现其中存在某些潮流和趋势。这些潮流和趋势限制了观察的方式,并且可能把数据强行放入了旧的盒子中。格拉泽指出,过分依赖于编码家族的策略可能会让学者把原因归结为有意识的目的,而实际上研究对象并没有那么想(p. 76)。其他理论代码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格拉泽建议,"可能研究中最经常出现的题目是社会秩序的问题(通常是无序的)"(p. 78)。但是反方认为,使用"无序"概念会阻碍研究者看到其他社会结构形式。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共识模式会让人看不到冲突和压迫的存在。一些符号互动论者就在研究中大量使用诸如"职业"、"工作"、"协商"和"策略"等概念(Charmaz,2005)。

比如,戈夫曼(Goffman,1959,1967,1969)的分析采用了互动的策略模型和社会行动者概念,社会行动者对如何控制互动(encounters)制定了策略:

> 不管个人心里的具体[互动]目标是什么,也不管他设立这个目标的动机如何,它(指控制互动的策略——译者注)都会出现在他控制其他人行动的考虑之中,特别是出现在他们对他的回应中。这种控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其他人对形势的定义来获得的,他可以通过这样表达自己来影响其他人的认识,即给他们一种印记(impression),这种印记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自愿行动。这样,当一个人出现在其他人面前时,他通常总有自己的行动理由,这样就给其他人一个印象,他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的。(1959,pp. 3-4)

65

在上面这段话中,你可以看到,戈夫曼对策略和控制有着清晰的关注。

由理论代码所提供的理论整合在分析中仍然是不清晰的。比如,符号互动论是我关于慢性病患者研究《好日子,坏日子:慢性病中的自我与时间》(*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1991a)的一个主要理论支持,但是只是出现在背景中。在该书中,对人们如何体验疾病的实质分析出现在前景中,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由符号互动主义的敏感性产生的代码提供了理论基础,或者说概念构架,它将这些叙述整合了起

来。来自其他学科的读者可能不会意识到组成某项工作的内在理论框架。比如,时间和自我之间的联系在下面的例子中是清晰的,尽管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把它们的联系看作是符号互动主义的。

> 重新抓住过去的渴望反映了对已失去的自我的向往。这种向往来自由于疾病而累积起来的痛苦。这个时候,人们会界定损失,确认病情。虽然,诗人梅·萨顿写道,她学会在生病后一分一秒地过,她同时也渴望过去的自己:"现在我极为孤独,因为我不是我自己了。我不能平静地看一个朋友超过半个小时,因为我的精神会像撒气的气球一样在渐渐枯竭"。(Sarton,1988,p.18)
>
> 当人们相信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时,由于过去自我而产生的悲痛就会不断增长。即使病愈,以后能否重新找回过去的自我、重新抓住过去也仍然是难以预料的。当萨顿写道,"管理这样一种消极等待的生活有好多个月,我本来应该把真正的自己埋葬掉的——我现在意识到,回到真正的自己比埋葬它更加困难"。(Sarton,1988,p.78,Charmaz,1991a,p.194)

萨顿的悲伤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的自我概念是有边界和内容的,就像符号互动论者所主张的那样。自我概念提供了一种认识我们自己的方式,一种区分什么是我们自己和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方式。萨顿告诉我们,她的自我概念仍然停在过去,现在和处在当前困境中的自我形象是不一致的。

哪些有可能作为理论编码家族呢?格拉泽(Glaser,1978)并没有提供标准,以确定我们应该接受哪些作为编码家族,以及解释我们为什么应该接受他对它们的描述。他认为,他的编码家族清单包含了重叠的类属,并指出,一个新的编码家族能够从以前的编码家族中产生。社会科学家常常同时从几个编码家族中吸取。正如格拉泽所言,编码家族既不会穷尽,也不会相互排斥。它们也并不反映同样水平和同样类型的抽象。一些编码家族指可识别的分析术语,而另一些则依赖于社会学概念。一些编码家族的名称,如"交互式(interaction)"、"阅读(reading)"、"传统(mainline)"显得武断而含糊。它们的意义以及其他术语的意义

66

仍然植根于叙述中(pp. 76-81)。"交互式"指"相互影响"、"互惠的"、"互相依赖的"等,而不仅仅是互动本身。"阅读家族"包括"概念"、"问题"和"假设"。"传统家族"包括广泛的结构性概念和关注,如"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化"、"社会互动"和"社会世界",这也是格拉泽在单元家族中所列出来的。

在格拉泽的清单中,一些概念家族显然是缺席的,包括对主体与行动、权力、网络以及叙述与自传等的关注。诸如不平等概念仍然掩埋于更大的单元中。冲突仍然归入更大的共识家族,处于从属地位,对此冲突理论家会正当地、有力地提出异议。[①] 最近,诸如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概念之类的理论潮流形成了其他理论家族。格拉泽认为,新的编码家族可能来自以前的家族。他最近补充的很多概念似乎来自过去的实证主义概念传统。

日常扎根理论编码如何与轴心编码及对理论代码的使用相比较呢?想一想之前的讨论以及名为"说出病情的形式"的图表(图3.1)。讲述病情的类型可以被看作更大的讲述类属的维度。每一个类型都有特定的属性,反映了有关自我和身份的观点以及直接的互动环境。在一种意义上,这些类型反映了从主观到客观的连续变化。在下面的领域中,这些类型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觉得情绪紧张、难以启齿,讲述中的情绪控制和信息控制,计划的数量和类型,以及目标听众的影响。很多研究对象发现,他们讲述的形式在病情的不同时间段上是不同的。在确诊或病情的第一阶段,他们会感到震惊,他们会难以克制地说出这个消息。如果他们觉得因为说出了这个消息而感到低人一等或失去价值,就会在说出病情时更加审慎,可能会从冲动地说出变成富有策略地告知。这些插曲发生以后,人们发现了说出病情的代价,于是可能会诉诸特定场合的策略性宣告。虽然很多人关于如何、何时、哪里及向谁透露存在策略性的考虑,但很少有人会去张扬。从这个简短的讨论中,你可以看到研究过程是怎样形成这一分析的。注意,如果一个人了解了某种说出病情的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他或她在选择其他讲述形式时会把这种形式作为一种参考依据。

---

①这一观点不仅属于今天,也属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格拉泽写了《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一书。大约40年以来,大部分社会学理论家都把冲突看作是共识概念的对立面,而不是将其看作共识的一个亚概念。

在我研究关于讲述病情的数据时，这种联系类型在以前例子中就出现过了。关于讲述形式更深入的数据或者另外的全面的数据会形成更多的联系。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这些理论代码可能会给分析带来客观性的味道，但是代码本身并不代表客观标准，不代表学者们会同意或者不加批判地去应用。当你进行分析时，使用理论代码有助于澄清和加强你的分析，但要避免把强制性框架施加在它身上。它有助于你反思，这些理论代码是否解释了所有的数据。

在编码中减少问题

67

警惕先入之见

通观扎根理论文献，都要求研究者避免把数据强行放入预先设定的代码和类属中，首先就有现有理论(extant theories)。我们也要警惕把先入之见放入编码的数据中。前面曾提到一个学生，他把自己关于残疾的观点强加在他的访谈数据上，把社会学家所谓的“常识理论化”放在了他的分析中(Schutz, 1967)。他的推理来自自己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观点，来自他自己作为残疾人的经验。扎根理论家也会像其他理论家一样，无意中从自己的先入之见开始，如某一特殊经验意味着什么以及必须承受什么。

来自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年龄、身份及历史时期的立场所产生的先入之见，可能会在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渗透到分析中。如果这样，这些看不见的立场就会游荡在分析讨论的框架之外，对于持这些先入之见的研究者来说，它们在根本上是不成什么问题的。这些研究者可能会否认它们的存在。①

每个研究者都持有一些这样的先入之见，可能影响但并不决定我们关注什么以及我们怎么理解它们。资本主义、竞争和个人主义的阴影可能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家的分析之中，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欧文·

---

①Dorothy Smith(1987)、Nancy Hartsock(1998)以及 Patricia Hill Collins(1990)等女性主义立场的理论家对于隐含假设(hidden assumptions)都有非常有力的论断。

戈夫曼(Erving Goffman)细致的田野调查、敏锐的观察以及强制性的类属使他成为20世纪最敏锐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但是,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戈夫曼援引了关于人类本质的个人主义、竞争性、策略性和等级性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只适合于20世纪50年代北美白人、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男人的文化概念(Charmaz,2004)。这些想当然的假设影响了我们所关注的内容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在下面的这段话中,戈夫曼对如何进行规范的人类学工作提出了敏锐的建议。虽然他的建议非常深刻,但我们还是能够瞥见他的先入之见。

> 作为研究生,我们只想表现得聪明,突出自己,为自己辩护——就像人们通常的那样——形成正确的关联,诸如此类。而如果你要做好田野工作,在我看来,难免要落空……
>
> 你必须呈现你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呈现的一面,以此打开自己。你必须展现自己通常被冷落的一面。你必须停止强调自己是如何地聪明。这对于研究生(特别是东海岸的研究生)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你必须情愿做一个蠢笨的人。(Goffman,2004,p. 127-128)

只有当我们习以为常的立场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看到自己的先入之见。罗莎娜·赫兹(Hertz, 2003)曾经进行过一个关于以色列农场(kibbutz)的民族志研究,直到20年之后她才遇到这样的挑战。最近,这个以色列农场一对夫妇的儿子过来要求和她一起生活。他的出现让她意识到,这个家庭把她和他们的关系看作是"家人"的关系,而她只把这种关系看成是她在以色列农场所度过的一段漫长时光里的一次"交易"。赫兹说,她意识到"感觉是多么地奇妙,假设是多么地根深蒂固,而意识形态的偏好甚至会公开挑战最热心的努力"(p. 474)。

68

一些策略会有助于揭示这些先入之见。深入熟悉*被研究现象*是前提条件。这种熟悉不仅包括人们应对这些现象所用到的深层的知识,还包括渗透在他们经验中的理解水平。这种理解水平会使你超越研究对象对同样事物所持有的想当然的态度。初始编码会引导你了解研究对象的解释框架,并使你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究,但对象的解释框架可能并不是你的框架。正如赫兹上面所做的那样,对于挑战要采取一种反思的立场,这会让人对人

们的视角和实践持一种质疑的态度。

从扎根理论的立场看，每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你的分析——包括你以前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Glaser，1978）。那意味着你首先要做崭新的繁重的分析工作。我曾经主张，以前的理论概念可能会为你提供观察数据的起点，但是并不会自动为你提供分析这些数据的代码。比如，问一下，阶级、种族、性别或年龄等这些需要分别关注的问题是否曾经出现过？如果你完全应用来自学科的理论概念，那么你必须保证这些概念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防止强制使用学科概念的方法可能会有所帮助。考虑一下下面的问题：

- 这些概念是否有助于你理解数据？
-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 你能用这些概念解释清楚某一部分数据吗？
- 如果没有这些概念，你能否解释这部分数据？这些概念增加的是什么？

如果对于理解你的数据现有概念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们就不应在你的代码或后来的分析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你，最好的方式是首先确定你的数据反映了什么事情。

先入之见会在我们思考和写作中发挥作用。那些把自己看作是客观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者会常常认为，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判断是正确的。这种立场会把一个人未加检验的假设作为事实。应用目的性、动机或策略语言时要小心，*除非数据支持你的判断*。你不能假设一个人脑子里想什么——特别是他或她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下。[①] 如果人们告诉你他们“想”什么，就要记住他们提供的特定表述，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时间、地点、个人历史以及听众。研究对象在告诉你他们想什么时，未曾说出的目的可能比他们说出来的想法更重要。如果你重新构造对象的表述，使其适合某种目的，你就把数据强行放入已有的类属中了——是你的，而不是他们的类属。然而，把人们说的话和做的事进行比较，会强化你原有的判断。

---

①一个相对真实的叙述是情境性的和建构性的。我们对这些叙述的表现是进一步的建构。

69 解释数据和把已有框架施加在数据上，存在细微的差别。

在编码时，问题可能来自：

- 在过于一般的水平上进行编码。
- 识别主题，而不是识别行动和过程。
- 忽视人们建构行动和过程的方式。
- 注重的是学科或个人的关注点，而不是研究对象的关注点。
- 脱离背景进行编码。
- 用代码去概括而不是去分析。

在一个扎根理论研讨班上，同学们在进行编码练习，都使用同样的关于临床背景中专业人士的数据。一个同学几乎对每一个陈述都进行了编码，并把数据中的事件描述为“压力”——未加区分的、未经检验的压力。她重视压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她在一个过于一般的水平上对吸引她的问题进行编码，却没有考虑田野笔记中的行动和观察。研讨班其他同学的代码就更接近数据，他们产生了更加细微的代码，综合了他们在数据中所看到的事情。

你的代码反映了什么观点，会指向什么样的类属，以及应该在什么时候引入抽象的观点，都要采取审慎的立场。这样一种编码的立场会让你对自己的观点以及研究对象的观点提出疑问。用下面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编码方式：

- 我的编码是怎样反映事件或所描述的经验的？
- 我的分析性建构是否从这一点开始？
- 我是否在数据和代码之间建立了清晰而明显的联系？
- 我是否反对把被研究经验改写以至彻底改动为无生命的语言，使其更适合*我们*学术世界和科层世界，而不是更适合我们研究对象的世界？

显然，我们把不同的观点带入了我们所看到的数据中。我们看到了研究对象可能没有看到的事物。随着代码越来越抽象，我们逐渐用越来越具有分析性的术语来表达，而这是研究对象所不了解的，但是可能会和上面所讨论的诸如“认同时刻”之类的观点产生共鸣。通过解释经验，代码在被描述事实和分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把数据转换成代码

编码依赖于对可靠数据的占有。如何记录以及记录什么都会影响你所进行的编码。质性研究依赖于深度访谈和焦点群体访谈。一些质性研究者主张从笔记开始进行编码,而不是从转录的访谈来编码。大体说来就是,你要把握要点,消除混乱。这一方法假定,研究对象所说和所做的是客观透明的。它也假定,任何敏锐的访谈者都会记录下最有说服力的资料,并且记录得很好。这一方法可能进一步假设,研究者的笔记和代码"抓住了"研究对象的观点和行动。这些假设都不是真实的——即使对于有经验的研究者也是如此。

70

对所有访谈记录进行编码,会使你产生一些你可能会忽视的想法和理解。这样,数据搜集的方法不仅形成了你的资料,也构成了你的代码。给所有记录编码能够加深你的理解水平。相反,从笔记并且依照笔记进行编码,你会获得更为开阔的观点。不过,它也有助于围绕研究现象而不是进入研究现象来发展扎根理论。重视说服力,而不是重视充分性和系统性,其危险就在于产生肤浅的分析。

转录整个的访谈和田野笔记也有一些潜在的好处。你最初对数据的阅读和编码没有必要成为最后的一次。丰富而充分的数据会产生很多研究问题。无论你在研究早期是否意识到,这些数据都常常包含着一些正在形成的分析。你可以保留一套有待后来发展的相关代码。你也可以返回去并记录一套旧的数据。在这两种情况中,你的代码都会激发一些新鲜的想法。与此同时,这些丰富的记录会保留一些细节,激发你产生以后的许多想法。你会从数据中为一个项目产生非常多的想法,以至于你会由此而迷惑。这样,编码和记录不仅能够引导你沿着新的方向前进,也能直接引导你走向新类属的理论抽样。早期的理论抽样会给你更多的好处,使你能够更轻松地穿越实质领域。[1]

---

[1]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committees)在越来越发挥着制造障碍和浪费时间的作用。跨越不同的环境以及获得进入每个环境的许可的逻辑会阻碍研究者进行理论抽样的计划。这样,从一套重新经过编码的数据集开始,在另一个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对于限制和按部就班通过这些委员会的审查可能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任何数据搜集的方法都会影响你所要编码的对象。民族志学者依赖所听到的要多于所看到的,而访谈者常常只依赖于他们所听到的。不仅要记录你所听到的,也要记录你所看到的。一个访谈者会看到一个场景,至少会看到一个人。关于这些观察的记录也是要进行编码的数据。在阿布迪·库索(Kusow, 2003)关于索马里移民的一个访谈中,他的观察构成了他的大部分数据。库索已经发现,很多潜在的研究对象会由于索马里动荡的政治气候而拒绝接受采访。一个研究对象向他推荐了一个同意接受采访的年轻女人。当库索到达那里时,电视在哧哧啦啦地响着,她和几个小孩子在看电视。她并没有提议离开房间,仍然让电视开着,很简单地回答着他的问题。库索认为她的回答"基本上根本不能给我任何信息"(p. 596)。库索的这段轶事给访谈者提出这样的启示:不仅要对你的访谈进行编码,也要对你所观察到的环境、场景和研究对象进行编码。揭示性的数据就存在于这样的观察中。

小　结

在研究的早期,编码会指导你在分析过程中的方向。通过实践,你可以熟悉扎根理论编码,然后评价它是否适用于你。你要对数据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由此你会发现一些微妙的意义,产生新的观点。我建议在最适合数据和任务的水平上完成一次封闭的初始编码。

71

编码是工作,也是游戏。我们和从数据中获得的想法进行游戏。我们要进入数据,并从它们那里学习。编码给了我们观察数据的一种聚焦方式。通过编码,我们会有所发现,并获得对经验世界更深入的理解。

理论的游戏性质使我们能够提炼想法,看它们会将我们引到哪里去。编码给了我们一套基本的想法,使我们可以通过写出这些想法来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和检验。扎根理论编码是灵活的,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返回数据,重新进行编码。我们可以继续写出这些代码,衡量它们的重要性。

编码是这场旅程第一个重要的部分,它使你能够从具体的事

件及关于这些事件的描述跳跃到理论观点和理论可能性上。扎根理论编码不仅仅是对数据的评审、分类和综合，就像质性编码通常的目标那样，它实际上还在以分析的方式统一各种想法，因为你把数据和代码可能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已经记在心里了。既然你已经有了这些代码，那么就到了备忘录撰写阶段了，通过备忘录撰写你可以继续发展这些代码。下一章为你撰写备忘录提供了一些建议。



第4章　撰写备忘录

Memo-writing

当我们停下来写分析笔记(一般称之为备忘录)时,我们穿越研究过程的旅程要在这里停下来进行一下分析。备忘录能够对我们旅程主要的分析阶段进行制图、记录以及细致化。我们从写代码和数据开始,上升到理论类属,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要坚持写备忘录。写备忘录会加速你的工作,提高你的创作力。我提出了一些如何着手写备忘录的观点,并补充了两个作家的策略,这可以让备忘录撰写变得更为简单易行。然后,我提出了一些用备忘录把聚焦编码提升为概念类属的方法。



撰写备忘录是数据搜集和论文草稿写作之间的关键中间步骤。在写备忘录的时候,你要停下来,用你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任何——以及每一个方法分析关于代码的想法(也参见 Glaser,1998)。备忘录撰写构成了扎根理论的一个关键方法,因为它鼓励你从分析研究过程早期就开始分析数据和代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撰写备忘录能够使你开始进行分析,有助于提高你的很多想法的抽象水平。在你不断撰写备忘录的时候,一些代码会凸现出来,以理论类属的形式出现。

撰写备忘录是数据搜集和论文草稿写作之间的关键中间步骤……备忘录撰写构成了扎根理论的一个关键方法,因为它鼓励你从分析研究过程早期就开始分析数据和代码。

备忘录能把握你的思想,保留你所做的比较和联系,使你所追求的问题和发现清晰化。通过写备忘录,你可以与你自己进行交谈,新的想法和洞见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把事物记在纸上会使工作具体和便于管理,使事物更加令人兴奋。一旦写了备忘录,你就可以马上使用它,或者保存起来以备以后进行修改。简单来说,备忘录写作提供了一个空间,使你能够积极地思考你的资料,发展你的想法,并调整你以后的数据搜集。

通过写作备忘录,你建构了分析笔记,可以用来说明和填充类属。你可以通过形成聚焦代码来开始备忘录写作。备忘录给你一个空间,让你能够进行数据与数据、数据与代码、数据的代码与其他代码、代码与类属以及类属和概念之间进行比较,并说明与这些比较有关的猜想。你可以用备忘录来帮助你思考数据,发现关于这些数据的想法。

73-74

下面的备忘录探究了苦难与道德地位之间的关系。我会经常提到戈夫曼(Goffman, 1963)对耻辱(stigma)的有力分析。他的概念涵盖了有关慢性病和残疾的社会科学文献和护理文献。我的研究对象谈论了他们觉得受到侮辱的情境,但某种程度上耻辱概念并不能代表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他们脸上和声音中的痛苦和难过在他们的故事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很少有人提到与他们有关的“受难(suffering)”;但他们的故事却充满了受难。研究

对象也不会使用“道德地位(moral status)”这样的术语,尽管它体现了他们经验的意义。

我早期的访谈包含了诸如“被侮辱(being stigmatized)”“自我的失去”“失去自信”“感觉到被贬值”等代码,尽管我没有把它们放在有关不正义、合法性和苦难的分析中。直到后来某些事件直接和这些关注点发生关联才引起我的注意。我早些时候曾经区分了耻辱、自我的失去以及受难之间的关系(Charmaz, 1983),并发现,大部分的受难来自其他人对待那些得了慢性病的人的方式,但是我只关注了自我的失去,而没有形成清晰的关于受难的分析。我也没有注意有关道德地位的观点,尽管后来对数据的精读揭示了大量关于它的表征。保存下来的早期大量访谈记录和录音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就失去了基本的线索和有着细微差别的陈述。通过把“受难作为一种道德地位”作为一个类属,我把一个代码提升到了概念水平来分析对待。我认为它是与众不同的,由某些属性组成的,我在数据中发现了这些属性,并通过仔细审查和编辑初始代码对其进行了综合。这样,我建构了这个类属,形成了与我的数据非常接近的抽象分析。

表4.1的备忘录简要谈到了一些想法,并引起不同想法之间的比较。我努力快速把我脑海中出现的任何关于类属、代码和数据的东西记录下来。我编码时正乘飞机穿越大陆,关于类属的一些想法在我脑海中出现了,我于是把它们记了下来。在我草草记录的时候,受难和道德地位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我对自己说,当然,这是我一直在努力获得的;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到呢?我草草地做了一个备忘录,在我回到家之后把它打印了出来。我拷贝了原来用大写字母和加倍行距所书写的备忘录,用黑体字取代了我的黄色标签(我从一开始就用一些直观的形式强调这些观点)。这样,有了这些提示和标志性线索,我以后就可以继续去追踪了。另外,我又补充了一些内容,使备忘录变得更加清晰。

表 4.1　一个备忘录的例子——受难

作为道德地位的受难

受难不仅是一种身体经验，也是一种复杂的道德体验。受难的故事反映并重新定义了道德地位。

当受难被认为合法时，道德权利和权益以及道德定义就随着受难一起到来了。这样，这个人就能够提出某种道德宣称，并把某种道德判断放在自己身上。

值得

依赖

需要

受难能够提升一个人的道德地位。这里，受难具有神圣的地位。这是一个处在神圣地位的人，曾经看到、知道普通人所没有看到、知道的东西的人。他们的故事被人们带着敬畏和好奇致意。自我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个人是特别的；这个引人注目的故事为故事讲述者投上了引人注目的光环。

贝茜和她的女儿。贝茜坐在餐桌旁的轮椅里，给我讲了她怎样突如其来地得了这种要命的疾病。在她开始讲起那次危险的手术时，她已中年的女儿西尔玛正在隔壁房间收拾橱柜，此时也停下来加入了我们。贝茜讲了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她濒死的经验。西尔玛全神贯注地充满敬畏地听着。尽管她之前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遍了，这个故事还是传达了一个新的时刻。贝茜说，她通过一条狭长黑暗的隧道，然后看到一道美丽明亮的光。贝茜相信这道光来自上帝的脸。当西尔玛再次听到她母亲的故事时，她充满敬意地注视着自己的母亲。之后，西尔玛强调，这个事情极大地提高了贝茜的精神，改善了她对自己疾病的看法。

受难也为上演英雄神话（他总是能够在抗拒所有厄运时获得胜利）提供了机会。这样，受难的地位再次提升了，当这个人被看作从战场凯旋而归时，就变得引人注目了。这个人通过危险的行为违抗了死亡，而且还可能违抗了医生。英雄的地位常常伴随的是比他的同辈更早地面对疾病和死亡。然后这样的故事就变得引人入胜并让人深信不疑了。它们吸引着听众，宣告着变化了的身份。人和环境都通过英雄式的斗争得到了改变。

虽然受难可能最初传递了一种得到提升的道德地位，但是观点还是会发生变化。来自受难的道德宣称一般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权力中。重要性的圈子在缩小。在这些道德宣称中自我的故事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的谈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些故事会逐渐淡漠——除非某些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个圈子会集中到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那些人。

受难的道德宣称可能只超过那些健康的人和完整的人在危机及其直接后果中所做出的道德宣称。否则，一个人就变得不重要起来。价值越来越小（worth less）。当疾病和衰老要人付出代价时，他们就可能从价值变小开始，最后以“无用（worthless）”结束。

续表

受难的道德地位带来了得体与尊严的标准。一个人不得不去符合这些标准,或者忍受最后的结果。然而,标准通常是想当然的,是相对于群体以及之前的经验而言的。使用一个群体的标准会疏远其他的标准。 克里斯蒂娜开始沉默,最后爆发了。沉默在有些背景中并不起作用;而在另外一些背景中却是唯一的策略。爆发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但也导致了疏离。 病人也可能把那些或共享或没共享的标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的道德地位可能私下里出现在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那里,也可能作为一种地位下降出现在公共场合。一个球场管理员作为保养组的一员已经和同样一批人工作很多年了。他们共享了团队精神。但是现在他的工作搭档在那些需要两三个人干的工作上拒绝帮助他。一个人手不足的系里,一名教授身体状况突然变糟了,于是不得不让他的同事接管了他的班级。尽管他们说他们愿意这么做,他还是感觉到他们很有压力,觉得他让他们失望了。同时,他的同事去敲系主任的门,说,"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离开这儿?" 克里斯蒂娜提出的道德宣称,不仅仅适合那些受难的人,也适合人的一般状态。她有权利要求别人听她说话,有权利在医疗和工作场所获得公正公平的对待。(备忘录 1-04-98)

75 在备忘录中,我第一次提出了"作为一种道德地位的受难",将其作为我要分析的类属。我认为我们应该超越身体的痛苦和折磨来考虑,看到道德生活和道德价值。因此,我形成了一个操作定义,受难让一个人的道德地位变得不再一成不变(problematic)。研究对象详细地讲述了身体残疾的道德故事及其屈辱的结果。他们讲故事的声调和身体语言表达了这种受难和意义,有时还超越了他们的语言。研究对象的故事也包括了不言而喻的对道德权利和合法道德地位的要求。

"作为道德地位的受难"这一类属包括了哪些代码?这些代码是怎样在这个类属下组合起来的?我看到,该类属包括了大量的初始代码,这些代码意味着贬值,以及研究对象面对身份贬低、不被信任或被歧视时的反应。我开始把权利、要求和不公平的概念与受难和道德地位联系起来。写备忘录有助于我搞清楚道德地位是如何在受难中变化的。它促使我进一步看到道德地位上升以及下降的条件。我开始排列出一个受难的等级,发现内在的规则怎样影响某些人在道德等级中的地位。备忘录鼓励我在数据和生成的分析之间来回移动,把该类属和其他类属联系起来。

备忘录会包括观念和一些故事，但是它的目的需要充实。我曾经对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处境进行过多年的比较。回忆一下克里斯蒂娜·丹福斯的故事。在表 3.2 中逐行编码产生了几个潜在的类属，"作为道德地位的受难"、"提出道德宣称"，以及"道德地位贬值"（Charmaz, 1999, 2001）。在过去的几年里，克里斯蒂娜一直在不停地讲，她怎样努力保持独立，怎样控制病情并得以生存下来。有几个主要事件激起了克里斯蒂娜的受辱感，并对她的道德权利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关注。这些事件不仅引起了她的不公平感，也破坏了她的自我感觉。

我开始用备忘录来定义受难和道德地位之间的关系。因此，首先我要求扩展受难的定义，让它包括社会反应，而且我保持了这个定义与自我的关系。和我交谈过的很多人发现，其他人——包括专业人员和家庭成员否定或怀疑他们症状的现状和程度。这些研究对象表示，他们曾经希望别人把他们作为受到合法关注的人来对待。正如第 3 章中推迟说出病情的邦妮·普雷斯利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一个人是否以及何时说出病情会影响到其他人看待和对待他们的方式。受难可能会进一步扭曲。获得二手信息会伤害被爱的人，让他们不舒服。这样，合法、说出病情、得体以及受难会交织在一起。 76

"作为道德地位的受难"类属应该属于哪种类型的理论分析？备忘录表明了什么类型的概念联系？当然要说到结构、过程和经验。地位的意思是结构。在这个案例中，它的意思是社会价值的等级分层。结构在备忘录中仍然是不清晰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存在的，而且有所暗示。要注意，高道德地位是怎样和低道德地位进行比较的。我指出了高道德地位的脆弱性，并指出它是怎么衰弱下来的。这个过程包括关于自我和身份的复杂意义。它激发了人们的情绪，影响了他们的身份，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处境，并且改变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作为道德地位的受难"这个类属不仅整合相同的经验，也整合完全不同的经验，指出了时间顺序和转折点，产生了特定的行为，适合一定的条件并出现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并产生了结果。

备忘录暗示敏感性概念是怎样在长期沉默之后在编码和分析中开始发挥作用的。对塔尔科特·帕森斯（Parsons, 1953）、欧文·戈夫曼（Goffman, 1959, 1961, 1963, 1967）以及启发了戈夫

曼灵感的埃米尔·涂尔干(Durkheim, 1893/1964, 1912/1965, 1925/1961)的微弱的回应通过备忘录得到了反映。帕森斯关于病人角色的概念始终只在我的研究背景中发挥作用,不过对道德立场的概念有所影响,道德期待和法令就是从道德立场产生出来。毫无疑问,戈夫曼通过他的作品所表现的对道德生活和道德意义的解释启发和推动了我对道德等级、其中的道德地位以及受难之间关系的思考。我在写备忘录前并没准备回顾任何理论家,在写备忘录时也没有想到他们。戈夫曼和涂尔干都在积极探究道德法则、道德权利和道德责任。戈夫曼广泛地处理了人们怎样把自我呈现给他人,怎样管理其他人对他们的印象,以及怎样在互动中表现自己。对于戈夫曼来说,环境有自己的道德法则,人们的目的是建立起在道德环境中的道德存在。涂尔干对法则的道德力量的分析,对神圣和亵渎意义的分析,说明了社会纽带和共享价值的隐含力量。

补充了一些内容之后,这个备忘录成为了主题演讲分析的核心,在会议之后就发表了。几个月之后我才返回资料修改这个演讲。像很多作者一样,我对类属的完整性也判断错误。它的粗糙打击了我。它需要填充很多东西。我进一步澄清了文章的一些类属,后来又返回现场获取更多的想法。要注意,下面已发表的版本对备忘录重新进行了完善和加工,但采用了我原来的大部分语言。因为我选择这个备忘录作为演讲稿,所以我希望听众能够听到我的观点和我所讲故事之间的联系。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想象到道德地位失去之后的受难。到我写了这个备忘录五周之后,再次呈现这些资料时,我已经拿出了一个清晰的道德等级了。这个表描述了作为结构的道德等级,并展示了沿着这个等级进行的移动。当道德地位下降时,无用感会通过不断让人衰弱的慢性病压垮很多人。



表 4.2 已发表的版本:关于受难的备忘录

77

作为道德地位的受难

道德地位的等级

受难不仅是一种身体经验,也是一种复杂的道德体验。一种道德地位传递的是人的相对价值,并衡量一个人应得的价值和无价值。受难的故事反映、重新定义或拒绝着这样的道德地位。这些故事形成了关于正确与错误、美德与道德缺陷、理性和合理化的道德寓言。克兰曼、布罗德文、古德和古德(Kleinman, Brodwin, Good, and Good, 1991)认为,目前对受难的专业描述采取的是理性化、常规化的形式,而没有表达道德和宗教的意义。受难的道德意义可能既不是直接明显的,也没有得到表达;然而,它们仍然形成了思想和行动。

道德权利和义务以及道德定义也随着受难而产生了——如果受难被认为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病人就能够做出某种道德宣称,并给他或她一定的道德判断,比如:

- 值得
- 依赖
- 需要

受难能够奖给个人一种提升了的、甚至是神圣的道德地位。他们所在的位置是神圣的,曾经看到和知道普通凡人所未看到和知道的东西。他或她的故事被敬畏和好奇地进行推崇。自我的地位也获得了提升。这个人是特别的;这个引人注目的故事给故事讲述者投上了令人注目的光环。

贝茜·哈里斯的经验转变了她的道德地位和她对自己受难的看法。原来她曾经由于肺气肿和心脏病陷入完全的瘫痪之中。当我拜访贝茜时,发现她坐在餐桌旁的电动轮椅里。她告诉我她是怎样突如其来地得了这种要命的疾病的。在她开始讲自己危险的手术故事的时候,她已中年的女儿西尔玛正在隔壁房间收拾橱柜,此时她也停下来加入了我们。贝茜讲了当她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她濒死的经验。西尔玛全神贯注地充满敬畏地听着。尽管她之前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很多遍了,它还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时刻。贝茜说,她通过一条狭长黑暗的隧道,然后看到一道美丽明亮的光。贝茜相信这道光来自上帝的脸。当西尔玛再次听到她母亲的故事时,她仍然充满敬意地注视着她的母亲。之后,西尔玛强调说,这个事情提高了贝茜的精神,改进了她对自己疾病的看法。

受难也为上演英雄的神话(他总是能够在抗拒所有厄运时获得胜利)提供了机会。这样,受难的地位再次提升了,当这个人被认为是从战场凯旋而归时,就变得引人注目了。这个人通过采取可能有风险的行为违抗了死亡,而且还可能违抗了医生。英雄的地位常常伴随的是比他的同辈更早地面对疾病和死亡。然后这样的故事就变成了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故事。它们吸引着听众,宣告着变化了的身份。英雄式的斗争既改变了人,也改变了他或她的处境。一个50岁的女人由于某种很少在她同龄人中出现的疾病要接受一次很复杂的外科手术。她说,“你进入了战斗,离开时伤痕累累。”她的同伴充满敬意地惊叹道,“呀,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

78

一种提升了的道德地位发生了变化。时间、辛劳以及麻烦都腐蚀着较高的道德地位。然后,来自受难的道德宣称就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影响之中。自我在这些道德宣称中的故事可能会吸引人一段时间,但是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续表

逐渐淡漠——除非某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权力。社会圈子会缩小到这个人的最重要的人那里。爱、权力、金钱或特殊知识维持着道德地位。关键因素的丧失降低了一个人的道德地位。

这里有一个关于受难道德地位的内在等级(见图1)

高道德地位——合法化的道德宣称
突发的身体疾病
非自愿的疾病发作
外界条件导致,本人无过失
维持性的道德地位——被接受的道德宣称
慢性病
经过协商的要求
现在或过去的权力及互惠
低道德地位——有问题的道德宣称
个人价值
价值减小
价值减小
价值减小
没有价值

图1 受难的道德地位等级

危机及其直接后果能够让受难的道德宣称(moral claims)超过健康的人以及完整的人的道德宣称。否则,一个人就变得不重要起来(less)——价值减小(worth less)。价值越来越小(worth less)。当疾病和年老要人付出代价时,价值减小,而且越来越小就会一直伴随他们,最后以*无用*(worthless)结束。

受难的道德地位带来了反映等级位置的得体和尊严的标准。一个人不得不去满足这些标准或者承受这些结果。然而,这些标准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是相对于具体的群体而言的,并且是先入为主的。使用一个群体的标准会疏远另一个群体的标准。克里斯蒂娜·丹佛斯从沉默到爆发。沉默在某些场合并不奏效;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却是唯一的策略。爆发要求获得关注,但是也会导致疏远。

79

所有的病人都会认为某些共享或未被共享的标准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的道德地位可能私下里出现在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那里。它也可能发生在公共场合或工作中。一个人可能会逐渐觉得在微妙地被贬低,或感受到明显地被降级。一个球场管理员作为保养组的一员已经和同样的一批人工作很多年了。他们共享了团队精神。但是现在他的工作搭档在那些需要两三个人干的工作上拒绝帮助他。一个人手不足的系里,一名教授身体状况突然变糟了,于是不得不让他的同事接管了他的班级。尽管他们说他们愿意这么做,他还是感觉到,他们觉得很有压力,觉得他让他们失望了。同时,他的同事去敲系主任的门,说,“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离开这儿?”受难的道德宣称很少能长期保持一个人的公共地位。

续表

道德宣称和道德地位会相互竞争。克里斯蒂娜·丹佛斯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问题——生活的安排、家庭、医疗、收入水平、工作关系。在请了病假之后，她返回了工作。她说，我在 3 月 1 日回去工作，尽管别人并不这么期望。然后当我到了那儿，他们开了一个很长的会，然后告诉我，我这些天不能再休息了。我唯一休息的时间就是午餐时间，那是我的时间；我们是封闭起来的。而我的主管说，我不能再那么做了，我说，"这是我的时间。你不能不让我躺下。"她说，"可是，你躺在那儿的沙发上，干扰了其他的员工。"因此我走去问其他员工，他们都说，"我们没有那么说过；从来没那么提过。"于是我回去说，"我刚刚和其他员工谈过，好像没人对此有意见，除了你。"我说，"而在午餐时间你甚至都不在这里。"她仍然坚持让我不要再那么做。几个月之后，另外一个员工开始在午餐时间躺下睡觉，于是我说，"这不公平，她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却可以躺着睡觉。"因此，我也开始这么做。 克里斯蒂娜做出了道德宣称，不仅适合那些受难的人，也适合一般人。她要求她的权利被听到，获得公正公平的对待，不仅在治疗中，也包括在工作场合。 是不是很荒谬呢？克里斯蒂娜所工作的是一个非赢利机构，这个机构正是在为身体有问题的人提供咨询服务。（Charmaz，1999，pp. 367-370）

初始备忘录会比最后的出版物更长久。观念的进一步分析和发展会产生更多的作品。一个备忘录能够激发很多观点，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包含备忘录的期刊论文后来发展成为了著作。自从研究发表以来，我完善了关于受难的一些观点，反映了病人对差异的定义怎样加速了他们在等级中的下降。当我比较数据中的事件时，我更加了解了关于阶级和年龄差异怎样在互动中表现出来，以及怎样出现在等级之中（见 Charmaz，2005）。

撰写备忘录的方法

80

备忘录写作要自然成文，而不要机械堆积。在知道扎根理论之前，你很可能认为备忘录就是正式的业务交流，官方用它来表述政策、程序和提案，常常是不透明的、科层式的。实际上正好相反，扎根理论家写备忘录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正如你在前面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用非正式的语言写备忘录，是为了自己使用。我写上面的备忘录是为了抓住那些关于代码的稍纵即逝的想法，探究数据，而不是为了和你分享。

写备忘录并不神秘；只要去做那些对你有用的事情就行了。

备忘录可以是自由的和流动的;也可以是短小的和蹩脚的——特别是当你进入新的分析领地时。重要的是把东西记在纸上,存储在你的计算机文件中。要记备忘录,不管你怎么写,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来推动你的思考。[①]

表 4.3 如何撰写备忘录

前提条件:研究你的生成数据!

确定你谈论的是什么,并给你的备忘录选择一个尽可能具体的标题。你可能认为你选择的这些词并不能把握这些意义,那么就标示出来,再想想,以后再完善。那么现在就开始写吧。

早期的备忘录

记录下你在数据中所看到的情况。使用早期的备忘录来探究和填充你的质性代码。用它们来引导和聚焦进一步的数据搜集。下面一些基本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 *在研究现场或在访谈记录中发生了什么?* 你能把它变成一个准确的类属吗?例子:"避免说出病情","活一天是一天","向疾病屈服"。
- 人们在做什么?
- 这个人在说什么?
- 从研究对象的行为和言语看,他们认为哪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 结构和环境是怎样支持、保持、阻止或改变他们的行动和言论的?
- 你进行了怎样的关联?你需要对哪些内容进行检验?

81

扎根理论研究让你寻找过程。下面的问题有助于你对过程进行聚焦:

- 这里有争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 这个过程在什么条件下会进一步发展?
- 在参与这个过程时,研究对象是怎样思考、感受和行动的?
- 这个过程是在何时、为什么以及怎样变化的?
-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什么?

图表式的结构备忘录可以观察和预测你数据中的关系,以及生成的类属之间的关系。

高级备忘录

- 用你的问题(topic)对数据进行跟踪和分类。
- 描述你的类属是怎样出现和变化的。
- 发现哪些信念和假设支持你的类属。
- 说一说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这个问题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各是什么样的。
- 对它进行讨论。
- 进行比较:

---

①进行初步的快速评论以及和合著者交流的备忘录,见 Anselm Strauss (1987, pp. 111-112) 备忘录。

续表

。比较不同的人(比如他们的信仰、处境、行动、言论或经验)。
。比较来自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点的数据。
。比较数据中的类属和其他的类属——例子:"'接受'生病的事实"和"向疾病妥协"怎样进行比较? 哪个类属应该成为主要的部分? 哪个应该放在次要的位置?
。比较次级类属和一般类属哪个更合适——例子:"'接受'生病的事实"会怎么发展? 什么时候它会成为一个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它适合生病的过程?
。比较一个一般类属中的次级类属——例子:"确认身份的时刻"和"重要事件"之间有什么区别?
。比较概念或概念性类属——例子:说明"过去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之间的差异,比较对"侵入性疾病(intrusive illness)"的体验和"抱病在身(immersion in illness,陷入疾病中)"。
。拿你的分析和已有文献或研究领域的主导观念进行比较。
。完善你的分析结果。

Adapted from Kathy Charmaz(1995). 'Grounded Theory,' pp. 27-49 in Jonathan A. Smith, Rom Harre, & Luk Van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London: Sage

备忘录写作会迫使你停下其他的活动,专注于一个类属,让你对这个类属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进行探求,并把你产生的所有想法都记下来。那就是为什么备忘录写作会为你进行探索和分析创造了时间和空间的原因。你会花时间对所看、所听、所想以及所编码的内容形成你自己的想法。 82

在定义了类属之后,备忘录写作会形成下一个逻辑步骤;不过,从研究的一开始你就要写备忘录。备忘录会让你在分析过程的早期就通过写作充分发展你的想法。备忘录会有助于引导和澄清你后来的编码。写作备忘录会推动你完善代码或类属所涵盖的过程、假设和行动。它们鼓励你把生成的类属区分出来,把它们分成若干部分。如果你还没有对它们进行定义的话,备忘录也有助于你识别哪些代码可以作为分析的类属,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写更多的备忘录来进一步发展这些类属。

一个有用的备忘录不能用单一的机械程序来定义,对你所拥有的资料应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处理。备忘录可以有各种形式,不过你可以在一个备忘录中进行下面的内容:

- 用分析性的属性来定义每个代码或类属。

- 详细说明包含在代码或类属中的过程。
- 比较数据和数据、数据和代码、代码和代码、代码和类属、类属和类属。
- 把原始数据放到备忘录中。
- 提供充足的经验证据来支持你对类属的定义以及对类属的分析论述。
- 在被研究的环境中检验假设。
- 发现分析中的漏洞。
- 通过提出相关问题来考察代码或类属。

扎根理论家要寻找模型,即使关注的只是一个单一的案例(见 Strauss & Glaser, 1970)。因为我们重视模式的识别,所以扎根理论家的特点就是要用研究对象的故事来说明观点,而不是对他们的生活提供完全的描述,或者提供对经验的全面叙述。[①] 当你把原始数据放到你的备忘录中时,从一开始就保存了对你的分析观点有用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你要提供大量的逐字资料作为抽象分析的基础,并为做出关于分析的论断提供基础。不同来源的逐字资料使你能够在备忘录中做出准确的比较,这些比较会使你能够对经验世界的模式进行定义。这样,备忘录写作就使你的研究超越了个体的案例。

> 从你的代码和数据那里形成定义,会促使你透过表面深入本质…… 你对类属的定义要从解释它的属性和特征开始。

你可以从对备忘录进行命名开始。这很容易,因为你的代码让你有了进行分析的题目;这样,你就有了方向和焦点。对你要处理的类属进行定义。注意我是怎样定义受难为什么会成为以及怎样成为一种道德地位的。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你的定义。从你的代码和数据那里形成定义会使你透过表面深入本质。尽管你可能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有效的定义来把握现象,但对资料的审查会使定义不再停留在描述水

83

①在这个意义上,比起其他质性方法来,扎根理论家所涉及的研究现场的奇闻逸事更少,描述也更少。我们常常为了分析而把行动、事件和研究对象的故事分割成若干部分。格拉泽(Glaser, 1998)认为,要发展理论,进行切割很有必要。叙事分析者、现象学家和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故事进行分割,因为他们相信故事需要以完整的形式进行保存(尽管常常是以浓缩的形式),而且故事所采用的内容和形式也会为故事的意义提供重要的见解。

平，而能够进入到分析之中。这样，你对类属的定义就从说明类属的属性或特征开始了。

接下来考虑一下，类属和类属所包含的数据会把你带到哪里。不论它们会走到哪里，你都要追随这些线索。我要寻找潜在的而且通常是未曾言明的嵌入在类属中的假设。此外，我试图展示类属是怎样以及何时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在研究环境中为什么会具有相关性以及对谁具有相关性。我发现人们在遭遇疾病或面对持续的不确定时，会活一天是一天（living one day at a time）。最后，我开始问，活一天是一天对于他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我开始从他们的回答以及自传中的描述来定义类属和它的属性。"活一天是一天"一词浓缩了一系列内在的意义和假设。它成为控制难以驾驭的情感、对现在无法控制的生活进行控制、面对不确定性以及控制可见的未来的一种策略。

备忘录写作能够激励你去挖掘内在的、未曾言明的以及浓缩的意义。要寻找那些包含浓缩意义的代码。这些代码会有利于你进行分析，并使你更好地处理其中的概念。看一看我是怎样在下面表 4.4 中这段比较长的备忘录中获得这些意义的。

表 4.4　备忘录写作的例子

活一天是一天

活一天是一天意味着一天一天地面对疾病，当病人面对病情时，未来计划甚至是日常行为都会暂停。在活一天是一天的情况下，这个人觉得自己的未来仍然是不确定的，不能预见到未来是什么或者说是否有未来。活一天是一天让一个人集中于病情、治疗以及调养，而不会由于恐惧或未来的可怕暗示而变得无所适从。通过关注当下，病人能够避免或者少去考虑死亡以及死亡的可能。

与时间观念的关系

觉得有必要活一天是一天，常常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时间观念。活一天是一天把一个人放在当下，忘记过去所设想的未来（得病前或在这次疾病发作前病人所设想的未来），这样他们就会在不痛惜［他们的损失］的情况下进行让步。这些过去所设想的未来就可能在几乎不知不觉中消失。［然后我比较了三个研究对象的处境、陈述和时间观念。］

84

只要有了一些想法和类属,你就可以开始写备忘录了。如果对写什么存在困惑,就详细说明一下你最常用到的代码。继续搜集数据,进行编码,并继续通过写更多的、更深入的备忘录来完善你的想法。使用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些研究者在数据搜集的早期就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于是就缩短了他们的研究进程。他们的研究缺乏对环境或经验"深入的熟悉(intimate familiarity)",洛夫兰德和洛夫兰德(Lofland and Lofland, 1995)认为好的质性研究要满足这些标准。巴尼·格拉泽(Glaser, 2001)非常赞同马丁·扬科夫斯基(Jankowski, 1991)关于群体成员中"目中无人的个人主义(defiant individualism)"的概念,因为扬科夫斯基比较了几百个这样的事件。[①] 要通过研究充足的案例,通过详细考察类属来深入谈论你的问题。

备忘录选择让你自由地探究关于你类属的想法。把备忘录作为部分的、初步的和临时性的。它们是可以随时修改的。只是要注意你在哪里有牢固的基础,在哪里只是猜测。然后回到现场去检验你的假设。

备忘录写作让你自由地探究你对于类属的想法。备忘录应该是部分的、初步的和临时性的,因为它们可以随时修改。只是要注意,你的坚实基础在哪里,你的假设在哪里。然后回到现场去检验你的假设。

备忘录可以是私人性的,用不着和人分享。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尽可能快速清晰地记下你的想法。不用担心动词时态、前置短语的过分使用或者句子过长。你写备忘录是为了提供数据,

①格拉泽(Glaser,2001)在本书中表明了他对于比较不同事件的立场,但是认为,小样本并不意味着有限的事件,因为人们可以非常详尽地谈论而且可以被多次访问。他的逻辑在实际活动中是否奏效或者多大程度奏效是一个经验问题。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过程中,典型事件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而且典型事件可能并不会涉及所有研究对象,因此要限制用来比较的资料来源。有很多(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扎根理论研究依赖的仅仅是一次访谈(也可见 Creswell, 1998)。这样,研究者可能不会发现研究对象其他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可能会提供其他可以用来比较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也失去了提出更多问题、了解最初感兴趣的事件的机会。小样本的扎根理论研究很少和多案例研究的观点相一致,比如爱德华·斯皮德林(Speedling, 1982)的研究,他对8个心脏病患者及其家庭,在其由于心脏病而住院治疗期间的情况进行了研究。斯皮德林是一个特殊的观察者,在为他的研究选择对象之前,他在医院呆了几个月。在选择了这些研究对象之后,他从他们进入病情监护到他们康复一直到回家庭重新生活,他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了多次拜访和访谈。

而不是和读者交流。写备忘录是为了发现和探究观点。你可以以后再修改这个备忘录。

文不加点的快速写作有助于产生和保留最自然的声音。这样你的备忘录读起来就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思考着、感受着的人所写的,而不是一个学究式的社会学家写的。你可以在不同的抽象水平上写备忘录——从具体到高度理论化。你的一些备忘录会直接成为你分析性初稿的一部分。把主题不同的其他内容放到一旁等以后再做处理。

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不断比较的方法一样,你的大部分备忘录写作也要关注比较的方法。在你连续的备忘录中,你可以比较由每个类属所指称的事件,通过比较它们、说明它们的关系来整合类属,通过比较类属和概念来限定生成理论的范围和界线,并写出这个理论,而关于这个理论,你可能在同样的研究领域已经把它和其他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因此,一开始时你就要认真处理这些代码,你要在这些代码中比较这个研究对象和其他研究对象的信念立场和行动,或者比较这个经验和那个经验。如果你有纵向的数据,你要比较研究对象在某一时间点上与其他时间点上的反应、经验或处境。然后当你的分析能力变得更加有力,并有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类属时,拿这些类属和新的数据进行比较。这一步骤有助于你限定自己的类属,定义它们的属性。

你可以通过写更深入的备忘录使类属之间的对比更为具体,从而进一步深化这些类属。这些备忘录有助于你进行比较,从而使你对资料的处理更加有力。这些备忘录也有助于你确定类属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写作备忘录,你区分了哪些是重要的类属,哪些是次要的类属,并说明它们是怎样建立联系的。这样,你就开始把它们形成理论陈述了。备忘录就引导你形成了分析的内容和形式。　85

在使你的备忘录更具分析性、更为抽象的过程中,把你的数据恰如其分地放到你的分析中。在每个备忘录中,你都要展示你是怎样把分析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的。最后,把你的数据放到连续的备忘录中会为你节省很多时间,因为这样你就没必要翻箱倒柜查找那些能够说明你的观点的数据了。在上面提到的备忘录中,注意我开始是怎样定义类属"活一天是一天",然后勾勒出它的重要属性的。然后我进一步丰富了"活一天是一天"很多方面

的内容,比如它和时间观念的关系(我在摘录中对此有所体现),以及它和管理情绪的关系。备忘录也涉及人们是*怎样*"活一天是一天"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如何提出的,以及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

备忘录写作有助于你[①]:

- 停下来想一想你的数据。
- 把质性代码作为分析的类属。
- 形成写作者的声音和写作节奏(让你的备忘录读起来好像是写给一位好友的信;没必要恪守学术陈规)。
- 激发灵感,在研究现场进行检验。
- 避免把你的数据强行放到已有的概念和理论之中。
- 形成新鲜的想法,产生新的概念,发现新的关系。
- 展示类属之间的关系(比如,经验事件和社会结构,大的群体和个人,信仰和行动)。
- 发现数据搜集存在的漏洞。
- 把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报告写作联系起来。
- 形成论文的整体部分和各章节。
- 深入到研究过程和写作过程中。
- 提高你的信心和能力。

学习作家们的策略:构思练习

备忘录会让你的写作获得解放。备忘录写作能够让你摆脱学术写作的责难、传统研究的程序限制以及教师和审查者的控制。但是能完全摆脱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困难有的来自研究者自身,有的来自研究者外部。一些研究者发现,备忘录写作的自由产生了信念和实践之间一种令人不安的跳跃。备忘录写作要求我们*容忍含糊不清*。那些根据最初设定的开始、中间和结尾的框架来写作的研究者可能会直接进入报告写作,忽视写作过

①改写自卡麦兹(1999)关于受难的故事:Subjects' stories and research narrativ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362-382。

程中出现的新发现和新解释（而备忘录写作则能够很好地展现这个发现的过程）。最后，这些研究者要等到胸有成竹才肯下笔写作，于是他们等啊等啊，等这个时刻的来临。而其他研究者则把写作作为一件烦人的苦差事，尽量拖着，不肯动手去写。①

如果你也喜欢拖拖拉拉，或者害怕写作，那么试着在分析实践中进行一些构思练习（prewriting exercises），帮助你容纳含糊状态——并享受写作过程。构思练习是作家们常常使用的一个策略；它和扎根理论方法本身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不过，这些练习有助于你探究扎根理论备忘录的写作。你可以将其作为无关的热身练习，或者作为帮助你开始备忘录写作的工具。 86

教师和研究审查者常常把扎根理论备忘录作为临时的但是可分享的报告，而不是作为一种私人的分析探究。这样，其他的环境因素就可能会压制你写备忘录的努力：也就是，他们会对备忘录的质量进行评价。当他们的目的是为个人分析建立障碍的时候，你怎么能写出既服从于审查又是自发的备忘录呢？你的备忘录很可能会失去自发性和创造力。当一双监视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它可能始终会制约着你的备忘录写作。

从教师和审查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来评价你的备忘录。如果老师把项目分成若干步骤，很多学生是能够把握一个大的很难处理的项目的。这种教学策略适合传统的量化研究设计和大部分质性研究，但不适合备忘录写作。

问题现在扩展到了专业领域。越来越多基于大型资助项目的研究团队选择扎根理论方法。合作的研究项目依赖于共享的任务和观念。主要的调查者期望团队成员能够证明他们的价值。还有什么比备忘录更好地让团队成员展示他们价值的方法吗？如果团队成员并不分享他们所生成的分析，他们怎么进行合作呢？但是这种情境给你产生了其他紧迫的问题。你怎样避免被压制、按时完成任务并保留你分析的自主性呢？

再说一次，可以考虑从进行构思练习开始。它们能使你的备忘录写作变得更容易些。你可以以后再修改你的备忘录，让它更

①不用对自己太苛刻。一些优秀作家也拖拉，然后逐字逐句地慢慢进展。你可能在前意识中吸收了一些资料，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你的想法集中起来。试着跟着这个过程走，发现你的模式，如果需要的话，按照那些能够帮助你前进的步骤和策略进行。

为清晰和条理。在过去的 10 年里,我介绍了两种构思练习,在扎根理论研讨班中进行聚集和自由写作(clustering and freewriting)。① 不管是在进展不顺的研讨班还是在进展顺利的研讨班,参与者都发现,这些方法对于他们产生和反思自己的想法以及组织这些想法都非常有用。彼得·爱尔堡(Elbow, 1981)自由写作的方法和备忘录写作的方法有相似之处,但是又没有把你限制在数据那里。聚集式写作和自由写作都不是线性的,这样就把你从线性逻辑和组织中解放出来了。

聚集式写作

聚集式(clustering)写作是为开始进行写作而采取的一种速记式的构思技巧。正如里科(Rico, 1983)所说的,聚集写作给你一种非线性的、直观的和灵活的技巧来理解和组织你的资料。使用这些技巧可以对你的研究产生一个尝试性的和可以修改的图表或地图。像自由写作一样,聚集写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解放你的想象力。写出你的中心想法、类属或过程;然后围绕它,从中心画辐射线,形成更小的圆圈来展示它的定义属性、它们的关系以及重要程度。

因为聚集式写作提供了关系的图表,所以它和扎根理论中的 87 概念地图或情境地图(Situational mapping)有一些共同之处(见 Clarke, 2003, 2005; Soulliere, Britt & Maines, 2003)。聚集的构型提供了一个如何组合你的问题以及如何和其他现象联系的图景。聚集写作是积极的、快速的和可变的。对于一次聚集式写作来说,你可以是未遂的。尝试几次不同的聚集,把你的拼图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一构思形式能够使你对自己处理观点的方式进行更快的自我更正。对于那些害怕写作的人,聚集式写作会使写作变得不再那么费力,并让那些享受写作过程的人加快写作速度。新手会发现,聚集写作能够让他们更快地对备忘录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安排。

通过聚集写作你会获得一种控制能力,因为你在深入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一幅关于各个片段的图景了。一个明智的聚集会让

①教授常规写作课程的那些人会提到这些技巧。更多的想法和不错的建议见:Eide (1995), Flowers (1993)。

一个新手有信心开始各个部分的写作。聚集会为你的备忘录形成一个初步的框架。之后,你可以使用聚集来展示论文的各个部分是怎样彼此结合的。

你可以用聚集写作来进行不同类型、不同分析水平的写作任务。聚集的一般方法包括下面一些方向。你可以在第一次探索你的代码时遵循其中的一些方向。

- 要从中心问题或中心观点开始。
- 快速工作。
- 从中心转移到更小的次级中心。
- 把所有相关的资料放在同一个次级中心。
- 在每个观点、代码和/或类属之间建立清晰的联系。
- 不断扩展范围直到穷尽了你的知识。
- 尝试在同一问题上进行若干不同的聚集。
- 用聚集写作的方法处理你的资料。

一个核心词语比如一个代码,会形成最基本的聚集。试着建构聚集,看它能给你带来什么启示。围绕过程进行聚集会推进你对行动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结构的研究。试着在你生成模式的各部分之间建立联系,然后,你会有一个前进的计划。不管是否遵循这个计划,你都已经形成了进入并处理已有资料的方法。为了实践,试着把与你的研究或写作无关的问题聚集起来。探究你对一个事件、一部电影或一本书的想法。

不要把聚集写作当成太重大的事情,这样可以减轻写作的严肃性。如果它能帮助你处理资料,那就更好了。作家们使用聚集写作来克服写作中的障碍。聚集写作能够让你起步,也能让你继续前进。聚集写作中的自发性和想象力能够让你在写作过程中推动感情、意象和节奏的发展。

聚集写作能够让你对本质进行定义。它允许混乱的存在,能够使你通过聚集产生研究的路线。在你产生关于你的类属、围绕你的类属以及通过你的类属的模式(a pattern about, around, and through your categories)时,你就获得了对资料进行筛选和分类的方法。聚集写作会让潜伏在背景中的东西跳到前景中来。使用聚集写作能够使事物更为清晰,并使你的问题得到整理。聚集提供的不仅仅是头脑中的想象,而是清晰的直观图象。因此,你可

88

以评价聚集中各个要点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要点之间的关系。

聚集技巧是快速的、流动的、富有成果的,并且是有趣的。如果它们对你有用,那么就用它们吧。我已经修改了这些技巧,可以作为扎根理论的方法。你可能希望从一个代码开始,然后转向代码之间关系的聚集,然后是代码和类属之间的聚集。无论如何,试试像上面概括的或下面我所改良的这个一般的聚集方法。在聚集 8 ~ 10 分钟之后,你会理解如何开始关于类属的写作。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集中的自由写作或备忘录了。

下面是*聚集写作的指导原则*,表 4.1 是一个例子。

- 围绕一个主要代码画个圈,要大到能够包括它所说明的对象。
- 使这个核心的代码成为这个聚集的中心。
- 把这个圈的内部分开,展示代码的定义属性。
- 从你的代码到它所包含的任何代码,画辐射线,以展示它们的关系。
- 使用关系丛构型来建构一个图像,展示你的主要代码是怎样组合的,以及怎样和其他类属发生联系的。
- 用中心代码圈的大小来反映它们相对的经验强度(relative empirical strength)。
- 用行距来说明代码之间关系的强弱。
- 让你的关系丛成为非线性的关系。
- 工作要快速,并要始终关注过程。
- 尽可能采用一个关系丛。
- 让聚集灵活、可变和开放。
- 继续聚集。对同样的代码试着进行不同的聚集,并进行比较。

自由书写

自由书写(free writing)意味着用笔和纸,或者用手和键盘,先写 8 分钟,然后逐渐延长写作时间。自由书写鼓励你:①把新鲜的资料组织起来,②忘记过去一成不变的习惯,③以自然的声音写作。自由书写解放了你的思想和感情。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热身练习,并有成果产生,即一份自由书写。一次 10 分钟的快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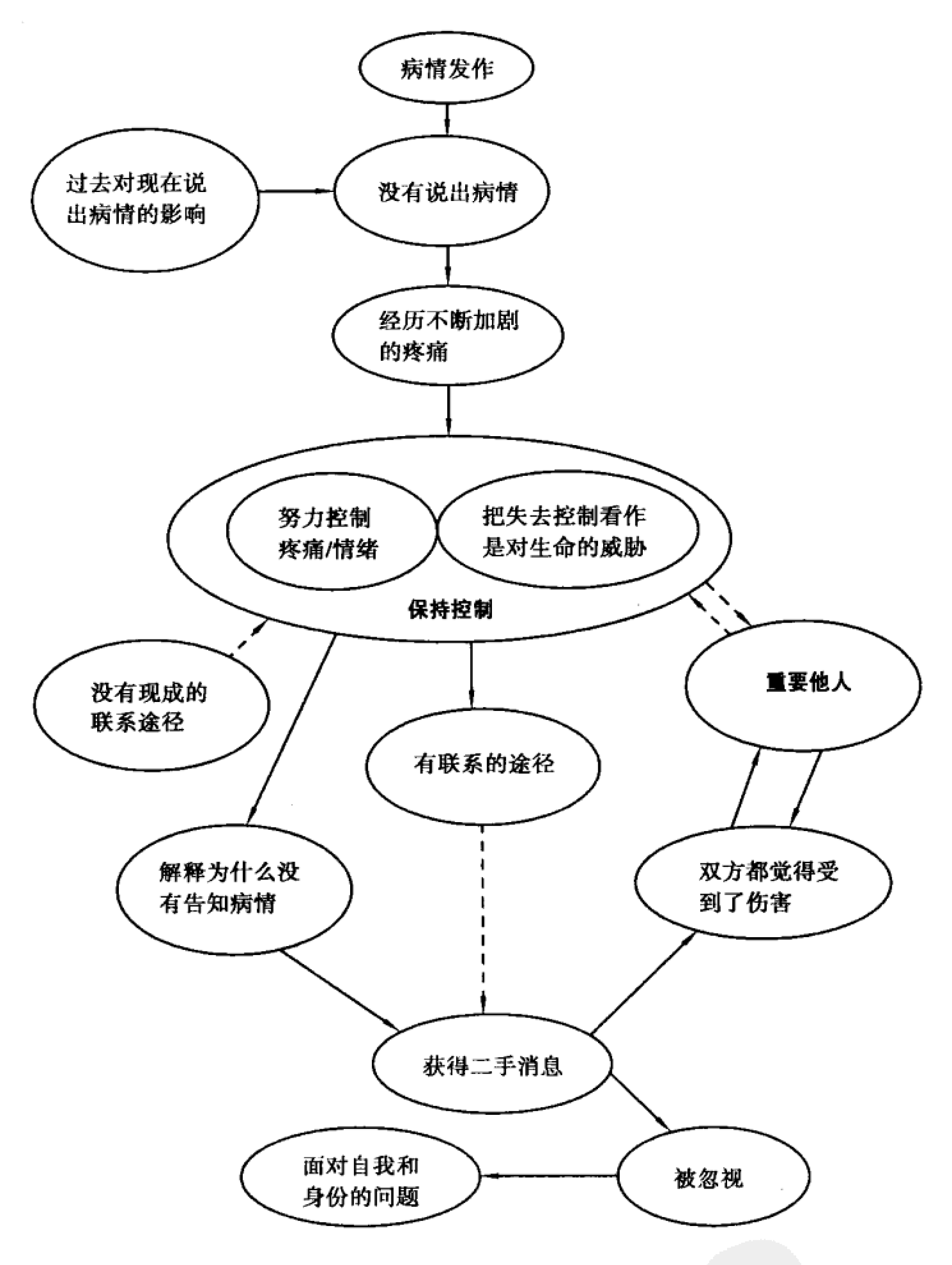


图 4.1 “聚集写作的例子”

由书写可能会让你减少很多盯着空白屏幕发呆的时间。

写作老师常常鼓励学生用自由书写的方法来获得自由的想象——写任何出现在他们意识中的东西。这种类型的自由书写让我们打开了思路,释放了想象力。这样的自由书写让我们能够更为开放地接受世界,更自在地进行写作。它解除了其他人施加给你而你可能已经内化了的顽固限制。自由书写的这一特征能

够让你的写作更为流畅,并使你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和想象。

如何进行自由书写呢?试试下面的方法:

- 尽可能快速充分地在纸上写下你的想法。
- 写给自己,并为自己而写。
- 允许自己自由地书写,即使写得很糟。
- 别管语法、结构、逻辑、证据以及读者。
- 好像说话似的进行书写。

在自由书写时要有一种接受的态度。接受任何出现在你脑海中的东西。不停地写——把能够引向其他事物的东西写在纸上。让过程自然呈现。追随那些转瞬即逝的想法,以及突然迸发的不成熟的念头——现在就开始。你可以以后再评价它们。只关注你现在所知道和理解的东西。

正确的语法并不重要。完美的拼写、合理的结构以及清晰的论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习惯把你的想法放到纸上,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出现。自由书写就像一本秘密日记,自己产生并只和自己享用。

90

一旦习惯了自由书写,你可以试着进行聚焦式自由书写,以此来处理你的数据和类属。试着用上面的方法让你自己保持开放的状态。进行聚焦式自由写作能够使你避免顽固,而且可以作为写备忘录之前使用的一个办法。你要认真研究这些自由书写的东西,因为它们可能包含了一个伟大的备忘录的种子。通过增加一两个写作步骤,你很快就可以为你的研究项目写出流畅的备忘录了。

用任何适合你自己的风格进行工作——用便笺纸和铅笔或者用电脑。我曾经用自己(经过训练的)声控程序开始为一篇评论文章进行聚焦式自由书写。什么手段会更快或更具自发性呢?与其不断犯记录上的错误,不如加快谈话的速度。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错误:

把"善意的方法(well-intentioned methods)"误以为"质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

把"分析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analysis)"误以为"分析的深度(the depth of the analysis)"

把“支离破碎——这个传统(the fragment—this tradition)”误以为“实用主义传统(the pragmatist tradition)”

在表 4.5 中,“一个聚焦式自由书写的例子”,我对来自邦妮·普雷斯利的访谈摘录进行了聚集写作(clustering),用了大概 12 分钟。要注意,我把其他数据也带入了自由书写之中;写作关于代码的备忘录,激发了我把这个对象和其他对象进行比较的动力。可想而知,聚焦式自由书写常常要比自由书写要连贯,一方面是因为我首先完成了聚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发现来自数据的写作要比其他形式的写作要容易。聚集帮助我得出了几个启发性代码和邦妮处境之间的关系。聚集对于我们这些容易被形象所吸引的人特别有帮助。很多作者首先使用自由书写,或者同时使用这两个技巧。体验自由写作和聚集写作,看看它们对你有什么作用。

表 4.5 对代码进行聚焦式自由书写的例子,来自邦妮·普雷斯利的访谈(摘录)

危机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说出病情的事件和两难。但是亲属关系过去的历史以及围绕说出病情产生的问题都反映在当前的危机之中。没有告知病情可能是一种清晰的选择或其他行动或不行动的一个结果。不同的研究对象会对一个人为什么没有说出病情做出不同的猜测,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以及它真正意味着什么。在邦妮的例子中,没有说出病情是因为她的疼痛在不断加剧,而她在努力地管理、处置和控制正在发生的情况。如果说出病情,那么就有失控的危险,即所有过去的冲突、失望以及缺乏情感支持可能再次出现。在鲍勃的案例中,说出病情意味着可能重新激发所有过去关于获得帮助,以及为了寻求帮助而产生的尴尬——以及屈辱。说出病情中的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亲属关系问题以及新的关系义务。鲍勃认为亲属关系的义务就是,除非绝对必要,否则绝不寻求帮助;邦妮把避免与她女儿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作为她自己的亲属关系义务。

那么在某种意义上,鲍勃只有几分获得帮助的可能,只有几分保持联系的机会,它不是一种确定的状态。而邦妮能够保持这种联系,尽管她需要早点知道这一点。艾米只是偶尔拜访或打电话;她不是邦妮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像琳达那样。邦妮的这个事件表明双方的感情伤害是怎样产生的。误解产生在彼此之间。

91

在家人或朋友看来,只能获得二手消息意味着他或她的位置不那么重要。被忽视是很让人痛心的。它得出一种不受欢迎的自我印象和亲属关系。它可能会再次强化家庭等级和家庭不和,正如安的例子那样。身份问题出现了。

使用备忘录把聚焦代码提升为概念类属

从一开始就写关于代码的备忘录有助于你搞清楚研究现场发生了什么。在扎根理论中,备忘录撰写依赖于把代码当作概念类属(conceptual categories)来分析。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p.37)把一个类属定义为“理论中的概念因素”。但是,什么是类属?那意味着什么?你没有必要担心,因为你已经有你的聚焦代码了,正如我上面所说的。

通过进行聚焦编码,你已经开始勾画初步分析的内容和形式了。努力把聚焦代码作为类属会推动这些代码的形成以及对它们的审查。然后你就能够评价这些尝试性的类属了,确定它们是否是类属。如果你把这些代码接受为类属,你就要澄清它们包括了些什么,并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具体化。

首先,评估哪些代码能够最恰当地表征你在数据中所看到的东西。在备忘录中,让它成为你的分析框架的概念类属——在备忘录中对它们进行概念性定义和分析性处理。这样,代码对于你就不仅仅是一种观察和综合数据的描述性工具了。

类属可以做什么?类属能够说明你数据中的观点、事件或过程——而且是用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来说明。一个类属可能把共同的主题和模式包括在几个代码中。比如,我的类属“从容面对疾病(keeping illness contained)”包括了“控制疾病(packaging illness)”,也就是,把它作为“好像它已经被控制了、限制了,限定在具体的范围,比如私人生活”,而且“正在过去”,意味着,“隐藏病情,保持一种常规的自我呈现,像未被疾病侵害的同龄人一样行事”(Charmaz, 1991a,pp.66-68)。

再说一次,尽量把你的类属作为具有抽象力量、普遍作用、分析方向和准确表述的概念。同时,要和你的数据保持一致。要让你的聚焦代码变得活跃、准确(反映人们在做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而且简洁,这样你就有了将其作为潜在类属的资料。在编码过程中,你要询问这些数据指示的是什么类属?现在你要问:这个代码指示的是什么类属?与数据搜集和初始编码保持一定的时间空间距离,有助于你进行另一个概念步骤。保持代码的活

跃，能够让过程变得更为清晰。简洁的聚焦代码会产生敏锐清晰的类属。那样，你就为你的类属建立了标准，以进行进一步的比较。

扎根理论家要寻找实质过程，而实质过程从它们的代码发展而来。上面提到的“从容面对疾病”、“控制疾病”和“活一天是一天”就是三个这样的过程。当扎根理论家创造概念工具，对环境中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的时候，他们也要定义一般过程（generic process）（Prus, 1987）。一般过程缩短了不同经验背景和问题之间的距离，能够被应用到不同的实质领域。第 3 章的两个代码“避免说出病情”和“评估说出病情后潜在的损失和风险”反映了个人信息控制的一般过程。尽管这些过程描述的是病人在宣布病情时所做出的选择，有其他问题的人们也可能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这样的信息控制。在社会学家看来，一般过程对于社会生活是基本的；在心理学家看来，一般过程对于心理存在是基本的；在民族志学者看来，这个过程支持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因为它们是基本的，一般过程能够应用在不同的职业和领域。扎根理论家能够通过在过程明显不同的各领域搜集更多数据来丰富和完善这一一般过程。比如，在揭示某些情况时，个人信息控制和选择对于同性恋者、性虐待受害者、吸毒者、酗酒康复者以及曾经被判刑的人，和得了慢性病的人一样，都是存在问题的。你要关注对一般过程的分析，而这一过程你在代码中已经进行了定义；然后你就能够把相关的代码提升到理论类属上，以解释和这些类属相关的过程和预测了。[①] 在你把一个代码提升为类属的同时，你也可以在备忘录中开始写叙述性的命题了：

- 定义类属。
- 说明类属的属性。
- 具体说明类属产生、保持和变化的条件。
- 描述结果。
- 展示这个类属怎么和其他类属发生联系。

类属可以包括原生代码（本土概念），即你直接从研究对象谈

---

①戴伊（Day, 1999）认为扎根理论中的类属化比原来预想的更加复杂和更加成问题，这是对的。我同意戴伊所说的，类属化不仅涉及分类，也涉及推论。

话中发现的,或者它们代表着你对数据中所发生的事情所进行的理论的或实质的定义。我的术语"好日子和坏日子"以及"活一天是一天"就直接来自研究对象的谈话。相反,我的类属"重新体验过去(recapture the past)"和"处于沦陷中的时间和时间中的沦陷(time in immersion and immersion in time)"则反映了对行为和事件的理论定义。进一步说,诸如"拖入(pulling in)"、"面对依赖(facing dependency)"以及"妥协(making trade-offs)"说明的是研究对象与严重疾病进行斗争的真实现实。我创造了这些代码,并把它们作为类属,但它们反映的是研究对象的关注和行为。新手研究者可能发现,他们依赖更多的是原生代码和实质代码。结果经常是一个扎根的描述,而不是一个理论。但是,研究这些代码怎样组合在类属中,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理论化的方式对待它们。

93

通过写关于聚焦代码的备忘录,通过检验它所涵盖的所有数据,通过发现存在于它之中以及其他类属之中的差异,你会建立和澄清你的类属。你也在你的分析中意识到了其中的漏洞。比如,当我发现我的类属"活一天是一天"并没有涵盖穷困者的绝望程度时,我形成了类属"朝不保夕的生活(existing from day to day)"。简言之,我有了关于为了生存而每天挣扎的数据,而第一个类属"活一天是一天"并没有将其包括进去。表 4.6 是已完成备忘录的第一段:

表 4.6 通过研究早期备忘录发展备忘录的例子——类属"朝不保夕的生活"

当一个人陷入生活一团糟的持续的危机时,朝不保夕的生活就开始了。它反映了对健康失去控制,以及使生活恢复正常的必要努力。
朝不保夕的生活意味着为日常生计进行不断的挣扎。贫穷和失去支持会使挣扎加剧,并更为复杂。因此,比起那些有家人关心的富裕者,贫穷和孤苦伶仃的人通常生活境况会更快地一落千丈。失控扩大到不能维持生活必需——食物、住所、取暖和医疗保障。
为生存而挣扎使人们活在现在,特别是,如果他们在获得中产阶级认为必不可少的必需品始终存在问题时。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其他问题比他们的疾病更加严重——暴虐的丈夫,走失的孩子,酗酒的配偶,到期的债务。
活一天是一天不同于朝不保夕的生活。活一天是一天提供了控制情绪、管理生活、模糊未来和度过艰难时期的策略。它包括管理压力、疾病或身体调养以及每天处理这些事情,尽可能地控制它们。它意味着关注此时此地,放弃其他目标、追求和义务。(Charmaz, 1991a, p. 185)

注意上面两个类属之间的比较。为了通过聚焦编码产生类属,你需要比较数据、事件、背景和类属。试着用表 4.3——《如何写备忘录》中"写高级备忘录"部分所介绍的方法进行比较。

一些例子会有所帮助。卡罗琳·威纳(Wiener, 2000)比较了专业养家者(professional providers)、卫生保健管理者以及工业管理者对质量控制以及对质量控制的责任的定义。我比较了个人对事件的描述以及他们在不同时间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对来自系列访谈的资料进行比较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编辑整理出研究对象所讲述的近期的故事,而不是对久远的事件进行重新编排)。除了比较事件,我也比较了人们如何经历他们疾病的不同阶段。 94-95

当我比较不同人的经验时,我发现,一些人的处境迫使他们停在了当下。然后我看到我关于活一天是一天的描述并不能应用到他们身上。我重新看了早期的访谈,开始在已发表的作品中寻找能够澄清这个比较的对疾病的描述。在上面两个类属的比较中就很明显,聚焦编码能够促使你看到类属之间的关系和模式。

小 结

备忘录会形成扎根理论的核心。写备忘录的时候,你要追随那些不断出现的观点和问题,这会推动你的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现在,把那些你认为已经完成的备忘录放在一边,开始处理那些比较棘手的备忘录。备忘录提供了一个关于你的研究和你的分析过程的记录。要保存每个存档原件,这样你就有了时间背景,能够捡回早期曾经被你抛弃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够用批判的眼光来重新阅读、评价和修改你的备忘录了。你也会像我一样,发现隔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备忘录中的缝隙和漏洞就会呈现出来。再回到这些备忘录时,你会立即明白你的下一步骤是什么,并把你的观点发展到更加抽象的分析水平。

研究我们的备忘录——特别是早期的备忘录,可能比解决分

析性问题更常见,它能让我们发现需要填补的缝隙。我们的观点是尝试性的,备忘录表明,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强化我们的类属。当意识到我们的类属还很薄弱和不完备时,我们会去寻找更多的数据,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数据?这些新的资料怎样解决我们的分析性问题?下一章会给你展示,扎根理论家怎样面对这些问题以及通常怎么解决。下面要回到经验世界。同时,继续写备忘录。

第5章　理论抽样、饱和与分类

Theoretical Sampling ,Saturation ,and Sorting

研究旅程中的转折和弯路会给你留下很多问题,比如要选择什么方向,要进展多快,在达到目的地时,你会获得什么。理论抽样会让你回顾所走过的路程,或者当你已经有了一些尝试性的类属,有了新产生的却还不完整的观点时,能够选取新的路径。通过回到经验世界,通过搜集与你的类属属性有关的更多数据,让研究中的这些数据更具分析性。最后,你就可以对有关理论类属的备忘录进行分类和整合了。你可能会发现,用图表和地图来画这个过程是很有帮助的,它们会说明你有什么,以及你要到哪儿。



> 理论抽样就是寻找更多的相关数据来发展你的生成理论。理论抽样的主要目的是加工和完善构成你的理论的类属。通过抽样来发展类属的属性直到没有新的属性出现,这就是理论抽样。

假设你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也许是尝试性的类属。在对数据进行初步比较时,你选择了一些聚焦代码,并撰写了关于这些代码的备忘录。现在,一些类属似乎很有希望成为有用的抽象工具,可以使你的数据更具分析性。快速浏览这些备忘录,你会发现:这些类属很有意思,但是很单薄。你还没有清晰地定义你的类属以及它们的属性。太多的内容仍然只是假设、仍然未知或存在问题。而你需要的是有力的类属,可以屹立不倒,而不是摇摇欲坠。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扎根理论策略怎样才能提高你在这个研究阶段的分析性思考呢?

答案是搜集更多关于这个*类属*及其属性的数据。这个策略就是*理论抽样*,理论抽样是指寻找和搜集相关的数据,来加工和完善研究中出现的类属。

理论抽样就是通过抽样形成类属的属性,直到没有新的属性再出现。这样,你就用数据使你的类属*饱和*了,最后进行*分类*,并且/或者对它们进行画图,从而整合你所生成的理论。[①] 进行理论抽样能使你避免陷入未聚焦的分析中。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and strauss,1967;Glaser,1978,1998,2001;Strauss,1987)创造了理论抽样、饱和和分类的策略。尽管格拉泽不断努力阐明理论抽样和饱和的局限性,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and corbin,1990,1998)也在对此进行了解释,研究者一般还是会误解扎根理论家对这些策略的使用。

97

本章包括了进行理论抽样、使类属饱和、对类属进行分类使其成为整合性的理论命题的指导方针。我选取了与简·胡德(Jane Hood)进行的谈话[②]、她的作品《成为双职工家庭》(*Being a*

---

①施特劳斯(Strauss, 1987;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非常强调把绘图作为排列概念关系的一种方式。从那时起,这一方法在阿黛尔·克拉克(Clarke, 2003, 2005)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好的发展。我在研究生阶段写了一篇论文《概念图示》('*Conceptual Mapping*', 1969),探讨了通过展示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清晰地呈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整合理论分析。

②2004年11月12日和简·胡德的谈话。

Two-Job Family, 1983)以及其他出版资料来解释理论抽样。胡德是少有的扎根理论分析和方法论都非常清晰的作者。因为质性研究者通常都使用"饱和"这个术语,所以我在扎根理论中限定了它的意义,表明它和标准理解的差异,指出一些扎根理论家自己使用有误的地方。本章最后介绍如何进行理论分类。

在下面的访谈摘录中,简・胡德叙述了她是怎样在研究中使用扎根理论策略的。她在研究中认为,没有双职业家庭(dual-career families)。准确地说,他们是工作着的、较低层中产阶级父母,两个人都有全职的工作,或者一个是职业一个是工作(one-career-one-job)的家庭。在胡德研究她的初始数据时,她的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开始时,她计划研究已婚妇女在有了孩子后重返工作时的自我概念和朋友网络。然而,胡德在田野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家庭问题:在妻子返回工作岗位时,夫妻两人是如何协商孩子的看护和家务问题的。最后,她把数据搜集转向了这个问题。胡德的数据包括:①来自一个小的初步研究的资料,②对16位妻子的第一次深度访谈,③对这些妻子的第二次深度访谈,④对她们丈夫的访谈,⑤6年后一份跟踪问卷调查,⑥第二轮访谈之后6到7年对她进行电话访谈其背景的实地笔记以及非正式会面的实地笔记。

在和我的交谈中,胡德描述了她是怎样从研究一开始就采用扎根理论策略的:

> 似乎我可以在这儿(她的数据中)做一些事情。在我的案例中,这些职业妇女真的很想工作。在我关于双职工家庭的研究中,那些因为非常想工作而工作的女性并没有从她们的政府那里得到很多家务方面的帮助。我很想知道那些因为迫不得已而去工作,而且她们的收入对于她们丈夫的确很重要的女性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但是我进行(初始)抽样的方式,就是请访谈对象讲述她们在做全职主妇之后再回到工作岗位时的经历。她们告诉我,回去工作感觉不错。我并没有遇到因为迫不得已去工作而很不情愿回去工作的女性。但是既然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返回工作的女性是怎样和她们的配偶商量让对方帮助照顾孩子和做家务的,那么我对那些具有更多一些讨价还价能力的人的观察就非常重要,因

98

为她们去工作是因为她们的丈夫的确需要她们去工作。然后我去寻找那些女性,并看到了很大的不同。

在我最初的七八个访谈中,的确有一两个女性是因为迫不得已而去工作的,这就给我一个线索——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特点。然后我就扩大了这个类属,那就是理论抽样。因为我有一个因为想去工作所以去工作的女性的类属——完全是自我实现型的,另一个类属是由于她们的家庭需要那部分钱所以去工作的女性。

这些类属来自对资料的分析……我会问她们,"为什么你又去工作?"一些女性会说"我回去工作是因为呆在家里太无聊了,""我回去工作是因为我得了湿症,医生让我最好走出房间,"或者"我回去工作是因为我不想只呆在家里"……——为了自我实现的原因。

我对回去工作的原因进行了编码。我也对她们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帮助的类型以及丈夫对她们收入的评价做了编码。当她们因为想去工作而工作时,她们的丈夫更可能说,"我们真的不需要你去工作。如果你不能处理这些家务,你就辞职吧"等。她们并不具有多少谈判的权力,因为她们的丈夫并不认为她们的收入是必要的。她们回去工作只是为了自我实现。

然后我发现,当丈夫们说——因为我也会问丈夫们,"如果她辞职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说,"我会再去找份工作"或者"如果她辞职的话,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在那些情况下,丈夫就不会说,"你知道,只要她不喜欢,她就可以辞职。"

"只要她不喜欢,她就可以辞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回去工作原因的分析代码:自我实现对经济需要——一些人两者皆有。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丈夫认识到而且愿意说,没有她的收入他们就过不下去。如果妻子辞掉工作,他们会不得不去做出一些重要的变动——可能会卖掉他们的房子,削减很多开销——或者在生活方式上做很多变化。如果她想辞就可以辞,如果那也是丈夫的基本说法,他们就会把她的收入作为"锦上添花(icing on the cake)"。那是从研究中得出的另一个类属。有多少人把它看作是"锦上添花",是很有趣的。"有点多余。"当他们那么想的时候,他们并不把她当

> 作一个共同养家者(coprovider)——那是第二位养家者的定义,他们把她的收入当作"多此一举"……即使当妻子的薪水足以支付日常支出,这个家伙也会说,真正养家糊口的是他;他不会把她作为一个共同养家者。即使她的收入和那些真正对家庭做出必要贡献的女性的收入一样,他也不会放弃养家者这个角色。
>
> 这就是(关于扎根理论的)不同之处,我认为,当我们随着研究进程形成这些类属、形成分析时,我们才真正地观察这些数据,形成一个扎根概念。我们把它们叫做类属,但是它是真正扎根于数据中的。

99

胡德的编码和抽样方法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她的实质性研究。[①] 因为她最初是想研究女性自我概念和朋友网络的变化,所以她在第一轮访谈中只访谈了妻子。但是她早期的分析表明,不仅要更加关注那些因为经济压力而回去工作的女性,还需要访谈她们的丈夫。她的原生代码如"只要想辞职就可以辞职"和"多此一举"是丈夫对妻子工作的立场的生动描述。这些代码也给胡德很强的关于这些丈夫的观点在互动中如何表现的线索。

注意胡德是怎样发现女性获得议价权力(bargaining power)的条件的。根据她在数据中所做出的解释,她把议价权和婚姻角色联系了起来。在胡德的作品中,婚姻中的角色分析是作为一个主题出现的。她的研究与"角色"理论编码家族相契合,并对"夫妻承担角色的方式"这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扩展。当然,其他研究者在数据中看到的东西不同,可能建构研究的方法也会不同。比如,其他研究者也可能发现了议价问题,但沿着不同的路线去分析它们,比如夫妻在议价中的情绪。还有另外一个研究者可能会

---

①胡德对理论抽样的使用直接建立在扎根理论方法上,不过她的编码策略有所不同。她开始用开放的代码进行编码,并用代码清单迅速进入正式程序,对资料进行分类,并组织为更为一般的类属(Hood,1983,pp. 200-202)。胡德说,如果她有机会接触像民族志、计算机辅助程序之类的东西,她就可能做出不同的东西来。她说,她把代码清单的方法作为"访谈"她的数据、解释数据中的模式以及检验类属属性的一种方法。尽管代码清单看上去可能像是调查编码,但是她说她不使用调查编码,原因是对于建立类属边界而言,这点并不重要。社会科学家常常会根据研究问题和/或者研究者的倾向,同时利用若干方法论方法。一些护士研究者把这种方法论的普遍性(methodological ecumenicalism)降格为方法的滥用(method slurring)(Baker, Wues & Stern, 1992)。

采访女同性恋或男同性恋伴侣,她们/他们既没有性别的概念,也没有传统的理所当然的性别角色。丰富的数据能够激发多元方向的探究。

胡德把她的兴趣放在婚姻角色上,并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做出了可验证的假设,即把议价权力放在婚姻环境中。她揭示了根据每对夫妻在婚姻关系中义务承担和投入程度、工作和家庭重心选择的情况、妻子角色的超负荷程度以及夫妻间解决冲突的风格等的不同,这些妻子的议价权力也会有所不同。胡德的研究揭示了,当一个研究者通过在每个分析水平上进行比较来建构扎根理论时,她是怎样按照她的理论兴趣和实质兴趣行动的,以及她是怎样处理她的数据的。看一下胡德在她的书中所做的一些结论性陈述:

> 本书中的夫妻没有一对是为了形成更为平等的劳动分工而成为共同养家者的。相反他们成为双职工家庭,或者是因为妻子需要走出家庭,或者是因为家庭需要钱,或者两者兼有。在成为双职工家庭的过程中,一些夫妻也在他们的婚姻中形成了更加平等的权力平衡,以及家务中更为平等的劳动分工。不过,这种趋向平等的变化是成为共同养家者的一个意料之外的而并非有意为之的结果。
>
> ……不过,有目的地决定分享角色的夫妻和那些"在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在至少一个重要方面分享角色的夫妻是一样的。从大部分案例都可发现,由角色分享所产生的新的共同基础,以及为了保持角色分享关系而不断增长的必要交流,把夫妻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83,pp. 197-198)

理论抽样

区分理论抽样和其他类型的抽样

110 为了理解和使用理论抽样(theorital sampling),我们必须消除我们关于抽样涵义的先入之见。通过抽样形成研究者自己的理

论类属，使理论抽样和其他形式的抽样区分开来。有时一些质性研究者声称使用了理论抽样，但是并没有遵循扎根理论的逻辑。他们把理论抽样误以为下面类型的抽样：

- 处理初始研究问题的抽样。
- 反映人口分布的抽样。
- 寻找相反案例的抽样。
- 直到不再有新数据出现的抽样。

这些抽样策略把理论抽样误以为是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了。当然，任何写了研究设想的人都要寻找数据来解决他或她的研究问题——但是这种抽样是一种最初的类型。初始抽样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不是理论的加工和完善。不能认为我们可以提前知道类属，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在研究问题中把它们包括进来。扎根理论逻辑假设，我们会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数据，以此来建构类属。

要记住，初始抽样的标准和那些在理论抽样中产生的标准是不同的。扎根理论中的初始抽样是你要开始的地方，而理论抽样则是指引你要去的地方。对于初始抽样，在进入现场之前，你要建立人、案例、环境以及/或者背景的抽样标准。你需要为你的研究找到相关的资料，不管那是否把你引向对人、背景或更大的结构如政府机构或组织的抽样。

比如，如果你计划研究客服关系，获得观察实际冲突的机会就是前提条件。当然，你所看到的和听到的要依赖于你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你如何对此进行协商。你可能有机会接触某些事物而无法接触另一些事物。① 如果你得到采访客服人员的许可，但是不能去观察他们，那么你的研究就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似乎简单明了的题目可能不久之后就变得复杂了。如果你希望研究残疾人的酗酒问题，那么你必须一开始就有一个（至少是临时的）对"残疾（disability）"这个词的定义。你需要认识到酗

---

①如果客服代表认为你的存在是对他们的监管，他们就有可能掩饰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也可能掩饰他们通常的行为。而且，他们可能把你和你的研究作为组织控制形式的一种扩展，就像多萝西·史密斯（Smith，1999）对研究者的警告一样，研究者复制了研究对象已经在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控制。如果他们把你看作是同盟，那么你就可能看到不同的局面，如果你和顾客谈到他们的经验，你就能获得对于情境的其他观点。

酒以及残疾对于你的研究对象意味着什么,如果你需要和他们的家人或朋友交谈的话。你必须明确你所谓的残疾人是否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正在康复的酗酒者。促使你接触某些人而不是另外一些人的主题已经限定了你所要解决的问题了。你应该澄清,而且不只在你的任务中,检验你自己对于酗酒的先入之见。

理论抽样遵循着与传统量化研究设计的抽样技术不同的逻辑。理论抽样的目的是获取数据来帮助你澄清类属。当你的分类充分时,它们会反映出研究对象经验的质量,并为你理解这些经验提供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简言之,理论抽样只是为了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它并不*代表一种人口类型(a population)或提高你的结果在统计方面的普遍性。很多量化研究要求对所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人口进行随机抽样。但是,量化研究者想用他们的数据形成目标人口的统计学推论,而扎根理论者的目的是让生成的理论去适合他们的数据。量化研究者要检验他们预先设定的假设;扎根理论者有时也会为其他研究者可能追求的生成性假设提供一些线索。

101

那些引用量化研究逻辑的同事或教师们常常错误地建议质性研究者,要使他们的样本代表更大人口群体的分布状况。这些建议的错误就在于认为质性研究的目的是普遍化。虽然这个策略对于初始抽样是有用的,但并不符合扎根理论的逻辑,并会导致研究者搜集不必要的并且在概念上单薄的数据①。在我们的谈话中,简·胡德这样评论对理论抽样的理解:

> 很少有人理解它。我真的认为它只是一个工具……在你努力学习如何操作时,你需要有人给你反馈,因为在理论抽样和其他类型的目的抽样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理论抽样是目的抽样,但是它是根据从研究者的分析得来的类属所进行的目的抽样,而这些类属并不是基于配额(quotas);它们是基于理论关注。而且教科书的作者并不会得到它。教科书的作者只是说一些“你访问的女性对象还不多,再去找一些来。”不,那不是理论抽样。那基本上是配额抽样或者说是人口统计学上的抽样。那样开始并没有什么错,但是那不

①博士生可能会把数据搜集的几个阶段放在研究计划中,和他们的导师协商。如果那样,他们可以一开始就把人口分布考虑进来,但在随后生成的分析中要遵循这些线索。

> 是你的第一步。理论抽样真的使扎根理论具体了，是扎根理论的主要力量，因为理论抽样使你拧紧了我所谓的螺丝锥或解释螺旋，这样最后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完美匹配你数据的理论。因为选择接下来要交谈的人或要寻找的下面一些案例都是基于[理论]分析，你不能在那些与你发展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的事物上浪费时间。①

正如胡德所言，很多研究者抽出了不同的背景或个人来反映经验分布或形势，但他们并没有进行理论抽样。比如，一个组织中的专家可能计划抽取有着严格权威系统和松散权威系统的不同业务。这个方案可能会产生有趣的数据比较，但它并不包含理论抽样。直到研究者从数据建构了概念类属，通过抽样来发展了这些类属，他们进行的才是理论抽样。

对反例(negative cases)的寻求会产生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抽取反例是补充扎根理论还是否定扎根理论，要看情况而定。质性研究者经常使用反例来发现新的变量，或者从他们形成的理论中提供其他的解释。反例的逻辑认为，要追问数据是否包括不符合你的分析的个人、情境或主题。弗吉尼娅·奥利森(Virginia Olesen)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你努力寻找那些案例了吗？(个人交流，2005 年 6 月 5 日)　102

反例的来源以及研究者对这些案例的使用方式影响着反例对扎根理论的契合度。这些案例是否会像它们能够推动理论抽样似的出现在数据中，或者研究者是否把它们*包含在*研究过程当中？如果研究者并没有在对数据的比较分析中清楚地说明这些反例，那么对反例的寻求就可能导致把反例包括进来。然而，如果反例出现在数据中，那么这些案例就可能让你觉得有必要完善你的生成理论。对反例的检验接近于对类属或过程中变量的重视，以及对扎根理论分析密度的重视(Strauss & Corbin, 1990)。贝克尔(Becker, 1998)指出，一些研究者在考虑假想的反例，或者依赖于对可能性的虚构。这些行为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研究者远离他们所研究的经验世界，因为扎根理论强调分析要来自数据，

①为了更为清晰，简·胡德对这段话进行了编辑。

所以他们仍然和扎根理论的这个特点不相一致。[①]

可能最普遍的错误就是,研究者认为理论抽样就是搜集数据直到发现同样的模式一再出现。这种策略和理论抽样是不同的,因为研究者搜集数据并不是为了让来自被研究世界的理论范畴更清晰地发展。相反,这些模式描述了他们所研究世界的经验*主题*。

一些抽样的形式更接近于理论抽样而不是其他。佩蒂·阿拉苏塔瑞(Alasuutari,1996)的抽样策略和理论抽样有一些相似之处。他指出,他选择案例的策略和理论抽样相似;然而,他的目的不同。阿拉苏塔瑞对当地芬兰旅店的民族志研究集中于旅店男性客人生活的研究,这些人常常醉酒。通过对他们喝酒情况的研究(Alasuutari,1992,1995),他的目的是得出"不同文化逻辑中的统一画面,在不同的文化逻辑中,人们的生命体验中存在着相同的历史结构条件",而并不是形成一个一般的理论(Alasuutari,1996,p. 376)。但是,他对文化逻辑的关注走向了关于酗酒的复杂文化理论(Alasuutari,1992)。当谈到包含在这个项目中的研究过程时,阿拉苏塔瑞说:

> 在民族志研究中,对假设的验证不仅仅和你所要观察的事物类型或者你从研究对象那里产生的主题类型有关。在观察结果的基础上,你会决定继续前进,搜集新的数据,就像我在AA群体项目中所做的那样。当我得知芬兰的A社团有他们自己的期刊时,浏览一下过期期刊的内容似乎是个好主意,以此来确定我在坦佩雷(Tampere)所发现的"处世哲学"是一种当地现象,还是一种更为民族性的现象。(Alasuutari,1995,p. 172)

理论抽样的逻辑

理论抽样包括从数据出发、建构关于数据的尝试性想法、然

---

①当研究者把虚构带来的数据当成是分析文本,而不是替代性现实时,虚构能够给所有的项目带来了不起的数据。比如,我们可以看看作者如何呈现具体时间阶段的人们、集体价值或个人追求。假设性反例更加复杂。研究者对于所研究世界的认识程度,以及使用这些案例的方法在这里都很重要。表面的知识以及对进一步探究的缺乏都会偏离扎根理论分析的轨道。那些依赖于假想反例的研究者可能会掉进空想理论之中。

后通过进一步的经验探究来检验这些想法。想想胡德(Hood,1983)在她的整个研究中是怎样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分析之间来回移动的。早期的类属是建议性的,但还不是定义性的。进一步的数据搜集会强化这些类属,但是胡德在她新的分析中看到了新的漏洞。她回到现场,进一步提出问题——并且不停地写和分析。 103

备忘录撰写将直接走向理论抽样。*理论抽样*是策略性的、具体的和系统的。因为你想用它来充实和完善你的理论类属,所以进行理论抽样要依赖于已经确定的类属。这一关键的扎根理论策略有助于你描述和形成类属的属性以及变量的范围。

写备忘录使你能够发现不完善的类属,发现分析中的漏洞。进行理论抽样会促使你去*预测*在哪里以及怎样才能发现必要的数据来填充漏洞,使类属饱和。和胡德的直觉一样,你的预测也来自直接的分析工作。它们不是突发奇想,相反,它们来自你对早期数据的扎根比较分析。追随直觉,它会告诉你哪里能够搜集到可以解释这些类属的数据,然后去*搜集*这些数据。接下来,对它们进行编码,比较你的代码、早期的代码以及你所生成的代码。在你继续记录新的比较——以及所有那些你在填充类属中产生的灵感时,撰写越来越抽象和概念化的备忘录。理论抽样会保证你建构充分而可靠的类属,并让你厘清类属之间的关系。

理论抽样不仅有助于填充你的主要类属的属性,还能够让你对一个基本过程如何发展和变化了解更多。当你进行理论抽样时,你会寻找那些能够解释你的类属的命题、事件或案例。像胡德那样,你也可以增加新的研究对象,或者在新的环境中进行观察。你也很有可能向你以前的研究对象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或者探究你以前未曾涵盖的经验。

你怎样才能从一开始就使自己的分析受益于理论抽样呢?从研究过程的早期,你就要在比较不同的数据时检验新出现的问题。注意胡德对数据的比较是怎样使她产生关于类属的猜测的,对于这些类属,她后来通过进一步的数据搜集进行了检验。她使用理论抽样的故事揭示了她是怎样形成分析问题的,是怎样使用演绎逻辑的。比如,胡德预测到,已婚女性的议价权力会随着她们的丈夫对妻子对家庭经济贡献的认识和公开承认而增加。然后,胡德验证了她的猜测,发现在之后的数据搜集中得到了确证。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抽样既需要我们通常所说的归纳推理,也需

要我们通常说的演绎推理。

104

扎根理论中出现的推理的特殊形式使它成为一种诱导性(abductive)的方法,因为扎根理论包括了为了进行理论预测以及通过进一步经验来检验的经验*推理*。[①] 有关数据的诱导推理从数据开始,并导致假设的形成(Deely, 1990; Fann, 1970;Rosenthal,2004)。简言之,诱导推论使你能够考虑对于数据的所有可能解释,为每个可能的解释形成假设,通过检验数据来进行经验验证,并追求最合理的解释。

简言之,诱导推论使你能够考虑对于数据的所有可能解释,为每个可能的解释形成假设,通过检验数据来进行经验验证,并追求最合理的解释。

在这一点上,研究者采用来自经验的观点,形成之后的假设,然后返回去在经验中检验这些假设(Peirce,1958)。这样,在你检验完案例之后,你就形成了一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为这些案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然后返回现场来检验和评价你的推论。这些过程是理论抽样的中心,在胡德关于如何进行理论抽样访谈的反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 你……在数据搜集和分析之间来回往复,当你的理论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得到发展时,你就逐步知道了为了使理论完善你需要搜集的是哪些数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把扎根理论看作是归纳和演绎方法的混合。你归纳地发展了理论,然后不断检验着你的直觉……我们把它叫做诱导的方法。……我不会说我们在严格地验证理论,这要看你所说的验证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是在验证我们的直觉。

正如胡德所表明的,进行理论抽样会推动你的分析。它既可以让你避免陷入无焦点的数据分析,也会让你的分析避免受挫。使用理论抽样来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如:

- 描述一个类属的属性。

---

①查尔斯·皮尔斯(Peirce,1878[1958])发展了诱导推理。它是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传统的基础,并支持这样的观念,即科学发现和主观判定(justification)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施特劳斯除了受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影响外,受皮尔斯和约翰·杜威的影响也很深。扎根理论中诱导推理的创造性认知维度可能受到施特劳斯及其追随者的极大重视。

- 检验关于类属的直觉。
- 使一个类属的属性饱和。
- 区分不同的类属。
- 厘清新出现的类属之间的关系。
- 发现过程中的变量。

理论抽样是*生成性的*。之前要建构尝试性的类属(tentative categories)。你不知道在开始分析之前需要对哪些设想进行抽样。你进行理论抽样的具体原因取决于你所捕捉(grapping with)的分析性问题,以及随后所出现的想法、漏洞、模糊性以及问题。①

分辨这些问题以及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需要一种坦率的态度,并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你的类属在分析上单薄吗?得到的支撑充分吗?你对类属之间的关系清晰吗?它们是模糊但可能具有启发性吗?好的研究者会学着分辨这些分析性问题——而且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扎根理论中的理论抽样为发展你的分析和纠正错误之处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对分析性问题的捕捉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觉得迷惑和不确定,但是学着容忍这些模棱两可,表明你作为一个研究者得到了成长。那些把研究过程当作透明过程的研究者常常进行的只是表面的分析。 105

进行理论抽样会让你遵循一定的分析线索。最后,你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完善你的研究:

- 使类属的相关属性具体化。
- 增加类属的精确度。
- 提供实质的内容,推动你的资料从描述走向分析。
- 使你的分析更为抽象和普遍化。
- 使你的预测扎根于数据。
- 说明数据间或数据中的分析性关系。
- 增加理论命题的精炼度。

理论抽样会让你发现那些能够描述一个类属属性的数据。当我试图对人们如何经历一种严重慢性疾病的方式进行分类时,他们的陈述充满了不平静的生活、麻烦的病症以及时间的消耗。

---

①正如我在前面章节指出的,你可以从一个新的观点立场出发,再次审视早期的数据并重新进行编码,这会加速你对新类属的理论抽样。

当比较这些陈述时,我想出了这样一个类属,"体验侵入性疾病(experiencing intrusive illness)"。[①] 当然这个类属本身对于疾病来说是平凡的和具体的,但是它包括什么呢? 我应该怎样对它进行概念化呢? 除了疾病之外,还有哪些类型的经验,是和经历意外侵害相关的?

通过理论抽样搜集了更多的数据之后,我通过分析性属性把侵入性疾病的类属定义为需要持续的关注、大量的时间支出以及被迫的调整(forced accommodation)。注意这些属性是怎样契合于下面的陈述的:

> 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做了……在我上夜校的时候……我必须在我还能走之前直接回家躺着,或者我干脆就不去,而在很多年前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
>
> 我真的很怕光。如果不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我就不能呆在有荧光灯的房间里。因此,如果晚上上课,我就不得不戴着太阳镜坐在那儿。那使我非常疲倦。它使我的眼睛肿胀得睁不开……我已经误了三次课了,而以前我从来没有误过课。(Charmaz, 1991a, p. 43)

在考察很多案例和事件时,我的目的是使侵入性疾病这一类属的属性能够反映人们针对自己的疾病所采取的行动,并揭示他们赋予疾病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如果想维持和过去相似的生活,疾病的侵入就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具体的麻烦。这个类属的属性似乎是直接的,尽管这些属性为做出抽象的有关时间和自我的陈述提供了有价值的东西。在进行关于体验侵入性疾病的理论抽样时,我搜集了更多关于下面问题的数据,人们如何定义不平静的日子,怎样分配很多时间去处理与疾病相关的事务来度过对他们有意义的日子,他们什么时候觉得不得不向疾病妥协,他们做了哪些调整,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比如,一个妇女想尽量不让她的同事了解她的病情。她不得不在疲倦袭来前早早完成她一天中的工作任务,并努力在下午时掩盖她的疾病症状。她要顺利度过工作日所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了,于是她意识到,她不

106

①我选择把疾病体验作为本书的焦点,是因为它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不过,这个焦点允许进一步发展对时间和自我的分析。

能指望坚持到 8 年后再退休了。当问到这些调整时，很少的问题就能引出很多故事来。并且，我看到了能够说明侵入性疾病如何影响研究对象的事件，并且在我形成分析时能够把他们内在的观点和行动联系起来。

要注意，理论抽样会给你提供一些资料来比较理论类属和类属。想想你是否把一些属性堆在了一个类属下，而实际上它们需要建构独立的、不同的类属。体验侵入性疾病和其他两种患病情况不同，如中断(an interruption)和抱病在身(immersion in it，陷入疾病中)。通过用其属性来定义每个类属，我提高了类属的分析水平，明晰了(sharpen)每个类属的定义。

描述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是使你的观点更为敏锐的一种方法。接下来，对一个环境中普通经验的描述会变得更具分析性、更抽象、更具潜在的普遍性。理论抽样会给你的研究以分析的深度和精确度。当你进行理论抽样时，你的研究会获得超越直接问题的清晰度和普遍性。通过关注你的*理论类属*而不是简单的经验问题，理论抽样使你能够在整个实质领域进行抽样。这样，进行理论抽样会让你把理论提升到一个正式的、更为抽象的水平上，它会涵盖不同的实质领域。

如果要把拥有一种侵入性疾病经验的分析推广到实质领域，该如何进行？当然一些看护(caregiving)类型要求有持续的关注、时间的支出以及被迫的调整——而且可能不受欢迎，和患有重病一样。几周前，一个看护病人的人(caregiver)告诉我，我对时间的分析非常适合她自己的看护经验以及她父亲的情况。她读过我的书，她的父亲死于癌症。那些发现自己陷入不曾预料的、不愉快的司法和行政纠纷中的人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有关侵入性经历(intrusive experience)如何蚕食他们生活的观点。经历身份丧失，或者一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在学校中获得了特殊的服务，是其中两个例子。在每种情况中，我们能够探究经历一种不受欢迎的持续很久的情形的属性怎样形成了时间的质量——以及怎样形成了接下来的自我和处境。我们应该比较一下作为一种不受欢迎的、有时是非常讨厌的中断而开始的情形，和开始不方便而后变为侵入性的情形。我们应该观察这种侵入性经验如何以及何时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变故发生了，根据生活变故所包含内容的不同，对这些个人的自我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也会不同。如果

我对自我和时间做疾病经验之外的分析,我会建构一个形式理论。

首先把你的类属锚定在一个稳固的实质领域中,你会得到一些线索,从哪儿以及如何在其他领域进行。简·胡德的著作提供了婚姻中关于家务活讨价还价的实质性扎根理论。[①] 通过分析,她建立了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各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产生了一个正式的关于缄默而策略性的议价理论。比如,她在不断的调整和清晰的协商之间建立了一个理论连续体。无论如何,她有了寻找新的参与议价的个人和群体的初始资料了。然后她就能够检验这些研究对象的相对平等或不平等的权力,以及在讨价还价结果中不同的优势是怎样影响讨价还价的进行以及结果会发生什么。

107

使用理论抽样

理论抽样,你既可以在研究的早期阶段使用,也可以在晚期阶段使用——如果你有类属来指引你抽样。理论抽样作为一种策略可以使你的焦点集中在生成的类属上,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发展和完善这些类属。理论抽样有助于检验、限定和详细阐述类属的边界,有助于使这些类属的关系具体化。最初,理论抽样有助于你填充一个类属的属性,这样你就能够形成一个关于该类属的分析性定义和解释了。接下来,理论抽样有助于你展示类属间的联系。

一些进行理论抽样的尝试可能并不够特别理论化。在这种情况中,研究者追求的是有趣的发现,但他们却可能没有把它的意义理论化。他们没能推动实质发现的边界,回答"那又怎样"的问题。在更大、更抽象的理论类属或问题中,这个发现只是部分现象吗?理论抽样不仅仅意味着使激发早期代码的内容继续进行下去,虽然这是好的研究者通常会做的事情。在你已经对相关想法(这些想法指出了可用更多的数据进行探究的领域)进行了

---

①对于这样的研究,其中中产阶级双职工家庭中已婚女性在即时协商中居主导地位和间接保持对家庭事务的控制,可见:Kerry Daly(2002)。夫妻双方在管理和专业职位上一周要工作50小时或更多。戴莉发现,通过控制家庭的日程表,这些女性成功地让她们的丈夫开始参与对孩子的照顾和家务劳动。

定义，并尝试性地进行了概念化之后，进行理论抽样。但是，早期的理论抽样可能会导致一个或更多的共同的扎根理论缺陷：

- 过早地封闭了分析性类属。
- 陈腐的或多余的类属。
- 过分依赖那些明显的陈述来阐述和检验类属。
- 没有聚焦或没有具体化的类属。

教科书作者常常把理论抽样作为研究者通过访谈进行的一个程序。理论抽样与其说是一个清晰的程序，不如说是你所产生并适合于你的具体研究的*策略*。因而进行理论抽样的方法相应地也不同。理论抽样需要你带着对理论类属的关注进行访谈或重新访谈，也需要你研究文献、进行观察或者参与到新的社会世界中。

通过理论抽样寻找的东西以及寻找的方式都依赖于你这么做的目的。和扎根理论逻辑一致，理论抽样也是生成性的。你正在形成的观念会决定你所做的事情、你涉足的领域以及你在理论抽样中所提出的问题。

通过理论抽样寻找的*东西*以及寻找的*方式*都依赖于你这么做的目的。和扎根理论逻辑一致，理论抽样也是生成性的。你正在形成的观念会决定你所做的事情、你涉足的领域以及你在理论抽样中所提出的问题。 108

当我试图解决慢性病病人如何定义时间流逝的问题时，我回到以前曾采访过的一些研究对象那里，向他们提出更为聚焦的问题，即他们如何感受早期危机时期的时间，什么时候时间慢，什么时候时间快，什么时候时间缓缓流动，什么时候度日如年。因为这些问题和他们的经验产生了共鸣，他们对这些深奥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对于时间双重性的意义发表了大量的见解。比如，当我研究他们的故事时，我意识到患有慢性病的成年人暗暗把他们的自我观念放在了过去、现在或未来。[①] 这些时间框架反映了自我的形式和内容，反映了自我的希望和梦想，也反映了关于自我的

---

①古布里厄姆(Gubrium，1993)发现，疗养院病人也把他们同样地放在时间之中。一些人把他们的生命放在过去，而另一些人则放在疗养院的经验之中，还有一些则越过他们当前的处境投向未来。

信念和理解。因此,我使"时间中的自我"成为一个主要类属。之后,我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进一步了解人们如何看待与过去、现在或未来有关的自己。一个年老的工人阶层的女性毫不犹豫地说:

> 我现在看的是未来的自己。如果你8个月前问我看到的是什么时候的自己,我会说,"过去"。那时我非常愤怒,因为我曾经是那么活跃。情形一落千丈——我觉得生活对我太残忍了。现在我看的是未来的自己,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是上帝想让我去做的。现在我全身蜷缩在椅子里,什么都不能做,但我在这里仍然是有目标的。(笑)我想知道它会是什么。(Charmaz, 1991a, p. 256)

通过理论抽样,你可以详细阐明你的类属的意义,发现它们之中的差异,定义*类属之中的漏洞*。类属中的漏洞指的是,你现在的类属不能解释相关经验的所有内容。理论抽样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来发现这些漏洞,发现弥补这些漏洞的方法。当你试图分析最初的经验和默认的观点时,这些方法特别有用。比如,当我和人们(研究对象)谈论他们关于疾病和时间的经验时,当写关于时间中的自我属性的备忘录时,我发现过去的意义是非常不同的(Charmaz, 1991a)。对于有些人来说,时间就是一张纠结的网,他们被困在了其中。他们试图去解释和说明把他们带到现在来的过去的事件。其他一些人把他们放在熟悉的过去,因为现在是陌生的和无法解释的。还有一些人把他们放在重新建构的过去,那里闪耀着欢乐、幸福、满足和活力,这些一起对抗着他们并不认同的现在。当我分析人们把自己放在过去的方式的差异时,我的次级类属描述了他们的过去,"作为纠结的网的过去"、"熟悉的过去和无法解释的现在"以及"重构的过去"重新定义了"过去的自我"这个更大的类属,展现了生活在过去的差异。

109 **发现差异**

在进行理论抽样的时候,过程中的多样性通常会变得很明显。比如,在承受身体的损伤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对于身体损伤,他们可能会忽视它、缩小它、对抗

它,也可能向它妥协、包容它或适应它。[1] 不仅不同的人承受身体损伤的方式不同,即使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承受的方式也会不同。我想看看,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什么变化,因此我和一部分研究对象保持了很多年的联系。对你要寻找的数据以及你所寻找数据的场所都要有所选择,这会有助于你看到研究过程中的差异。你关注一定的行动、经验、事件或问题,*本质上关注的不是个体*,是为了理解你的理论类属是怎样、在何时以及为什么会有所差异。但是,你可能会获得有关那些经验、事件或问题更多的知识,通过观察或者和特定个体交谈,你更能理论地(theoretically)对待它们。比如,我的一个主要类属是"陷入疾病(immersion in illness)"(Charmaz, 1991a)。"陷入(immersion)"的主要属性包括,围绕疾病重新安排生活、陷入疾病的日常琐事中、进入自己的内在的圈子(inner circle)、面对对别人的依赖,感受变化了的(放慢的)时间观念。所有类型的行动都会持续更长时间,但是并不是每个人的时间观念都会变化,尽管也都抱病在身。

我怎么来说明这一现象呢? 什么会有助于保持以前工作世界的时间观念? 通过回顾数据,我获得了一些线索。然后我和更多的人交谈了影响他们时间观念的具体经验和事件。理论抽样有助于我完善分析,使其更为复杂。然后我增加了一个类属"陷入的差异"来强调和说明陷入疾病的不同经验。

我早期的访谈包含了这样一些线索,陷入疾病是有差异的,影响着所经验的时间,但是这些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我形成了关于"陷入疾病"的更大的类属后才对我发生作用。当我对突出的事件以及有着不同疾病、不同生活条件和不同年龄人的具体经验进行比较时,我开始观察陷入疾病的差异。后来,理论抽样帮助我定义更为具体的差异形式。比如,我通过抽样研究了对于那些把时间消磨在黑屋子里的人来说,疾病和时间有什么不同,以及当人们预计到病情后来会好转或预计到会面对持续的不确定时,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当人们活动很少、缺少陪伴以及没有负担时,时间的间隔就加长了。通过连续的备忘录进行清晰的比较,

---

[1] 我从研究对象的陈述和行动描述中形成了这些次级类属。因此,它们比心理学上的接受和否认概念包含了更少的默认(implied)的判断,尽管心理学上的这些概念在关于疾病和损伤的专业术语中很流行。

我能够发现最初无法察觉的联系。备忘录成为一章中的一小部分,之后将其他的要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化,这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陷入疾病的差异

> 长期陷入疾病会成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并影响他或她对时间的体验。相反,时间体验的方式也反过来影响陷入疾病的状况。上面对陷入疾病和时间体验的描述已经给我们形成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什么类型的差异会削弱或改变关于陷入疾病和时间体验的画面呢?这幅画面可能根据一个人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以前的时间观念、生活条件以及目标不同而不同。
>
> 疾病类型形成了和时间相关的经验和方式。要控制糖尿病,就需要强调一种使日常生活规律化的意识。但是这种病的影响可能会更为微妙。比如,对于患有修格连氏症候群的人来说,当他们觉得和周围的世界完全不合拍时可能会有一段心理混乱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身体和头脑运转太慢,而事物却发生太快。最后,他们退回到日常事务来保护自己。红斑患者通常必须退却,因为他们不能晒太阳。萨拉·萧(Sara Shaw)在病得很严重的时候,用一块黑毯子遮上了她的窗户。这样,当白天和黑夜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永无休止的疾病之流时,她对漫长时间的感受就变得更为扭曲了。(Charmaz, 1991a, p. 93)

110

理论抽样关注进一步的数据搜集,以此完善研究中的关键类属。然后你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义这些类属,识别它们的属性和起限定作用的因素了。接下来的备忘录撰写会变得更为精确、更具分析性、更为深刻。理论抽样使你在目标数据搜集和分析性备忘录撰写之间不断往返。你需要遵循一些线索,检验预感、完善你在连续备忘录中的观念。因为理论抽样要求你检查那些和直接经验事实不符的观念,你会拥有可靠的资料和可信的观念,以此来进行研究。你会在对自己数据的理解中以及在对它们的理论化中获得自信。

理论抽样的逻辑包含了一种快速的、聚焦的搜集关键数据的方法。一些扎根理论家将其作为完善理论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

的步骤。但是进行理论抽样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分析的程序。它会把你带回到有着自身含糊性和张力的经验世界。

经验世界有自己的规则和传统，理论抽样可能并不适合它们。教科书对理论抽样的解释很少考虑互动互惠和情境的要求。这些技术性解释忽视了研究现场的人际关系和互惠，忽视了得到获取信息的现成渠道的所有实际工作。你也许不能迅速写下来、抓住需要的数据并飞奔回自己的书桌。在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和保持距离之间的界线常常是模糊的，可能需要不断的重新调整。要记住，人们不可能喜欢被当作抽取信息的客体。互惠是重要的，聆听和呆在那里都是要走到他们中间。一些研究者可能要求在他们项目权威和声望的基础上进入研究现场。其他更多的研究者并不能这么做。我们通过信任得以进入现场，通过建立持续的关系和互惠，信任才会慢慢地形成。忽视这些互惠不仅会削弱你得到明显数据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使你的研究对象以及你自己非人性化了。

合法性的逻辑、正式进入的渠道以及实际的进入都会出现问题。在最近一次扎根理论的报告中，一个研究者问我，“当你不得不获得 IRB(institutional rewiew boards，机构审察委员会)的支持时，你是怎么进行理论抽样的?”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如果有机构审察委员会，进行理论抽样可能需要进一步清晰化，这要依赖于研究对象的情况和你自己的情况。生物医学的实验模型会很好地引导这些委员会。通过决策，他们试图实行这样的原则:不损害研究对象、预测潜在的伤害、说明使任何可能的伤害最小化并得到控制的策略。受资助的研究计划要求主要调查人在搜集数据之前就接受详细的审查。那些进行非资助研究的研究者和学生也必须在进行他们的研究之前得到机构审察委员会的同意。他们是怎样对扎根理论研究的生成过程和机构对研究的限制进行协调的呢?②

111

由于当前存在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制约，很多质性研究者试图

---

①她在一个题为“通过扎根理论建构质性研究”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地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CAPS)，2004 年 9 月 7 日。

②在很多学科和专业中，质性研究者在挑战限制他们研究的制度规定。他们试图让那些坚持生物医学模型的同事认识到，这一模型对质性研究产生了不少限制。这些应该导致伦理政策和机构审查的变化。

预测所有可能的意外,并在他们的研究计划中对其进行解释。从表面来看,理论抽样产生了障碍,因为你不能提前预测你的核心类属是什么。但是,你能形成一种原则,让以后对理论抽样的使用具有合法性,而不需要解释理论抽样的逻辑,或提前确定核心概念。所以需要从一开始就努力获得进行第二次以及(可能的话)第三次访谈和观察的许可。它有助于把访谈现场以及田野现场中研究对象的经验包括进来作为你方法论步骤的一部分。多次访谈和观察会给你这样的机会。清晰确定的语言足以让你的研究计划得以通过。通过描述扎根理论的关键步骤,你会展现出在进行研究时,你计划怎样提高生成观念的概念精确性,以及怎样把你的数据搜集集中在获得这些精确性上。这样,你后来的观察、访谈、案例或其他数据对于解决概念问题就都是精确的了。简言之,制订返回研究现场的计划,以及把关键"信息提供者"放入你最初的研究计划中,都会给你一些余地来搜集进一步的信息,从而发展类属的属性。同样,当你设计一个访谈研究时,会有在主要想法上进行追踪访谈的计划,这个计划会把理论抽样考虑在内。

在研究计划中采用成员检验(member-checking)的方式可能也有帮助,因为大量关于成员检验的文献已经使其成为一种被接受的,有时是被期待的实践了。虽然成员检验一般指把观点带回研究对象那里寻求他们的确证,但是你也可以使用回访来搜集资料以加工你的类属。谢里尔·阿尔巴斯和丹·阿尔巴斯[①]在他们研究的后期设计了一种检验和完善他们类属的聪明办法。他们向某些曾经的研究对象解释了他们的主要类属,然后询问这些类属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每个研究对象的经验。两位阿尔巴斯观察了研究对象在对话中的表现和那些无意识透露出来的信息。当一个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分析不以为然时,他们得出结论,他们的类属并没有渗透到研究对象经验的核心中。接下来,两位阿尔巴斯让这个研究对象参与到谈论中,于是产生了类属的新的属性或一系列新类属。他们在报告中说,他们从这一技术中

①私人交流,2004 年 3 月 29 日。两位阿尔巴斯发现,他们用这一方法发现了他们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同时,他们也加速和强化了他们的分析。也见:Albas & Albas(1988, 1993),Albas & Albas(1988)。

获得了一些最好的数据。

阿拉苏塔瑞(Alasuutari,1992,1996)使用了同样的策略;但是刚好相反,他的目的不是发现他可能忽视了什么或哪些分析不够——就像两位阿尔巴斯一样,他所做的是让研究对象面对自己的缄默行动(tacit action)。这样,阿拉苏塔瑞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们*所忽视或未曾言说的东西。当他指出信息提供者主要提供了有意义但是片面的解释时,他是从研究者的立场来说话的。研究者必须更深地挖掘,来发展更为全面的解释。阿拉苏塔瑞建构解释的策略和理论抽样一样。看看他是怎样把他的观察带回到信息提供者那里的: 112

> 在一次特殊的对话中,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对象总是热切地去竞争酒量最大的人的头衔,同时又轻视其他成员的酒量呢?
>
> PA: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在这个群体中有这样一种情感,这个群体里总是有一些人喝得没有其他人多,或者说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快喝醉出局,你会轻视那个人的酒量,你知道那是小菜一碟,我比他喝的多多了。
>
> A:你从哪儿听说的?
>
> PA:我会让你明白。
>
> B:我明白。
>
> PA:即使此时此地。
>
> C:你越早知道离开并寻求帮助,就越好,不是吗。
>
> A:没错。
>
> C:你喝酒时间越长,就会越愚蠢,这是毫无疑问的。
>
> PA:但是关于变得更愚蠢的说法,你是在夸大其词吗?
>
> C:你有点歪曲事实,就像我喝酒要比你时间长。你只喝了一年,而我已经喝了两年了。因此那些喝了一年的人会意识到,有那么一个点,你需要起身离开,并给自己寻求帮助。我很愚蠢,我并没有这种要获得帮助的感觉,我不得不继续。因此这就是我对形势的描述,所以你有那样的看法,我要好一些,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所以好一些。
>
>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这个群体的成员首先想否定我的解释,即使我在田野笔记里有这类情形的清晰记录。之后这

个说法又被接受了,这种现象是真的存在的,成员 C(在他说话的斜体字部分)进一步支持了我的解释,强调一个人早期酗酒的严重性是和成员所表现出的对实际经验的尊重有关的。(Alasuutari,1995,pp. 170-171)

在这个例子中,阿拉苏塔瑞向原来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他的解释,并发展了关于这个解释的谈话。① 在同一访谈中他的观点获得了确证,并在后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阿拉苏塔瑞的有效性来自两个方面:和群体成员的密切关系,以及用来得出结论的坚实数据。密切的关系建立了信任,使其能够就平常不曾谈到的领域与研究对象展开了公开的谈论。坚实的数据使得问题根基扎实——*尽管它们本质上容易引发争议*(*provocative nature*)。一个由菜鸟观察者所提出的先入之见的问题能够被一个老练的民族志研究者变成为具有启发性的策略。有趣的是,阿拉苏塔瑞没有采用那些人对他解释的表面价值上的支持。相反,他采取了进一步的分析步骤。他把确证了的解释放在群体文化的语境中,做出这样的总结:它也反映了群体成员和工作人员的矛盾关系,以及对专业人员信任的缺乏。

使理论类属饱和

> 当搜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类属就"饱和"了。

什么时候停止搜集数据呢?你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扎根理论对标准问题权威而短小的回答是:当你的类属"饱和"时停止。更长一些的回答是,当搜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也不再能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类属就"饱和"了。

正如上面所说,扎根理论饱和与看到同样的事件或故事重复出现是不一样的,尽管很多质性研究者混淆了饱和与被描述事

①阿拉苏塔瑞的策略让我想起安塞尔姆曾经给我的建议,不要对教科书上关于进行中立访谈的要求过于认真。他发现,有时一些煽动性的问题会很有用,田野研究者是可以问他们的,只要不被他们一脚踢出去。

件、行动和/或陈述的重复。饱和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是指没有新东西出现了。“我发现的是同一模式。”相反，格拉泽（Glaser，2001）对饱和有着比一般研究用法更为复杂的见解：

> 饱和不是一而再地看到同一模式。它是这些事件对照之后的概念化，这些事件产生了模式不同的属性，直到再没有模式的新属性出现。这就产生了概念密度，在被整合进假设中时，概念密度构成了具有理论完整性的扎根理论的主要部分。（Glaser，p. 191）

格拉泽关于饱和的观点形成了扎根理论中处理理论概念的基础。当你理论地处理类属时，你把它们提升到了抽象的、一般的水平，同时把这些具体的关系保留在了数据（你从这些数据中建构这些类属）中。要评价你的类属是否饱和，可以考虑一下下面的问题：

- 你在数据内部和类属之间进行了怎样的比较？
- 你怎样理解这些比较？
- 它们给了你什么样的线索？ 114
- 你的比较是怎样解释你的理论类属的？
- 如果有其他方向的话，它们会把你带向哪里？
- 如果有新的概念关系的话，你可能看到什么样的概念关系？

扎根理论逻辑把饱和作为标准应用到你的类属。一些扎根理论家（Glaser，1992，1998，2001；Stern，2001）认为，在类属饱和之前你要一直进行抽样，这个逻辑代替了样本规模——符合饱和逻辑的样本规模可能非常小。

其他考虑可能要取代对样本规模的考虑。想一想，你对饱和的判断是怎样影响研究的可信度的。有着最谨慎判断的小型研究可能允许早早判定样本饱和。做出最有力判断的研究者应该对他们数据的充分性以及分析的严格性保持谨慎态度。拥有 25 个访谈的研究对于某些小的项目来说可能足够了，但是当作者的言论是（比如说）关于人的本质或与已有研究相矛盾时，就可能招致怀疑。

根据常规，*理论*饱和是扎根理论家的目的所在——或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扎根理论家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个术语“饱

和”。对饱和的意义也存在不同意见。正如贾尼斯·莫尔斯(Morse,1995)所看到的,研究者常常判定饱和而不是证明它们已经达到饱和了。这样,像其他质性方法一样,扎根理论方法常常也有这样的危险,即在可能没有饱和的时候就认为类属已经饱和了。

最初研究问题的类型和之后类属的分析水平都很重要。普通的研究问题可能很快就会出现饱和而平庸或微不足道的类属。比如,一个研究者研究肥胖妇女是否体验到屈辱,她可能发现她的所有访谈都表明,她们感到屈辱,而且如果不去分析屈辱是什么以及屈辱如何产生,那么就会认为她的类属“体验屈辱”已经饱和了。不加批判或有限地分析处理可能也会导致过早的类属饱和。新颖的问题可能要求更复杂的类属和更具持续性的探究。

戴伊(Day,1999)在两点上挑战了饱和的概念:饱和的意义以及饱和的结果。第一,他指出,扎根理论家通过部分的——非穷尽的编码产生类属。戴伊把“饱和”这个术语作为“另一个不合时宜的比喻”(p. 257),因为它的使用很不精确。在他看来,饱和这个词和“在没有对所有数据进行编码的情况下就停止”(p. 257)这个程序是不一致的,并且主要依赖于研究者对类属属性是否饱和的*推测*。简言之,如果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你就没有证据来支持这个推测。戴伊不是通过数据来建立类属的饱和,而是坚持认为我们拥有了数据所*表明*的类属。戴伊最喜欢的术语“*理论的充分性*(*theoretical sufficiency*)”(p. 257)并不判定饱和的获得,从而更适合研究者进行扎根理论的操作。

其次,戴伊认为,对于类属饱和,接下来的扎根理论方法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果。他想知道,类属饱和本身是否是扎根理论家聚焦和对数据搜集进行控制的人造产物。这些关注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我们对已使类属饱和的判定是否具有合法性?如果有的话,何时?这个方法是一种技术封闭的系统吗?当研究者把扎根理论方法当作药方时,他们就在没有对数据进行探究的情况下提前封闭了创新的可能性。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 Corbin,1990,1998)的轴心编码矩阵可能会把数据强行放入预先设定的框架中,就像格拉泽的任何一套理论代码那样。采纳和应用这些框架会导致选择扎根理论固有的聚焦,使它更具指向性和规定性。最后,研究者会破坏他们分析的价值和合法性。

115

通过扩展，戴伊的主张补充了我对提前关闭分析可能性以及形成表面分析的研究。我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对现场所发生的事情保持开放态度，愿意为此殚精竭虑。当你陷入其中时，返回去对早期的数据重新编码，看你是否发现了新的线索。扎根理论基本原则给你的是把握资料的工具，而不是为你进行工作的机器。

理论分类、绘图和整合

对备忘录进行分类、绘图和整合是交互相关的过程。你的分类可以整合分析，图表可以同时分类和整合分析。图表的直观图象不仅可以展示分析的形式，也能展示分析的内容和方向。所有的质性研究者都会用到诸如分类、绘图和整合这些方法策略来对他们的资料进行处理；但是，扎根理论家用这些策略则是使他们的分析获得理论方面的发展。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下面分别介绍分类、绘图和整合，尽管它们在扎根理论实践中是纠缠在一起的。

理论分类

分析备忘录为形成论文的第一份草稿或若干章节提供了内容。在每个分析阶段撰写备忘录会让你的分析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力、清晰和理论化。你已经在自己的书面备忘录中形成了类属，而且已经尽可能地将其命名为具体的、特别的和分析性的术语。现在你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类了。

> 扎根理论分类给你组织分析的逻辑以及形成和完善理论联系的方法，这会推动你对类属进行比较。

在扎根理论中，分类不只在构建论文、章节或著作的第一步发挥作用：分类服务于你的生成性理论。它给你一种产生和完善理论联结的方法。你可以通过分类对你的类属进行理论整合。这样，分类使你能够在抽象的水平上比较类属。

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成性理论的逻辑。在我关于慢性病经验的研究中，理论的逻辑就很清晰，某些事件在出现很长时间之后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发生反响，成为一个转折点。我把它们叫做"重要事件（significant events）"，把它们当作一个主要的类属，因

为它们形成了关于时间和自我的意义。我对类属的处理①如下:

116

作为转折点的重要事件

> 重新体验的时刻(relived moment)。重新讲述的故事……再现的情感。记忆中重要事件重现。一个重要事件不论是证实自我还是完全中断了自我,都揭示了现在的或可能的自我形象,并激发了情感。这样,这些事件就标志了时间,成为了转折点。
>
> 一个重要事件在记忆中凸现出来,因为它是有边界、有强度和情感力量的。而且,一个重要事件引起、区别和强化了情感。那些情感常常是不愉快的,比如慌乱、羞辱、羞愧、背叛或失落。这些事件点燃并形成了这些情感。某一事件的情绪反应在现在和将来反复出现,因此微妙地形成了关于自我的想法和情感,改变了时间的意义(比较 Denzin, 1984)。
>
> 重要事件超越了事件中的行动者,以及事件所发生的场所。这些事件是生成的现实,是独特的事件;它们不能被简化为某些部分(Durkheim,1951)。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或其他人的行动。这一事件是何时、哪里以及怎样发生的,谁参与其中,都构成了事件的主要力量并影响了事件随后的解释。对事件的意义以及对事件所持有的"正确"情感进行分类,形成了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
>
> 一个重要事件会冻结和放大某个时刻。由于自我在事件中具有内在的或潜在的意义,人们会认为这个事件是冷酷无情的(obdurate),他们使它具体化了。对于他们来说,事件超越了过去的意义,预告了未来的自我。(Charmaz,1991a,p. 210)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列出了类属的属性。然后我说明了这一类属所包含的两个过程:发现积极的事件和再次体验消极的事件。当研究对象把具体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事件定义为对自我具有意义的转折点时,我把它们当作重要事件。接下来,我思考了一个人现在的情绪是怎样和过去的自我发生联系的。在这个案

---

①审稿编辑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修改了我关于"重新体验的时刻"以及"再现的情感"的措辞。我原来的陈述包括在这里。

例中，当有了关于次级类属“体验现在的情绪和过去的自我”以及“超越过去的情绪”的备忘录，我将分析从过去带到当下时，分类就从一个直接的逻辑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研究者建构了他们分类和编辑备忘录的方式。分类越贴切地反映你对现实经验之流的描述，它对于你以及你的读者也就会更顺畅。当你有一个有意义的逻辑时，对备忘录的分类和整合就会落到实处。当你包括几个过程或追求多个类属时，备忘录的分类和整合就不可能总是那么清晰。尝试几种不同的分类，思考每种分类各是怎样描述你的分析的。当你考虑每种分类方式的含义时，它会有助于你对这些分类进行画图。

对备忘录进行分类、比较和整合似乎是个简单的步骤。一个类属的每个备忘录都可能成为草稿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次级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备忘录的整合可能只是再现了分析的理论逻辑，或者一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然而，对备忘录的分类、比较和整合可能更为复杂。选取一个备忘录，和其他的备忘录进行比较，逐次比较下去（也见 Glaser，1998）。如何比较备忘录？你的比较会产生新的观点吗？如果能产生，那么再写一个备忘录。你能发现备忘录之间新的关系吗？通过对备忘录进行分类，你会获得什么线索？如果这样有用，选取相关的备忘录，并形成一个关于这些线索的快速检索的资料串。它们放在一起是否适合？哪些最有意义？一些备忘录结合起来会更好，会使答案清楚起来。但是对于很多分析来说，你必须建立秩序，并为你的读者建立联系。你论文的第一个草稿要展示你如何分类、比较和整合一组备忘录，使其具有某种连贯的秩序。 117

应该怎样对备忘录进行分类、比较和整合呢？

- 根据每个类属的标题对备忘录进行分类。
- 比较类属。
- 小心地使用你的类属。
- 思考类属的秩序是怎样反映被研究经验的。
- 现在考虑一下它们的秩序怎样契合于类属的逻辑。
- 在研究经验、你的类属以及关于这些类属的理论陈述之间建立最大可能的平衡。

一些操作性建议会对你有所帮助。在一个你能看到并排列

你的各个备忘录的空间里对你的备忘录进行手工分类。现在把电脑关掉。一张大桌子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如果没有猫或孩子来打扰你的分类设计的话,地板也不错。我曾经用写着备忘录题目的卡片贴满了我的餐厅。要愿意用不同的备忘录组合来进行实验。要以一种实验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些组合,和它们游戏。把你的备忘录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排列出来。画几幅图画来把它们联结起来。当你产生一个看上去有前景的分类时,迅速把它记下并画出来。

在你对备忘录进行分类时,继续比较类属。分类会推动你完善类属之间的比较。分类的结果可以让你更清晰地看到不同类属之间的关系。比如,对关于时间和自我的备忘录进行分类,就对患有严重慢性病的人对他们自己看法的变化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我看到,当病人的现在变得越来越有问题时,他们很容易从试图活在现在变成回到过去。类属间的关系形成了你要涵盖的内容的轮廓以及你涵盖这些内容的方式。它们会给未来的读者以重要的信息。而且对这些类属进行研究和分类有助于发现你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在哪里误入歧途的。

绘图

图表可以为我们提供观点的具体图像。图表的好处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幅直观的关于类属及其关系的图画。很多扎根理论家,特别是那些受克拉克(Clarke,2003,2005)、施特劳斯(Strauss,1987)以及施特劳斯和科尔宾(Corbin,1998)影响的人,把形成生成理论的直观图表作为他们扎根理论固有的一部分。他们在建构自己的分析时使用不同类型的图表——包括地图、表格以及图形来描述关系,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展现这些关系。

图表不仅能让你看到类属之间的关系,也能让你看到,在你的分析中类属的相对力量(power)、范围以及方向。你会发现,在分析的所有阶段,图表都会服务于有用而多元的目的。当一个图表解释了一个类属的属性时,你可能会修改关于这个类属的资料串,使其成为更加严格的形式。你会形成一个概念地图,定位你的概念并指引它们之间的运动。

118

地图展现的是位置和过程(Clarke,2003,2005)。概念地图能够绘制关系的相对强弱。阿黛尔·克拉克(Clarke,2003,2005)使

用地图来进行复杂的形势分析，它提供了不同于早期扎根理论的崭新途径，不再只是重视基本的社会过程。她认为，对于我们的研究地点和问题，我们在正式搜集数据之前就已经知道很多了，地图是富有成果地使用这些知识的一种方法。

通过绘制情境地图、社会世界及其竞技场的地图，以及话语中的形势地图，克拉克试图这样发展扎根理论方法，保留经验现实和复杂性，而不是诉诸简化的分析，或者说不完全依赖格拉泽（Glaser，1978）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的社会过程模型（格拉泽认为这一模型对于扎根理论来说是本质性的）。除了说明社会竞技场和社会世界的分析水平外，还可以考虑一下克拉克为常规扎根理论备忘录设计的分类技术（见图 5.1 和图 5.2）。

克拉克的情境地图（situational maps）认真地采用了格拉泽（Glaser，1998）的格言“一切都是数据”，因为她把结构属性放到了地图中，在社会世界和竞技场中设定了它们的位置。形成和限定研究情境的结构性因素，可以绘制在地图中。她的策略让我们把分析从微观发展到组织的水平，使不直观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变得直观了。同样，这一方法使得不同的社会世界和竞技场之间的关系和过程变得直观了，而它们通常则隐藏起来难以被看到。接下来的情境分析对被研究的社会世界结构进行了解释，提供了临时的、灵活的、解释性的理论。

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auss & Corbin，1990，1998）引入了条件/结果矩阵，让它更清晰地呈现经验世界的交往以及它们的互动和相互关系。特别是，他们把这个矩阵作为思考宏观和微观关系的分析工具，这些关系可能形成了研究者所研究的情境。他们提供了对条件/结果矩阵的描述，作为同心而彼此联系的圆圈，在 1998 年的版本中，他们把个人放在了核心位置（在 Stauss & Corbin，1990 年版中他们是把行动放在核心位置）。同心圆代表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单位。

条件/结果矩阵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的思考超越微观社会结构和直接互动，进入更大的社会条件和结果中。施特劳斯和科尔宾提出，条件/结果矩阵不仅有助于定位条件发生的环境和条件之间的路径，也有助于研究者进行理论抽样。他们把矩阵作为发展理论的一种途径，它能够使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超越现象的描述。这个条件/结果矩阵是一种*应用*的技术；因此，它会让你推



图 5.1 抽象的情境地图,混乱版

来源:Clarke,2003:564. © 2003 b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Used with permission.

动自己的数据和分析沿着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你的
119 生成性分析表明,以这种方式绘制条件、情境和结果地图符合你
的数据,你就想要使用这个矩阵了。

整合备忘录

如何整合备忘录呢?对过程进行排序是整合这些片段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如果你把论文建立在一个主要类属上,那么你必须判断,有关这个类属的备忘录怎样组合起来最好。过程分析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秩序,但是分析性类属可以有一个对你的读者更有意义的微妙秩序。比如,在我对说出病情的分析中,
120 开始时避免说出病情,之后估计说出病情的后果,然后说出病情,这个秩序就是有意义的。把这个例子放到另一个领域,避免公布

消息以及冒险公布消息——个人的、专业的以及组织的公布——可以发生在所有类型的工作环境中。一个公司的经理知道,要使信息最小化就要限制传播的范围,首先他会避免公开,然后试着告诉他所信任的员工,最后进行策略性的一般性公告。在这个例子中,公开信息的两难处境与信息公开发布的类型和程度、或者隐蔽信息被发现的可能性以及影响信息公开的其他条件有关。

人的因素/行动者 比如,个人 集体行动者 具体的组织	**非人为因素** 比如,技术 物质基础 专门化的知识 物质的"东西"
政治/经济方面 比如,国家 具体的工业 地方的/区域的/全球的秩序 政党	**社会—文化方面** 比如,大众传媒 宗教 少数民族 种族
时间维度 比如,历史方面 季节方面 危机时刻	**空间维度** 比如,地理
对非人类行为的零散建构 正如在情境中所发现的	**对人类行动的松散建构** 正如情境中所发现的
主要问题/争议(经常被争论) 正如在情境中看到的, 看位置地图	更多象征的维度 比如,美学因素 感情的/情绪的因素 道德的/伦理的因素
其他类型的因素 正如在情境中所发现的	**话语** 比如,行动者、行为以及/或者其他特殊因素规范的期待;流行文化的话语;具体情境的话语

图 5.2 抽象情境地图,有序版

来源:Clarke,2003:564. © 2003,b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Used with permi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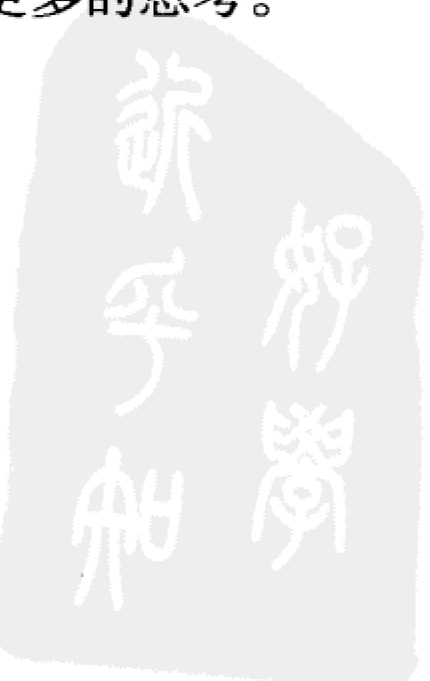
很多扎根理论文献强调,要充分展开对一个类属的写作。但是,你可能需要把玩好几个类属。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分类就要注意这些类属怎样才能彼此协调,或者它们是怎样不协调的。之后的整合可能反映了你在经验世界所发现的内容。整合使得关系变得可理解了。早期的扎根理论研究强调因果关系,但是现在很多学者的目标是解释性理解。这种理解要视环境条件而定。

121 通过对备忘录进行分类和整合,你可以解释那些你无意识接受的、意义含糊的理论代码。此外,这些策略会促使你通过类属间的理论联系来进行思考,即使那些类属可能还不很清晰。画图使得你的理论类属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了。所有这三个策略都能为建构书面报告以及形成导论和撰写理论框架激发思想的灵感。

小 结

像编码和备忘录撰写一样,理论抽样在扎根理论中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它所阐明的这种实践,最优秀的质性研究者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论抽样过程中在类属和数据之间来回往返有助于提升类属的概念水平,并扩展它们的范围。在形成你的类属时,你可以判断把哪个类属作为分析的主要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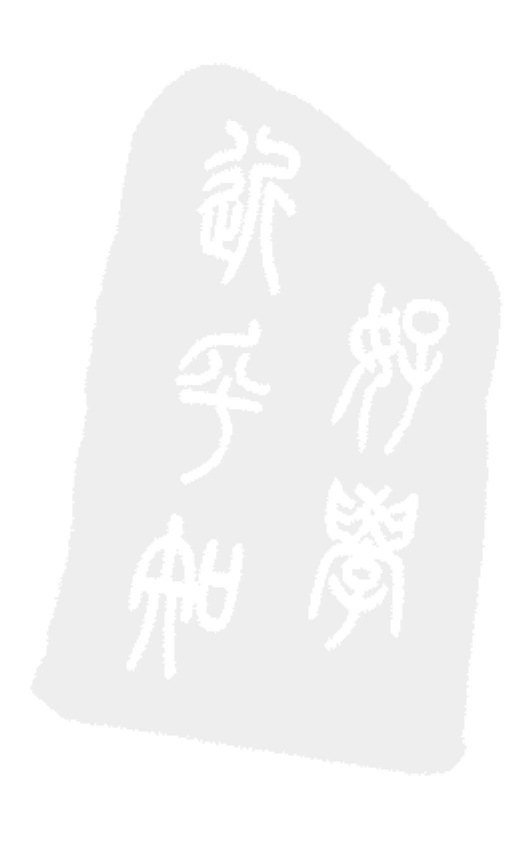
通过进行理论抽样、饱和和分类,你形成了犀利的类属和透彻的分析。你会在越来越抽象的备忘录中获得很多东西,抓住这些东西会使你最后的作品获益匪浅。分类和绘图会给你带来最初的分析框架。现在,你可以开始撰写报告的第一稿了,但是你可能希望首先对扎根理论中的理论化有更多的思考。



第6章 在扎根理论研究中重构理论

Reconstructing Theory in Grounded Theory Studies

扎根理论家谈了很多理论，也谈了很多理论的建构，但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本章，我们停下来逗留片刻，思考理论意味着什么，扎根理论家是怎样在作为*实践*的理论化过程中进行工作的。我从扎根理论研究中有关理论化的一段引文开始，然后再返回来思考：理论是什么？通过把理论的一般定义看作两种不同的传统，我们可以搞清楚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和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前辈们是怎样体现这两种传统的。重新思考对于扎根理论的批评有助于重新思考和重申我们的理论任务。为了鼓励你发展自己的理论敏感性，我向你介绍了一些方法，你可以在扩展理论范围时用这些方法探测自己思想的深度。最后，我们看一看，三种不同的扎根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展现理论化过程的，并在结尾处反思扎根理论家是如何成为他们理论化过程的一部分的。



在扎根理论中什么可以作为*理论*呢?研究者怎样使他们的扎根理论分析具有理论性呢?也就是说,他们是怎样从分析的过程到扎根理论的形成的?扎根理论常常采用什么样的路线?为了评估扎根理论研究是否、怎样、为什么以及何时提供了真实的理论,需要后退一步问一问:什么是理论?理论一词在扎根理论话语中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很多扎根理论家谈论理论,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许多扎根理论家认为他们建构了理论,但他们真的建构了吗?再仔细地考察可能会很有帮助。通过分解一些扎根理论,我为你重构了它们的逻辑。

我们从思考扎根理论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开始,想一想我从关于慢性病体验的研究中所摘录的这部分内容。它是一篇论文的一部分,包含了清晰的理论逻辑。在分析中,我关注的是患有严重慢性病的人如何努力实现有价值的自我。① 他们不仅努力寻找定义自己的方式,也在努力改变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我发现,那些身体有病的人形成的是未来的身份目标,特别是病情突然发生时。我在努力捕捉这些有时明显但常常隐蔽起来的身份目标的意义和内涵,来形成一个理论表达。很多人打算与疾病斗争,打算在常规的世界里参与竞争。当疾病和伤残刚刚出现时,他们支持这些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通常会降低自己的身份目标。下面这段摘录体现了我的实质理论的逻辑,揭示了身份目标和正在出现的身份等级之间的关系。

124

> 当病人随着时间变化选择不同的偏爱的身份类型时,身份等级就显现出来了,反映出要实现具体的愿望和目标会碰到的困难。所偏爱的身份类型包括了身份等级中具体的身份水平。这些身份水平包括:①非凡的社会身份,在常规世界要获得这种身份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成就;②康复后的自我,患病前身份的重构;③偶然的个人身份,由于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一种假设性的可能的身份、尽管是不确定的;④被救治的自我,在变得必须依赖别人时,在有价值的行动或特征的基础上,保持过去的自我。体验愈益严重的病情常常意味

①1983 年我在完成了对这部分资料的大约一章篇幅的分析后,于 1987 年发表了这部分内容。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列出了这些中心观点(1973),但是在中间阶段,我搜集了更多的数据来完善这些类属。

着降低身份目标，在身份等级中寻求更低的目标。简言之，降低身份目标意味着获得低一些的身份目标。（Charmaz，1987，p. 285）

在这段叙述中，我指出，研究对象在努力获得一个有价值的自我，因为他们并不想变得无用。对他们来说，无用就意味着成为一个无价值的人。这个假设告诉了我们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行动。身份等级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关注身份等级中的变动。人们并不总是在身份等级中垂直下降。有些人还会在身份等级中攀升。我注意到一些康复希望渺茫的重病患者，会从最初陷入疾病转变到逐渐做出了不起的成绩。他们可能从不同的起点开始，在患病的过程中，根据各自对自己处境的定义，在身份等级中上上下下。

我的部分任务就是解释这些慢性病患者的身份目标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如果他们的确采取了行动的话，就发现这些行动。因此，我要实现下面的目标：①在身份等级中逐渐丰富每个类属的属性，并展现它们的组合方式；②使研究对象选择所偏爱身份的条件具体化；③考虑他们用来实现其身份目标的资源；④判断他们在身份等级上什么时候上升，什么时候下降；⑤描述他们试图协调和建立所偏爱的可能身份的社会环境；⑥解释不同的身份水平是怎样预示不同的自我的。这些分析目标都有助于提升理论水平和分析密度。看看我是怎样把它们组织在论文中的：

> *一个人关于自我以及为了自我的期待*，是他或她定义自己最偏爱身份的重要源泉。人们不仅通过行动，也通过他们的期望来保持自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年龄因素就影响期望。年轻人要面对聚集在职业、感情和生活方式周围的、同龄人都要面对的所有身份问题。这些年轻人通常都要勇敢地去实现他们最想要的身份。如果生活被久病缠身严重打断，他们会认为这不应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多其他的被访者也认同这位女士的说法："我希望在我 75 岁的时候才得这种扰乱我生活的慢性病，但是现在却是 29 岁。谁会想到呢？"（Charmaz，1987，p. 292）

125

我在呈现这些观点以及观点之间的关系时，对身份等级中的上下移动的分析采用了一种中立、客观的语调。这段摘录模糊了

我分析中的建构性,而从这之后,建构性在我的研究中就变得越来越明显起来。上面这段话的中立写作风格把我对于身份等级的想法和我对它们的分析性建构分割开来了,但又把它们作为理论概念联系在了一起。很多质性研究中的分析话语都采用中立的语调,这不仅消除了质性研究的解释性行为,而且还消除了研究现场和分析处理中的含糊性(Charmaz & Mitchell, 1996)。

现在我们需要审视一下上面的这段摘录,想一想是什么使得其中的分析成为理论——或者说具有理论性。这种分析类型对于理论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假设?我们怎样把发展扎根理论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和它们理论报告中的客观主义表述做出协调呢?我们应该怎样在建构主义的方向上使用扎根理论?为了使理论化过程更为透明,我们需要看看扎根理论家是怎样建构他们的理论的。

什么是理论

在社会科学的思维中,“理论”意味着什么?哪些理论能够真正成为扎根理论?如何形成扎根理论,一个完整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原因在于,理论是什么还没有解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充斥着带有抱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不同意见,扎根理论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认识论基础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些不同意见可能在关于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的讨论中表现出来并得以强化。当我们透过表面观察事物时,我们会发现,在扎根理论家中存在着对理论的不同理解。有些对于理论的定义很严格,而有些却很灵活。

思考扎根理论中理论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看到更宽广的理论定义。我用古典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理论视角来展现这些更宽广的定义,并发现其中的主要主题。

理论的实证主义定义

可能最流行的理论定义来自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关于理论的定义是将其看作关于抽象概念之间关系的命题,涵盖了广泛的经验观察领域。实证主义者把理论概念作为变量,对概念进行了

操作性定义，并通过精确的、可重复的经验评估来验证假设。这些定义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①它们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②研究类教科书的作者接受了它们，并对其进行鼓吹。

126

在这种看法中，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和*预测*。实证主义的目标是简洁、一般化、普遍性，同时减少经验客体和事件，这样才能被概念所包容。实证主义理论寻求原因、支持决定论的解释，并且强调一般化和普遍性。简言之，实证主义理论包括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目的是：

实证主义理论寻求原因、支持决定论的解释，并且强调一般化和普遍性。

- 把概念作为变量。
- 使概念间的关系具体化。
- 解释和预测这些关系。
- 使知识系统化。
- 通过假设验证来证明理论关系。
- 为研究产生假设。

由于重视简洁，这些理论在形式上是讲究的，在陈述上是直接的；然而，这些理论会由于过分简单化的行动模型而导致解释的狭隘和简化主义。

理论的解释学定义

理论的另一个定义强调*理解*（understanding），而不是说明（explanation）。这个定义的支持者把理论理解作为抽象的和解释性的；从理论中获得的理解依赖于理论家对被研究现象的解释。解释理论允许非确定性，并不追求因果关系，优先考虑展示模型和联系而不是线性推理。乔治·里策尔和道格拉斯·古德曼（Ritzer & Goodman, 2004）关于古典社会学理论（采用抽象的、一般化的概念）标准的讨论解释了这个观点。对于里策尔和古德曼来说，理论具有广泛的范围，提供了宽广的应用，而且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考虑到他们关注的是古典理论，因而理论也是经受了时间检验的。他们声称，他们的定义与以解释和预测为目的的理论正好相反。里策尔和古德曼对理论的定义在其对理解

和适用范围的重视中有很强的解释学成分。

解释学的理论要求对被研究现象进行具有想象力的理解。这种理论类型假定现实是生成的、多元的;事实和价值的联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真理是临时的;社会生活是过程性的。这样解释学的理论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是完全相容的,共享着这些假设。米德用一种复杂的行动观点作为起点来进行分析,包括人们在互动中对其他人角色和反应的理解。

解释学的理论要求对研究现象进行具有想象力的理解。这种理论类型假定现实是生成的、多元的;事实和价值的联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真理是临时的;社会生活是过程性的。

127

我们解释研究对象的意义和行动,他们也解释我们的。当社会建构主义原则在不同的学者那里获得支持时,特别是从 1960 年代以来,理论中的解释学循环(the interpretive turn)就得到了关注。这一理论方法重视实践和行动。社会建构主义者不是解释现实,而是观察多元的现实,然后思考:人们认为*什么*是真实的?他们*如何*建构现实,*如何*按照他们关于现实的观点行动?这样,知识以及理论——就被放在具体的位置、视角和经验中了。简言之,解释学的理论目标在于:

- 对被研究现象进行理论化,用抽象的术语理解它。
- 说明与范围、深度、力量以及相关性有关的理论命题。
- 在理论化过程中接受主观性以及协商、对话和理解的角色。
- 提供具有想象力的解释。

解释学的理论常常反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我在下面关于建构主义和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讨论中会具体论述。现在,我们认为*作为理论*的扎根理论,不仅包括实证主义倾向,也包括解释主义倾向。格拉泽(Glaser,1978,1992,1998,2003)对理论的处理就包含着很强的实证主义倾向。他重视作为变量的理论类属的形成,采用概念指示(indicator-concept)的方法,力求脱离语境(context-free)而又可变化的理论命题,目的是"在解释力中获得简洁和解释广度(scope)"(1992,p. 116)。格拉泽重视那些使用比较方法的研究,认为理论分析能力的发展来自比较研究的生成性;然而

他把生成的类属基本上作为一种自动的结果。在他那里,解释学的理解仍然比不上实证主义的因素清晰。

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 Corbin,1998)关于理论的观点有一些实证主义的倾向,但是更为强调概念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理论意味着"一套在关系命题中相互联系的完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可以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p. 15)。然而,他们趋向于建构理论的立场,也认可解释主义的观点。科尔宾(Corbin,1998)认识到,分析意味着研究者解释数据,但是又暗示,这样的解释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她写道,"怎么能抹煞人或事物是来自比较过程这一事实呢? 一个分析者只能在阅读数据的基础上来进行比较。人们希望,通过'紧贴数据'把分析者丢在解释过程之外,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p. 123)。施特劳斯和科尔宾在理论和描述之间做了清晰的区分,他们认为描述是一个人用词语来激发客体、事件以及经验在头脑中的印象。对于他们来说,理论更多是抽象的和说明性的。

让我们转向文化理论,阿拉苏塔瑞(Alasuutari,1996)进一步区分了人们理解世界的通常方式和理论的概念意义之间的差别。阿拉苏塔瑞采纳了舒茨(Schutz, 1967)关于理论的复杂观点,认为,理论家检验了业余人士的解释规则,因此超越了业余人士的概念。 128

> 一个人要和研究对象的视角保持一步远的距离,不是通过表明他们的视角是狭窄的或不对的来实现,而是通过研究在连续的社会现实中这些视角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来实现。理论就这样解构了我们建构现实和社会条件的方式,解构了我们建构作为现实主体的自我的方式。理论不能和业余的思考竞争,因为理论的目的是在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事例中理解业余思考。(Alasuutari,1996,p. 382)

阿拉苏塔瑞显然不是把理论定义为关于世界的普遍化命题,不认为研究者可以从这里由假设推论出对当地具体现象的解释。相反,对于他来说,理论提供了*解释的框架*,通过这些框架来看待现实。虽然阿拉苏塔瑞认识到业余人士和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解释框架,不过我们可能会发现他们都理解业余人士的观点和行动。

阿拉苏塔瑞对当地现场和具体事件的认真解释,和对它们的理论化是结合起来的,这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了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他的研究工作体现了一个老练的民族志学者的敏感性和最好的扎根理论家所具有的理论敏感性的结合。

理论化的修辞、范围和实践

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还是解释主义的,理论是修辞性的——尽管解释学理论家比实证主义对手更有可能承认这一点。一个理论家试图让读者相信,某些结论来自一组假设(Markovsky,2004)。这样,理论表现了关于世界的命题以及世界中的关系,虽然有时会消除背景因素,只剩下似乎中立的陈述。对于那些支持实证主义客观性观念的人,这种消除和中立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说服力。

在思考实证主义或解释学理论时,我们需要考虑在学科内部、学科之上以及学科之间理论的范围(reach)和力量(power)。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说,"理论就是你所记着的东西"(2004a;也见 Davis,1971)。理论闪烁着具有启示性的见解,理解着那些复杂的问题和模糊的线索。观念要适合现实。你以前只能感觉的现象以及现象之间的关系变得直观了。理论还能做更多的事。一个理论能够转变你的观点,改变你的意识。通过理论,你能够从不同的立场看这个世界,产生关于世界的新的意义。理论有着内部的逻辑,基本上能够结合成连贯的形式。

我所偏爱的理论化(theorizing)——是理论化,而不是理论——是自然而然的(unabashedly)解释。理论化是*实践*。它需要参与世界的实践行动,也需要建构关于世界的以及处在世界中的抽象理解的实践行动。扎根理论方法的基本贡献在于为解释性的理论实践提供了指导,而不是提供了一幅理论化产品的蓝图。

129

解释学的理论化来自社会建构主义的假设,支持符号互动论、民族志方法、文化研究和现象学话语,以及叙事分析。这些理论化不只局限于个体行动者或微观情境,它也不应当如此。解释学理论化能够超越个人处境和直接的互动。梅因斯(Maines,2001)提出了关于符号互动主义的论题,阿拉苏塔瑞(Alasuutari,1995,1996,2004)以其在文化研究中的优势指出了一种研究路线。从理论家的阵营来说,柯林斯(Collins, 2004b)坚持把情境(situa-

tion)而非个人作为19世纪古典理论和当代理论问题之间理论化连续的起点。他看到了个人身上的社会性,探究了礼仪的不同强度怎样形成了社会参与的形式,怎样形成了地方性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在集体层面上涉及更大的社会结构。施特劳斯对于协商秩序(negotiate orders)(1978; Strauss, Schatzman, Bucher, Ehrlich, & Sabshin, 1963)以及社会世界(1978a)的分析引发了在组织和集体层面上的解释性探究。施特劳斯和他的同事(Strauss, 1963)不是把医院的结构作为静态来研究,而是通过对医院不同组织水平的人和部门进行分析,揭示了它的动态过程本质。他们对作为协商秩序的医院的解释以及对这种秩序的分析,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施特劳斯等人展示了研究者可以怎样研究个人以及具体行动的结构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解释学的理论化能够把使观点产生意义的工具放到网络分析方法之中。柯林斯(Collins,2004b)和克拉克(Clarke,2003,2005)都为进行中观和宏观水平分析的研究提出了方法论策略。柯林斯也认可用网络分析来研究环境的方法,不过扎根理论家会发现克拉克的方法让他们有更多的途径来了解具体环境和互动类型。当研究者使用这两种方法时,他们会发现克拉克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和位置地图能够扩大网络分析,并使其更具解释力。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和客观主义扎根理论

> 为了对比清晰,我把这些形式并列放在这里;然而,判断一个具体的研究是建构主义还是客观主义,你需要看它的关键性特征所遵照的是哪个传统。

在本书中,我把扎根理论方法的使用和理论化都作为*社会行动*,研究者与当时当地的其他人一起建构了这些*社会行动*。除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同事、教师、学生、机构审察委员会以及数不清的其他人都可能活跃在我们的头脑中,在我们与他们直接互动很久之后,影响着我们对研究的建构。我们和数据互动,产生了关于数据的理论。但是我们并不生活在社会真空之中。

我们关于理论和研究的概念是怎样影响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所坚持的原则呢？正如我所提到的,很多扎根理论家之间的争论和其他同行的批评都源于作者立场的不同,他们或者处于解释学传统之中,或者处于实证主义传统之中。我认为,扎根理论从其诞生以来就采用了相当不同的形式: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和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这就是扎根理论家之间立场差异的原因(Charmaz, 2000, 2001)。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是解释学传统的一部分,而客观主义扎根理论来自实证主义。为了对比清晰,我把这些形式并列放在这里;然而,判断一个具体的研究是建构主义还是客观主义,你需要看它的关键性特征所遵照的是哪个传统。

130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我在前面章节已经提到,建构主义方法优先考虑的就是研究过程本身,认为数据和分析都来自与研究对象共享的经验和关系,以及其他的数据来源(Charmaz, 1990, 1995b, 2000, 2001; Charmaz & Mitchell, 1996)。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直接存在于解释学传统中。

> 建构主义方法优先考虑的就是研究过程本身,把数据和分析都看作是来自与研究对象共享的经验和关系(Charmaz, 1990, 1995b, 2000, 2001; Charmaz & Mitchell, 1996)。

建构主义研究的是对象*怎样*,有时是*为什么*,建构具体环境中的意义和行动。正如我在第2章所解释的,我们要尽可能地从经验内部来解释,但是要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复制研究对象的经验。建构主义方法不仅仅意味着要观察个体如何看待他们的环境。它不仅仅是把研究对象的解释理论化,还要承认最终的理论只是其中的一种解释(Bryant, 2002; Charmaz, 2000, 2002a)。理论要*依赖*研究者的观点;理论不会也不能处于研究者的观点之外。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观点,尽管他们对这些观点的理论表达可能不同。

扎根理论家可以从西尔弗曼(Silverman, 2004)对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评论中借用一些观点。西尔弗曼认为,分析者只有在发现人们如何建构意义和行动之后,才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做。当然,对人们建构行动和意义的方式进行细致

的分析，能让扎根理论家发现其中的一些原因，尽管有时这些原因会和方式一起出现。

建构主义方法的逻辑扩展意味着去了解被研究的经验如何、何时以及什么程度上植根于更大的、经常性的、隐蔽的位置、网络、环境和关系中。接下来，不仅充满差异和区别的权力等级、沟通等级以及机会等级变得直观了，甚至人们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也变得直观起来。建构主义方法意味着对产生和保持这些差异和区别的条件保持警惕。拥有能够指引经验的材料，不仅会带来丰富的数据，还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这样人们才能看到差异和区别。当扎根理论研究非常小的时候，它们的风险在于和社会背景和情境失去联系。这样，研究者如果把经验作为分离的、片段的和孤立的内容，就会削弱他们分析的潜在力量。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家对研究过程和结果都采取了反思的立场，思考他们的理论是*怎样*进展的，这就涉及对我早期观点——，即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会对意义和行动做出解释——的反思。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家认为，数据和分析都是社会建构的，反映了他们的理论成果所承载的内容（Bryant，2002，2003；Charmaz，2000；Hall & Callery，2001；Thorne，Jensen，Kearney，Noblit & Sandelowski，2004）。在这种观点看来，任何分析都是情境性的，都处于具体的时间、地点、文化和环境之中。因为建构主义者认为事实和价值是相互关联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以及看不到的都依赖于价值。这样，建构主义者试图发现自己的先入之见，并努力发现它们是怎样对研究产生影响的。他们发现，扎根理论家会在对自己最初的假设缺乏认识的情况下把先入之见引入研究。这样，建构主义使研究者不仅反思研究对象的解释，也研究他们*自己的*解释。　131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

>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存在于实证主义传统中，关注作为真实存在的数据本身，而并不关注数据的产生过程。

扎根理论的客观主义方法和建构主义方法相反。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存在于实证主义传统中，关注作为真实存在的数据本身，而并不关注数据的产生过程。

这种立场不仅忽视数据产生的社会环境以及研究者的影响，而且也常常忽视扎根理论家和他们

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要注意,大部分已发表的报告的访谈摘录(包括我自己的),都没有让你了解访谈者和研究对象是如何产生数据的。一个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家认为,数据代表了有关可知世界的客观事实。数据已经存在于世界中;研究者发现了它们,并从它们那里"发现"了理论。

在这种方法中,扎根理论家用来理解数据的概念意义来自数据自身;意义内在于数据中,扎根理论家发现了它(Corbin & Strauss, 1990; Glaser, 1978; Glaser & Strauss, 1967)。这种观点认为外部现实等待着发现,等待着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来记录下关于它的事实。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家相信,对他们方法的认真应用产生了理论理解。因此,他们的角色更像是研究过程的一个承载者,而不是研究过程的产生者。有了这样的假设,客观主义的支持者会比建构主义者坚持更严格地追随扎根理论步骤。①

132

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家与研究对象以及他们的现实之间,分离开来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他们可能采用了观察的方法。吊诡(paradoxically,似非而是)的是,价值无涉的中立立场是一种价值立场。与他们关于中立的假设一致,这些扎根理论家把他们在书面报告中描述研究对象的方式当作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承担着权威专家的角色,把客观主义的观点带进了研究。

格拉泽(Glaser,1978,1992,1998,2001,2003)说明了客观主义立场的重要方面,尽管他轻视对精确数据的追求,认为扎根理论并不是一种证实性(verification)的方法。② 我同意格拉泽关于证实问题的看法。在我看来,检验猜想和确证生成的观念并不等同于证实,特别是把证实当作进行系统量化研究的程序(量化研究假设,在研究现象之前要形成关于现象的确定的定义)时。我认为扎根理论家不是要贡献证实的知识,而是要提供因果解释。

格拉泽(Glaser,2002)把数据作为独立于研究者的东西,认为数据并不受研究者解释能力的影响。格拉泽认为,如果研究者偶然解释了他们的数据的话,那么这些数据是通过观察很多案例而

---

①更完整的关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和客观主义扎根理论的区分比较,见:Charmaz, 2000, 2006a。

②我同意格拉泽(Glaser,1992)关于证实问题上的看法,尽管它出现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中。在我看来,检验猜想和确证观念并不等同于证实。我认为扎根理论家不是要贡献证实的知识,而是要提供因果解释。

"得到的客观性"。这一观点和格拉泽对饱和问题中的小样本进行积极捍卫形成了矛盾。显然,案例的数量可能并不总等同于样本的规模,但是在很多扎根理论研究中它们是很接近的。

研究很多案例很重要,部分原因是研究者可能会由此意识到他们对问题的先入之见。但是,这个研究不会挑战他们对于世界的基本假设、认知世界的方式或者在世界中的行动。研究者根深蒂固的假设会削弱观察世界的多种视角,过滤掉这些视角产生的对于世界的印象。我们给数据所下的定义以及我们看待数据的方式都很重要,因为这些行为决定了我们会看到什么和了解到什么。如果不进行反思,研究者就会把他们自己默认的假设和解释提升到"客观"的地位。我们的假设、互动以及解释影响着社会过程,而社会过程构成研究的各个阶段。

格拉泽认为观察很多案例很重要,这是正确的。很多理论家,包括那些被未经检验的假设限制了视野的人,都从观察很多案例获益,因为丰富的案例加强了他们对于经验世界的理解,发现了类属中的差异。当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去了解,特别是当我们努力发现研究对象在说什么以及他们的世界是什么样时。

建构主义方法并不遵循实证主义对于变量分析的定义,也不遵循实证主义关于在被研究现象中发现一个单一的基本过程或核心类属的观点。建构主义观点认为,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obdurate),而又处于不断变化中,但是又承认多样的地方世界(local world)和多元的现实,主张人们的行动影响着他们的地方世界以及更大的世界。这样,采用建构主义方法的人目的就在于展现特殊世界、观点和行动的复杂性。

在扎根理论中进行理论化

133

批评与更新

扎根理论的理论在哪儿?虽然声称使用了扎根理论方法的研究者要比承认建构了实质性理论或形式理论的人要多,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持有某种类型的理论观念。如果你细读那些声称坚

持扎根理论的作者的文章,看他们如何解释一个正完成的扎根理论,你就可能发现如下不同的观点:①经验的普遍化,②一个类属,③一种倾向(a predisposition),④对过程的解释,⑤变量间的关系,⑥解释,⑦抽象理解,⑧描述。最近,格拉泽(Glaser,2001)把扎根理论描述为"解决一个主要问题(concern)的理论",可以以很多方式进行理论编码。[①] 关于扎根理论中的理论是什么,存在大量不同的主张,这使得评估扎根理论家产生理论的程度变得更为复杂。一些观察者看到了研究者在扎根理论之名下所做的事情(Becker, 1998; Charmaz, 1995b; Silverman, 2001),并指出大部分的研究是描述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当然,描述使得概念化成为可能,但是理论处理也是分析性的和抽象的。

其他观察者解决的是扎根理论的逻辑问题。当然很多批评(Atkinson, Coffey, & Delamont, 2003; Bulmer, 1979; Dey, 1999, 2004; Emerson, 1983, 2004; Layder, 1998)挑战了他们在扎根理论中发现的关于先入之见、纯归纳以及程序的假设和规定。当然,不同流派的扎根理论家相互批评对方的方法,在本书中可以明显看到(Bryant, 2002, 2003; Charmaz, 2000, 2001c, 2005; Clark, 2005; Corbin, 1998; Glaser, 1992, 2002, 2003; Melia, 1996; Robrecht, 1995; Stern, 1994a; Wilson & Hutchinson, 1996)。

批评越来越多是有益于讨论的。布拉瓦里(Burawory,1991)说,扎根理论产生了经验的一般化,产生了从时间和空间抽离出来的一般性解释。[②] 这里有三点是相关的:第一,和布拉瓦里相比,我认为扎根理论的主要力量在于在多个实质领域的应用。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怎样*以及*何时*推动我们的分析,并思考我们在扩展这些分析前是否对现象已经足够熟悉了。[③] 第二,布拉瓦里认

---

①格拉泽(Glaser,2001)现在认为研究者要发现这个主要关注点(main concern),这表明他和早期观点有了很大差别。他(Glaser,1992)曾主张研究者应该在背景中分析主要关注点,而且研究对象会告诉研究者这个关注点是什么。

②布拉瓦里(Burawory,2001)号召"扎根的全球化(grounded globalization)"(2000,p. 341)和"扎根于全球化(grounding globalization)"的日程表(后者出现在后来的*Global Ethnography*(2000,pp. 337-373)中)。虽然他的概念间接提到了扎根理论,但他并没有论述或引用这一理论。

③我的这一观点补充了上面提到的希尔弗曼(Silverman,2004,p. 341)的主张。

为，和扎根理论不同，经他扩展的案例方法（Burawory，1991）发现了情境的特殊性，解释了宏观基础如何形成了情境的特殊性，并为全球化的再生产和维持提供了基础（Burawory，2000）。他认为扎根理论会导致非结构性（astructural）的分析，并暗示归纳方法和脱离背景的普遍化会有助于非结构性分析的产生。

我认为，布拉瓦里以为扎根理论所不能做的，恰恰是扎根理论提供给方法让我们去做的（Charmaz，2005）。情境化的扎根理论可以从使概念敏感化开始，即提出诸如权力、全球化和差异之类的概念，并以归纳性的分析（inductive analyses）结束，即让地方世界和更大的社会世界之间的联系理论化。

去情境化分析的问题引起了布拉瓦里未曾提到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扎根理论家在没有参与情境或没有意识到情境或对情境不清楚时，都可能产生去情境化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掩盖了扎根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因素的重要性。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家努力获得一般性以及去情境化的结果。这些扎根理论家通过在不同的研究现场穿梭（move across）建构去情境化的分析，与此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可能会把数据强行放到他们早期的概括（generalization）中，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情境作为新数据的基础。同样，寻求去情境化的一般化也会减少产生理论复杂性的机会，因为去情境化会产生（过分的）简单化。第三，布拉瓦里认为一些来自具体研究的经验一般化可以作为关于更广大现实（larger reality）的一般陈述，这是对的。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些一般化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赋予理论的地位。谁能赋予它们理论的地位——或者谁不能给予它们理论的地位？为了什么目的？对理论化的强调让我们考虑，谁在进行理论化，以及代表什么类型的权威或进行的是什么类型的权威化。

134

布拉瓦里声称，扎根理论并不考虑微观环境中的权力，而且“它压制更广泛的宏观权力，而实际上这些宏观权力既限制了变化，也在微观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1991，p. 282）。布拉瓦里认为扎根理论的创始人并不解决权力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是把对权力的忽视作为扎根方法自身内在的一个弱点，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方法忽视了权力？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对权力的关注。莱德尔（Layder，1998，p. 10）提出了同样令人质疑的批评，他认为，扎根理论“在认识论上（知识的有效性）和本体论上（它的社会现

实观)否定现象的存在,而那些现象不仅仅是行为性的(像市场、科层制和统治形式)”。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早期的作者并不解决权力或者宏观力量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扎根理论方法不能处理这些问题。它可能意味着追求数据搜集的混和的方法形式,其中包括了对文献的使用。常(Chang, 2000,音译)关于中国阶级的社会转型的研究为扎根理论家如何研究权力和宏观过程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在这个领域使用扎根理论方法能在旧的理论领域产生新的视野。

布拉瓦里对扎根理论中客观主义因素的关注使他遗漏了扎根理论的建构主义潜能。与布拉瓦里和莱德尔的主张不同,我认为,我们正是应该在这些领域用扎根理论方法获得关于社会正义问题的新鲜看法(Charmaz,2005b)。克拉克(Clarke,2005)也鼓励扎根理论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扎根理论内部也在争论,什么才是扎根理论,以及它应该坚持什么方向。有时来自外面的批评使得早期著作中的命题固化了,把它们变成了静态的宣告,而不是把它们看成起点,或作为一个方法在发展中的历史性陈述。大部分批评并没有涉猎扎根理论的所有资源,一些人在《扎根理论的发现》一书之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阅读其他的资料。其他人对这种方法的解释也很狭隘。这些批评通常忽视四个关键点:①理论化是一种行动;②扎根理论方法为继续进行这种行动提供了建构性的方法;③研究问题和研究者展开的兴趣形成了这个行动的*内容*,而不是方法;④理论化的产品反映了研究者是如何按照这三点行动的。

135

批评者把扎根理论的本质固化(reification)了,由此又把他们假定的扎根理论的限制也进一步固化了。接下来,*他们的*宣告有时又固化为这些内在事实,即扎根理论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它。这些固化影响了其他的解释者、实践者和学习这种方法的学生。关于扎根理论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有一些观念是未经验证的,但这些观念却使得扎根理论研究内容的边界限制变成了现实。比如这一说法,扎根理论家不能用他们的方法来使权力理论化。对扎根理论探究形式的有限认识也产生了其他类型的固化。比如,把扎根理论只是作为一种变量分析,这会产生一种归谬法的框架,并鼓励使用已有的那些“变量”。因此,肤浅的研究会在没有对类属进行解释的情况下就限定这个类属的边界。

理论一般化继续是未兑现的承诺和扎根理论的潜在可能。正如丹·米勒(Miller,2000,p.400)所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扎根理论(Glaser & Strauss, 1967)经常作为一种方法策略提起,扎根理论却很少被实际应用。”

通过理论化发展理论敏感性

像近期的其他一些作品一样(Glaser,1998;Goulding,2000;Locke,2001;Strauss & Corbin, 1998),本书使得扎根理论方法的逻辑和序列更为清晰了。早期扎根理论家预测到了建构理论对发展“理论敏感性”的作用(Glaser,1998),但是扎根理论家怎样才能做到?通过研究扎根理论家的行动,我们能够获得什么线索?理论化的行动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理论化意味着停下来、思考和再次重新思考。我们把被研究的经验之流停下来,分解开来。要获得理论敏感性,我们要从多元的立场观察被研究的生活,进行比较,遵循一些线索,并依据某些观点。因为你在通过理论化行动确定自己的方向,所以你可能无法预测到终点,或者可能在这条路上停下来。

理论化过程中的这些行动会让你*看到*可能性,*建*立联系,并*提出*问题。扎根理论方法会让你保持理论的开放性,让你避免引入或施加固有的印象或不假思索的回答。如何进行理论化以及如何建构理论化的内容,会根据你在这个领域所发现内容的不同而不同。在进行理论化的时候,你向下要抓住基础,向上要进行抽象,并要深入经验之中。理论化的内容要切入被研究生活的核心,要提出关于它的新问题。

在进行理论化的时候,你向下要抓住基础,向上要进行抽象,并要深入经验之中。理论化的内容要切入被研究生活的核心,要提出关于它的新问题。

虽然工具可能帮得上忙,但建构理论并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理论的游戏性要加入进来。奇思妙想和好奇心会让你看到平凡中的新奇。对意料之外的事物保持开放,会扩展你关于被研究生活的想法以及随后的理论可能性。你辛勤的工作要由那些最适合数据的想法来驾驭,并使其产生成果。

136

和格拉泽(Glaser,1978)的方法原则一致,我也强调在编码和备忘录撰写中使用动名词。接受动名词有助于产生理论的敏感

性,因为这些词会提醒我们摆脱静态的问题,进入动态的过程。① 动名词推动了关于行动(大的行动和小的行动)的思考。如果你能让你的代码关注行动,你就有可能看到结果,并产生联系。如果你的动名词很快就让位于问题的编码,那么你虽然可以综合和概括数据,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可能会更加不清晰。这样,我建议重新重视行动和过程,而不是个体,以此作为建构理论和超越个体类属类型的一个策略。② 在我对身份等级中身份水平的分析中,这些类属来自人们的目的和行动,而不是固定在某些个人身上。个人能够而且的确在身份等级中上下移动,一定的社会条件能够推动这种移动,即使有其他条件限制着。

仔细观察过程分析,会有助于你建构理论。③ 对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你建构理论,因为你会对经验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和概念化。然后你就能够定义主要阶段,关注阶段之间的关系了。当你研究一个可识别的过程,比如成为某一职业的一名成员时,主要的事件以及(常常是)进展过程,可以是很清晰的。④ 比如,社会工作的研究生学位项目就有清晰的开始和结尾,你可以识别存在于两者之间的过程和先后顺序。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个路径,能够注意到这个过程中的标志和转折点。其他过程,比如被从工作岗位上辞退或癌症患者的垂死状态,可能就不那么清晰——至少对于经历这些过程的人和研究他们的研究人员来说

---

①对动名词的强调似乎是个小问题;但是我把它看成一个关键部分,而扎根理论家并不总能接受这一点。可能在英语语言中对结果的强调要远远大于对过程的强调,这使得用动名词来思考不那么让人熟悉。但是,研究者常常发现,动名词会以他们没有,也不能完全预料的方式适合于他们的大部分数据。

②学着关注过程而不是个体和问题,是我们研究生期间扎根理论分析研讨班的第一课。我学着超越关注个体性的静态类型学,进入对基本社会过程的分析之中,给研究对象以充分的分析。在这个时期,很多质性研究依赖于给个人贴标签(labeling individuals),因此在扎根理论中形成对社会过程的清晰分析是一个决定性的进步。

③大量扎根理论研究对主观经验或组织过程提供了富有见地的观点(比如,可见于 Hogan, Morse, & Tason, 1996; Lepert, 1996; Melia, 1987; Thulesius, Hakansson, & Peterson, 2003; Tweed & Salter, 2000),而且,逐渐地越来越多的扎根理论研究对更大的社会过程提供了有用的研究(比如,可见于 Clarke, 1998; Star, 1989,1999)。

④分析的层次在这里很重要。虽然当过程在叙述中或在自然背景中被指出来时,很多扎根理论家也研究过程,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并没有像传统分析者那样严密地解决互动序列问题(interactional sequences)(比如,可见于 Maynard, 2003; Silverman, 1997)。厄克特(Urquhart,1998)建立在系统分析基础上的研究,就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

是如此。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得不做很多可观察的和分析性的工作来定义这些阶段,使其具有经验的和理论的意义。

霍根、莫尔斯和坦森(Hogan, Morse & Tason, 1996)在其对亲人丧亡问题的实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of bereavement)中,描述了面对一个主要家庭成员死亡的过程。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些连续的主要过程,可能重叠或重复:

- 得到信息。
- 确证事实。
- 面对现实。
- 沉浸在悲痛中。
- 从悲痛中走出。
- 继续生活。
- 体验着个人成长。

作者根据死者是患病死亡还是突然死亡,界定了这个过程。如果亲人是突然死亡,他/她会进入第二个主要阶段,而那些亲人死于疾病的人会经历一个对最终诊断感到震惊并进行看护的过程。霍根等人把对痛苦的描述、这个过程的具体阶段以及构成特殊阶段的次级过程联系了起来。这样,他们把"忍受着绝望"、"存在于当下"和"沉湎于过去"作为"思念、渴望和怀念"的一部分,这些是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的人们所具有的特征。注意,这些过程与 1991 年我对严重慢性病体验的分析存在强烈的呼应。这两个研究都把基本阶段放在痛苦和意义丧失上。 137

如果扎根理论家用这个方法来建构理论,那为什么很多研究仍然是描述性的呢?对主题而不是对行动进行编码,是停留在描述水平的原因。相反,扎根理论家用这些工具来解释构成一个过程的那些行动,正如克拉克在《规训再生产》(*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1998)中所表明的那样。克拉克坚持在这个双重过程的每个阶段对行动进行分析,即科学家把他们的研究领域建成为一个合法学科的同时,也将控制施加在了女性身体上。这些工作保持了*分析的动力*(analytic momentum),也就扩展了它们的理论范围,而不仅仅只是确定一个过程、勾勒其阶段、然后描述这些阶段了。扎根理论方法的一个灾难就是,建构了一系列相互联系却分析不足的过程。

斯塔(Star,1989)分析了早期大脑研究者(他们认为大脑的功能固定于大脑的具体区域)是怎样建立科学确定性的,并在分析中保持了分析的动力。在她关于他们排除反对者(他们认为大脑的功能是分散分布的)的策略的分析中,她给我们展示了大脑功能定位论者(localizationist)的策略,并对他们的行动如何形成科学的主导地位进行了理论化。看看斯塔在讨论下面的过程时是怎样保持她的分析动力的:

操纵可信度等级

> 可信度等级是指给予具有不同地位的人或组织的话语以不同的分量。那就是,在等级顶端的一个人或机构从本质上比处于底端的人或机构更具"可信性"(Becker, 1967)。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就可能比一个流浪汉的话更具说服力,即使说话的内容是一样的。
>
> 操纵可信度等级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被科学方法认可。但它们却是普遍存在的。定位论(localization)在争论中赢了,并不是因为定位论者比分散论者(diffusionist)更言词尖刻或者更以情动人。相反,是因为当定位论者获得医学和生理学中的专业权力时,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操纵可信度等级。
>
> "比你更科学"
>
> 在操纵可信度等级的宣称类型中,存在着对于[更大]科学性的这方面或那方面作用的宣称。有的认为,某个程序或方法比其他的程序或方法更具科学可行性,或更具技术优势。这些宣称常常反对像"形而上学"、"诗意"、"印象主义"或"软科学"之类的名称……(Star,1989,p. 140)

斯塔从对她的类属"操纵可信度等级"进行清晰的定义开始,然后通过展示定位论者如何建立他们的论辩框架来形成定义的结构。因此,她向下接触了数据,并展现了定位论者是怎样形成他们"比你更科学的"的状态的,作为支持更加一般的类属"操纵可信度等级"的策略。最后,她将"比你更科学"以及其他支持更大类属并使这些类属具体化的策略(包括"来自权威的观点"和"忽视、审查和讽刺")组合在了一起。在每个案例中,她展示了定位论者使用这些策略的方式,给出了他们为什么使用这些策略的原因。因为斯塔给她的类属和亚类属以形象和实质,所以她建构

138

了读者可以记住的密集的理论陈述。这个摘录展示了写作风格和理论重要性是怎样出现在陈述之中的。斯塔的工作风格对读者很有说服力,并让读者参与到她的理论论证中。

为了保持分析的动力,尽量对理论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回忆一下格拉泽(Glaser,1978,1998)给你的建议,要从问"这些数据是关于什么的研究"开始分析过程(Glaser,1978,p. 57)。如果我们在分析过程的每个阶段提出这个问题,并寻求适合问题的最基本的答案,就可能发现,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的特殊意义和行动,会与具有说服力的观念之间,存在怎样的理论联系,而这些观念可能是我们并未想到的。在寻求理论可能性时,我们可能在理论类属和与人们经验核心相关的观点之间建立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研究可能是关于基本观点和价值的,比如那些与人的本质、自我、自主和依附、道德生活和责任、合法性和控制,以及确定性和真理相关的内容。比如,对在身份等级中寻找自我的研究就和自我、自主、合法性以及控制有关。

任何领域都包含基本的关注点和彼此不同的观点,无论它们是否被理论化了。在对数据进行编码,撰写备忘录时,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资料能够说明什么,已完成的理论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在我的社会学领域,关注点包括:

- 表现和意识。
- 个人和集体行动。
- 合作和冲突。
- 选择和限制。
- 意义和行动。
- 立场和差异。
- 礼节和仪式。
- 位置和网络。
- 权力和声望。
- 结构和过程。
- 机会和不平等。
- 权利和资源。
- 道德生活、道德行为和道德责任。

识别和这些关注点的关系为理论化打开了可能性。什么会

使它们发生偏向？分析起点非常重要。早期的扎根理论规定,要发现一个单一的基本过程。如果大量的“基本”社会过程发生在139一个环境中,那么确定哪个是最基本的过程就会让人觉得非常棘手,即使对于一个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家也是如此。在我关于慢性病体验的研究中,我毫不困难就把自我丧失(Charmaz, 1983b)作为比“管理疾病”或“说出病情”更为基本的主题,但是我却不能确定这样一个基本过程,把我所了解的任何事情都统一在其中。几年以来,我都费尽心机地想发现一个能够把握我所了解到的关于体验疾病的所有信息的基本社会过程。[①] 我试图发现一个比“疾病体验”更加具体的过程;但是,人们体验着很多过程,从学会接受慢性病到以新的方式体验时间,再到重新产生或建立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自我。

一旦分析工作开始,所有上面提到的潜在问题都可能发生。这样,一些扎根理论家在质性研究中感受了约翰·洛夫兰德(Lofland, 1970)叫做“分析中断(analysis interruptus)”的痛苦。分析工作开始了,但却中途停止。中断产生于这些扎根理论研究的分析过程和理论化目标之间。凯西·厄克特(Urquhart, 2003)认为她的信息系统领域发生中断,原因在于编码中的主观因素。她说:

> 使用 GTM[Grounded Theory Methods,扎根理论方法]的经验表明,它基本上是一个自下而上(bottom up)的编码方法。因此,研究者发现 GTM 给他们的是一个低水平的理论,这并不奇怪,他们会发现很难把这个理论进行相应的提升。
>
> 在我们把 GTM 使用在 IS[information systems,信息系统]中时,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我们用它来干什么:a)一种编码的方法,b)一种产生理论的方法。在信息系统文献中有大量供第一次使用的资料,但是供第二次使用的就很少。在信息系统中使用 GTM 一个有用的副作用是,对理论的角色进行更加细致的考虑——而且对具体的信息系统产生我们自己的理论。(Urquhart,2003,p.47)

---

①我的博士论文(1977)研究的是同样的实质领域,在论文中,我把“再动员(remodilzing)”作为一个主要过程。这个丑陋的词语不仅产生了机械论和军国主义的意象,还不能解释经验的广泛范围。博士论文后我在搜集更多数据时,这个限制变得越来越显著了。到那时,我已经提高了访谈技巧,并用录音机记录了访谈内容。

厄克特敏锐的评论可以应用于各个学科的很多扎根理论研究者，这些研究者在编码和构建了基本的类属之后，就停止了他们的分析工作。但是，我和厄克特相反，我认为，自下而上的方法给予扎根理论以自己的力量。观察者的主观性提供了看待问题的一种方式。研究者不能在编码阶段就急于进行分析，而要形成能够产生概念的类属（categories to concepts）。

类属是主要的，也是次要的。研究者要为理论概念产生什么样的类属呢？你要和扎根理论逻辑一致，产生能够使数据更为有效的类属。克拉克认为这些类属具有"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因为它们能够承载实质分析的重量。[①] 这些类属包含了关键的属性，能够赋予数据以意义，并推动分析的发展。我们要根据它们的理论广度、深刻性、普遍的力量以及与其他类属的关系，有选择地提出一些能够产生概念的类属。对于客观主义者来说，这些概念是核心变量，要进行解释和预测。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理论概念是解释框架，提供对关系的抽象理解。理论概念包含了更少的类属，而且通过比较会包含更丰富的意义，解释更多的数据，而且变得更为明显。我们在比较了这些类属和其他类属以及数据之后，做出了关于这些类属的一系列决定。我们的行动形成了分析的过程。与其说我们是要发现数据*内部*的秩序，不如说要产生对数据的解释、组织和再现（Charmaz, 1990）。

140

检验扎根理论

在记住理论和理论化实践的意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用新的眼光看一看我在以前介绍的几个扎根理论的理论建构。每个理论都带有作者兴趣和观点的印记，反映了它的历史背景，也反映了观点和扎根理论，在其母学科中的历史发展。在 1980 年代出版的每个理论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形式和风格。在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 Marcus, 1986）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提出后现代挑战之前，大部分质性研究者都在努力实现客观性和实证性。正如凡・曼农（Maanen, 1988）所言，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

①2005 年 2 月 28 日私人交流。

ser & Strauss, 1967)的方法仿效自然科学,为研究者提供了免于主观性谴责的方法。①

简·胡德的实质理论

简·胡德(Hood,1983)的著作非常突出,因为她概要地介绍了解释实质问题和过程的具体理论条件。和今天相比,在胡德搜集数据的那个时代,有孩子的工人阶级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和她们的男性伴侣结婚的更多,而且已婚妇女觉得在有了孩子之后有必要重返工作岗位的更少。现在很多妇女,已婚的或未婚的,必须工作,以前的文化价值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的价值既鼓励母亲不去工作,也鼓励父亲不参与家务劳动。

我在前面章节提到,胡德发现,丈夫们对妻子在家庭经济的贡献价值的认可和重视,成为分担家务的根本条件。那些重视妻子经济贡献的丈夫会参与家务劳动和孩子的照顾。那些并不把妻子作为共同养家者的丈夫也并不把家务和照顾孩子看作是应该共同分担的事情。

这样,丈夫对于情境的定义,特别是对妻子经济贡献的定义,成为最后结果所依据的变量。注意,胡德把丈夫认可和重视妻子的经济贡献时所发生的情况*以及* 他不认可、不重视时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化。

胡德受到了格拉泽的影响,而且毫不奇怪,她的分析模型反映出了这种影响。像1980年代早期的其他扎根理论一样,胡德的分析是一种客观主义的类型。她寻求解释,并提供预测。虽然她让研究对象积极参与了讨论,提出了具体尖锐的问题,但她还是站在专家的立场对她的数据提出了干脆直接的评价。胡德发现了变量,使事件和行动所发生的条件具体化了,并对结果进行了检验。她的陈述是简洁而完整的,并从这些陈述中推理出了可以检验的假设。胡德在她的整个研究中都充满了分析的动力。当她研究数据,并致力于理论抽样时,胡德通过解决以下一些问题使她的理论更加密集了,工作导向(work-oriented)的夫妻是否可能呆在一起;哪种类型的妻子仍然留在劳动力市场,她们对于工

141

①在1960年代,很多学者都把质性研究作为一种印象主义的、非系统的、主观的方法加以排斥。

作的投入和她们的工资在家庭收入中的比率怎样影响了她们的议价权力;什么类型的丈夫会相应地增加他们在家务中的责任。考虑一下胡德在阐明了她的理论之后所推论的这些假设:

> 1. 为了"自己"的原因而不是为了"家庭"的原因而工作的妻子,更有可能在家庭不需要她们收入的情况下,留在劳动力市场。
>
> 2. 有着彼此冲突的目标的夫妻比那些有着补充性目标的夫妻感受到更多的压力。
>
> 3. 越来越多的工作责任施加在妻子一方(与此相伴的还有陪伴丈夫时间的减少)会在以丈夫为中心以及以夫妻为中心的婚姻中导致大量问题的产生,而以孩子为中心的婚姻产生的问题则要少得多。
>
> 4. 为了自己而工作的妇女嫁给以工作为导向的男人,最有可能协商成为共同养家者(并提高她们的工资在家庭收入中的比率)。
>
> 5. 对于妻子能够承担的责任分歧最严重的夫妻,很可能这样解决这种矛盾,或者让妻子放弃工作,或者接受妻子作为共同养家者。
>
> 6. 工作导向的丈夫比事业导向的丈夫更易于接受妻子不断增加的工作责任。
>
> 7. 工作导向的丈夫和有着年幼孩子的家庭最有可能增加他们在家务劳动中的责任,而事业导向的丈夫和有着年长孩子的父亲则更不愿意这么做。
>
> 8. 除了妻子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份额以外,妻子的议价能力还会随着自信心的增加以及婚姻之外的社会支持的提高而获得提升。(Hood,1983,p.138)

这些假设是从胡德的角色议价过程理论发展而来的。角色议价过程理论是胡德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如果我们今天进行同样的研究,可能一开始就会撒一个涉及范围更广的网,去探求其他因素,比如种族或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以及地理位置,是否、如何、何时以及何种程度上会影响议价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如果发现其中有什么模式,那么接下来就会将其应用到分析中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想看到当代夫妻在对什

么进行讨价还价,了解他们在胡德的初始研究之后,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重新构造了这件事。当代的研究者可能会关注讨价还价过程中变量的范围,关注对接下来的分析进行定位。

对胡德分析类型的进一步检验表明,在定义发生了什么以及使其含义理论化的过程中,她的分析类型展示了它的用处。她揭示了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潜在规则和默认协议(tacit agreements)是怎样影响讨价还价的。她指出,她的研究对象分享了默认的协议,即一个妻子不能指望在家务事情上获得帮助,除非她通过工作来养家糊口。相反,孩子会导致联合的责任,如果夫妻一方不能完成他或她的任务,那么就需要双方来共同承担。受访的夫妻认为,孩子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来自父母的关注,这样夫妻一方就觉得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如果另一方投入不足,自己就必须补上这一部分。

142

访谈数据可以提供这样的陈述,说明夫妻*怎样*从男女当事人的视角来协商家务,但是访谈只是——回顾性的叙述,很容易根据当时的需要和目标进行重新组织。但是,胡德多元的数据搜集方法对于补偿访谈的限制起了不少作用。她的访谈记录指出了与协商时机有关的假设条件。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妻子在争取获得丈夫对家务的参与时有效或无效的原因。当然,我们也理解了谁的视角和特权处于优先位置,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些丈夫并不参与家务的妻子对于她们丈夫特权的认可程度有多强。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些妇女是怎样进行她们的定义的。有趣的是,胡德发现男人对家务的参与会使夫妻关系更为密切。她的数据并没有揭示变得密切的这个过程,但是显然指出了继续探究这一过程的路径。

胡德的分析以非凡的清晰度展示了起作用的社会条件。胡德不仅保持了分析的动力,还对她的关注焦点保持了专注。她从一发现她的核心变量开始,就追寻它们的变化和意义,并把它们整合在一个逻辑严谨的框架中。她的假设命题为进行预测和把分析扩展到对其他类型的环境进行分析提供了工具。比如,我们能够观察到,分析是否能够以及在什么程度上适用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双职工夫妇。

通过形成整合性的条件命题,胡德把她的分析从一个小样本的经验普遍化为一个经验问题的实质理论。这个理论的概念水

平是具体的和直接的。胡德展示了使具体关系理论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提供了评价实质环境的一个有用工具。

胡德把早期的比较放在了研究之中，这为她进行比较和寻找她的主要关注点（即责任超载（role overload）和婚姻关系平等）提供了基础。与格拉泽（格拉泽当前关注的是人们怎样解决他们生活中的紧迫性问题）一样，胡德一直专注于分析职业女性是否以及如何就家务这一常规问题进行协商。要注意，在格拉泽（Glaser，1998）完成关于人们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最后命题之前，胡德早就完成了她的研究。

因为有着搜集数据、进行比较以及理论抽样的系统方法，胡德能够有条件让她的生成性实质理论特征化，使理论整合成为可能。她的理论能够让研究者甚至于读者来检验经验案例。胡德是把她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但是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把她的方法运用到一个更大的多元方法项目中，甚至把质性研究和全面的全国性量化调查结合起来使用。这个研究表明，某些质性扎根方法是可以很好地和多元方法（multi-method）以及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他们解决的是具体研究问题）一起发挥作用的。 143-145

帕特里克·比尔纳基的基本社会过程理论

帕特里克·比尔纳基（Patrick Biernacki）的《摆脱毒瘾》（*Pathway from heroin addiction*，1986）和早期的扎根理论文本（Glaser，1978；Glaser & Strauss，1967）一样，对基本社会过程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他的理论解释了那些没有经过戒毒治疗的人当中，有些人是怎样实现从“瘾君子”到“戒除毒瘾者（ex-addict）”的身份转变的。比尔纳基展示了这个过程的几个阶段，并将其作为概念类属。他在代码中对这些过程进行了定义，然后把这些过程放在一起，得出了这些类属。我列了一个图（图 6.1）来展示比尔纳基过程理论的逻辑，不过我在下面只详细谈论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比尔纳基的理论有着很强的客观主义基础，同时也有一些解释学的因素。他追踪着这一连串事件，并表明这些次级过程是怎样发生关联的。在戒除毒瘾者克制了他们对毒品的渴望，保持了一种禁欲状态时，比尔纳基认为，他们进行着一种微妙的社会心理过程，其中包括对他们生活和世界的象征性重构和社会学重

构。这些重构要求在传统世界获得一席之地(make a place)。这些象征和社会重构通常给瘾君子带来非常痛心的问题和没完没了的麻烦——但是克服这些困难始终是完成他们身份转变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样,类属"变成并保持'正常状态'"(p. 141)就成为比尔纳基理论一个完整概念。他展示了研究对象是怎样经历这个转型过程的。戒除毒瘾必须接受和保持传统的生活。但是,他们不情愿和正常人接触,同时还要面对把吸毒者看成是不值得信赖和讨厌的人的刻板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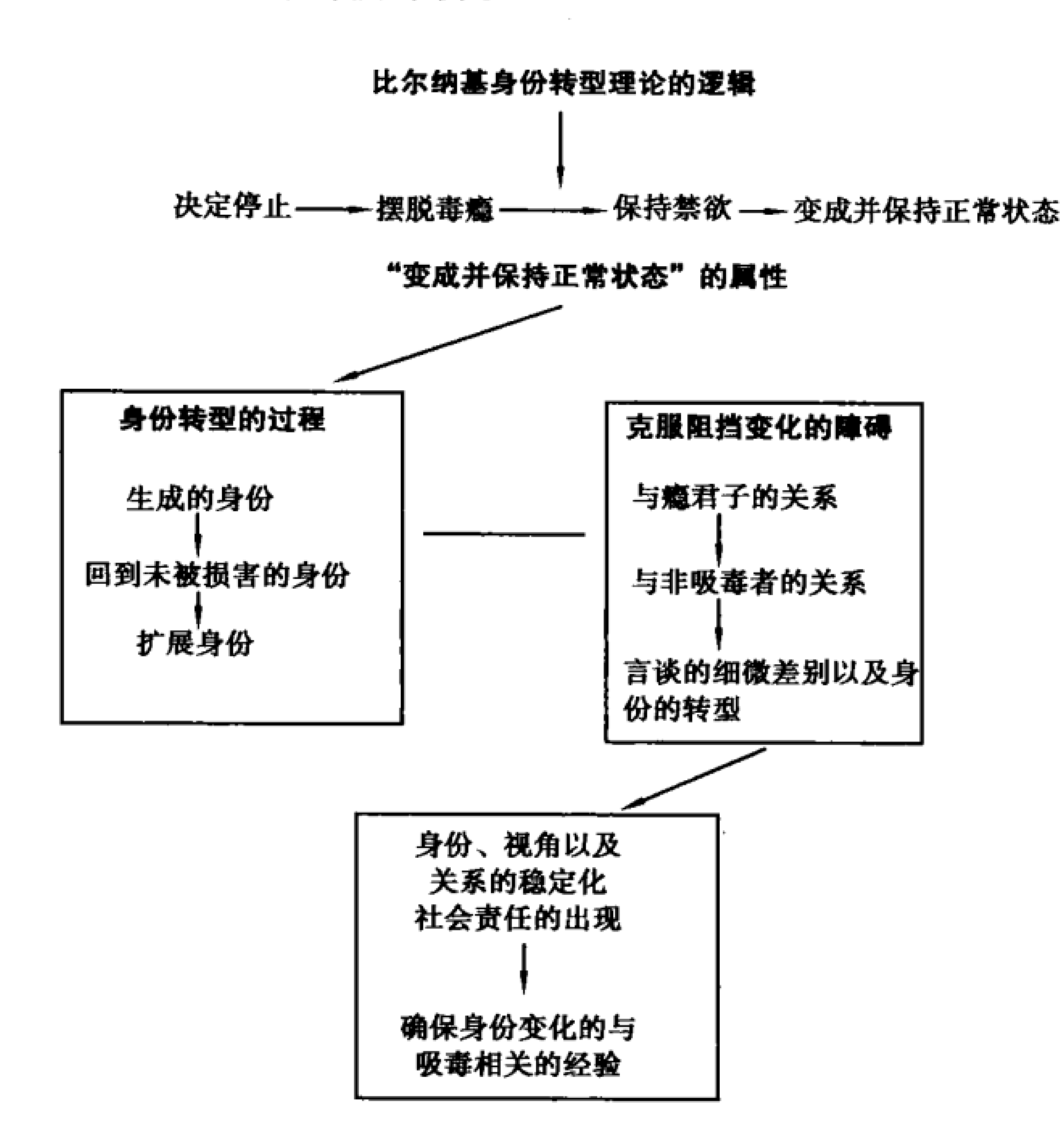


图 6.1 帕特里克·比尔纳基有关不经治疗的戒毒过程的身份转型理论

为了使其理论连贯,比尔纳基需要解释"变成并保持'正常状态'"在康复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瘾君子真正实现身份转型的过程进行*理论化*。是什么使这个转型过程成为可能的呢?社会环境和个人选择是怎样共同引发一个完整的身份转型的?比尔纳基下面的几个类属是指瘾君子恢复正常中三个不同的身份路径:

- 生成的身份(pp. 144-148)。
- 转向未被损害的身份(pp. 149-155)。
- 扩展的身份(pp. 155-160)。

这样,在第一种方式中,当康复中的瘾君子开始有了新的追求,而且被这些新目标所吸引,并有可能产生身份的变化时,他们的新身份就出现了。在第二种方式中,建构一个以前的正常身份,会最终抛开瘾君子的身份。在第三种方式中,扩展在吸毒期间未被损害的身份,为身份变化创造可能。生成的身份在环境和行动中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继续发展。转向一个未被损害的身份以及扩展现在的身份更可能来自有意识的选择。每个类属都绘制了变成并保持"正常状态"的一种身份路径。

比尔纳基的身份类属穷尽了他在这个领域发现的经验事件的范围。这样,他的概念"变成并保持'正常状态'"就来自经验的引导,并对其进行了解释。比尔纳基必须处理这些同时发生的过程,使他的理论变得连贯。在进行这类型的身份工作(identity-work)时,瘾君子就进入了"克服阻挡变化的障碍"阶段,即比尔纳基在身份转型中所定义的下一个主要问题。最后,戒除毒瘾者必须稳定他们新的或者说经过修正的身份、观点和关系(pp. 161-180)。如果仔细观察比尔纳基的类属"克服阻挡变化的障碍",并注意他是如何处理的,我们就会看到他是怎样把他的数据、代码和类属编织成为一种直接来自数据的理论解释的。康复中的吸毒者必须抗拒来自他的吸毒同伴的诱惑,而且抗拒毒品世界及其言论的力量和渗透。同时,吸毒者必须克服传统世界加在吸毒者身上的坏名声,并且证明,他们已经变了。比尔纳基已经发现*什么时候*克服这些障碍是最关键的。接下来,他看到了戒除毒瘾者是*怎样*证明他们的新身份的。

> 这是怎样发生的? 实际上,证据可以在戒除毒瘾者对一些行为的坚持中找到,这些行为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作为传统的、"正常的"生活的典型表现。比如,人们会希望戒除毒瘾者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住处,并保持合理的"正常"的时间安排。他们也应该拥有非吸毒世界里日常的物质资料——比如电视机和音响。戒除毒瘾者必须避免,或者至少不被看到出现在"不正常"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以吸毒者经常

> 出没而著名的地方。他们应该经常光顾“正常”的地方——电影院、饭店或者运动场,而且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应该是自力更生的。
>
> 这些看起来是些细枝末节的地方,但是却很重要,因为他们要消除不吸毒者对吸毒者的刻板印象……其他人通过吸毒者的行为甚至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判断他们是否像他们宣称的那样,不再吸毒,并且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生活。(Biernacki,1986,pp. 166-167)

比尔纳基提供了一个关于不经过治疗而完成吸毒者身份改变的完整的实质理论。他的理论足够抽象,可以覆盖经验情境的范围。比尔纳基通过系统建构类属,也就是综合和解释研究对象对其经验的陈述,处理了身份的理论概念问题。在对数据中的模式进行定义和概念化时,他通过寻找进一步的数据来使影响康复的条件具体化。毫不奇怪,比尔纳基发现一个主要因素,即一个人对毒品世界的参与程度,它会排除一个人的传统追求。但是比尔纳基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把再次沉迷于毒品世界与获得毒品的难易程度及毒品成本进行比对,看这些变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比尔纳基发现,当毒品成本很高而且获取不易时,吸毒者在毒品世界的沉迷似乎是最彻底的。接下来,他在医生和护士中进行理论抽样。对这些专业人士而言,不仅毒品成本很低,获取相对容易,而且拥有要求参与其中的受尊重的身份。比尔纳基通过从他的数据中寻求模式,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吸毒者不经治疗就康复了。

146

比尔纳基分析的理论范围可以超越吸毒这一现象。他提出了在一个特殊类型的人群中进行身份转型的一般过程,我们可以跨越的不同领域来进一步形成概念。其他非正常行为的形式,比如少年犯罪和卖淫,也提供了发展或改进比尔纳基理论的可能性。

凯西·卡麦兹的建构主义理论

下面的讨论说明了建构主义方法可以怎样帮助你在解释学传统中进行理论化。解释学理论化不仅涉及明显的过程,也钻研内在的意义和过程,而且后者尤为明显。沿着我的推理,再关注一下类

属"活一天是一天"。我数据中出现的"活一天是一天"的想法是慢性病患者中理所当然(taken-for-granted)的言论的一部分。人们把"活一天是一天"的需要作为一个显然的事实,但是并不对此有更多的解释。建构主义的方法会让你探究和解释这一内在的(implicit)陈述或行动。

活一天是一天

活一天是一天意味着对待疾病的一种每天的态度——但是必须是一天一天地过。当人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拥有未来的计划,即使是普通的无效的追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活一天是一天是默认了他们的脆弱。

活一天是一天也让人们在没有被缥缈的希望和难以满足的期待压倒时,关注疾病、治疗和养生(regimen)。采取这种立场为每一天的活动提供了指导,并产生了一些控制感。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人们能够避免去想或尽量少想病情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死亡。

活一天是一天这种态度的必要性戏剧性地改变了一个人的时间观念。活一天是一天把一个人的注意力放在了当下,把曾经有的对未来的投射推远了。原来对于未来的想法在未被破坏的情况下退却了,溜走了,可能是几乎未被察觉地溜走了。当下是压倒性的,而且最后可能是有回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时间的内容变化了;时间变得更长,更充实。

活一天是一天对于管理慢性病和组织时间是一种策略。而且,它还提供了面对不确定性时管理自我的方式。它提供了一种对行动的控制感,而且,进一步说,提供了对自我和环境的一种控制感。拥有这一策略也改变了时间观念……

活一天是一天揭示了埋藏在疾病经验中的情绪。很多病人,特别是老人,表示,对依赖、衰弱和放弃的恐惧要远远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活一天是一天有助于减轻这种未来比现在更糟糕的恐惧。在一系列挫折中,马克·雷那森(Mark Reinertsen)低声说,"我努力活一天是一天,因为这样会少一些恐惧。"后来他注意到,"我真的陷在了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死亡或者进一步恶化),因为在过去的 6 个月中发生了这么多事(多元并发症以及由治疗引起的其他疾病)。但是那有什么用呢？我能把握住的只有今天。"(1991a,pp. 178,180-181)

147

这段话展示了建构主义分析的一个案例,因为它把组成类属的内在意义放在一起并进行了解释,由此展示了一个普通的陈述怎样涉及一系列意义和经验。我指出了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尽管类属的内容*取决于*我如何排列这些行动,*取决于*如何表述我对研究对象的陈述和行动所给出的意义和解释。当我们钻研默认的意义时,不是每一个受访者都能同样熟练地描述它们,或者把他们的行动和这些意义联系起来。这样,研究者就可能不仅形成用来了解相关意义和行动的分析策略,也形成了特殊的方法论。

上面的分析把类属中分散的经验放在了一起,并说明了这些默认意义的范围。一个解释性的分析,会让读者通过类属的*理论呈现*充满想象地参与到相关经验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对类属的理论理解产生了意义;如果没有它,在交谈过程中偶然产生的、研究对象未曾言明的关于"活一天是一天"的表述就始终不会被注意。相比之下,纯描述会让读者进入现场,激发读者的兴趣,并对研究对象的故事产生认同。经验的重要性常常是直接的,正如胡德和比尔纳基在做出关于他们研究的具有说服力的描述时所表现的那样。他们的描述强调了他们解释的合理性。

和建构主义方法一致,我对数据所持有的观点是数据呈现的一部分。胡德和比尔纳基的扎根理论也是真实的,不过是在扩展的意义上。胡德和比尔纳基的理论既涵盖了有着清晰标志的确定事件,也涵盖了真实的经验。在其各自领域中受过训练的其他观察者一旦进行了各自初始的经验跳跃和概念跳跃(如胡德和比尔纳基所做的那样),就能够看到和描绘出同样的过程(胡德的案例发现了职业女性几乎无法从丈夫那里获得家务方面的帮助的原因,比尔纳基的案例发现了吸毒者是否以及如何在没有经过治疗的情况下摆脱毒瘾)。

比起胡德和比尔纳基的分析,我以上的分析仍然更为直觉和印象主义。我的解释框架是强化分析还是削弱分析,要看批评者坚持的是建构主义的还是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得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否把它看作是保持情绪控制的一个策略呢?如果他们已经有一些针对自我、时间、情绪以及生活中断的概念的理论敏感性,那么这是可能的。如果没有对这些概念的理论敏感性,就很难说,因为类属的属性直到理论抽样和解释性呈现使它变得清晰,它才能变得清晰起来。我们进

入内在的经验越深，进行这种经验和概念的跳跃所用的时间就越长。其他研究者是否本该在经验中看到不同的事物以及（进一步而言）类属呢？是的，很有可能。研究者带给被研究生活的理论敏感性类型很可能会呈现不同的意义。分析来自研究者对研究过程每一阶段的参与。

148

解释的部分任务就是要对这种可能保持警惕，即让分析超越了你目前所拥有的确定性证据。那就是为什么接下来进入或重新进入经验是那么重要了。我不是把"活一天是一天"作为一个方便的口号，我抽样是为了进一步发现，人们是否以及如何按这种观念活动。观察者可能能够重新进入现场；访谈者能够仅仅寻找那些可以解释类属的故事。在这个案例中，理论抽样成为获得接近这个具体经验的途径。通过回到数据并探究进一步的问题，片段的经验获得了形式。

类属在建构主义分析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虽然类属并不是主要的变量，但研究者可以展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案例中，我说明了我的类属"活一天是一天"是怎样和三个主要概念"时间观念"、"时间结构"以及"自我在时间中的位置"发生联系的。这样，"活一天是一天"形成了一个人一天以及一周的时间结构。随着过去的消退和未来的淡漠，长时间采取这种立场会改变一个人的时间观念。结果，这个人把他或她自己放在了当下。

和胡德与比尔纳基一样，我把条件具体化了，展示了概念关系，预测了结果。我并没有得出清晰的理论命题，而是把它们编织到了叙述之中。虽然这个理论比胡德和比尔纳基的理论更不集中（diffuse），但是它也更为抽象和普遍。当然，探究的内容影响了理论结果。我既重视自我，也重视时间，这种双重重视的不易把握性有助于形成我自己的理论陈述。这样，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带给我生成性的分析，并激发出了新鲜的理论联系。

小　结

在本章，我在实证主义和解释学探究之间、在建构主义和客观主义扎根理论之间以及它们的特性与方向之间划了一条明显

的界线。然而,在研究实践中,这条界线可能并不那么清晰。实证主义研究者可能探究的是一些只有短期意义的含糊问题。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家可能试图在复杂的细节中发现明显的过程。在研究实践中,理论化意味着折衷,依赖有用的资料,定义合适的概念(也见 Wuest, 2000)。在这个问题上,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可能都不想让读者认为他们的书面扎根理论是*宏大理论*(*Theory*),以防止他们的扎根理论彻底掩盖在巨大的神秘性或理论化行动中。相反,他们只是在以自己所理解的方式进行扎根理论。

然而,像斯塔所研究的早期大脑研究者一样,扎根理论家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招致不满的比较形式——"比你更具理论性"。149 一个优雅精炼的理论可能会提供清晰的命题,但适用范围却十分有限。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松散(diffuse)理论可能会激发思想的火花,但提供的却是模糊不清的框架。每一个都假设不同的目标,支持一定的认知方式和知识类型。一个理论允许我们避开日常的解释和理解,允许我们关注这个现实而不是那个现实。理论不能像银行报表那样去精确衡量,虽然我们能够为不同类型的理论化建立标准。"如果—那么"式的理论陈述要与抽象的数量和密度保持平衡,就不仅取决于扎根理论家的理论倾向,也取决于读者和目标。如我在前面讨论扎根理论中的理论化时所提到的,理论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因而在包容性、精确度、水平、范围、一般化和应用性上都会有所不同。

我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中所描述的主观性和含糊性也渗透在客观主义方法中。这些客观主义方法通过分享关于世界的假设、建立研究的模式掩盖了主观性和含糊性。结果,探究使我们出乎其外,而反思又让我们入乎其中。接着,扎根理论把我们带回这个世界做进一步的观察和更深层的思考——一遍又一遍。富有想象力地呈现所见所闻就是解释,这样的解释源自思想和经验的辩证法。不论坚持客观主义传统还是坚持解释学传统,我们并不会自动获得理论,虽然这个理论还必需经过修改。我们是自己所建构的理论的一部分,这个理论反映了我们各种内在经验中占主导的观点,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

第7章 撰写草稿

Writing the Draft

你在本章将会看到，写作过程使扎根理论的旅程进一步延伸了。在撰写草稿的过程中，每次修改你都会获得新的发现，也会以你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你的领域里建立自己的声誉。我会提出一些建议，让你把草稿的片段整合起来，建构一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适合你的扎根理论的论点，检验你的类属，并判断它们是怎样成为草稿的核心的。在写完扎根理论草稿后，我们会认真讨论一下那些充满争论的文献评述问题以及常常很棘手的理论框架问题。我提供的结论会在这些学术标准要求和扎根理论化过程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这会有助于你进行理论分析，并进行相关的论证。本章最后会介绍作家们写作的策略和修辞技巧，这会使你的扎根理论更具可读性，也更有意义。



扎根理论写作保存和呈现了分析过程的形式和内容。扎根理论没有强调行动者或作者,而是把观点和分析框架放在了中心舞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概念变成了“行动者(actors)”,能够对现场的行动进行分析。建构扎根理论分析和我们的写作任务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张力呢?我们怎样通过分析表述来捕捉全面的事件呢?我们怎样把扎根理论的分析要求和良好的写作标准结合在一起呢?

正如我所提到的,扎根理论的潜在力量存在于它的分析力度中,它使得意义、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建构方式变得*理论化*了。分析备忘录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这些备忘录深入到我们的理解中,揭示了我们的先入之见。我们可以在整合性分析(通过整合性分析,我们对各种被研究的行为领域进行了理论化)中把这些备忘录组合起来。

扎根理论深入挖掘经验,形成了能够证明假设的分析框架。这样,通过我们的分析性表述,与日常经验有关的直接明了的类属会由于意义明晰而引人注目。下面这段摘录以分析的视角描述了慢性病患者的日常经验,集中关注和突出了我们对于这些经验的观点。想想看,普通慢性病是广泛存在的。很多成人都知道早期的症状、病情的发展、当前的治疗情况以及更多。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想不到患有这样的疾病意味着什么吗?还有什么比理解患有一种慢性病意味着什么更具普遍意义的吗?但是了解它意味着什么并不容易。扎根理论研究能够说明,人们是*怎样*明白得到一个诊断和患有一种疾病之间的差异的。通过研究人们怎样理解慢性病的长期性,我们会知道,对于他们而言患有这种疾病意味着什么。①

152

对慢性病长期性的了解

数周数月连续不断的病情发作会让病人知道慢性病的长期性是什么。进而言之,了解慢性病的长期性意味着发现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过努力管理他们的日常行为,病人会发现他们已变化的身体的意义。哈里·鲍尔(Harry Bau-

①任何一种意义的描述都是一种解释性的描述。我们不知道人们的头脑中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解释他们说什么和做什么。

er)回忆在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情况,“当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我告诉医生,我要回去工作。他说,‘不可能。等你从那儿爬起来,你就知道你有多虚弱了。’我过去每只手能够拎起 100 磅的东西。当我离开那儿之后,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自己连站都站不起来。”

身体障碍、功能失调或者身体损伤的意义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直到经历了日常生活事务的检验,一些人才知道变化了的身体意味着什么。希瑟·罗宾逊(Heather Robinson)直到确诊十个月之后才经历了她的第一个严峻时期,但是其他人把得到确诊和面对疾病混为一谈了。她回忆说:

“人们说,‘你(在确诊之后立刻就)应对得很好了。’我只是说,‘我还没有真正应对好,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开始经历这场病呢。’我的意思是说,你在经历某些东西之前,你不能很好地应对它,你不需要去应对。因此,一旦我得病了而不得不去应对它时,我觉得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得了多发性硬化症……现在我知道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能去哪儿,我能做多少。”

过去的尺度,而非已经改变了的现在和未来的尺度,衡量着走路的距离、所完成的任务以及制订的计划。人们在发现过去设立的标准变得艰难或不可能的情况下,才慢慢了解到慢性病究竟意味着什么。

病人必须经常放弃他们的希望和计划,放弃他们过去的行为。疾病和身体残损(disability)迫使他们降低对自己的期望——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必须如此。但是这么做使人很受打击,很不安。在精神病学家克莱·丹伯格(Clay Dahlberg)的著作中,他回忆了当他得知自己得了中风可以回家时的心情:“那是荣耀的一天。我开始计划要用这段我将要拥有的不可思议的大量自由时间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推掉繁多的杂事,去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和我想见的朋友共进午餐——这么多令人高兴的事情。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能去做这些事情。我没有这样的脑力和体力,我陷入了抑郁之中。”(Dahlberg & Jaffe, 1977, p. 30)

过去和现在生活状况的差异是那样鲜明,因为过去仍然那样近在眼前……(Charmaz, 1999a, pp. 21-22)

上面的例子把分析性陈述与支持性描述及解释混杂在了一起。这样,它就在理论解释和经验事实之间来回移动。扎根理论著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写作。哪些步骤会加速完成扎根理论的报告呢?如何控制一个归纳性的扎根理论和学术写作标准模式的内在演绎逻辑之间的张力呢?什么样的写作策略有助于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和生动的叙述呢?怎样写报告最好呢?

153

关于写作

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怎样才能做出原创性的东西呢?年轻学者需要在自己的学科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making your mark)。资深学者需要证明他们仍然配得上他们的名声。新老学者都希望表明他们并没有失去在自己领域的声誉。罗伯特·墨菲(Murphy ,1987,p. 81)提出他的"墨菲学术生涯第一法则",其中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年轻学者会为自己能否被发现(discovered)而忧虑;第二阶段,已有所建树的学者会担心他们是否会被重视(found out)。"

"原创性贡献"是什么呢?如果你提供了一个对被研究现象更为新鲜或深入的理解,那么你做出的就是原创性贡献。研究者所断言的原创性理论很多时候常常只是一系列陈腐常识的堆砌(也见,Silverman, 2000)。当然,什么是原创,部分也取决于读者。作者们也采用一些策略来获得原创性。他们提供了①对一个新领域的分析,②对一个旧的或衰退的领域进行原创性的论证,③现有观念的扩展。

过去,大量学者通过探究重要的新领域来显声扬名。像第一个对新大陆进行探索的人一样,他们宣告了这块领地——而且在以后会被经常引用到。这块新领地可能是诸如情绪社会学这样的新领域,或者是像"实验室科学家的工作"这样有趣的问题(Clark, 1998; Latour & Woolgar, 1979; Star, 1989)。但是随着一个领域的发展,学者能够宣称原创性的区域会越来越小。在很多学科,通过建构一个新领域来做出突破性贡献的日子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扎根理论家能够对一个专门领域有所贡献，同时也能延伸那些跨越不同领域的一般性理论解释。一些敏锐的理论观点会超越对一个具体经验问题的解决。帕特里克·比尔纳基(Biernacki, 1986)对有关吸毒者戒除毒瘾的已有观念的质疑不仅产生了对吸毒研究的贡献，也对我们关于身份变化的知识有所贡献。比尔纳基提出的新问题在两个已有领域都产生了新的洞见。如果你不能宣告发现了新领地，你还可以挖掘那些被忽视的领域。

一些学者在依赖于其他研究形式或探究方法的领域发展了原创性扎根理论。卡罗琳·威纳(Wiener,2000)把扎根理论带入医院护理的问责制领域，这个领域过去是由经济学家和量化研究所主导的。莫尼卡·卡斯珀(Casper, 1998)的扎根理论民族志研究进入了生物伦理学领域，在这个领域哲学家已经研究了很多的假设性案例，但没有探究经验环境。

不论你是投身于一个新领域还是进入一个已有领域，现在都需要强调一下分析中的原创观念。接下来，用这些观念形成一个论述，让它对你的目标读者进行展示。 154

把你的发现写出来

> 在做出关于如何处理草稿的决定之前，先让你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不管你是决定写一个扎根理论的课堂报告还是写一本书，都要把它先写出来。在你有了一个可靠的分析草稿之后，再决定如何处理草稿以及怎样实现。

扎根理论中的发现过程可以延伸到写作和修改阶段。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你会获得进一步的见解，并产生更多的与你的数据相关的想法。你会看到类属之间更为清晰的联系，并从它们那里发现更多的意义。这样，写作和修改就成为*分析*过程的关键阶段。写作的要求要多于单纯的报告。通过撰写和修改草稿，你会产生确定的论点，介绍它们的背景，与已有的文献建立联系，批判检验你的类属，做出你的解释，并提供能够支持分析论点的数据。每一个连贯的草稿都会变得更加理论化，变得更加全面。

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到你的草稿写作中，就像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本身一样。在做出关于如何处理草稿的决定*之前*，先让你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emerge)。不管你是决定写一个扎根理论的

课堂报告还是写一本书,都要把它先写出来。在你有了一个可靠(solid)的分析草稿之后,再决定如何处理草稿以及怎样实现。一步一步地进行。最后重新评价你的手稿时,你可能会发现,它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标。扎根理论的课题报告可能会成为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学生作业。经过修改,一篇论文的一部分可能会成为一份期刊的投稿。一篇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会适合一家出版社的专题丛书系列。

扎根理论写作的生成性特点可能会和课堂报告或博士论文的要求有冲突。实证主义主导一切的后遗症仍然影响着我们形成研究报告的形式——有时影响还相当深远。

必需的格式常常预示着一种传统的逻辑—演绎结构。这样,我们就需要修改格式,而不是把我们的研究塞到标准的类属中。在这么做的时候,要让格式服务于你的想法,而不是让你的分析做出妥协。

必需的格式常常预示着一种传统的逻辑—演绎结构。这样,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格式的问题,并使其适应我们的需要和目标,而不是把我们的研究塞到标准的类属中。重新思考和调整规定的格式,让格式服务于你的想法,而不是让你的分析做出妥协。

修改早期的草稿

告诉你一个"行业秘密":撰写质性研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过155 程(an ambiguous proess)。撰写分析不仅仅是让我们形成报告。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获得了什么,或者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比起其他很多方法,扎根理论给了我们更多的指导原则和基础。但是,我们可能仍然觉得好像站在一块不稳定的大陆上。也许我们想知道我们的分析是否有价值。在这个阶段,要学着去容忍含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继续前进,那会让你向着自己的目标进发。你终会发现有所回报。如果不相信自己,就学会去相信写作过程,就像学着去相信扎根理论分析过程一样:我们的写作就像我们的分析一样,是不断生成的。对这些过程的投入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与建构一个扎根理论分析一样,撰写完整的报告可能充满了

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当作者的声音常常流露出确定性和权威性时，这些完成的作品常常会充满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Charmaz & Mitchell, 1996)。作家们常常表现得好像他们在沿着一条有着清晰目标的单行线前进，从选题到写出结论一直如此。这条道路不可能是单一的，目标也并不那么清晰。而且今天你还可以把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写出来。

把片段整理在一起

富有热情的研究者可能会把三个有趣的备忘录放在一起，附加一个简短的介绍和结论。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一个才华奕奕的小报告(presentation)，但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报告或者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经过仔细分类和选择的备忘录会给你的小报告以更具说服力的内容。呈现这些材料内容的方式非常重要。在做口头报告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语言的节奏、情绪的变化和热情、肢体语言以及与听众的目光交流来传达意义。在交谈中，强有力的观点、微妙的意义以及优雅的转折都很明显，但是在书面论文中，这些都会消失。实际会发生什么呢？在你的书面文本中，口语会黯然失色，会平淡无味。你的分析会为你提供很好的工作材料——但是它仍然需要加工。你应该做什么呢？

根据你的分类逻辑以及最具说服力的图表或你所做的聚集，排列你的备忘录，并研究这些备忘录。然后把你的备忘录组合在第一份草稿中，你的草稿整合了这些内容，并展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你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尽量使分析更为抽象。你要用它形成你报告的核心。在处理其他部分前，你要尽可能地采用你自己的扎根理论。

观察你的理论并思考下面的问题：

- 主要类属的定义是完整的吗？
- 在我的理论中，把主要类属提升为概念了吗？
- 我在这一稿中是否扩展了分析的范围，加深了分析的深度？
- 除了数据，我是否在类属之间，在类属和它们的属性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理论联系？
- 我怎样增进对被研究现象的理解？

156

- 我的分析对于扩展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对于它的理论范围和幅度，对于方法，对于实际知识，对于行动或干预各具有什么意义呢？
- 我的分析与哪些理论性、实质性或实践性问题最接近呢？什么样的听众对它最有兴趣？我的研究应该向哪里发展？
- 我的理论怎样做出新的贡献？

然后开始写一个导论和结论，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些部分可能会比较粗略，需要不断地去完善。你的第一份导论或结论草稿仅仅是草稿而已，你可以而且应该对每个部分重新加工好几次。在第一个阶段，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是完美的。[①] 通过对你的草稿进行若干次修改，你会逐渐把握那些本来含糊的表述和仍然有歧义的句子，而且写出凝练而具有说服力的命题来。

现在你可以处理整个草稿了。你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扎根理论分析，但是它可能并不包含清晰的目标或论点。深陷其中的研究者常常认为他们的目标是明显的，他们的论点是清晰的，但他们也可能是错的。新手作者可能以为，指引他们研究的那个目标足以产生论点，做出学科贡献，但那是不可能的。为了做出贡献，你需要把你的分析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中，它会引导你的论点逐步形成这一份草稿。当沉浸在工作中时，我们都容易弄错目标和论点。要注意，把初始的目标误以为是贡献，以及认为你的论点不言自明，都是标准的陷阱。

建构论证

很多学术写作都包括论证（argument）——不管是清晰的还是不清晰的。看似直接的数据分析也要依赖于论证，需要修辞工具来形成。我们要说服读者接受一个新理论或新解释。我们要让研究者相信，我们有可靠的数据和合理的分析。有力的论证会让读者接受作者的观点。想一想，为什么一个读者要关注你的想法，甚至于要接受你的想法。

你认为你有论证。这些材料吸引了你，因此你预计任何人都

---

①阿黛尔·克拉克注意到，修改10或10次以上是很平常的（私人交流，2004年12月22日）。一个写作老师告诉我，她直到修改4遍草稿之后才会拿未完成的作品和非正式的听众分享。

想去读它。但是你的读者为什么要在意它呢？如果在意，那又如何？

作者必须解决“那又如何”的问题。强有力的论证会回答“那又如何”的问题，因为你清晰地表明了为什么你的扎根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导致左右为难，因为论点可能是难懂的或是陈旧的。那意味着发现你的论点，并使它具有原创性而且具有意义。

你非常可能在初稿中埋没了论点。努力找到它。找到它会很有帮助。你最后的论点很可能和最初设定的论点很不相同。那很好，表明你成长了。一个最初的目标把你带入研究中，但对于成稿的论点来说还远远不够。当新手作者把草稿交付出版时，他们常常把最初的目标误以为一个已完成的论点。现在你能够得出一个更具启发性的论点，继续前进，并围绕这个论点修改和重新组织你的草稿。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把你的论点放进每一部分。我们的论点并不像停下来的汽车一样静止不动，只等我们去发现它们。我们很少是从一个驱动我们写作的最重要的论点开始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要恭喜你的好运气了。如果不是这样，不要停下来干等着一个论点从天而降，并自动把分析的各个部分为你组合起来。

作者必须解决“那又如何”的问题。强有力的论证会回答“那又如何”的问题，因为你清晰地表明了为什么你的扎根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57

相反，你需要对它进行加工，这样你的论点才会出现。它会随着你思考的发展而出现。一个论点是斟酌资料之后的成果。对你生成的论点做简短而连续的备忘录会有助于你进行聚焦。一些研究者会从大声谈论他们的想法中受益颇多。自言自语也会产生许多模糊的论证形式。检查你的手稿并写出下面内容：

- 我在此处的论点是________________。
- 我的论证是________________。
- 支持这个论点的材料有________________。

在写作过程中，和其他人交谈要比自言自语冒险。他们可能会鼓励你说出你已经知道的，或者你可能会关注他们希望知道的而不是你的论点仍然需要你去做的分析工作。我的建议是，如果

你必须和其他人交谈的话,就向他们解释你的分析逻辑,并进行录音。你可能会在谈话过程中抓住论证的本质以及它的顺序,而这些可能是你在草稿中没有说明或仍然不清晰的。

> 一个论点是对资料进行斟酌的结果。你可以从存在于你分析中的要点那里产生论点。

你会从嵌在分析中的要点那里产生你的论点。概括出论文每一段的要点,有助于你发现微妙的论点。有时它有助于你从一个尝试性的初始命题开始,你需要不断完善它;看它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但是要到确定它能解释你最重要的想法之后再选择它。你可能会放弃最初的论点,那也没错。通过对这些想法的深思熟虑,你会获得更加有见地的论点。

有助于发现论点的一些问题:

- 你希望你的读者怎样理解这个过程或分析的意义?
- 为什么它是重要的(即使有经验的作者也常常*假定*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不是努力使意义更为明确和清晰)?
- 告诉读者你想做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告诉他们这些?
- 你的主要观点是和哪些句子或段落结合在一起的?

返回去寻找你的论点——用彩笔把它标识出来。最好是把它概括出来。你的次论点是什么呢? 它们和你主论点的关系是否紧密? 它们对于这个主论点是不可分割的吗? 如果次论点和主论点联系松散,你会不加修改就删掉它们吗? 如果真的没关系,就删掉吧,在另一个研究中再使用它们。如果你不删除,就使次论点和主论点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和密切吧。

寻找使你的要点联系起来的具有说服力的句子或段落。你会在那儿找到你的论点。作者可能并不理解什么是他们分析中更为重要的。你的论点可能隐藏在你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埋藏在结论之中。你在最后的时刻说明了你的论点。现在要在一开始就把论点放在导论中,并且在整个论文中塑造这个论点。

158

为了证实你的论点,你要提供生动的描述、例子、能够展示要点的证据,而不是仅仅告诉读者它是什么。单一的论断会使读者厌倦;它们并不能使他们信服。要使存在于具体经验事例中的分析性陈述保持平衡。你能看出本章开始的摘录(对慢性病长期性的了解)和下面摘录之间的差异吗? 你觉得哪个更具理论性? 哪

个摘录更具说服力？

了解疾病的意义

> 得了病，必然会觉得难受。单单得知生了病还不够。在确定了身体感觉或身体功能的变化之前，人们会逃避，不想面对病症，甚至是严重的疾病，而且还会忽视医生的建议和警告。疾病似乎并不是真的。然后这个人可能宣布这个诊断是错的，无关紧要的，或者是不合逻辑的，和医生的关系也相应变得不顺畅起来。
>
> 人们是通过体验疾病来知道什么是疾病的（Charmaz，1991；Davis，1963）。对于疾病长期性的了解来自日常生活经验中细枝末节处所遇到的困难，比如开一个罐头盒、弯腰拣报纸、叠床单、清理草坪等。和过去毫不费力的表现相比，这是让人不安的。这种震惊后来会成为明确追求的标准以及评价身体状况的标准……（Charmaz，1999，p. 282）

显然，这两个摘录代表了不同的类型，服务于不同的读者。第一个是为大学出版社写的书评，要展示原创性的研究。书评不仅要提供可靠的学术思想，还要面向学术专家和一般读者。第二个摘录是为一本手册撰写的概括性的文章，这本手册是针对研究保健和医学专业人士的社会科学家的。在写了一个扎根理论之后，你可能会在之后的写作中为不同的目的呈现你的观点，正像在第二个摘录中所表现的那样。如何组织你的行文要看你写作的目的以及目标读者。

从一开始就要进行分析，在形成你的论点并获得证据之后，要为你的读者和专业标准而写作。在连贯草稿的基础上进行写作。对于每一个草稿，接受更简单、更直接的词语和更紧凑的表述和逻辑。最后，你要增强分析的精确性、清晰度以及文章的流畅性。

仔细审查类属

再次检查你的类属，看它们是怎样形成这个草稿的。审查这些类属的力度、目的和模式。然后对它们进行整理，使它们清晰而活跃。要使得类属能够对材料进行新的处理。在使用类属时要明智；不要滥用类属或蔑视你的读者。扎根理论的一个隐患就 159-160

是让你的作品充满了太多蹩脚的行话。消除和平复那些类属,把最重要的类属变成你自己的这个手稿的概念。

你已经让你的类属多次经受分析性审查了。有了每个连续的备忘录,你的想法会变得越来越有力和连贯。这样,你就有了一个节奏,会自然顺畅地进行你的大部分工作。扎根理论方法作为分析过程一个内在部分,会推动类属中和类属间联系的形成。这样,你的句子已经汇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部分。

现在检验一下你类属的力量、目的和模式。考虑取消(collapsing)那些缺乏力量的类属。问问自己:它们在这儿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如果你并不需要它们服务于这个分析、论点或读者,就放弃它们吧。表7.1是早期备忘录的一段摘录,我的类属读起来像一个清单,听起来像个演讲。但是,它们揭示了我是怎样安排和整合叙述中的想法的。

表7.1 早期的一个有关揭示病情的备忘录的摘录

揭示病情的两难

慢性病患者常常想知道,在告诉其他人他们的病情时应该说什么,需要说什么。正如凯瑟琳·刘易斯(Lewis, 1985)在她书中说的那样,"'你好吗?'可能会成为一个慢性病患者需要回答的最困难的问题,凯瑟琳患有红斑狼疮。(3页)……"

避免说出病情

因为有这些潜在的代价,避免说出病情就完全是对疾病的自然反应。社会环境以及具体关系可能会形成或强化某些人避免说出病情的倾向。可能避免说出病情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因要取决于这个人是否从根本上把疾病看作是一种现实,以及如果把得病看成是一种现实的话,是什么样的现实……

讲述的形式(forms of telling)

讲述意味着要付之于想法、行动或感情,意味着要说清楚这些东西。在这里,讲述常常包括宣告和叙述专业人士对病情和症状的说明……

1. 揭示病情(disclosing)

揭示病情代表了一种主观的讲述形式,会把一个人的经验、情感带到台前。揭示病情暴露了与自我相关的关键事实和情感。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中很少公之于众的对自我的私人观点和个人顾虑都可能在这里出现。揭示病情的过程是一种冒险……

续表

我在数据中发现了揭示病情的两种类型:自我保护型的和自发形成的……
2. 告知(informing)
相反,在告知病情时,病人会采取一种客观的立场,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和处境和他们自己是隔离的一样……告知会降低情感风险。和揭示病情相比,告知允许对情绪、其他人的反应以及可能的消极标签有更多的控制。
3. 策略性的宣告(strategic announcing)
通过进行策略性的宣告,病人把他们的控制扩展到信息、自我和其他人的反应。他们会设计他们说的内容、告诉的对象以及什么时候说。策略性的宣告会保护自我、控制互动关系并保存力量……
4. 对病情的张扬(flaunting illness)
进行策略性宣告的逻辑扩展就是对病情的张扬。在张扬病情的时候,人们把进一步的控制扩展到其他人的反应,并会极力从他们的听众那里获得一个具体的反应,常常是震惊或内疚感……
揭示病情的策略
病人会形成一些揭示病情的策略,保护他人、自己以及他们之间关系。他们可能不希望再保守秘密。但是,他们可能并不想控制其他人的反应,特别是如果它深深地触动了自己的愤怒、怜悯或恐惧时。他们的策略依赖于要说出的内容以及如何说……
1. 揭示的内容
缓和这个消息会让其他人对这个疾病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病人像专家一样通过强调积极方面,通过掩盖所有消极的情感,通过对治疗的积极立场,来缓和这个消息。
2. 采用保护性的说法
采用保护性的说法会用到下面的四个策略:①获得其他人的协助,②设置说话的环境,③形成不断好转的线索,④有选择地告知……

表 7.1 的类属是直接的,它们的顺序是有意义的。它们涵盖了能够激发读者进行比较的经验。每个人都不得不采用某种类型的告知形式。评价一下你的读者对同类经验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类属的理解,然后决定是否删去每个类属的正式标题。在表 7.2中表现的是在正式出版物中这些类属是怎样瓦解的。

161

表 7.2 已发表的版本:关于揭示病情的备忘录

揭示病情的两难
慢性病患者常常想知道,在告诉其他人病情时,他们应该说什么,需要说什么……
避免揭示病情
因为有这些潜在的代价,避免说出病情就完全是对疾病的自然反应……
潜在的损失和风险
除了冒着不被别人接受以及失去自主的最终风险之外,病人面对的是直接互动关系中的风险:①因为说出了病情,或得了一种疾病,而被排斥,而忍受屈辱,②不能控制其他人的反应,③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讲述病情的形式
讲述病情意味着要使想法、行动或情感能够清晰地传达以便别人能够理解。讲述病情通常包括宣告病情以及列举专业人士对病情和症状的说明。因为揭示病情代表了一种主观的讲述形式,会把一个人的经验、情感带到台前。在美国中产阶级生活中很少公之于众的对自我的私人观点和个人顾虑可能会在这里出现……(Charmaz, 1991a:109-119)

你的类属可以作为工具来形成语境。要使每个次级类属都适合你的主标题。然后考虑把你的次级类属作为标题包括进来。经过认真选择的扎根理论类属,如果作为学生的论文以及专业日志的路标(signpost)会发挥很好的作用。社会科学和专业期刊的文章会包括很多这样的路标。散文(essays)即使包含这样的标题,数量也要少很多。审稿编辑可能会在快速阅读后删除所有的次级标题。随着路标的消失,叙述风格也会发生变化。一种直接的科学风格消退了,更加文学化的风格会发展起来。要保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类属作为路标,都要让它们融入到叙述中。

类属如果过于一般化或太明显,就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包括进来呢?到这个时候,你应该有能力把那些脱离目标的任何类属删除掉。更少但却更新颖的类属会给你的写作带来力量,并成为读者能够记住的概念。

次级类属如果能够解释新观点，就可以考虑把他们作为文章的清晰标题。保留这些观点，但要使它们服从于主标题或目标。在这一点上，要考虑一下，引入图表是否能使你的分析和论点更为清晰，便于读者理解。当我们从分析性写作转向和读者的交流时，面对作为作者和分析者的我们自己，和面对读者，我们的做法应该有所不同。你可以削减一些次级类属，压缩一些描述，并省略一些过于明显的陈述，但要增加一个图表来说明概念关系，因为尽管它们对于你是非常清晰的，但对于读者却不是这样。

162

当我们把所有的次级类属都包括进来时，我们的声音会变得沉闷乏味，写作会变得僵硬呆板。是的，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又一个的次级类属来管理我们的研究工作。但是管理研究工作和为读者写作是不同的。想想看，读着一份每一个轴心代码都被仔细说明了的分析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们从分析性写作转向和一位读者的交流时，面对作为作者和分析者的我们自己，和面对读者，我们的做法应该有所不同。

我在这里提个醒：把次级类属变成清晰的次级标题，在不熟悉的领域中是有用的。非传统的想法和抽象的概念构架需要有更多路标。比如，对时间的体验，我们还没有很成熟的语言去谈论。这样，我拒绝审稿编辑把我的次级标题删掉（而且主任编辑是同意的）。下面的次级标题不仅可以作为路标，还可以表明病人与时间关系的长期性。这些次级标题可以作为概念类属，并把分析植根于语境和行动中。

作为时间标志的疾病

很多人用疾病来标识时间，来划分他们的生命阶段（Roth，1963）。他们把特定的时间点作为一个积极的变化来庆祝和纪念。时间点也被作为衡量疾病、健康和自我的参照点……

产生一个年表

病人指出了他们生命阶段中的时间是怎样和自我直接发生关系的。他们的疾病年表使他们的经验更加易于理解。他们用年表来帮助他们解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情况越来越糟或越来越好，以及疾病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建立时间标志

什么是时间的基准?为什么一些事件会永远那么突出,而另一些却在时间流逝中模糊……?

作为衡量标准的时间标志

当人们通过疾病来标识时间时,时间标志意味着什么呢?被标识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什么?通过比较疾病中的自我观点和其他人对自我的观点,他或她能够衡量现在的自己。这些衡量标准可以用来评价这个人的生病状况。同样,用积极的方式标识时间会比仅仅发现各个时间标志对未来有更积极的期待……(Charmaz, 1991a,198-206)

把主要类属作为各部分的标题。在形成一个完整报告的过程中,扎根理论会给你明确的帮助。你的类属会让读者扎根于你的问题中,引导他们理解你的分析。它们预示了内容,强调了这部分内容的逻辑。行动类属要比"发现"或"对数据的分析"更能引人入胜。如果你必须接受一种传统的量化研究格式,那么就把标准的几部分早些放在报告中:"导论"、"文献评述"、"理论框架"和"方法与数据"。在你完成这个领域令人钦佩的工作之后,你就为自己的分析建立了稳固的基础——而且获得了某些自由的空间。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突出展示有着你自己类属的这一分析部分,使其成为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也是最长的部分。

163

把主要类属作为各部分的标题。在形成一个完整报告的过程中,扎根理论会给你明确的帮助。你的类属会让读者扎根于你的问题中,引导他们理解你的分析。它们预示了内容,强调了这部分内容的逻辑。

回到图书馆: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

当你返回图书馆撰写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时,会发生什么呢?你会设想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作者吗,他/她会在认真分析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公正的分析?尽管学者可能会披着客观性的外衣,但研究和写作本质上却是意识形态的行为。文献评述和理

论框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场所,你在其中宣称、定位、评价和捍卫你的立场(也见 Holliday,2002)。在报告的这两部分你应该包括比概述更多的东西。你要展示为什么你支持某些论点,你接受和拒绝的是哪些证据,你是怎样得出深思熟虑的结论的。你需要考虑的是什么?你是怎样谈论它们的?

> 尽管学者可能会披着客观性的外衣,但研究和写作本质上却是意识形态的行为。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场所,你在其中宣称、定位、评价和捍卫你的立场(也见 Holliday,2002)。

从形成你的研究任务的正式要求和非正式传统开始。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的界线常常是模糊的。是否要在它们之间进行清晰的区分要取决于手头的任务以及它的要求。学生的研究项目在各个水平上都要求既要有文献评述,也要有理论框架。其他任务则采用不同的形式。在大部分学科中,著作不同于博士论文。一篇期刊文章可以来自一篇论文的任何章节,但不能简单复制任何一章。如果要作为一个文集中的一章,可能还要采用另外的形式。

学科和写作类型(genres)也会形成你怎样、哪里以及何种程度上"评述"文献和"使用"现有理论。学系(department)和指导老师(advisors)在涵盖文献和理论框架的要求上是不同的。学系可能对论文的每一部分章节都有不同的长度要求;而指导老师可能要求学生把研究文献和理论观点融入到他们的分析中去。

164

如果你计划把你的扎根理论交付出版,首先需要关注一下相关的研究会出现在哪里。接下来要仔细研读这些期刊和出版物。他们的编辑制度有助于你判断每个编辑对你的研究是否有兴趣。你可以在他们编辑条款以及期刊指南中找到期刊编辑的这些制度。出版社常常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布这些内容。这有助于你研究相关的文章或书籍,从而确定他们的选题、分析风格和水平、研究方法以及读者。在了解完编辑制度和实践,并评价了作者们的著作之后,你可以为你的研究作品选择几个潜在的发表途径。要注意一下在你的目标期刊或出版社中,作者们是怎样评述文献和写理论框架的。研究一下最优秀的作者的写作风格,但还是要形成你自己的风格。

最好的作者可能并不是最知名的学者。一旦一个学者建立

了他或她的声望,即使他或她的写作不是一流的,编辑也会接受他们的作品。也就是说,一些老资格的(senior)学者已经磨砺了他们的技巧,能够写得清晰、优雅和风格化。他们的作品不会有那些初级水平的同行常有的那些拐弯抹角的行话和很绕口的句子(Derricourt,1996)。这些作者不仅由于他们的思想,也由于他们的写作风格而赢得了密切的关注,因为写作水平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不断发展,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新的作者。要认真地选择你的写作榜样。

当你计划把你的作品交给外部审阅时,要使用目标期刊或目标出版社能够接受的实际惯例和作品风格。出版物的学科不同,作者们在处理选题和组织叙述时也会有所不同。有的学科可能会规定要涵盖以前的所有文献;另一个学科可能重视简练而有限的评述。一个出版者可能要求你在专门的一章评论相关的作品;而另一个出版者则可能希望你在末尾使用注释(notes)。很多学术期刊的文章包括了对很多相关著作不加讨论的引用(citations)。一些期刊禁止使用附注(endnotes),但又认为作者应该有大量的引文。对文献的分析可能出现在导论部分。一本书前面的章节会形成对现有理论进行讨论的基础,它一般出现在分析之后,而不是之前。

要做和你的扎根理论相关的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你可以用它来指导你批判以前的研究和理论,来和这些材料进行比较。

不同的风格会给你留下无限的选择空间吗?不是。要*做和你的扎根理论相关的*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你可以用它来指导你批判以前的研究和理论,来和这些材料进行比较。目的是在清晰的陈述中得出你的想法。然后修改这些部分使其适合你的具体任务。在你形成自己的分析*之后*再为读者和专业标准进行写作。

扎根理论中不断比较的方法并不以你数据分析的完成而结束。文献评述和理论框架可以作为有价值的比较和分析的来源。通过把你的扎根理论与其他学者的证据和想法进行比较,你可以展现他们的想法在哪里以及怎样启发了你的理论类属,你的理论是怎样扩展、超越或挑战这个领域的主导观念的。

具有争议的文献评述

应该在什么时候钻研文献？应当怎样钻研文献？需要涵盖哪些内容？扎根理论研究中何时进行文献评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争论和误解。回忆一下，古典扎根理论家（Glaser &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建议要把文献评述延迟到分析完成之后。他们并不希望你通过以前的观点（特别是“已接受的理论”）来看你的数据。

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提出了一个尽管有问题，但也很有价值的观点。教师们通过学生在他们的领域里引用关键理论的情况来评价学生，这也并不稀奇。一些研究机构希望学生能够写出展现他们能力的博士论文，这些能力指能够对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应用。初学者很容易被其他人的观点所迷惑；而已有建树的学者可能会沉迷于自己的观点。无论哪种情况，新老学者都会把他们的数据强行放入已有的类属中。有意延迟文献评述的目的是避免接受先入为主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强加在你的研究中。延迟文献评述有助于阐明*你自己的*观点。

在格拉泽和施特劳斯努力把新手学者从旧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他们或者夸大了自己的立场，或者对此意见不一。对于施特劳斯来说，《扎根理论的发现》的关键之处在于修辞。[①] 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 Corbin, 1990）这样阐明他们的立场，“我们都要探究专业和学科文献中不可忽视的背景”（p. 48）。格拉泽（Glaser, 1992, 1998）对于先在知识（prior knowledge）的立场多少有些模糊。他坚持认为扎根理论家能够而且应该使自己不受已有观念的影响。但是在《理论敏感性》（*Theoretical Sensitivity*, 1978）中，格拉泽在关于理论代码的讨论中谈到了先在知识。他写道，“扎根理论家为了对次级标题（次级标题对数据中的关系进行了清楚的表述）保持敏感，有必要知道存在多少理论

①我是在和施特劳斯进行了多次谈话和访谈的基础上形成这一观点的，他认为，扎根理论家在着手进行他们的研究之前都有着先在的生活和知识。也见：Charmaz, 1983。

代码”(p. 72)。如果它们没有成为我们技能的一部分,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代码呢?而且如果它们成为了我们技能的一部分,我们会对它们的出处一无所知吗?

其他的学者已经拒绝了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早期的主张了,而且继续这么做。比如,布尔默(Bulmer, 1979)、戴伊(Day, 1999)以及莱德尔(Layder, 1998)认为,格拉泽,可能也包括施特劳斯,天真地把研究者当作一块白板了。尽管早期的作品持这样的观点,但并不是所有的扎根理论家都这样认为。凯伦·亨伍德和尼克·皮金(Henwood & Pidgeon, 2003, p. 138)一个切中肯綮的术语“理论的不可知论”为整个研究过程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立场。他 166 们认为研究者应该对以前的理论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他们的立场和格拉泽(Glaser, 1978)的立场是一致的,即要使已有理论在你的叙述中获得一席之地。要把已有概念看作是有问题的,然后要找那些生动的、可理解的概念,而不是教科书里给定的那些概念。

对一项研究或项目申请的要求或批准的研究方案可能会让你在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前就开始在图书馆查阅文献。这一提议要求你拥有与你的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和主要理论相关的复杂知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你形成自己的类属以及这些类属之间的分析关系之前,你要让这些资料处于闲置状态。然后开始把你的研究工作放在相关的文献中。既然你已经开始了你的研究,那么你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实质领域,并达到了未曾想象的理论高度。如果需要这样,就通过概括你的研究路径来让你的老师满意,但是首先要专注于写出你自己的扎根理论。

推迟文献评述并不等于要写一个没有文献评述的报告,也不能成为对文献情况粗心疏忽的借口。一些扎根理论家对文献评述的言论或疏忽反映了对以前作品的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某些学者不愿意接受他们同事具有竞争力的观点,或者任何关键性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可能会破坏他们的立足点。还有一些学者引用次要的而不是最重要的内容。懒惰的学者总是不能引用到共识和分歧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我们需要给以前的研究以恰当的评价。一个材料充分的、要点突出的文献评述会加强你的论点——以及你的可信度。对于扎根理论家来说,写一个论述充分

而又聚焦的文献评述常常意味着要跨越几个领域和学科(优秀的例子可见 Baszanger, 1998; Casoer, 1998; Clarke, 1998, 2005; Wiener, 2000)。

很多研究报告要求使用标准的、严格的格式。使用格式的诀窍在于不能让它抑止你的创造性,扼杀你的理论。文献评述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为你在随后的部分或章节中要做的事情搭设舞台。你需要分析与你的扎根理论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最重要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评价和批判*文献。你的文献评述所能做的不仅仅是罗列、概括以及综合主要的作品。

来自文献和已有理论的主要观点常常出现在文章或报告的导论部分。洛拉·贝克斯·伦珀特(Lempert)在她的文章《帮助的另外一面:受虐妇女寻求帮助过程的消极影响》(The other side of help: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elp-seeking processes of abused women)的导论部分,介绍了她对文献进行的重要研究,提出自己的论点,并把它和以前的理论进行比较。下面的摘录解释了她的逻辑:

> 在本文中我对一些重要的社会行动进行了考察,即受虐妇女从非正式网络资源中得到了获得帮助的途径,最初还保持着和他们的联系,后来却离开了他们。"受虐妻子"的集体表征把这种关系简化为暴力行为,并且认为,受虐妇女应该通过离开虐待她们的配偶来解决受虐的问题(Loseke,1992)。然而,受虐妇女对配偶以及和配偶的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解释。她们相信配偶是她们爱和情感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她们生活中最危险的人(Walker, 1979; Lempert, 1995)。要理解何时、为什么以及怎样寻求帮助来处理、改变以及/或者离开她们的关系,必须要分析地把握这一同时性。
>
> 解释"家庭暴力"和/或"妻子受虐"的理论有助于理解整个复杂的动态状况(见 Walker, 1979,1989 论暴力理论的心理循环;Straus, Gelles & Steinmetz, 1980 论暴力理论文化;Pagelow, 1984 社会学习理论;Giles-Sims, 1983 一般系统理论;Dobash & Dobash, 1979 以及 Martin, 1976 的冲突理论;Strauss 1977 的亲密关系资源理论;Mackinnon, 1993 年暴力理论的色情化)。但是没有一个是完全的。

167

> 几乎少有例外(Dobash & Dobash,1981;Ferraro & Johnson, 1983; Mills, 1985; Loseke,1987; Chang, 1989),受虐妻子问题的研究者集中关注的是暴力关系中的妇女在做什么,而不是关注受虐妇女如何解释暴力行为,以及这些产生意义的解释如何影响了她们寻求帮助的过程。大部分关于受虐妇女寻求帮助过程的研究集中于正式的机构,主要是警察局和医学反馈(或者缺乏这方面的资料)以及社区庇护所(Berk et al., 1983,1984; Berk & Loseke,1980/81; Bowker & Maurer, 1987; Edwards, 1987; Ferraro, 1987,1989; Schechter, 1982; Stark & Flitcraft, 1983,1988; Loseke,1992)。作为基本的关注点,我的分析有受虐关系中(也就是说,在爱和暴力矛盾而又并存的环境中)妇女非正式地寻求帮助的一些建议,还包括了这些建议产生的未曾预料的结果。这一研究通过分析性地直接关注一些善意的帮助行为所产生的某些消极影响,扩展了以前研究者的报告,强调了寻求帮助的过程和它们未曾预料的结果。它要求进一步关注二元对立的逻辑怎样阻碍了寻求帮助和提供帮助的过程。(1997,p. 290-291)

文献工作不仅仅局限于一篇论文的一小部分或者一部论著的一章。要把对文献的讨论交融在整个研究作品中。一个必需的部分或章节会要求你为这一讨论奠定基础。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挑战来进行下面的工作:

- 澄清你的想法。
- 进行具有启发性的比较。
- 请你的读者开始一场理论探讨。
- 展示你的研究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契合或扩展了相关的文献。

最后,你要创造一个对话环境,进入你研究领域当前的对话之中(也见 Silverman, 2000)。成为实质领域复杂对话的一部分意味着,你的读者能够把你当成一个严肃的学者。

168

表 7.3 撰写文献评述

文献评述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你能够专注于你的扎根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领域已有的观点和研究。它可以成为评价你对这些领域了解程度的一种方式。文献评述给你机会完成下面的目标: • 展示你对相关研究工作的了解情况 • 展现你在这些研究工作中识别和讨论最重要观点和最重要发现的技能 • 让你能够在自己的研究和以前的研究之间建立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联系 • 让你从自己的扎根理论那里得出自己的主张 使用文献评述来分析与你的具体研究问题以及已形成的扎根理论相关的作品。用文献评述来做下面的工作: • 列出形成、整合和评估文献的概念性论点 • *评价*早期的研究 • 具体介绍谁做了什么,他们是何时、为什么以及怎样做的 • 揭示已有知识之间的*漏洞*,指出你的扎根理论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 指出你的研究的地位并说明它的贡献

不是概括,而是要说明,为什么读者必须考察被引用的作品——和你这份报告的目的有关。文献评述所需要的详尽程度要依赖于你的研究任务是什么。无论如何,要对主要的文献进行处理——不管它们是否支持你的扎根理论,不仅要展示这些文献的一致性,还要展示它们的分歧。想一想你的研究是怎样在最后的结论中超越具体的研究的。你需要起草一个相关而又聚焦的文献评述。一个详尽的文献评述并不意味着摘要的无止境罗列。如果你的老师或学系期望一份详尽的文献评述,你就要集中并组织你的评论。再说一遍,用你的扎根理论来安排你的文献评述的结构。

考虑超越当前的实质领域,和其他领域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你的创新性分析理论,也要抓住机会贡献新的论题,研究新的研究对象群体,或者创造新的方法。

撰写理论框架

一个进行归纳研究的扎根理论家怎样撰写必需的理论框架呢?这一框架难道不是混乱胜于清晰?也许。这一框架难道不意味着你使用了演绎逻辑?也不尽然。你可能会不得不停下来,

然后勉强拼凑出一个理论框架。但是不要去拼凑,要让理论框架为你的读者提供一个指引,展示你的扎根理论是怎样*完善*、*扩展*、169 *挑战或超越*已有概念的。这样,一个理论框架就不仅仅是对草稿的概念基础所进行的宣告和概括了。

扎根理论中的理论框架和传统量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不同。在搜集数据之前,我们并不从理论演绎具体的假设。符号互动论的概念刚好说出了我的世界观。这样,这些概念影响了我能看到什么以及怎么看,就像其他研究者的视角也影响了他们一样。但是,这些概念直到与直接的分析问题相关,才会出现在背景中。

你的论证会说明你希望你的读者怎样对你的分析过程进行思考。理论框架会定位你所得出的具体论点。

你的论证会说明你希望你的读者怎样对你的分析过程进行思考。理论框架会定位你所得出的具体论点。在这里,你使用和发展理论框架的方式会产生一个新的扭曲(a new twist):它来自你对它的分析和论证。相反,使用传统量化设计的研究者在进行他们的研究之前,会引用已有的理论,并从它那里推导出假设。对于他们来说,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使用的理论是已经存在的。

相反,在一个扎根理论研究中,你把你的敏感性概念和理论代码放在理论框架中发挥作用。这些概念和代码把你的文本放在相关的学科和话语之中。敏感性概念可以解释你的起点。理论代码会有助于解释,你是怎样对关键想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概念化的。

要写一个能够服务于你的扎根理论的可靠的理论框架,你会怎么做呢? 考虑使用理论框架:

- 解释你的概念逻辑和方向。
- 关注主要观点。
- 介绍之前的理论工作。
- 定位和这些理论相关的新的扎根理论。
- 解释你的原创概念的重要性。
- 使其适合你的写作任务和读者。

理论框架不都是一样的。它们需要适合你的目标读者,满足手头的任务。比如,你为一个期刊写的东西就和为其他目的写的

不同。下面是我为《社会学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写的一篇文章的理论框架,《社会学季刊》的读者大都受过符号互动论社会心理学的良好训练。这一理论框架考虑了为适应疾病和残疾状况,病人身体、自我和身份之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关系。

理论框架

这篇文章对身份采取了一种符号互动论的视角(Blumer, 1969; Cooley, 1902; Lindesmith, Strauss, & Denzin, 1988; Mead, 1934; and Strauss, 1959),并建立在有关身体的文献的基础上(DiGiacomo, 1972; Frank, 1990; 1991a; 1991b; Frankenberg, 1990; Freund, 1982; 1988; 1990; Gadow, 1982; Glassner, 1988; 1989; Kotarba, 1994; Olesen, 1994; Olesen, Schatzman, Droes, Hatton & Chico, 1990; Sanders, 1990; Scheper-Hughes & Lock, 1987; Zola, 1982; 1991)。我利用了萨丽·加道(Gadow, 1982)关于身体和自我关系的解释,以及我早期对于慢性病中的自我的研究(Charmaz, 1991[a])和对生病损伤给身份带来的影响的研究(Charmaz, 1987)。

170

用符号互动论来说,个人身份意味着一个人定义、定位自我并区别自我与他人的方式(Hewitt, 1992)。彼得·伯克(Burke, 1980)认为,身份的概念内在地包含了人们希望怎样定义他们自己的方式。希望不仅建立在思想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如果可能,病人通常试图把他们的希望变成意图、目标和行动。这样,他们就被激励去实现未来的身份,有时也被迫去接受现在的身份。然而,他们也在暗暗形成自己的身份目标。这里,我把身份目标定义为人们所假定的、想要的、希望的或打算获得的最喜欢的身份(Charmaz, 1987)。身份目标的概念认为,人们在解释他们在世界中的经验和互动时,有目的地产生着意义和行动。一些人的身份目标是隐含的、未曾表述的和需要去理解的;其他人则有着清晰的最喜欢的身份。有些慢性病病人相信他们会实现自己最喜欢的身份;另一些人则在体验现在时,对未来的自我和正在产生的身份保持谨慎的态度(也可见 Radley & Green, 1987)。

加道(Gadow, 1982)假定,人们的存在本质上意味着体

现(embodiment),自我是和身体不可分割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心智和意识依赖于身体中的存在。反过来,身体感觉影响着心智和意识。但是,正如加道指出的,身体和自我尽管是不可分割的,但也不是同一的。身体和自我的关系对于那些认识到他们已经在遭受着持续的身体损伤(bodily loss)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变得特别成问题。对于那些以前通过控制和建构他们的身体来追求并保持永远年轻的病人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性从本质上被强化了(Turner,1992)。这样,损失(loss)的意义就植根于关于身体的假设中。个人不仅通过理性实践来进行身体控制,还认为他们的实践实现了而且非常确实地体现着个人主义(Shiling,1993)。

正如维克多·凯斯腾鲍姆(Kestenbaum, 1982)所看到的,疾病威胁到一个人的自我与身体、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感。慢性病患者会发现,不断严重的疾病始终威胁着他们身体和自我的统一(self-integrity)。他们风险在于病残的身体成为社会识别他们以及他们进行自我定义的唯一方式(Bury,1988;Goffman,1963;Locker,1983;MacDonald,1988)。这样,那些超越身体损伤和屈辱的消极标签的慢性病患者可能在定义他们自己时,就不仅仅通过他们的身体和疾病了(Charmaz,1991)。

加道认为,疾病和年老会导致身体和自我原有统一的丧失,并在新的水平上提供恢复统一的方式。她认为,原有的统一存在过,而且暗示着统一的失去和重新获得是同一个过程。但是,统一的意义只能主观定义。有些人也许本不该把他们自己定义为疾病前所体验到的这种统一,即使只是部分体验到的统一。因为慢性病患者经常会有新的始料未及的身体损伤,他们会不断经历到以前所定义或接受的身体与自我之间统一的丧失。这样,在每个这样的时刻,当他们遭受和定义损失时,身份问题和身份变化就会出现或再现。在本文中,我要解决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身体—自我统一性的丧失以及通过认可身体体验,让自己对寻求身体和自我之间的和谐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171

为了理解身体—自我的统一是怎样失去,以及怎样恢复的,我们必须理解病人赋予他们身体经验的意义以及他们所

在的社会情境的意义(Fabrega & Manning, 1972; Gerhardt, 1979; Radley & Green, 1987; Zola, 1991)。这样的意义产生于和他们个人历史有关的辩证关系中(Bury, 1982; 1988; 1991; Corbin & Strauss, 1987; 1988; Dingwall, 1976; Gerhardt, 1989; Radley & Green, 1987; Willams, 1984)并通过解释他们现在的经验进行协调。用符号互动论社会心理学来说,有病之身的现有意义以及自我的现有意义都是从过去的态度以及现在的社会认同发展而来的,但并不由它们决定(Blumer, 1969; Goffman, 1963; Mead, 1934)。

当慢性病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时,他们知道,它不仅破坏了他们的健康,也破坏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最喜欢的身份。进一步而言,他们可能发现,可见的疾病和身体的损伤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极为屈辱的身份。由于身体损伤,他们要重新评价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能成为谁。最后,他们在努力重建正常生活时,形成自己的身份目标(Charmaz, 1987; 1991)。慢性病患者最初会规划和期待重新开始他们未被疾病所影响的生活,甚至超越他们之前的身份目标。当病人考察他们的身体和自己时,需要在某些时候进行身份交易,甚至系统地降低他们的身份目标,使其和他们削弱的能力相匹配。在其他一些时候,当获得成功时,他们可能会不断地产生希望,并继续提高他们的身份目标。因此,提高的或降低的身份目标都会形成一个内在的身份等级,也就是病人在适应身体疾病和变化时所产生的不同身份系列(Charmaz, 1987)。(Charmaz, 1995a, pp. 659-660)

注意我直接引用了萨丽・加道(Gadow, 1982)的论点。它们是我接下来论证和分析的中心。加道的哲学论点为理解我在文章中所要做的事情提供了源泉;符号互动论社会心理学提供了另外一个源泉。因为《社会学季刊》的读者理解关于自我的符号互动理论,因此我提到了这些重要作品,但并不需要去解释它们。你在发表的文章中所给出的解释的分量和深度要看杂志和它的读者的情况。一个课堂作业或论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码事。你不是给和你有共同知识背景的读者写作,你必须证明,你能够解释、批判和使用现有理论。

考虑在一个具体的作品中——而不是在你的整个研究项目中——使用理论框架来说明具体的论点。你可能有几篇论点不同的论文。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建构从同一数据开始的几个扎根理论。萨丽·加道的观点在我想出关于“适应身体残损(adapting to impairment)”的观点时变得非常重要。加道和我都把身体经验作为真实的而且是与自我紧密联系的。我通过强调个人意义、不断失去和获得身体—自我的统一以及在内在身份等级中的身份重建扩展了加道的观点。

172

通过写作来呈现

写作反应了作者的选择。扎根理论家的写作风格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报告形式。研究者记录他们的扎根理论，叙述支持理论的“事实”。但是，你能够通过关注写作过程来扩展可能性的范围——并扩展发表的途径。正如劳雷尔·理查德森(Richardson，1990)所说，写作至关重要(writing matters)。[①] 你可以使用那些反映你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的修辞技巧和写作策略。使用这些策略有助于发展你的扎根理论，增强你的写作能力。下面一些策略和实例可能会有所帮助。

超越对行动和事实的分析。想一想在你分析的背景中，哪些是相关的而又是潜在的？文化背景？历史前辈？组织气氛？情绪状态？看看文本中的表达方式怎样影响了你的写作——而且让你的分析超越了报告。在我的研究中，情绪状态影响着场景和表述。这样，我要通过写作中的呈现(rendering)来激发我的经验情感——作为分析和证据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包括把读者带到故事中，通过语言风格和叙述说明来传达它的情绪。这样的方法让你的写作在没有变成小说、戏剧或诗歌的情况下，和典型的科学格式区分开来。我用再现了经验节奏和情绪的语言构造(frame)了关键的定义和区分。

①格拉泽(Glaser，2001，p.80)提醒读者，“扎根理论是在概念性观点的基础上被人们所了解和记住的。没人会记得它是怎么写的。”作为一个曾经的编辑，我认为格拉泽第一点是对的，第二点是错的。最好的以及最坏的作者和作品都会成为学科知识的一部分。

当一个人突然陷入一种持续的危机，并把他的生活撕裂开时，过一天是一天的情况就出现了。(Charmaz，1991a，p. 185)

他们等着去描绘一个未来。不断等待。他们监控着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他们寻找迹象来指引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只有当他们确信疾病的最坏情况已经结束时，才会描绘未来或者转移到另一个时间点上。当他们觉得已经远离疾病，能够放松情绪时，才会描绘未来或转移到另一个时间点上。(Charmaz，1991a，p. 191)

类比和比喻可以解释包含在一个类属中的默认意义和情感(也可见 Charmaz & Mitchell，1996；Richardson，1994)。在下面的第一段摘录中，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某些慢性病患者所体验到的限制。在第二段摘录中，我的目的是传达时间的双重性是怎样被感知的。 173

这些人不得不活一天是一天。他们强迫自己这样，几乎是咬紧牙关。这里，活一天是一天就好像在语法学校学习一种陌生的、让人厌恶的课程；它是活下去的一个讨厌的前提。(Charmaz，1991a，p. 179)

漂移的时间(drifting time)，和拖延的时间(dragging time)相反，是不断展开的。当沉浸在疾病中时，漂移的时间像一把扇子一样，是不断展开和膨胀的。(Charmaz，1991a，p. 91)

简单的语言和直接的观点会使理论具有可读性。再说一遍，你对这些技巧的使用程度要取决于你的写作任务和读者。对于一个希望你写书而不是一篇博士论文的部门，采用这些策略会加速你的工作。对于一篇备用(spare)的理论文章，要尽量少使用这些技巧。理论是嵌入叙述中还是用简要的语言凸现出来，要看你的任务是什么，以及如何表达你的任务。当理论交织在叙述中时，会更易于接近，但也更难于识别。

其他一些策略也会使你的写作更具可读性。抓住经验的节奏和速度会让你把这些节奏和速度在写作中再现出来：

从窘迫到羞耻。从不舒服到痛苦。无尽的不确定。接

下来呢？管制。(Charmaz,1991a,p.134)

> 一天天过去了。同样的一天继续过去了。既然没有什么事件来打破每天、每周或每月,对时间的忍耐就在增长。疾病就像一场漫长的、不会被打断的对时间的忍耐。(Charmaz,1991a,p.88)

出人意料的定义和观点会引起读者的注意。

> 用来表达习惯的语言是无声的(The language of habit is silent)。(Charmaz, 2002b,p.31s)

> 扎根理论在"质性革命"的前线服役(Denzin & Lincoln, 1994, p.ix)。(Charmaz, 2000a,p.509)

问题有助于把主要的观点联结在一起,或者有助于引导读者。反问会加快节奏,并让人关注之后的要点。你也可以以新颖的方式使用问题。你也可以站在读者或研究对象的角色或立场上,像他们那样提问。

> 是癌症吗？是绞痛吗？当眼前常常无法诊断的症状可能意味着严重的慢性病时,不确定性的痛苦就会被激发出来。(Charmaz,1991a,p.32)

努力去平衡表述的逻辑和理论化经验的逻辑。作者可以使用线性逻辑去组织他们的分析,使经验能够被理解。但是经验既不一定是线性的,也并不总能用清晰的界线来进行方便的划分。比如,对疾病的体验,很少是螺旋上升的结果,也并不完全适合一个线性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的扎根理论作品(Glaser & Strauss, 1967; Glaser, 1978)强调发现和分析是同一个基本的过程,但它可能对你并没有什么用。

考虑一下文章的节奏和语调。想一想你在什么时候以及需要怎样去改变文章的节奏和语调。在你带着读者进入一个主题时要确定一个基调。提供既适合你的观点也适合你的语调的证据。下面的摘录是名为"侵入性疾病"的一章的开头。我的目的是说明,病症和身体损伤是怎样对日常生活产生限制的,以及这些限制为什么不能轻易排除。约翰·加斯顿等研究对象在这点上认可了"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提法。他说,

174

> 现在什么是好日子呢？没有什么好日子……嗯，现在好日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中立的一天。你知道，从来没有……几乎从来没有这样的日子，让我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而且置身事外！……我真的不能花很多精力[去关注我的身体]，从来不能。我现在花很多精力，因为我被[严重的肺气肿所]限制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说我在监控着身体；我是在观察[笑]。是的，我不得不观察它。（Charmaz，1991a，p.41）

对于扎根理论家来说，一个故事并不只是故事本身。相反，我们要用故事服务于我们的分析。一篇文章的力量依赖于分析的范围、深刻性和有用性。下面是我对“好日子”的分析性陈述：

> 好日子意味着疾病侵害最少，能最大程度地控制头脑、身体以及行动，对行动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在好日子里极少关注病情和养生事项（regimen），或者他们可以自如而有效地控制自己。疾病仍然是他们生活的背景。在好日子里，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扩大了，甚至可能变得膨胀起来。当病情减轻时，人们会有更好的日子。就像从前曾被判刑的人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一样，他们可能希望立即去弥补失去的时间。（Charmaz，1991a，p.50）

注意，约翰·加斯顿坦白的陈述怎样为分析奠定了基调，怎样补足了分析的深刻性，怎样和作者的语言节奏形成了对应。这个类属“好日子”嵌入在更大的分析之中，即对侵入性疾病的体验，并和“坏日子”并列。对“好日子”的分析性定位让我能够延伸约翰的陈述和理论解释之间的距离。比较一下你有发挥空间的地方，和你需要经验证据的地方。

现在考虑对作者的声音做一个注解。我在前面的章节指出，扎根理论中的分析性的强调会导致沉默的权威，即充满了假定的中立、客观主义的表述以及不在场的作者（Charmaz & Mitchell，1996）。但是，完整的扎根理论没必要是无声的、客观化的记录。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观点交织在文本中，描绘一种惊奇、意象和戏剧的感觉。

上面的例子表明，即使是扎根理论家也没必要像干巴巴（disembodied）的技术员那样去写作。我们可以把激发想象的写作融入到叙述中去。上面的摘录中，我的声音遍及整个过程并说服着

读者,虽然我作为场景和情势的解释者,是处在背景中的(也见于Charmaz & Mitchell, 1996)。作者通过选择语言、语调和节奏,使得经验的呈现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呈现。声音(voice)反映了研究者对被研究现象的参与;它并没有再生产这些现象。但是通过仔细再现我们研究对象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主观性中的集体性(collective)。 175

听听下面两段话之间的差异:

> 身份水平对于个人身份和/或社会身份(慢性病人希望实现的)来说,或者是潜在的,或者是明显的。这些身份水平反映了他们希望塑造或选择的自我类型、也就是他们的首选身份。因此,实现这些身份目标就是否定或无视来自疾病的身份鉴定。这些慢性病患者建构首选身份的努力来自他们作为病人个体的经验。我的研究对象中几乎没有人是从有组织的同类人群获得身份目标的(比较 Anspach[2])。然后这些病人建构了和他们的希望、期望或梦想,以及和他们对具体环境的期待和定义相关的身份水平。因此,具体个人在首选身份目标上是不同的,它们代表了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及个人历史的不同时刻个人形成的不同身份水平。(Charmaz, 1987, pp. 286-287)

> 通过斗争和屈服,病人在适应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对自己坚决起来。他们忍受身体的痛苦,但是却找到了自我。这种长时期的艰难经历使他们有了高深的自我意识水平——对自己,对环境,对和其他人共存的场所。当他们的身体衰弱时,他们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当他们放弃对身体的控制时,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身体。自我是身体的,又是超越身体的。有了这种立场,就会有果决感和对时间把握的意识。病人们把握住了何时去斗争,何时去屈服。他们会逐渐不受包括被轻视在内的社会意义的影响。他们能够在仍然是他们自己的情况下毫不惧怕地面对未知。在这一点上,慢性病患者可能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反讽(ironic)的状态中,而这种状态对于健康来说是积极有益的。他们知道自我正处在一种考验中——对性格、才智和意志的考验,他们由此获得了一种骄傲。他们知道需要斗争,需要用勇气来面对他们身

体的损伤。

> 但是这一艰难历程对于这些慢性病患者很少是一种简单的旅程。他们常常会在同一领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的旅程,发现他们走到了未曾预料的歧途之中,在他们面对挫折、突发的病情、并发症及次生病症(secondary conditions)时。他们还发现艰难经历的每一部分不仅产生了障碍,还带来了决心和更新的可能性。(Charmaz,1995a,p.675)

你在哪段话里听到了人的声音?哪一段满载着学科代码?你想继续听哪一段?将第一段摘录从语境中脱离出来,我对自己不太公平。这一引文从介绍我的扎根理论概念开始,为接下来的内容做了铺垫。接下来我在身份等级中列出了身份水平——非凡的社会身份,恢复的自我,偶然产生的个人身份以及被拯救的自我。这些类属比理论框架更吸引读者的注意,而我正是从这个框架那里摘出了这一片段。第二段也是脱离语境的。我没有选择两个以同样概念为基础的理论片段进行比较,而是从结尾处选择了第二段摘录。作者对于其他作者不能总是公平对待,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但是重点在于:人的声音有助于产生令人信服的阅读。 176

小 结

写作是一个社会过程。可以利用朋友和同事的作用,但是首先要为你自己和你的扎根理论写作。你现在不是专家;理论是你的。在撰写文章时,让老师和以前研究者的声音减弱下来。一旦形成自己的核心观点,再把这些声音拉回来。向你的导师和关系密切的同事征求建设性的批评。在你把自己的手稿提交评议之前,把他们的帮助列出来——不论它是你的论文还是一篇文章。然后,要对他们的评论进行批判性评价,并愿意根据它来重新思考、修改和加工这个手稿。那意味着不仅仅是装饰性的修补,还可能意味着重新设计中心观点。比如,一个导师可能提出一个严肃的批评,而你对此并不同意。那么你不仅要考虑批评的内容,还要考虑是什么激发了这一批评。很有可能是表述的含糊、过于

一般化或者逻辑漏洞削弱了你的论证,从而引起了导师的注意。你可以修改这些问题,避免延误以及以后后悔,特别是在交付出版阶段。有着可靠数据和有趣想法的研究遭到拒绝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太早地把作品提交出版。

认真对待早期的批评,并不断修改草稿,你会提交一件经过打磨的作品,那会使你的扎根理论闪闪发光。每一次修改都能够使你的手稿更有力、更清晰、更有说服力。在你思考每一个草稿时,下一章的标准"反思研究过程"会帮助发展你的手稿,并预测评论者的关注点。同时,享受你在这个过程中的发现。



第8章 反思研究过程

Reflect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在旅程的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展望一下扎根理论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才是扎根理论，什么时候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方法，什么时候它又是别的东西。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扎根理论非常重视方法论的发展，扎根理论的定义对于发展知识蕴涵着强大的潜力。扎根理论给了我们分析的工具和方法论的策略，这是我们即使没有接受某一特定的知识理论或现实观点也可以采用的。为了扩大扎根理论的范围，我呼吁回到实用主义的根基，呼吁为了未来的研究旅程，并承诺把探究作为我们未来研究旅程的目标。



在本章,我们将结束穿越研究过程的旅程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搜集数据,停下来,通过编码对它们进行分类;接下来我们通过撰写备忘录开辟新的分析路径;通过进行理论抽样,我们拓宽了研究的道路;通过分类和整合类属,我们确定了发展扎根理论的方向;最后,我们通过写作探究了呈现成果的方式。我们如何理解这一旅程?我们怎样评价已经完成的扎根理论?扎根理论方法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以前的章节回顾一下我们的旅程。

扎根理论的核心:不同的版本及修订

当反思你的扎根理论观点的时候,想一想扎根理论是由什么构成的。每个人都"知道"扎根理论是关于什么的;然而,它们是否有着共同的定义和基本的假设呢?扎根理论这一术语从 1967 年产生以来,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但也包含了大量的误解,也被许多不同的版本搞得更加复杂。许多关于扎根理论的论述模糊了作为过程的方法和作为产品的理论之间的区别。那么什么是扎根理论呢?我们怎样定义一个作为扎根理论的已完成的作品?哪些属性、目标和策略构成了方法的核心?哪些是不断形成中的扎根理论方法,哪些因素在不断地改变着它?

178

扎根理论方法的生成性建构和作为生成性建构的扎根理论

当我们思考如何定义扎根理论方法时,可能会考虑采用一种具体的哲学立场,一种探究的具体逻辑,一套程序或者灵活的指导方法。所有这些观点意味着扎根理论的定义外在于研究者和研究过程的特征中。但是,已完成的扎根理论是生成性的(emergent),扎根理论方法自身是开放的并依赖于生成的过程,而且研究者对概念的不断生成性建构(emerging constructions)既形成了过程,也形成了产品。

我在本书中的观点是,扎根理论方法的力量存在于它们的灵活性中,一个人必须通过使用这个方法来使这种灵活性变成现实。研究者可以不在把扎根理论变成有关数据搜集、分析和理论倾向以及认识论立场的严格规定的情况下,利用这一方法的灵活

性。扎根理论方法必须要依赖某一种方法论吗？我认为不是。就像这些扎根理论方法没必要固定用某一种数据搜集方法，或者一定从一种具体理论视角产生一样，扎根理论方法也不需要固定于某一种方法论。

我们可以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工具，而不把它固定于某一种特定的知识理论或现实观点。我们也没必要把扎根理论看作是存在于外在世界数据中的探索性范畴。我们也不需要把扎根理论看作是程序的应用。我们可以把扎根理论看作是通过互动出现的生成过程的产物。研究者从互动的结构中建构了他们各自的产品，包括看到的和实际经历的。下面的几点概括了我的建构主义立场：

- 扎根理论研究过程是流动的、互动的和开放的。
- 所研究的问题影响（inform）着数据搜集的最初的方法论选择。
- 研究者是他们所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和他们所研究的内容不可分割。
- 扎根理论分析形成了概念内容和研究方向；生成的分析可能会导致采用多种数据搜集的方法，并在多个场所进行探究。
- 通过比较分析进行连续的抽象构成了扎根理论分析的核心。
- 分析的方向来自研究者与比较和生成性分析的互动，以及研究者对它们的解释，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规定。

扎根理论中比较方法和互动的统一

扎根理论方法依赖于不断比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s）以及你的参与。这两者构成了这一方法的核心。在数据、代码和类属之间进行比较会推动你的概念性理解，因为是你定义了你的类属的分析属性，然后对这些属性进行了严格的审视。当你问"这些数据会成为哪些理论类属的例子"时，你的分析就变得更加具有理论性了。随着探究你的类属和人们生存的基

179

本方面(如社会关系的本质,或选择和限制、个人和制度,或者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你的研究工作也变得更加理论化了。

比较方法给了你基本的工具,但是在不同水平以多种形式发生的无数互动形成了你的扎根理论的内容。最后,生成的内容决定了你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你的扎根理论旅程依赖于互动——来自你的世界观、立场和处境,产生于研究现场,在你和你的数据之间发展,随着你的观点的生成,返回现场或另一个现场,并继续和你的学科以及实质领域进行对话。为了进行互动,我们要理解我们的环境,评价在这些环境中发生了什么,借助语言和文化来产生意义和形成行动。简而言之,互动是解释性的。

的确,一些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质性研究中搜集到的数据具有解释性的本质。量化研究者已经对质性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疑问,因为这些质性数据是建立在直接互动的基础上的,而最后又是由独立的可能有所偏颇的质性研究者记录下来的。刻意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质性研究者极力和他们的研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问题在之后的分析中产生了关于解释在研究中占什么地位的争论。历史上,质性研究者很少关注整个研究过程的互动性,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努力在传统量化科学话语中获得一个合法地位,因此试图实现客观性的目标。

客观性的外衣掩盖了过去的扎根理论,使得人们看不到扎根理论互动的力量。在当代更具反思性的模式中使用扎根理论,会让你和你的数据以及生成的理论之间发生互动。这是通过推动抽象解释的发展来实现的。从在初始编码和备忘录中进行的尝试性解释,到已经完成的项目,扎根理论方法能够抓住你转瞬即逝的想法和即时性的问题,让你能够在分析性写作中赋予你的想法以具体的形式。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力量与格拉泽和施特劳斯(Glaser & Strauss,1967)关于扎根理论逻辑的最初陈述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他们的论点和广大的读者是有共鸣的,其中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者,既有社会建构主义的支持者,也有客观主义的支持者。格拉泽(Glaser,1978)的版本采用了基本的扎根理论策略,表达了它的实证主义、客观主义的最初立场,但是只是针对很少一部分学者。施特劳斯(Strauss,1987)与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

Corbin,1990,1998)的扎根理论版本取得很大的成功,是更为流行的版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也使得扎根理论更为技术性和程序化了。

软件程序的发展大概建立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同时促进了人们对这一方法的关注(见 Fielding & Lee, 1998),并产生了对缩短分析过程的关注,其结果是使得分析变得肤浅了,使质性研究变成了一种单一的方法(Coffey, Holbrook, & Atkinson, 1996; Lonkila, 1995)。早期版本的比较逻辑在施特劳斯和科尔宾(Strauss & Corbin,1990,1998)的扎根理论版本那里还不很明显,而他们附加的技术使得它比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最初的陈述或者施特劳斯(Stauss,1987)的版本更加程序化,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也更不清晰。 180

我对建构主义的强调使扎根理论从它的客观主义基础那里解放了出来。批评者可能把我的或施特劳斯和科尔宾最近的主张解释为对这一方法的发展或偏离。格拉泽把他现在的版本作为古典扎根理论,然而,格拉泽的方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前面章节所指出的。格拉泽总是主张通过扎根理论指导原则(guidelines)来使数据搜集简单化(streamlining)。然而,他对小样本的捍卫已经显得僵化,尽管有些时候在数据搜集和大量案例比较之间存在着他所谓的张力。然而,当考虑到研究什么时,格拉泽(Glaser,2001)在想法上有了重大的转变,他早期曾坚持研究对象要告诉研究者什么是重要的(Glaser,1992),而如今他认识到研究者可以把研究对象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作为一个主要的关注点。这一转变至少产生了一些解释的可能性,把扎根理论家放在了研究过程中。我们是站在研究过程中,而不是这一过程之上,之前或之外。

如何定义扎根理论

当我们想确定扎根理论的定义属性(defining property)时,就进入了一个含糊的领地。扎根理论的分析目标和关注点会在什么程度上构成它的定义属性?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研究者可能用扎根理论方法来追求不同的生成性分析目标和焦点,而不是

追求预先确定的目标和焦点,比如一个单一的基本社会过程。

如果曾经用对社会过程的研究来定义过扎根理论方法,而现在没有必要再这么做了,那么对于这一方法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否构成了这一方法本身的基本变化?建构主义方法能够激发扎根理论方法产生多种分析和多种实质性问题。当格拉泽认为扎根理论是"解决一个主要关注点的理论"(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进行理论编码)时,他提供了一个对扎根理论的不错的应用,但并不是唯一的应用。在那个问题上,什么构成主要的关注点要取决于个人的观点。建构主义非常重要。谁来定义这个主要关注点呢?用什么标准?谁的定义会被坚持?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要把主要关注点作为待定的,而不是作为确定的,要把权力和控制带到分析中去。扎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工具,让我们能够对某个特定情境进行不同的建构或提出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是在行动中显示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在重构的表述中得到说明。

扎根理论必须把经验现实抽象到一般水平吗?不是。通过仔细的对比,我认为,把扎根理论定位于(situating)社会的、历史的、当地的以及互动的背景中会强化理论。这样的定位允许在研究之间进行细微的对比。最后,这些比较能够产生更为抽象——而且吊诡的是更为一般的理论。这里的一般化来自对大量特殊性的详细审察,而且在形成实质理论之后,一般化还可能包括对多元研究的结果进行分析和概念化,从而建构一个正式的理论。

一般性来自分析过程,而不是把一般性作为一个确定的目标。当你定位你的研究,并让一般化来自分析时,你就克制了把数据强行放到你最喜欢的分析类属中的倾向。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把扎根理论研究放在具体的环境中也减少了引入先入之见的可能性,比如关于人们的意图、行动和意义,也使得民族志、性别、阶级或种族偏见进入分析的可能性最小化了。

181

分析的形式能够把进行"真正的"扎根理论的研究者和那些只是宣称使用了这一方法的人区分开来吗?并不尽然。一个已完成的扎根理论必须总是变量的分析吗?不。它应该是一个模式化关系的概念分析吗?是的。它忽略模式外部的关系吗?不。这些关系表明了在过程或类属以及其他的解释中了解变量的途径。讽刺的是,传统扎根理论使研究者不重视那些不适合生成性类属的数据和细节,最后他们会把数据强行放入其类属中。

对扎根理论研究的少数几个反思谈到了这一点。卡罗琳·埃利斯(Ellis, 1986)认为,她的扎根理论关注点使她把民族志的细节强行放到她生成的类属中,结果她的类属具有了解释的价值,但“呈现的生活比起实际的日常经验来更加类属化了”(p. 91)。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修订标准来得到解决。但是会这样吗?研究者多久以后会进行后续研究,以改变一个类属或产生不同的理解?埃利斯在她的研究之前和研究过程中,对这个社区参观过很多次。在作品发表3年后,她重访了这个社区,却遇到很多问题,后来的反思激发了她新的见解。研究者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所进行的参与是有限的,他们认识不到他们类属的有限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人们就不会遵循修订标准。同时,理论的有用性会降低,或者更糟糕,会产生出根本没用的公共政策或专业政策来。

扎根理论要对数据进行比较,向上建构抽象理论,同时向下把这些抽象理论和数据联系起来。它意味着要了解具体和一般——而且要看到其中新的东西,然后考察和更大问题的关系,或者产生更大的未曾发现的总体性问题。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解释会激发新的观点,并把其他学者引向新的视野。扎根理论方法能够提供深入研究的途径,并提供具有想象力的解释路径。

评价扎根理论

当评价我们到过哪里以及获得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顾我们的旅程,并期待着看到我们的终点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或评论者面前。带领我们穿越旅程的方法和我们在这个旅程中的收获是两码事。我们对这一旅程的理解是以已完成的研究作品的形式出现的。我们所描绘的终点对我们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一直处在这个过程中。然而对于读者,过程和结果之间的界线变得很模糊。其他学者有可能把扎根理论过程作为这一结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在本书中一直主张,扎根理论方法包含了未曾使用的多种功能和潜能。我们需要考虑读者,不论他们是教师还是同行。他们通过最后产品的质量来判断我们方法的有用性。 182

评价研究的标准取决于谁形成了这些标准以及他或她的目标。格拉泽(Glaser,1978,pp. 4-5)关于适合性、功能性、相关性以及可更改性的标准对于思考你所建构的理论如何呈现数据特别有用。

其他重要的标准要考虑学科、证据或美学问题。对于你的项目来说每个都很重要。对于研究的操作和证据的可接受性来说,不同的学科要坚持不同的标准(比如,可见 Conrad, 1990; Thorne, 2001)。研究并不充分的领域的标准和那些已赢得尊重的研究领域的标准是不同的。学科或学系对于研究生的要求可能要低于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的要求。尽管对扎根理论研究的期待可能不同,不过下面的标准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

扎根理论研究的标准[①]

可信性(credibility)

- 你的研究是否已经对背景或问题有足够的熟悉?
- 数据是否足以说明你的判断? 想一想数据中所包含的观察所达到的范围、数量和深度。
- 你是否在观察与观察之间、类属与类属之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
- 类属是否涵盖了经验观察的广泛领域?
- 在所搜集的数据和你的论点及分析之间是否有很强的逻辑联系?
- 你的研究是否为你的观点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让读者能够形成独立的评价,并同意你的论点?

原创性(originality)

- 你的类属是否新鲜? 它们是否提供了新的见解?
- 你的分析是否为数据提供了新的概念呈现?

①这一部分从卡麦兹(Charmaz,2005a)的作品扩展而来。

- 这次研究工作的社会和理论意义是什么?
- 你的扎根理论是否挑战、扩展或完善了现有的观点、概念和实践?

共鸣(resonance)

- 这些类属是否充分描述了被研究经验?
- 你揭示的是否是原初的、不稳定的习以为常的意义?
- 你是否在更大的集体或制度与个体生活之间进行了关联，当数据有这方面的指示的时候? 183
- 对于你的研究对象或那些和他们具有同样背景的人来说，你的扎根理论是否有意义? 你的分析是否为他们提供了关于他们生活和世界的更深刻的见解?

有用性(usefulness)

- 你的分析是否提供了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解释?
- 你的分析类属是否展示了一些一般的过程?
- 如果展示了一些一般的过程，你是否检验了这些一般过程所默认的含义?
- 分析是否激发了其他实质领域进一步的研究?
- 你的研究对于知识是否有贡献? 它是否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原创性和可信性的有力结合增加了共鸣、有用性和接下来贡献的价值。要做出学术贡献，需要认真研究相关文献，包括那些跨越学科界线的文献，需要对你的扎根理论进行清晰的定位。这些标准提到了被研究现象的内在行动和意义，有助于分析研究现象是如何建构的。上面的标准说明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发展，而几乎没有谈到研究者是怎样表述的，或者是什么使得表达更具说服力。其他的标准还应谈到写作的美学因素。我们的书面作品除了来自理论陈述和科学原则之外，还来自美学原则和修辞技巧。写作行为是直觉性的、创造性的和解释性的，不仅仅是对行为和事实的报告，对于扎根理论来说，写作就是原因、条件、类属和结果——或者是对过程的勾勒，这些过程描述了一个主要问题

的解决经过。

如果一个扎根理论经过理性反思和严格证明,对一个实质领域有意义的内容进行了概念化和解释,那么它就能够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如果再增加一些美学因素和分析力度,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扩展到更多的读者。

扎根理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古典扎根理论的建构性回归

我的扎根理论版本回顾了它的过去,探究了现在,并转向了未来。扎根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实证主义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双重起源,以及它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已经使扎根理论具有了精确性(rigor),并使其依赖于生成性。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试图把扎根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前辈们放到前台中,并展现他们是怎样丰富当前的扎根理论讨论的。

我们穿越扎根理论过程的旅程顾及了它的实用主义前辈。184 现在我号召新老学者回顾一下扎根理论的实用主义遗产,在使用21世纪建构主义敏感性的时候,要建立在这些前辈的基础上。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保留了实用主义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正如施特劳斯的作品以及受他影响的其他人的作品所表明的那样(比如,可见 Baszanger, 1998; Bowker & Star, 1999; Clarke, 1998, 2005; Corbin & Strauss, 1988; Strauss, 1959, 1978a, 1978b, 1993, 1995)。在典型的扎根理论实践中,当你发现了数据给出的线索,而且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让你进一步探究时,你可以追随这些线索。建构主义方法不仅有助于你对你所建构的理论的前辈保持清晰的认识,还有助于其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认识你的扎根理论的局限性,而且确定如何以及从哪里去修改它。

实用主义基础有助于你保持对扎根理论中语言、意义和行动的重视。最后你要避免把扎根理论研究降低为只有表面价值的对外在行为或访谈陈述的研究。如果你具有建构主义敏感性,你可以在不断认识到你的数据和分析的互动及生成性本质的时候,理解和解释意义以及行动的细微差异。简言之,回到实用主义基

础鼓励我们建构对所研究世界的解释性呈现,而不是对事件和陈述的一种外部报告。

尽管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提供了更新和复兴古典扎根理论实用主义基础的方法论路线,不过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还能够服务于来自其他传统的研究者。这样,建构主义敏感性和其他的方法,比如女性主义理论、叙事分析、文化研究、批判现实主义以及批判性探究都是相适宜的。

你可以看到你的研究和以前没有意识到的芝加哥学派之间的联系。如果你很早就熟悉芝加哥学派了,你可能希望考虑一下这一传统是怎样揭示新视野的,怎样把你带到新的高度的。简言之,有着实用主义基础的芝加哥学派有几个优势非常突出。这些传统是:

- 促进对世界的开放,以及对(关于世界的)好奇心的开放。
- 鼓励对研究对象意义、行动和世界的同情性理解。
- 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
- 在主观的和社会的水平上关注意义和过程。

知识转化(transforming knowledge)

既然你已经完成了你的扎根理论研究,那么就考虑一下它所服务的目标吧。你最初的目标可能是很直接的:在实践中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来进行你面前的工作。当紧迫的项目和对研究过程的参与缩小了你的注意力时,其他目标就始终不会浮出水面。在更大的意义上,你的扎根理论服务于什么目标?

185

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水平上考虑这个问题,知识应该服务的目标是什么?罗伯特·林德(Lynd, 1939)几十年前在他的《知识是为了什么?》(*Knowledge for What?*)一书中提出了这个问题,知识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答案仍然充满争议。但是如果我们对它的逻辑外延采用建构主义的立场,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具体,答案也会更加清晰。知识应该改变实践和社会过程吗?是的。扎根理论研究能够对一个更好的世界有所贡献吗?是的。这些问题是否会影响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研究的方法?是的。

转向研究者的行动之后,扎根理论研究文献是否反映了知识

转化、社会过程——以及作为实践的扎根理论的努力呢？在护理领域和教育领域，扎根理论家已经有了很多发展，一些社会学家也在不断前进。但是职业的发展可能会比固守一个主题领域或知识转化这一目标产生更多的扎根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研究者会依赖于价值中立的要求，他们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仍然是含糊的。不论是举足轻重还是微不足道，价值中立的要求可能掩盖了我们所产生的知识的意义。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家可能在产生知识和与公共事务分离时要求保持中立。知识不是中立的，我们也不能把它从它的生产过程或这个世界中分离出来。

研究旅程本身可以结束了，而形成一项事业的过程却远没有结束。我们能够用扎根理论方法在20个以上的职业领域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扎根理论，你可以实现激动人心的目标。

扎根理论方法为你的知识转化提供了可能性。那些激发你热情的问题会引导你进行研究，不仅仅只是满足学术要求和职业身份的目标。你会带着热情进入被研究的现象，让自己对研究经验敞开心怀，追随它的指引。这条道路会带给你不可避免的含糊，使你陷入混乱的迷惑之中。当你带着热情、好奇、开放和认真进行研究时，新的经验就会产生，你的观点就会生成。回忆一下本书的开始，玛吉·阿伦承认，当她学着去了解其他人时，她接受了她的慢性病。像玛吉的慢性病旅程一样，你穿越扎根理论的旅程也会改造你。



术语解释

诱导式推理(abduction) 一种推理类型,从检验数据开始,经过对这些数据的详细审查,考虑对数据的所有可能解释,然后对形成的假设进行确定或驳斥,直到研究者得出最可靠的对数据的解释。

轴心编码(axial coding) 一种编码类型,把一个类属作为一个轴心,分析者围绕这个类属描述关系,使这个类属的维度具体化。轴心编码的主要目标是,在研究者通过逐行编码使数据支离破碎之后,把数据再次聚拢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类属化(categorizing) 扎根理论中的分析步骤,选择某些代码作为最有意义的代码,或者从一些代码中提炼共同的主题和模式作为分析性概念。当研究者进行类属化的时候,从描述到更加抽象、更加理论化的水平,都要不断提升分析的概念水平。然后研究者要努力定义类属的属性、它发生作用的条件、发生变化的条件以及和其他类属的关系。扎根理论家要把最重要的理论类属作为他们的理论的概念。

芝加哥社会学学派(chicago school sociology) 一个社会学传统,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兴起于芝加哥大学。实用主义哲学和民族志田野工作分别形成了这个传统的知识基础和方法论原则。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并不像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并不是那个时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所有成员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密切联系;但是,这个学派产生了符号互动主义社会心理学、民族志和质性研究这一重要的传统。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假设,在解释和行动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交互的关系。社会生活是互动的、生成的、一定程度上是非决定性的。芝加哥学派民族志培养了对世界的开放性和好奇心,符号互动主义培养了对研究对象及其世界的同情性理解。

编码(coding) 定义数据说明的是什么的过程。和量化研究者把预先设定的类属或代码应用到数据上不同,扎根理论家通过定义他们在数据中所看到的内容来产生质性代码。这样,代码就是生成的——在研究者研究他们的数据时,这些代码也在发展着。编码过程可能会把研究者带到未曾预料的领域和研究问题中。扎根理论的支持者追随这样的线索;他们并不追随预先设计的指向确定结果的研

究问题。

概念导向模型(concept-indicator model) 一种理论建构的方法,研究者建构能够解释关系的概念,这些关系是在经验数据中所界定的,每个概念都依赖于经验的指示。这样,概念就"扎根"于数据中了。

条件/结果矩阵(conditional /consequential matrix) 一种编码技术,表现关于行动的微观和宏观条件/结果的交叉点,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不断比较的方法(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一种分析方法,通过比较数据和数据、数据和类属、类属和类属、类属和概念的归纳过程,不断地产生更加抽象的概念和理论。然后比较就构成了分析发展的每个阶段。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一种社会科学的视角,解决现实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这一视角假设,人们,包括研究者,建构了他们所参与的现实。建构主义的探究从经验出发,问其成员是如何建构了他们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者会尽最大努力进入现象,获得对现象的多元观点,并把它放在联系与限制的网络中。建构主义者认识到,他们对被研究现象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建构。

演绎(deduction) 一种推理类型,从普遍的或抽象的概念开始,向具体的事实推论。

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 一类普遍性问题或过程的理论呈现,涉及几个实质性研究领域。形式理论中的概念是抽象的和一般的,理论使得这些概念中的联系具体化了。诸如身份的形成和丧失、文化的建构或者意识形态的形成等理论有助于我们在诸如青少年帮派、专业人员的社会化以及移民的经验等多元领域理解行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进行质性研究的一种方法,通过从数据中进行归纳性分析,关注概念框架或理论的形成。因此,分析类属直接"扎根于"数据。该方法喜欢分析胜过描述,喜欢新鲜的类属胜过预先设定的观念和已有的理论,喜欢系统聚焦的连续的数据搜集胜过大量的原始事例。该方法与其他方法不同,因为在搜集数据的时候就将研究者放入其中了——我们用这种数据分析方法来指引和形成进一步的数据搜集。这样,传统研究中数据搜集阶段和分析阶段的鲜明区分,在扎根理论研究中就被故意模糊了。

归纳(induction) 一种推理类型,从研究一系列个别的案例开始,由这些案例来形成模型,以形成一个概念类属。

备忘录撰写(memo-writing) 在数据搜集和论文手稿写作之间扎根理论的一个关键性中间步骤。扎根理论家在写备忘录的时候,会停下来,分析他们关于代码以及生成性类属的想法(也见 Glaser,1998)。备忘录撰写是扎根理论的一个关键

方法,因为它推动研究者去分析他们的数据,在研究过程的早期把他们的代码发展为类属。不断地写备忘录会使研究者参与到分析中,帮助他们提高观念的抽象水平。

客观主义的扎根理论(objective grounded theory) 一种扎根理论方法,研究者充当的是冷静中立的观察者角色,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作为一名外界的专家来分析研究对象的世界,把研究关系和研究对象的表述当作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主义扎根理论是客观主义质性研究的一种形式,认同实证主义传统的很多假设和逻辑。

实证主义(positivism) 一种认识论,认同一元论科学方法,包括在外部世界进行客观的系统观察和实验。实证主义探究的目标是为了发现和建立普遍规则,以解释被研究现象,并根据普遍规则进行预测。最后,实验和预测会导致对被研究现象的科学控制。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一种理论转向,对启蒙精神的基本精神提出了挑战,启蒙精神信仰人类理性,信仰科学,信仰通过科学获得进步。后现代主义者包括范围广泛,从那些希望认可认知的直觉形式的人,到对现代认知形式、在世界中的存在形式以及他们的启蒙价值观基础持无政府主义反叛态度的人。

实用主义(pragmatism) 一种美国的哲学传统,认为现实的特征是非决定性的和流动的,是对多元解释开放的。实用主义假设,人们是积极的和具有创造性的。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意义是通过解决问题的实践行动、通过人们认识世界的行动来产生的。实用主义把事实和价值看作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隔离的,把真理看作是相对的和临时的。

反思性(reflexivity) 研究者通过把研究者放到过程之中,允许读者来评价研究者的兴趣、立场以及假设是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探究,对自身的研究经验、决定和解释进行详细的审查。反思的立场会表明,研究者是怎样进行研究的,如何和研究对象发生联系,以及如何在书面报告中体现这些内容。

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 一种理论视角,假设人们通过个体的和集体的行动产生了社会现实。建构主义者不是把世界看作是给定的,他们要问的是世界是怎样形成的?这样,不是假设一个外部世界中的现实,包括全球结构和地方文化,社会建构主义者研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们认为什么是真实的,他们是怎样建构他们的观点和行动的,当不同的建构出现时,谁的建构会成为权威,以及那个过程是如何出现的。符号互动主义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因为它假设,意义和客观现实是集体过程的结果。

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 对某一特殊领域特定问题的理论解释或说明,比

如家庭关系、正式组织或教育。

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一种来自实用主义的理论视角,假设人们通过互动建构了自我、社会和现实。因为这一视角关注的是意义和行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它解决的是人们产生和传递意义的积极过程。意义产生于行动,反过来又影响行动。这一视角假设,个体是积极的、具有创造性和反思性的,社会生活是由过程组成的。

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 一种扎根理论抽样形式,研究者的目的是形成他或她的类属或理论的属性,不是对挑选的人群进行随机抽样,也不是在特定的人口中按照代表性来分配抽样。在进行理论抽样的时候,研究者要寻找人、事件或信息来解释和定义这些类属的边界的相关性。因为理论抽样的目的是通过抽样来发展理论,通过理论抽样使研究者超越实质领域。

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 如果对于一个理论类属,搜集更多的数据已不能揭示其新的属性,也不能产生进一步的关于该理论的理论见解时,就可以说达到理论饱和了。



参考文献

Alasuutari, P. (1992). *Desire and craving: A cultural theory of alcoholis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

——. (1995). *Researching culture: Qualitative method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 (1996). Theoriz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Qualitative Inquiry*, 2, 371-384.

——. (2004). The 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Clive Seale, Giampietro Gobo, Jaber F. Gubrium, & Davi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595-608). London: Sage.

Albas, C., & Albas, D. (1988). Emotion work and emotion rules: The case of exam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1, 259-274.

Albas, D., & Albas, C. (1988). Aces and bombers: The post-exam impress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students. *Symbolic Interaction*, 11, 289-302.

——. (1993). Disclaimer mannerisms of students: How to avoid being labeled as cheater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0, 451-467.

Anderson, E. (1976). *A place on the cor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3). Jelly's place: An ethnographic memoir.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217-237.

Anspach, R. (1979). From stigma to identity politics: Political activism among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and former mental patient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3A, 765-763.

Arendell, T. (1997).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er-researched relationship: A woman interviewing men.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 341-368.

Ashworth, P. D. (1995). The meaning of 'participation'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5, 366-387.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Atkinson, P., Coffey, A., & Delamont, S. (2003). *Key them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New York: Rowan and Littlefield.

Baker, C., Wuest, J., & Stern, P. (1992). Methods slurring: The grounded theo-

ry, phenomenology exampl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7, 1355-1360.

Baszanger, I. (1998). *Inventing pain medicine: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Clinic.*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Becker, H. S. ([1967] 1970). Whose side are we on? Reprinted as pp. 123-134 in his *Sociological work: Method and substa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 (2003). The politics of presentation: Goffman and total institutions.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659-669.

Becker, P. H. (1998). Pearls, pith, and provocations: Common pitfalls in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3(2), 254-260.

Bergson, H. ([1903]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Mabelle L. Andison, translator).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Inc.

Berk, R. A., Berk, S. F. Loseke, D. R., & Rauma, D. (1983) Mutual combat and other family violence myths. In D. Finkelho, et al. (Eds.), *The dark side of families* (pp. 197-212). Beverly Hills, CA: Sage.

Berk, R. A., Berk, S. F., Newton, J., & Loseke, D. R. (1984). Cops on call: Summoning the police to the scene of spousal violence. *Law & Society Review*, 18 (3), 480-498.

Berk, S. F, & Loseke, D. R. (1980-1981). Handling family violence: Situational determi nants of police arrest in domestic disturbances. *Law& Society Review*, 15 (2), 317-346.

Biernacki, P. (1986). *Pathways from heroin addiction: Recovery without treat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Biernacki, P. and Davis, F. (1970). Turning off: A study of ex-marijuana users. Paper pre 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Drug Use and Subcultures, Asilomar, California.

Bigus, O. E., Hadden, S. C., & Glaser, B. G. (1994). The study of basic social processes. In B. G. Glaser (Ed.), *More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 reader* (pp. 38-64). Mill Valley, CA: Sociology Press.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79). Comments on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the Chicago tradition of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2(2), 21-22.

Bogard, C. (2001). Claimsmakers and contexts in early constructions of homelessness: A comparison of New York City and Washington, D. C. *Symbolic Interaction*, 24, 425-454.

Bowker, L. H., & Mauer, L. (1987). The medical treatment of battered wives. *Women & Health*, 12(1), 25-45.

Bowker, G., & Star, S. L. (1999).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ryant, A. (2002). Re-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4(1), 25-42.

——. (2003). A constructive/ist response to Glaser. FQS: *Forum for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4(1), www. qualitative-research. net/ fqs/.

Blumer, M.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stitutionalization, diversity, and the ris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rawoy, M. (1991).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In M., Burawoy, A. Burton, A. A. Ferguson, K. Fox, J. Gamson, N. Gartrell, L. Hurst, C. Kurzman, L. Salzinger, J. Schiffman, & S. Ui,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m metropolis* (pp. 271-29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0). Grounding globalization. In M. Burawoy, J. A. Blum, S. George, G. Sheba, Z. Gille, T. Gowan, L. Haney, M. Klawiter, S. A. Lopez, S. O' Riain, & M. Thayer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pp. 337-373).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ke, P. J. (1980). The self: Measurements from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3, 18-29.

Bury, M. (1982). Chronic illness as biographical disrup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 167-182.

——. (1988). Meanings at risk: The experience of arthritis. In R. Anderson & M. Bury (Eds.),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 (pp. 89-116). London: Unwin Hyman.

——. (1991). The sociology of chronic illnes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prospect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3, 452-468.

Calkins, K. (1970). Time perspectives, marking and styles of usage. *Social Problems*, 17, 487-501.

Casper, M. (1998). *The unborn patient.*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Chang, D. B. K. (1989). An abused spouse's self-saving process: A theory of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 535-550.

Chang, J. H. -L. (2000).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lass structure: The case of China. *Symbolic Interaction*, 23, 223-251.

Charmaz, K. (1973). *Time and identity: The shaping of selves of the chronically ill.*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 (1983a).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n ex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R.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p. 109-126). Boston: Little Brown.

——. (1983b). Loss of self: A fundamental form of suffering in the chronically ill.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5, 168-195.

——. (1987). Struggling for a self: Identity levels of the chronically ill. In J. A. Roth & P. Conrad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care: Vol. 6. The experience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illness* (pp. 283-32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0). Discovering chronic illness: Using grounded theor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0, 1161-1172.

——. (1991a). *Good days, bad days: The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and ti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1991b). Translating graduate qualitative methods into undergraduate teaching: Intensive interviewing as a case example. *Teaching Sociology*, 19, 384-395.

——. (1995a). Body, identity, and self: Adapting to impair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 657-680.

——. (1995b). Grounded theory. In J. A. Smith, R. Harré, & L. Van Langenhove (Eds.), *Rethinking methods in psychology* (pp. 27-49). London: Sage.

——. (1998). Research standards and stories: Conflict and challenge. Plenary present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tario. May 15.

——. (1999). Stories of suffering: Subjective tales and research narrative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 362-382.

——. (2000). Constructivist and objectivist grounded theory. In N. K.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509-5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1).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and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pp. 675-69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2a).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In N. J. Smelser & P.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p. 6396-6399). Amsterdam: Pergamon.

——. (2002b). The self as habit: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The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of Research*, 22 (Supplement 1), 31s-42s.

——. (2002c). Stories and silences: Disclosures and self in chronic illness. *Qualitative Inquiry*, 8(3), 302-328.

——. (2003). Grounded theory. In Jonathan A. Smith (Ed.), *Qualitative psychology: A practica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pp. 81-110). London: Sage.

——. (2004). Premise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evisiting the foundatio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 976-993.

——. (2005). Grounded theory in the 21st century: A qualitative method for advancing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pp. 507-5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2006a). Grounded theory. In G.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2006b). Stories, silences, and self: Dilemmas in disclosing chronic illness. In D. Brashers D. Goldstein (Eds.), *Health communication*.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Charmaz, K., & Mitchell, R. G. (1996). The myth of silent authorship: Self, sub-

stance, and style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Symbolic Interaction*, 19(4), 285-302.
——. (2001). An invitation to grounded theory in ethnography.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e, J. Lofland, & L. H. Lofland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p. 160-174). London: Sage.

Charmaz, K., & Olesen, V. (1997).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med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5(4), 452-494.

Chenitz, W. C., &Swanson, J. M. (Eds.) (1986). *From practice to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urs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Clark, C. (1997). *Misery and company: Sympathy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larke, A. E. (1998). *Disciplining reproduction: Modernity, American life sciences, and the problems of sex.*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3). Situational analyses: Grounded theory mapping after the postmodern turn.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553-576.
——. (2005). *Situational Analysis: Grounded theory after the postmodern turn.* Thousand Oaks, CA: Sage.

Clifford, J., & Marcus, G.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ffey, A., & Atkinson, P. (1996).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Complementary research strateg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ffey A., Holbrook, P., & Atkinson, P. (1996).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echnologies and representations.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

Collins, P. H.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Hall.

Collins, R. (2004a).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Distinguished Lecture, sponsored by Alpha Kappa Delta,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August 14.
——. (2004b).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Conrad, P. (1990).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chronic illness: A commentary on method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0, 1257-1263.

Corbin, J., M. (1998).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Valid or not? *Theory & Psychology*, 8, 121-128.

Corbin, J., & Strauss, A. L. (1987). Accompaniments of chronic illness: Changes in body, self, biography, and biographical time. In J. A. Roth & P. Conrad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health care: Vol. 6. The experience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illness* (pp. 249-28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0).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 *Qualitative Sociology*, 13(1), 3-21.

——. (1988). *Unending Work and Care: Managing Chronic Illness at Hom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Creswell, J.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Dahlberg, C. C., & Jaffe, J. (1977). *Stroke: A doctor's personal story of his recovery.* New York: Norton.

Dalton, M. (1959). *Men who manage.* New York: Wiley.

Daly, K. (2002). Time, gender, and the negotiation of family schedules. *Symbolic Interaction*, 25, 323-342.

Davis, E (1963). *Passage through crisis: Polio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Davis, M. S. (1971). 'That's interesting!'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sociology and a sociology of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 309-344.

Deely, J. N. (1990). *Basics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enzin, N. K. (1984).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1994). The art and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00-515).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rricourt, R. (1996). *An author's guide to scholarly publish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Dey, I. (1999). *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2004). Grounded theory. In C. Seale, G. Gobo, J. E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80-93). London: Sage.

Diamond, T. (1992). *Making gray go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iGiacomo, S. M. (1992). Metaphor as illness: Postmodern dilemma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dy, mind and disorder. *Medical Anthropology*, 14, 109-137.

Dingwall, R. (1976). *Aspects of Illness.*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Dobash, R. E., & Dobash, R. P. (1979). *Violence against w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1). Community response to violence against wives: Charivari, abstract justice and patriarchy. *Social Problems*, 28, 563-581.

Durkheim, E. (1902/1960).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1915/1965).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1925/1961). *Moral education: A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1951). *Suicide.* Glencoe, IL: Free Press.

Edwards, S. (1987). Provoking her own demise: From common assault to homicide.

In J. Hanmer and M. Maynard (Eds.), *Women, violence and social control* (pp. 152-168).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Eide, L. (1995). *Work in progress: A guide to writing and revising* (3r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Elbow, P. (1981). *Writing with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lis, C. (1986). *Fisher Folk: Two communities on Chesapeake Bay.* Lexington, KY: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 (1995). Emotional and ethical quagmires of returning to the fie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4(1), 68-98.

Emerson, R. M. (1983). Introduction to Part II: Theory and eviden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R.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A collection of readings* (pp. 93-107). Boston: Little Brown.

——. (2001). Introduction to Part III: producing ethnographies: Theory, eviden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R. M. Emerson (Ed.),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formulations* (2nd ed., pp. 281-316).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2004). Working with 'Key Incidents.' In Clive Seale, Giampietro Gobo, Jaber F. Gubrium, & Davi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457-472). London: Sage.

Fabrega, H. Jr., & Manning, P. K. (1972). Disease, illness and deviant careers. In R. A. Scott & J. D. Douglas (Ed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deviance* (pp. 93-116). New York: Basic Books.

Fann, K. T. (1970). *Peirce's theory of ab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Ferraro, K. J. (1987). Negotiating trouble in a battered women's shelter. In M. J. Deegan, & M. R. Hill (Eds.), *Women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pp. 379-394). Boston: Allen & Unwin.

——. (1989). Policing woman battering. *Social Problems*, 30(3), 61-74.

Ferraro, K. J., & Johnson, J. M. (1983). How women experience battering: The process of victimization. *Social Problems*, 30, 325-339.

Fielding, N. G., & Lee, R. M. (1998). *Computer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data.* London: Sage.

Finch, J. and Mason, J. (1990). Decision taking in the fieldwork process: Theoretical sampling and collaborative working. In R. G. Burgess (Ed.), *Studie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Reflections on field experience* (pp. 25-50). Greenwich, CT: JAI Press.

Fine, G. A. (1986). *With the boy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preadolescent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98). *Morel tales: The culture of mushroom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lick, U.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Flowers, L. (1993).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for writing* (4th ed.).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rank, A. W. (1990). Bringing bodies back in: A decade review.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7, 131-162.

——. (1991a). *At the will of the bod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91b). For a sociology of the body: An analytical review. In M.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 B. S. Turner (Eds.),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pp. 36-102). London: Sage.

Frankenberg, R. (1990). Disease, literature and the body in the era of AIDS—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2, 351-360.

Freund, P. E. S. (1982). *The civilized body: Social domination, control, and health*.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88). Bringing society into the body: Understanding socialized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Society*, 17, 839-864.

——. (1990). The expressive body: A common ground for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nd health and illnes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2, 452-477.

Gadow, S. (1982). Body and self: A dialectic. In V. Kestenbaum (Ed.), *The humanity of the il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86-100). Knoxville, TN: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Gerhardt, U. (1979). Coping and social action: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feevent approach.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 195-225.

——. (1989). *Ideas about illness: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medical sociolog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Giles-Sims, J. (1983). *Wife battering: A systems theory approach*.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Glaser, B. 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 (1992).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 (Ed.) (1994). *More grounded theory*.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 (1998).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 (2001)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ill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 (2002).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On-line Journal*], 3. Available at: http://www.qualitative-research.net/fqs-texte/3-02/3-02glaser-e-htm.

——. (2003). *Conceptualization contrasted with description*. Mill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Chicago: Aldine.

——.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 (1968). *Time for dying*. Chicago: Aldine.

——. (1971). *Status passage*. Chicago: Aldine.

Glassner, B. (1988). *Bodies*. NewYork: Putnam.

——. (1989). Fitness and the postmodern self.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0, 180-191.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1961). *Asylum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1963). *Stigm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 (1969). *Strategic inter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Gorden, R. (1987). *Interviewing: strategies, techniques, and tactics*. Homewood, IL: Dorsey.

Goulding, C. (2002).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market researchers*. London: Sage.

Guba, E. G.,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8). Thousand Oaks, CA: Sage.

Gubrium, J. F. (1993). *Speaking of lift: Horizons of meaning for nursing home residents*.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ubrium, Jaber F. and Holstein, James A. (Eds.) (2001).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Hall, W. A., & Callery, P. (2001). Enhancing the rigor of grounded theory: Incorporating reflexivity and relationalit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1, 257-272.

Hartsock, N. C. M. (1998).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Boulder, CO: Westview.

Henwood, K., & Pidgeon, N. (2003). Grounded theor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P. M. Camic, J. E. Rhodes, & L. Yardley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Expanding perspectives in methodology and design* (pp. 131-15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ermes, J. (1995). *Reading women's magazin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Hertz, R. (2003). Paying forward and paying back.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473-486.

Hewitt, J. P. (1992). *Self and socie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Hogan, N., Morse, J. M., & Tasón, M. C. (1996). Toward an experiential theory of bereavement. *Omega*, 33, 43-65.

Holliday, A. (2002). *Doing and wri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Holstein, J. A., & Gubrium, J. F. (1995). *The active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Hood, J. C. (1983). *Becoming a two-job family*. NewYork: Praeger.

Jankowski, M. S. (1991). *Islands in the street: Gangs and American urban socie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arney, Margaret H. (1998). Ready to wear: Discovering grounded formal theory.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21, 179-186.

Kelle, U. (2005, May). Emergence vs. forcing of empirical data? A crucial problem of 'grounded theory' reconsidered [52 paragraphs].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On-line Journal] 6 (2), Art. 27. Available at http//www. qualitative-research. net/fqs-texte/2-05/05-2-27-e. htm [Date of Access: 05-30-05].

Kestenbaum, V. (1982). Introduction: Th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V. Kestenbaum (Ed.), *The humanity of the ill: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s* (pp. 3-38).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Kleinman, A., Brodwin, D., Good, B. J., & Good, M. D. (1991). Introduction. In M. D. Good. P. E. Brodwin, B. J. Good, & A. Kleinman (Eds.),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pp. 1-2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otarba, J. A. (1994). Thoughts on the bod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ymbolic Interaction*, 17, 225-230.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usow, A. (2003) Beyond indigenous authenticity: Reflections on the inside/outsider debate in immigration research. *Symbolic Interaction*, 26, 591-599.

Latour, B., & Woolgar, S. ([1979] 1986).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2nd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yder, D. (1998). *Sociological practice: Linking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Lazarsfeld, P. and Rosenberg, M. (Ets.) (1955).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ader i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resear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Lempert, L. B. (1996). The line in the sand: Definitional dialogues in abusive relationships. N. K. Denzin (Ed.),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8 (pp. 171-195).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1997). The other side of help: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elp-seeking processes of abused women. *Qualitative Research*, 20, 289-309.

Lewis, K. (1985). *Successful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 Wayne, NJ: Avery.

Lindesmith, A., Strauss, A. L., & Denzin, N. K. (1988). *Social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Locke, K. (2001). *Grounded theory in management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Locker, D. (1983). *Disability and disadvantage: The consequences of chronic illness.* London: Tavistock.

Lofland, J. (1970). Interactionist imagery and analytic interruptus. In T. Shibutani (Ed.), *Human nature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Lofland, J., & Lofland, L. H.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Lonkila, M. (1995).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K. Udo (Ed.), *Computer-aid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ractice* (pp. 41-51). London: Sage.

Loseke, D. R. (1987). Lived realit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blems: The case of wife abuse. *Symbolic Interaction*, 10, 229-243.

——. (1992). *The battered woman and shel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ife abus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uker, K. (1984).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ynd, R. S. (1939).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Donald, L. (1988). The experience of stigma: Living with rectal cancer. In R. Anderson & M. Bury (Eds.), *Living with chronic illness* (pp. 177-202). London: Unwin Hyman.

MacKinnon, C. A. (1993).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 a feminist jurisprudence. In P. B. Bart and E. G. Moran (Ed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p. 201-208). Newbury Park, CA: Sage.

Maines, D. R. (2001). *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Markovsky, B. (2004). Theory construction. In G.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volume II* (pp. 830-834). Thousand Oaks, CA: Sage.

Martin, D. (1976). *Battered wives.* NewYork: Pocket Books.

Maynard, D. (2003). *Good news, bad news: Conversational order in everyday talk and clinical sett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G. H. (1932).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LaSalle, IL: Open Court Press.

——.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lia, K. M. (1987). *Learning and working: The occup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nurses.* London: Tavistock.

——. (1996). Rediscovering Glaser.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6, 368-378.

Merton, R.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IL: Free Press.

Miller, D. E. (2000). Mathematical dimens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ymbolic Interaction*, 23, 399-402.

Miller, G. (1997). Contextualizing texts: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texts. In G. Miller & R. Dingwall (Eds.), *Context and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77-91). London: Sage.

Mills, T. (1985). The assault on the self: Stages in coping with battering husbands. *Qualitative Sociology*, 8, 103-123.

Mitchell, R. G. (1991). Field note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Corvallis, OR.

——. (2002). *Dancing to armageddon: Survivalism and chaos in modern tim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rill, C. (1995). *The executive way: Conflict managementin corpor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se, J. M. (1995). The significance of saturatio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5, 147-149.

Murphy, E., & Dingwall, R. (2003).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health policy research.* NewYork: Aldine de Gruyter.

Murphy, R. F. (1987). *The body silent.* NewYork: Henry Holt.

Olesen, V. (1994). Problematic bo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ymbolic Interaction*, 17, 231-237.

Olesen, V., Schatzman, L., Droes, N., Hatton, D., & Chico, N. (1990). The mundane ailment and the physical self: Analysis of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0, 449-455.

Pagelow, M. D. (1984). *Family Violence.* Praeger: New York.

Park, R. E., & Burgess, E. W. (Eds.) (1921).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rsons, T (1953). *The sodal system.* Glencoe, IL: Free Press.

Peirce, C. S. (1958).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lner, M., & Emerson, R. M. (2001). Ethnomethodology and ethnography. In P. Atkinson, A. Coffey, S. Delamont, J. Lofland, & L. H. Lofland (Eds.),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p. 118-135). London: Sage.

Prior, L. F. (2003). *Using documents in social research.* London: Sage.

Prus, R. C. (1987). Generic social processes: Maximizing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6, 250-293.

——. (1996).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lived experien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Radley, A. (1989). Style, discourse and constraint in adjustment to chronic illness.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11,230-252.

Radley, A., & Green, R. (1987). Illness as adjustment: A methodology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9, 179-206.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inharz, S., & Chase, S. E. (2001). Interviewing women.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pp. 221-238).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hardson, L. (1990). *Writing strategies: Researching diverse audienc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516-529). Thousand Oaks, CA: Sage.

Rico, G. L. (1983). *Writing the natural way: Using right-brain techniques to release your expressive powers*.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Ritzer, G., & Goodman, D. J. (2004).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4th ed.). Boston: McGraw Hill.

Robrecht, L. C. (1995). Grounded theory: Evolving methods.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5, 169-177.

Rock, P. (1979). *The making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London: Macmillan.

Rosenthal, G. (2004). Biographical research.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48-64). London: Sage.

Roth, J. (1963). *Timetables*. NewYork: Bobbs-Merrill.

Rubin, H. J., & Rubin, I. S. (1995).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Sanders, C. R. (1990). *Customizing the bod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arton, M. (1988). *After the stroke: A journal*. NewYork: W. W. Norton.

Schechter, S. (1982). *Women and male violenc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Scheper-Hughes, N., & Lock, M. M. (1987). The mindful body: A prolegomenon 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1, 6-41.

Schneider, M. A. (1997). Social dimensions of epistemological disputes: The case of literary theor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0, 243-264.

Schreiber, R. S. & Stern, P. N. (Eds.) (2001). *Using Grounded Theory in Nursing*. NewYork: Springer.

Shostak, S. (2004).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genomics: Acting on the futur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 as Culture*, 13, 539-562.

Schutz, A. (1967 [1932]).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walbe, M., &Wolkomir, M. (2002). Interviewing men. In J. F. Gubrium &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pp. 203-219). Thousand Oaks, CA: Sage.

Schwandt, T.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8-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Seidman, I. E. (1998).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Shilling, C. (1993).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Silverman, D. (1997). *Discourses of counselling: HIV counselling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 (2000).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handbook*. London: Sage.

——. (2001).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Methods for analysing talk, text, and interaction*. (2nd ed.). London: Sage.

——. (2004). *Instances or sequences?: Improv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Sec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erlin, September.

Smith, D. E.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oulliere, D., Britt, D. W., & Maines, D. R. (2001). Conceptual modeling as a toolbox for grounded theorist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2(2), 253-269.

Speedling, E. (1982). *Heart attack: The family response at home and in the hospital*. New York: Tavistock.

Star, S. L. (1989). *Regions of the mind: Brain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certainty*.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377-391.

Stark, E. and Filcraft, A. (1983). Social knowledge, social policy, and the abuse of women. In D. Finkelhor, et al. (Eds.), *The dark side of families* (pp. 330-34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88). Violence among intimates—An epidemiological review. In V. B. VanHasselt, et al. (Eds.), *Handbook of Family Violence* (pp. 293-317). New York: Plenum Press.

Stephenson, J. S. (1985). *Death, grief, and mourn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alities*. NewYork: Free Press.

Stern, P N. (1994a). Eroding grounded theory. In J. Morse (Ed.), *Crit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p. 212-2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1994b).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ts uses and processes. In B. G. Glaser (Ed.), *More grounded theory: A reader* (pp. 116-126).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Straus, M. A. (1977).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wife-beating. In M. Roy (Ed.), *Battered women* (pp. 194-238).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Straus, M. A., Gelles, R. J., & Steinmetz, S. (1980). *Behind closed door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Strauss, A. L. (1959). *Mirrors and masks*.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 (1978a). A social worlds perspective.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1, 119-128.

——. (1978b). *Negotiations: Varieties, contexts, processes and social order*.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3). *Continual permutations of acti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1995). Notes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eneral theories. *Qualitative Inquiry*, 1, 7-18.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1994).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Strauss, A. L., & Glaser, B. G. (1970). *Anguish*. Mill Valley, CA: The Sociology Press.

Stranss, A. L., Schatzman, L., Bucher, R., Ehrlich, D., & Sabshin, M. (1963). The hospital and its negotiated order. In E. Friedson (Ed.), *The hospital in modern society* (pp. 147-168). Glencoe, IL: Free Press.

Thomas, J. (1993). *Doing critical ethnography*. Newbury Park, CA: Sage.

Thorne, S. E. (2001). The implications of disciplinary agenda on quality criteria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 M. Morse, J. M. Swanson, & A. Kuzel (Eds.), *The nature of qualitative evidence* (pp. 141-159). Thousand Oaks, CA: Sage.

Thorne, S., Jensen, L., Kearney, M. H., Noblit, G., & Sandelowski, M. (2004). Qualitative metasynthesis: Reflections on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ideological agenda.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4, 1342-1365.

Thulesius, H., Håkansson, A., & Petersson, K. (2003). Balancing: A basic process in the end-of-life care.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3, 1357-1377.

Timmermans, S. (1999). *Sudden death and the myth of CP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B. S. (1992). *Regulating bodies: Essays in medical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Tweed, A. E., & Salter, D. P (2000). A conflict of responsibilities: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f clinical psychologists' experiences of client non-attendance within the

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73, 465-481.

Urquhart, C. (1998) Exploring analyst-client communication: Using grounded theory techniques to investigate interaction in informal requirements. In A. S., Lee, J., Liebenau, & J. I. DeGross (Eds.),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149-181). London: Chapman & Hall.

——. (2003). Re-grounding grounded theory-or reinforcing old prejudices?: A brief response to Bryant.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ory and Application*, 4, 43-54.

van den Hoonaard, W. C. (1997). *Working with sensitizing concepts: Analytical field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Van Maanen, J.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lker, L. E. (1979). *The battered wo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 (1989). *Terrifying love.* New York: Harper & Row.

Wiener, C. L. (2000). *The elusive quest: Accountability in hospital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Williams, G. (1984).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6, 175-200.

Wilson, H. S., & Hutchinson, S. (1991). Triangulation of qualitative methods: Heideggerian hermeneutics and grounded theor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 263-276.

——. (1996). Methodologic mistakes in grounded theory. *Nursing Research*, 4(2), 122-124.

Wuest, J. (2000). Negotiating with helping systems: An example of grounded theory evolving through emergent fit.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0, 51-70.

Zola, I. K. (1982). *Missing pieces: A chronicle of living with a disabilit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Bringing our bodies and ourselves back in: Reflections on 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ed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2, 1-16.



索 引

* 此处页码为英文版页码,后同。

■ 扎根理论是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处理质性资料的方式，其创立于1960年代，被西方社会科学界公认为是过去四十多年中，质性研究发展中最重要的，却也是最受争议的方法论基础之一。

■ 在本书中，作者引导读者接触在社会研究中使用扎根理论的技术，为那些对这个领域还陌生的人提供了清晰的、循序渐进的指导。本书通篇使用了许多精选的例子，描画出了扎根理论的奠基人格拉泽和施特劳斯所提出的扎根理论图景之外的另一种景象。作者认为，扎根理论必须从其实证主义源头那里继续发展，把过去20年来由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很多方法和问题融入进来，使其成为一种更加细致和更具反思性的实践。因而本书对于学生、研究新手以及经验老道的社会科学家，都是一种基础性的阅读。

■ 发表及参阅相关讨论，请登录：
万卷方法与学术规范博客圈（http//q.blog.sina.com.cn/fafang）



ISBN 978-7-5624-4747-4
9 787562 447474
定价：33.00元



万卷方法总书目

万卷方法是我国第一套系统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型丛书，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近两百余名学者参与了丛书的写作和翻译工作。至今已出版图书51个品种，其中绝大多数是2007年以来出版的新书。

2009年版

1 **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教育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南**
赛德曼著　周海涛译
书号:978-7-5624-4679-8

2 **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第2版校订新译本)**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278-4

3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
孙振东著　定价:38
书号:978-7-5624-4649-1

4 **参与观察法**
乔金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616-3

5 **分析社会情境：质性观察和分析方法**
洛夫兰德等著　林小英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690-3

6 **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
卡麦兹著　边国英译　陈向明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747-4

7 **公共管理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第2版)**
袁政　编著　定价:33

8 **AMOUS与研究方法**
荣泰生著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806-8

9 **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
格雷著　许梦云译　高丙中校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698-0

10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
普拉尼等著　郑显兰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720-7

11 **如何做质性研究**
希尔弗曼著　卢晖临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697-2

2008年版

12 **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第8版)**
赫文著　李涤非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4465-7

13 **应用Stata做统计分析(Version 9)**
汉密尔顿著　郭志刚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4483-1

14 **实用抽样方法**
亨利著　沈崇麟译　定价:22
书号:978-7-5624-4487-9

15 **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邓晓芒著　定价:40
书号:978-7-5624-4446-6

16 **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
陈向明主编　定价:30
书号:978-7-5624-4462-6

17 **社会研究方法**
仇立平著　定价:39
书号:978-7-5624-4456-5

18 **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第2版)**
米尔斯，休伯曼著　卢晖临译　定价:78
书号:978-7-5624-4426-8

19 **实用数据再分析法(第2版)**
利普西著　刘军译　定价:37
书号:978-7-5624-4296-7

20 **质性研究的伦理**
丁三东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304-9

21 **叙事研究：阅读、倾听与理解**
利布里奇著　王红艳译：定价:27
书号:978-7-5624-4303-2

22 **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第2版)**
麦瑞尔姆著　于泽元译　定价:33
书号:978-7-5624-4349-0

23 **爱上统计学(第2版)**
萨尔金德著 史玲玲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196-0

24 **复杂调查设计与分析的实用方法(第2版)**
雷同能著 王天夫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4290-5

25 **美国心理协会写作手册(APA格式)(第5版)**
美国心理协会著 定价:49
书号:978-7-5624-4130-4

2007年版

26 **做自然主义研究:方法指南**
欧兰德森著 李涤非译 定价:32
书号:978-7-5624-4259-2

27 **多层次模型分析导论(第2版)**
Ita kreft 著 郭志刚译 定价:35
书号:978-7-5624-4060-4

28 **评估:方法与技术(第7版)**
罗希著 邱泽奇译 定价:49
书号:978-7-5624-3994-3

29 **焦点团体:应用研究实践指南(第3版)**
克鲁杰著 林小英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990-5

30 **质的研究的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第2版)**
马克斯威尔著 朱光明译,陈向明校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71-4

31 **组织诊断:方法、模型和过程(第3版)**
哈里森著 张小山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055-1

32 **民族志:步步深入(第2版)**
费特曼著 龚建华译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996-7

33 **分组比较的统计分析(第2版)**
廖福挺著 高勇译 沈崇麟校 定价:35
书号:978-7-5624-3942-4

34 **抽样调查设计导论(第2版)**
扎加,布莱尔著 沈崇麟译 定价:39
书号:978-7-5624-3943-1

35 **定性研究(第1卷):方法论基础(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58
书号:978-7-5624-3851-9

36 **定性研究(第2卷):策略与艺术(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8
书号:978-7-5624-3286-9

37 **定性研究(第4卷):解释、评估与描述的艺术及定性研究的未来(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38
书号:978-7-5624-3948-6

38 **定性研究(第3卷):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第2版)**
邓津等主编 风笑天等译 定价:45
书号:978-7-5624-3944-8

39 **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第2版)**
克雷斯威尔著 崔延强译 定价:29
书号:978-7-5624-3644-7

40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2版)**
约翰·斯科特著 刘军译 定价:28
书号:978-7-5624-2147-4

41 **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方法:理论与应用**
李钢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50-2

2007年以前版

42 **论教育科学:基于文化哲学的批判与建构**
申仁洪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41-6

43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黄欣荣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825-0

4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
陈向明著 定价:25
书号:978-7-5624-3689-4

45 **电话调查方法:抽样、筛选与监控(第2版)**
拉弗拉卡斯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441-7

46 **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
沃恩著 沈崇麟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669-X

47 **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第6版)**
米勒著 风笑天译 定价:68
书号:978-7-5624-3295-1

48 **量表编制:理论与应用(第2版)**
德维利斯著 李红等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0-5

49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3版)**
殷著 周海涛译 定价:15
书号:978-7-5624-3266-1

50 **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第2版)**
邓金著 周勇译:定价:15
书号:7-5624-3185-X

51 **调查研究方法(第3版)**
福勒著 孙振东译 定价:15
书号:7-5624-3289-9